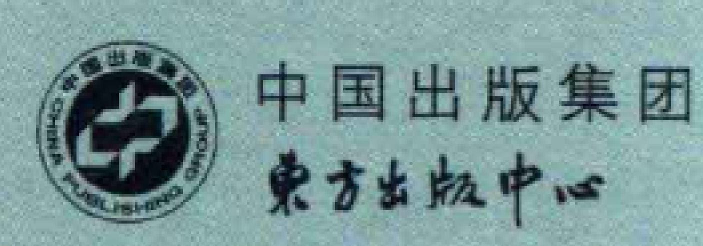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下册

欧洲史

J.M.罗伯茨 著 李腾 史悦 刘旭 黄小洁 毛佳鹏 魏孝稷 译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


ISBN 978-7-5473-0597-3

定价：10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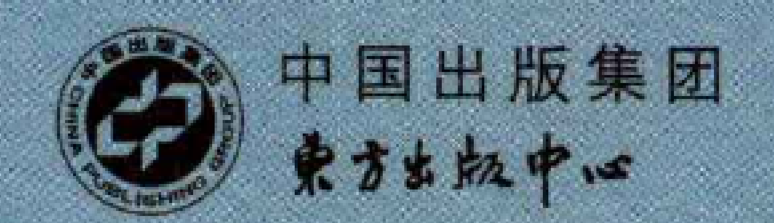


下册

欧洲史

J.M.罗伯茨 著 李腾 史悦 刘旭 黄小洁 毛佳鹏 魏孝稷 译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



第四卷

欧洲的时代

341

随着欧洲的近代化,世界历史这个主题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首先,人们可以从经济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世界历史的存在;其次,世界历史也以政治和外交体系的面目出现。如今,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到了它的最终阶段,也就是文化和知识的综合化。世界历史以及它的这种进程并不是人为计划的。整个过程一直显得比较凌乱且不完整,而且人们经常意识不到这个进程。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它的发展既没有在时间上同步,也没有遵循相同的方式。20 世纪初,种族仇恨在巴尔干依然蔓延,这和人们在巴黎与柏林过的现代生活显得格格不入(而且世界的其他角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石器时代)。不过,欧洲的通讯、技术和帝国政府已经能让许多的理念和实践逐渐实现共享,同时也渐渐侵蚀着其他大陆上那些古老、根深蒂固的文明传统的势力与影响。由于各种机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传播,物质生活的潮流也渐渐趋向于建构一个与这些倾向和进程相适应的世界。有人把 19 世纪描绘成"欧洲的时代",这一时期欧洲所作出的成就以及在欧洲发生的事件,都毫无疑问地印证了这一描绘。

不过对于欧洲那些不断扩张的大国和他们在世界各地树立的威权来说,只有从这些社会和文明的外部观察,才能看出一些相互联系和统一的特征。欧洲人有意无意地利用他们新的统治力来使世界同一化,并强制性地推广那些得到了他们共同承认的"欧洲"标准。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彼此之间的内斗并没有停止,并且他们还强调那些在各自看来是根深蒂固的差异。由于欧洲自身迅速但不均衡的快速发展,这种差异性被扩大了。欧洲可以说第一次变得政治化、世俗化、个性化和工业化了。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正经历着巨变,比他们前几代人所经历的更加剧烈。这些变化中有很多在持续发生,且越来越快,直到 20 世纪。

第十六章　新　政　治

343

一个革命的时代

19 世纪的欧洲史(正如 18 世纪那样)大多还是战争和冲突的历史。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在大陆的传播和认同。到 20 世纪初,欧洲人对主权国家的认同达到了巅峰。主权国家的至高地位在原则上已经无懈可击,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教皇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它。那个时期,其他的一些主要政治思想,只要遵循着一定的基本原则,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这个原则就是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发来使权力合法化并规范对权力的使用。另外在 1900 年还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并没有完全成型,仍然受到质疑,甚至在某些国家还遭到抵制,这就是民主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让大众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是必要的、令人向往的,甚至是必然的。最终,在 19 世纪末,无数欧洲人开始支持社会主义这一 19 世纪初闻所未闻的信条。不管是否愿意接受,就连欧洲最反动的统治者也在 1914 年被迫同意将这种观点纳入考虑的范围。

在 18 世纪,另外一个政治词汇有了新的含义,这就是“革命”。传统上这个词仅仅被用于表示政府构成的更替,而非一定意味着暴力流血。当大臣更替的时候,人们可以在特别法庭上使用“革命”这个词。

而在1789年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19世纪，这个词汇经常在政治家和焦躁不安的大众的观念里流传。人们开始设想一种新的革命，一种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以表面上或暗含的暴力为特征。这种革命可能导致无法预计的彻底变革，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变。此外，这种对革命的新看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从对革命现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普世性和广泛具有的特点。即便强烈反对这种革命诉求的人也不得不同意，这种新的革命是这个时代政治的基础。

虽然19世纪是个在政治上疾风骤雨的时代，但并非所有的政治变革都能被冠以“革命”之类的词汇。不过我们依然可以说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究其原因，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政治动荡，并且都以激进和暴力为特征。不过这些革命有很多都失败了，还有很多偏离了人们起初的设想。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变通地理解革命这个词，把那些政治集团快速或者基础性的反常的更替也算进去的话，我们就能发现这个时代有许多非暴力性的政治变革达到了革命性的结果。

344

第一个跨海的欧洲国家

在欧洲历史的新纪元里，第一场政治革命却发生在欧洲之外，时间是在18世纪结束之前。这场革命即第一个不列颠帝国的解体。1763年，不列颠帝国在北美的统治正值巅峰。他们从法国手里夺走了加拿大，同时也击溃了法国在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的防御壁垒，法国希望通过这些壁垒阻挡不列颠的13个殖民地，不让他们侵入西部地区，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一时间有很多人认为去除法国的威胁并不会加强不列颠对北美的控制，反而会削弱它。殖民者(他们的数量比欧洲的几个主权国家的人口加起来还多)中有很多人都不是纯正的英国人，甚至母语也不是英语，他们并不完全忠心于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帝国的霸权并无瓜葛。加上殖民地和伦敦之间相去甚远，不列颠政府很难真正地控制他们。

1763年的《巴黎和约》很快惹出了麻烦；新的问题立刻跃入了人们

的视野。那些唾手可得的西部土地如何处置？殖民者被允许对那些土地展开哪些活动？统治加拿大产生的新问题应当如何处理？随着殖民者对西部地区侵入力量的加强，印第安人开始进行反抗运动，这也迫使不列颠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帝国政府随即宣布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地区属于帝国。这立刻引出了一系列殖民问题。随后，不列颠政府开始与印第安人进行关于土地条约的谈判，并且用守备部队将政府人员和殖民者彼此隔离开来，这些举动引起了更大的不满。之后 10 年里，殖民地独立这个一直孕育着的潜在可能性慢慢浮出水面，独立的时机业已成熟。不过这一进程的快慢一直取决于不列颠政府的主动性。殖民地人民对此深感不满，一开始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抵制活动，之后发展成了叛乱。殖民地的政治家们为了让他们的追随者变得更加激进，采用各种挑衅英国的方法。政治家们声称，殖民者以前最重要的实际自由权利正在受到威胁。

美国革命

345

1763 年	《巴黎和约》结束了“七年战争”（也称“乔治国王”战争）。
1764 年 7 月	税收名目的增加激化了殖民地的躁动不安。
1773 年	“波士顿倾茶事件”标志着反抗英国税收的开始。
1775 年	列克星敦的枪声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首次流血冲突。
1776 年	《独立宣言》在费城签署。
1777 年	萨拉托加大捷。联邦条例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独立殖民地。
1778 年	法国与美国签署同盟条约。
1779 年	西班牙加入对英国的战争。
1781 年	英国在约克镇投降。
1783 年	大英帝国和美国在巴黎签署条约，承认美国独立。

所有的英国大臣都认同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管政策上是否有分歧，美利坚人应该缴纳税款，用以维持他们的防务和帝国向那里输送的日常用品。英国不论是试图强征殖民地的食糖进口税还是依据某些法律文件增收印花税，这些行为都会涉及另外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显然英国的政客和美洲殖民地的纳税人对这一问题都心知肚明，那就是这些税收立法行为都是由英国议会单方面决定的。那时，通常的增税行为都已经在殖民地当地的会议中进行讨论了。实际需要研究的问题是，

英国国会是否应该有超越殖民地的最高立法权。

当暴乱来袭的时候,通常都会颁布禁运法令,并伴有愤怒的抗议,但如今伦敦政府已经不再使用这些陈旧的手段。他们换了一种方式,对输入殖民地的日常用品课以重税。由于这种税并非内部税收,管理权通常也都掌握在帝国手中,所以这种方法看起来更加有效。但是如今,美利坚的激进政治家对他们的人民灌输了新的思想,他们坚信既然一个立法机关中没有他们的代表,那么这个机关作出的税收决议就不应该被认同。这一思想直接攻击了英国政府,而非英国皇室。殖民地内发生了更多的暴乱和抵抗运动(虽然当时还没有“抵抗运动”这种说法),1770 年,在这些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中,发生了一次“波士顿屠杀”事件,该事件在反殖民运动的历史和传说中都很有分量。在这次事件中,可能有五名左右的暴乱者被英国士兵击毙。

不列颠政府又一次妥协了。但不幸的是,不列颠政府意识到,现在问题已经超越了税收的范畴。国王乔治三世曾说道:“我们既不能全然控制他们,也不能完全失去他们。”不过这话说得已经有点迟了。殖民地问题的焦点虽然集中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相同的征兆已经遍及整个殖民地了。到 1773 年,激进分子毁掉运茶船的时候(也就是波士顿倾茶事件),不列颠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变成:我们还能否继续维持对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统治?

346

乔治三世以及他的首相和大臣们都认为如今已经没有可以妥协的余地了。国会通过了强制性的法案试图控制住波士顿。同时在 1774 年,英国国会通过了《魁北克法案》,这一法案对于加拿大的未来发展无疑是仁慈和正面的,但是却激起了美利坚的强烈反对。很多人反对该法案给予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英国希望通过此举尽量平稳地通过更换统治者来控制住法语加拿大地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将加拿大的领地向南扩展到俄亥俄地区会大大阻碍他们向西部发展的脚步。同年 9 月,在费城召开了一次由各个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大陆会议。会议决定断绝与英国的贸易联系,并且要求废除大部分现存的殖民地法律,包括《魁北克法案》。

至此,武装冲突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殖民地的激进政治家们促成美国独立的思想已经昭然若揭,殖民地的人民也都对此心知肚明。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独立这一思想发展成型的速度也确实快得惊人[①]。不过对于任何18世纪的帝国政府来说,要理解这一想法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虽然很明显美国不会屈从于英国的统治,但是英国政府直到对于殖民地进行法律层面的威慑已经毫无效果,殖民地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才极不情愿地诉诸武力。最终,危机终于降临。1775年4月,一队在列克星敦抓捕马萨诸塞殖民地武装的英国士兵遭遇了袭击,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独立革命的第一次行动。在此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殖民地的领导人终于统一了认识,坚信必须要完全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由此,1776年7月,《独立宣言》诞生了,一切的争论也都随之转移到了真刀真枪的战场上。

英国后来战败了,原因包括地理因素,美国将领指挥得当,法国的参战报了1763年的一箭之仇,而西班牙的介入则打破了海军力量的平衡。同时英国在战场上也畏首畏尾,因为他们不愿意用军事胜利来打击美国民众,让那些本来愿意投靠英国的人也断绝和他们的联系,并激起反叛者们最擅长的自由解放运动。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只能是打开一道和平之门,劝慰殖民地重归英国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法国波旁王朝的结盟更是致命的。1781年,当一队英国军队发现他们在约克镇陷入美国陆军和法国海军的包夹时,英国的军事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虽然只有大约7 000名士兵在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降,但这成了英国军队最大的耻辱,也标志着英帝国统治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停战谈判,两年之后,英国签署了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英国方面同意美国的领土可以到达密西西比河流域(这也奠定了美国国家版图的基础)。

347

① 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和大部分美国人来说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观念,12年前对他们来说还是十分富有挑战性的理念。"(R. Middlekauff, *The Glorious Cause*, New York, 1982, p. 3.)

虽然由于美国革命,欧洲对于这块遥远的大陆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少,不过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讨论。这个西半球上的新国家的出现——尤其还伴随着西部地区蕴藏的大量资源——在各种层面上都是革命性的改变。不过当时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的潜力,这个新国家的孱弱更加明显。实际上,它还远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各个殖民地都还不够强大,并且相对独立,很多人都料想他们会陷入各种争执中从而分崩离析。不过美国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他们和欧陆相距甚远,这样他们可以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处理各种问题,这也成为之后美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有利因素。接下来的六年里,一些美国政治家们凭借这些优势,作出了许多决定。这些决定日后将会塑造我们今天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里也包括欧洲。

美国和欧洲的观念

在战争的背景下,美国人通过了《联邦条例》,其中规定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名称。和平的时光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这些条例远远不够。最终在 1789 年,诞生了一部宪法。同年 4 月,美国战时的军队司令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这个崭新的共和国,同时也是第一个独立的,曾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的第一任总统。18 世纪的欧洲几乎没有共和政体,这种体制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在欧洲人熟悉的历史上,意大利古老的共和制城市国家并没有比更早的罗马和雅典的古典共和制度有更为先进的地方。而人们对于古代共和制的印象,一方面是一些领导人富有传奇色彩的统治方略,另一方面是各个派系同样为人诟病的内讧。欧洲的共和主义者也很少,尽管仅有的那些人也吵吵嚷嚷,但是他们的影响总归很小。而在人们的印象中,这种体制如果说能成功的话,也只能是在小的城市国家里。因此观察家们普遍对美国的前景不抱希望。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后美国的成功对于欧洲传统的共和体制观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不久以后,欧洲人的政治改革就将尝试从美国的共和体制中汲取养分。而其他尝试从欧洲人的统治下独立的殖民地亦

将如此。

尽管如此，美国的新宪法还是深深地植根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历史经验中。新的国家法律体系除了吸收习惯法的原则外（几年之后，法国的地方性法律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政府在实际组织上还参考了英国的宪法理论，在行政机关的顶端安排了一个类似君主的职位（尽管是选举产生的，也没有王冠）。美国的国父们选取了他们所知的最好的宪法，并且对宪法进行了改良，依据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具体内容进行了修改。他们没有选择那个时代里欧洲更加盛行的政府改革方式，也就是君主专制体制，即使是更加“启蒙”的形式也没有入他们的法眼。

美国通过采用联邦制度的原则，自觉地同英国宪政模式决裂。之前的殖民地从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来对抗宿主，因为他们对英王乔治的政府非常信任。联邦政治的结构也为多样化的殖民地现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像新政府的座右铭所宣示的那样，他的理念是“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联邦制度强烈吸引着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将之视为调和统一与自由的关键方式。在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英国政府也把它作为处理殖民地问题的重要的备用手段，而一个新的欧洲国家也将采取这种方式作为宪法的框架，这就是德国。

另外一个对欧洲影响很大的理论是美国宪法最开头的几个字：“我们也即人民（We the People）。”他们加入这句话似乎出于偶然，因为在1789年的美国政治现状中毫无民主的特征，甚至在美国的国父中有好几位都十分畏惧甚至憎恶民主制度。尽管如此，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理论无疑是缘起于此。这使得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理论以及欧洲的普遍思想大相径庭；合理的统治权力来源于民众对自己被统治给予的认同（早在《独立宣言》中就有过类似的叙述），这种民主制度的采用对于传统思想来说是重要的突破，虽然这种制度也无法解决所有政治统治的问题。所以说美国革命在世界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并不完全来自它的直接影响。随着一代一代的延续，这个崭新的美利坚

合众国将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国家,那些希望让整个世界重归自由的人们将会聚焦于此。就像一个美国人所说,这是"世界最后的和最好的希望"。

美国革命产生了很多长期影响,不过在短期内,它对于英国之外的欧洲国家影响有限。18 世纪 80 年代,在一些较小的国家(联省共和国和瑞士的日内瓦地区最为主要)也发生了被称为"革命"的动荡或者骚乱,当时的人们有时会把美国的例子和这些革命联系起来。但是美国革命对于欧洲的影响中,最为显著的是影响了那些作为盟军参与革命战争的法国人。这些人很快就会被卷入到另一场由其他力量推动的革命洪流中。这些法国人的观念,加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两位曾经出使过法国的要人的努力,最终形成了法国流行思想中微小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促使革命的观念在那个年代"流行"(*á la mode*)起来,为法国即将发生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做了铺垫,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虽然这个国家革命频繁,但是这一专有称呼从未改变。

349

法国大革命

这里所说的"事件"是一个历史学科专门造出的词汇,仅仅用来代指那一系列可以相互区别、接连发生的事情中的某一件,而这些事情往往被认为是较大的历史进程的"真正"的起点。"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混乱的、始料未及的、前所未有的,以及至今仍然难以想象的事件的汇集。当时的情况与其说是拧开了开关,不如说是打开了煮着沸水的锅盖或者山崖突然崩塌。在 1789 年(传统上认为革命开始的年份),没有人能意识到马上会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先兆。另一方面,法国人认为正在发生的动荡距离自己的本土都非常遥远,而且也都按照他们的预期进行着,尽管后来证明这些都是一厢情愿。而在当时的法国,如果有重大的变革,就势必会演变成国际事件。因为当时的法国是俄国以西的欧洲最强大的势力。法国在学术和艺术领域发展迅速,也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由于法语的规范和文雅,欧洲人普遍都很熟悉法语,因而在巴黎的思想探讨能够很快在整个欧洲获得反响。在 1789 年之后那

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这些传统观念依然影响很大，即使是那些有意无意地推动了革命发展的人，依然还是宁愿向过去寻求答案，而并不关注未来。

18 世纪 80 年代，英法之间长期存在、时断时续的竞争成为对法国影响巨大的历史因素。法国为了参与美国革命战争以便打击他们的老对手，付出了财政上的沉重代价。而这场战争除了让英国丢了脸之外，法国也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反而在它高筑的债台上又增添了一层负担，这些债务是 17 世纪 30 年代以来，法国的统治者在欧洲称霸的代价。1774 年登基的路易十六是一位年轻、有些迟钝，原则性强且用心良好的国王。路易十六及其治下的大臣们试图偿清法国债务，将国家从财政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没有成功，他们只能面对失败，无计可施。整个 18 世纪 80 年代，国家财政破产一直威胁着法国。

社会和政治的现状也妨碍着法国更好地处理财政问题：主要的阻碍就是特权、特殊豁免权和法定期限权。在 18 世纪的欧陆各国都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悖论，那就是专制君主如果想要侵犯大众从中世纪的法规那里继承来的自由和权利，也就必然会威胁到自身统治的基础。而 18 世纪 80 年代，更多的法国人并没有看到这些，他们认为法国要脱离眼前的困境，就必须改革政府和法律的体制。有些人甚至想得更远。他们认为政府没有能力将财政负担公正合理地分担到各个阶级的肩上，并将此看做各个阶层普遍要求改革的典型理由。这个问题开始被一系列对立的词汇所形容，认为这是理性和迷信、自由和奴役、人道主义和贪婪的对立。最终，各色言辞都集中于一个典型的问题上，这就是法定特权，被人们看成不平等的化身。而由此激起的愤怒则都投向了贵族阶层，不过这个阶层包含的人很多，他们之间也各不相同（在 1789 年的法国，贵族男性大概有 20 万至 25 万），很难从文化、经济或是社会角度寻找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贵族们都享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根据他们等级的不同，享有不同的特权。

350

这种特权只有和贵族们达成协议才能废止，但是到 1788 年，这种

对于皇家官员(通常都是贵族)和国王本人的特权的屈从已经开始减弱了。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试图通过法律渠道来控制局面。法国曾经具有的最接近全国性代表机构的是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分别由贵族、僧侣和平民代表参加,最后一次召开三级会议是在1614年。政府寄希望于用这种大家都认可的代表机构来获得足够的道德上的控制力,以便使得增税的财政特权法案得到通过。不幸的是,虽然三级会议这种解决办法被政府寄予厚望,但是三级会议具体有哪些职权,却并不十分明确。对此人们众说纷纭。一些激进分子说三级会议可以制订国家法律,而且这些法律要高于那些从古至今延续而来的法定特权。

如今政治危机又节外生枝,而且迫在眉睫了。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的人口增长比上一个世纪已经有所减缓了,但是其速度仍然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这使得农产品价格的通货膨胀有增无减,受害最严重的就是穷人,大部分法国农民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土地。法国政府为了渡过财政危机,不仅借款,也直接或者间接增税,这些压力最终都落到了穷人头上,而地主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断地降低工资,提高租金和各种费用。在整个18世纪,穷人们的生活越发艰难和悲惨。而18世纪80年代末,在普遍的贫困景象之外,其他灾难也接踵而至。农业歉收、牛群染病、经济衰退,这些都令法国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最终,1789年的三级会议在一种群情激愤的背景下召开了。无数生活穷困潦倒、千方百计寻找出路的法国人,非常热切地希望寻找和谴责那些应该为这些弊病负责的人,而且他们抱着不切实际却又十分热忱的想法,指望他们信任的国王能帮他们改善这一切。人们都毫不怀疑,只要国王知道了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他就会作出必要的变革。

351

政府无能、社会不公、经济艰难、改革的愿望十分强烈,这些因素的复杂互动最终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人们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渴望过革命的发生。社会不公的情况确实很普遍,但也并不比18世纪的其他许多国家更加突出。针对在道德和宗教层面对出版物进行的审查,法

国兴起了一场旨在废除这项审查制度的改革运动,很多人强烈地期望和拥护这场改革。而此刻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能和保守的政党针锋相对。这样的政党直到 1789 年 5 月 5 日三级会议召开以后才成立,而这个日子也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支持还是反对革命成为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由于法国是欧陆的大国,三级会议也立即产生了外交上的反响。最终三级会议既没有让法国瘫痪(许多外国的外交家都希望如此),也没有解决法国的燃眉之急,恢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大地位。

1789 年夏天,三级会议变成一个能够行使国家权力的全国性会议。这个会议的主要成员宣称他们将平等地代表每一个法国国民,而不像人们先前预计的,这个会议将代表中世纪所划分的社会等级。他们迈出这一革命性的步伐,是由于政府被农村的暴乱和巴黎人的起义吓怕了,他们认为已经无法完全依赖军队,而农民们对贵族乡间住所进行的掠夺也吓坏了保守派们。这使得国王第一次抛弃了特权阶级,在新成立的国民大会的领导者的要求下,他十分不情愿地承认了许多几个月前无法想象的事。这些承诺在那些支持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随后,这两部分人被称为左派和右派(源于他们在国民大会中就座的位置),并且这一指称传遍了世界。

国民大会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书写宪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法国的政治结构进行了革命性的重组。直到 1791 年国民大会解散,他们已经将教会的土地国有化,废止了所谓的“封建体系”,废除了审查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代议制政府体系,他们废止了旧的行省划分和地方机构,用新的“省”(departments)来代替这些地方单位,他们视平等高于法律,并将行政和立法权力分开。这些仅仅是国民大会所做的改变中最主要的部分。国民大会的失败则似乎将这些成就抹杀了,这些成就可以说是将法国近代化的种种法律和机构上的障碍都清除了。人民主权、中央集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原则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诞生了,在法国政治的发展历程中,人们经常会重拾它们。

对于这些变化,许多法国人无法全部接受,有一些人则对其全盘否

352 定。到1791年,法国国王已经明确地印证了他的担忧,革命早期对于他善意的支持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已经被当成反革命者。许多的法国贵族(以国王的两个兄弟为首)对于革命已经无法忍受,纷纷移居国外。而国民会议将教会的相关问题纳入改革的范畴也激起了很多法国人的反对。这些改革涉及了许多的法国人,包括教士。但是教皇拒绝接受这些改革,因而法国天主教会就必须作出选择:教皇和国民大会两者谁拥有更高的权威?这成为了革命中最重要的政治分歧,同时也是数个世纪以来教权和王权之争的新的翻版。

到1792年,法国已经和奥地利、普鲁士开战了。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法国人认为外国势力想要干涉大革命,使得旧制度复辟。确有一些外国政治家如此打算。到夏天,战事不利,国内物资短缺,人们也心生疑虑,而国王成了主要怀疑的对象。一伙巴黎暴动者推翻了法国国王,并且召集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准备草拟一个新的法案,在那时这种法案也是共和性质的。这个机构被称为国民公会(Convention),直到1796年它都是法国政府的核心机构,不过大部分国民公会的成员,其政治观点比他们的前任进步不了多少。他们相信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对任何敢于提倡为土地共产主义立法的人判处死刑)。他们通过男性成年公民的普选权,允许一些穷人在国家事务上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他们真正特殊的地方是他们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比以前的法国统治机构更加冷酷无情,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尤其是当他们面对失败的危险的时候)。他们也同样控制着首都,让一群激进政治家指挥暴徒们用极端的方式做一些偏离他们愿意的事情,而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更加富有民主色彩。和以前一样,他们也威胁着欧洲其他地区。同时,他们也尽力确保革命的进行。

具有象征意义的与过去的决裂在1793年1月到来了,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了对国王的死刑。对国王的这种合法谋杀被认为是对英国处死国王的翻版;不过英国当时也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震惊。英国随后也向法国宣战,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国击败驻扎荷兰的奥地利军队后,产生战略和贸易上的不利影响。不过这场战争越来越像一场意识形态的大

战。为了赢得战争,法国开始使用更加残忍的态度,使用更加暴力的方法。一种相对仁慈的死刑器具——断头台——成为法国恐怖统治时期(the Terror)的象征,而恐怖统治时期这个名词也很快被用来指代国民公会为了保卫革命,恐吓国内的反对势力而不择手段的那个时期。一部分恐怖统治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是政治家们为了保持己方的信心,同时恐吓和打击对手的夸夸其谈。实际上这种现象反映了爱国主义、实际需要、意识形态混乱、自私自利和打击报复心态的混杂,而过去的成就都被囊括在共和的名号之下。大约有 3.5 万或者更多的人罹难,许多人出国避难,但是只有少数人死于巴黎的断头台,更多的人死于各个省份爆发的内战,或者死于他们自己的军队。在 18 个月里,那些被同时代的法国人称为怪物的同胞,杀死了许多人,数量几乎相当于 1871 年巴黎公社流血周里死于街头冲突和行刑队的人。流血冲突加深了法国人内部的隔阂,不过这种隔阂不应该被无限夸大。几乎所有法国贵族都在革命中有所损失,但只有一小部分到了必须移居国外的地步。可能僧侣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有大量的僧侣逃到国外。不过革命产生的难民还是要比 1783 年美利坚殖民地产生的少很多。

353

到 1797 年,欧洲诸国中只有英国还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恐怖统治时期已经结束,共和国的统治已经变得更像一种宪法制约下的国会政体,国民公会在 1796 年结束了它的统治。革命成果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已经有些不同于以往了。在国外,保皇势力试图和那些计划回国的人结成同盟,同时和国内带有不满情绪的人也积极策划阴谋。不过过去统治秩序的复辟并不是多数法国人所期盼的。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民主理论需要进一步落实,因为此时国内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依然很明显,类似之前特权阶层和无特权者之间的差距,巴黎的激进民众也要求在国家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都让人担心,一方面在革命中获利的人担心会失去他们的利益,一方面人们担心会爆发新的流血冲突。因此督政府(Directory)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来回摇摆,希望找到一个较好的立场,不过政府的反对者发现这种中间道路(*via media*)——某种程度上是墙头草式的(zig-zag)——令人难以接受。

最终,一帮政治家连同军队一起在 1799 年发动政变(*coup d'état*),颠覆了政府统治。

革命的表象与现实

三级会议以后仅仅 10 年,法国像是与中世纪的历史彻底决裂了。在许多领域也确实如此。几乎所有的重大法律改革都在 1789 年被以立法的形式,至少从原则上确立下来。对封建体制、法定特权和君权神授的正式废止,以及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为基础来组织社会,正是 1789 年《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这也成为 1791 年宪法的引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则是具体的政策上的表现。而人民主权理论通过建立统一的国民会议得以实现其统治,没有任何地方或是组织能够以特权行使立法权,这成为支撑革命的法理基础。一方面,新的体制看起来可以经受更加严重的财政危机,旧的君主制度无法驾驭的财政危机(国家破产,货币流通崩溃)现在看来不成问题;另一方面,新的体制将会进行行政改革,以往只有开明君主制才能梦想进行这种改革。其他的欧洲国家对此十分意外,甚而瞠目结舌,他们看着这个强大的立法机构被推翻,而法国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有新的机构诞生。立法主权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手段,开明君主都明白这一点。严刑拷打不复存在了,贵族头衔也没有了意义,司法上的不公消除了,法国手工业者旧的行会也取消了。之前的贸易联合体被扼杀在摇篮里,因为法律禁止工人或雇主联合的集体经济形式。回想起来,对于社会市场的改革事先毫无先兆。甚至在加洛林时期就采用的 1 ∶ 20 ∶ 12 的货币兑换比率[里弗、苏和丹尼尔(*livres, sous and deniers*)三种法国货币单位之间的兑换,也称为 L. S. D,到 1970 年英国仍然采用类似的比率]也被法郎(*francs*)和生丁(*centimes*)之间十进制的新兑换方法代替,而旧时采用的混乱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也(在理论上)被新的公制单位代替,很快这种单位就被普遍采用(实际上,直到 19 世纪,法国农村还在采用这些单位)。

354

巨大的改变引起了很多分歧,而人们的思想变化总是比这些律法

的变化要缓慢。农民们非常高兴封建义务被废止了，但是他们也对公共土地的消失感到不满，以前通过开垦公地，他们可以获得收益，而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封建”制度。这种保守主义在宗教事务方面尤其重要，不过却很难说明白。位于兰斯（Reims）的教堂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国王进行涂油礼的地方，在恐怖统治时期被当权者公然捣毁了；巴黎圣母院中对基督的供奉被对理性的崇拜所代替。许多僧侣都承受着严重的迫害，“九月大屠杀”中死去的殉道者也被人们长久纪念。显然，在这种恐怖气氛下的法国，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了。虽然多数法国人对神圣君主并不怀念，但是教会的处境却激起了人们对革命的反感，不过也仅限于反感而已。许多革命者推崇对于一些类神的崇拜，比如理性或超自然，但是民众并不太感兴趣，很多人还是更乐于看到天主教会正式回归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当然最终教会确实回来了。实际上，那时候很多教区的法国男男女女经过长期的努力，自发地重建了教会。

法国之外的革命

1789 年的宣言起初赢得了许多赞许，并没有其他国家对其进行谴责。不过很快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尤其是法国政府开始通过宣传和战争把这种观念向其他国家灌输以后。法国的革命引起了很多关于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的讨论。法国实际上给欧洲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左派和右派的说法也一直在国际上被沿用至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虽然大概 10 年后这些词语才被使用）也成为政治词汇，显然法国革命成了检验政治倾向的试纸。这两种政治立场，一种是共和主义、普选权、个人权利、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另一种是秩序、原则、法定职责之外更多的义务——而非权利、承认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以及依靠道德调剂市场活动的倾向。

355

一些法国人建议其他国家也借鉴法国解决国内问题的方法。而法国也利用有意识的宣传和传教士的努力来加强法国的影响力。这些并不全是出于法国的傲慢。在前工业化的欧洲，各个地方社会都有很多

相同之处;因而所有的国家也都可以从法国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不仅仅对革命的肯定者和支持者来说是空前的和全面的,同时也动摇了欧洲保守主义的根基。1789 年以前,近代保守主义思潮的诸多构成要素都已粉墨登场:开明君主制改革引起的触痛,"启蒙"思想的威望及其在世俗领域的影响力给僧侣阶层带来的不满,以及动摇了浪漫主义核心的理性主义的流行带来的感情上的抵触。这些反对因素在德国十分明显,但是在英国更甚,那里不仅是第一次,而且之后还以各种方式出现了最激烈的保守反革命的论述,例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 1790 年出版的作品《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鉴于作者之前维护北美殖民地独立的立场,这本书显然不是对特权的不假思索的维护。书中的保守主义立场从法理上维护了现行体制,并且通过社会学理论阐释了其具体观点,这本书作为一部作品,不仅仅包含了立场和分析,更是道德的化身。与此相反,革命遭到谴责,被说成是知识分子的自大,空洞的理性主义,以及傲慢的表现——对于基督教来说,傲慢是诸罪之首。

大革命给欧洲带来的严重分歧使得人们对革命的新看法日渐清晰。旧观点认为政治革命不过是一些细节的革新,总体上还是延续的。而新观点则认为革命是激进的、全面的大变革,没有什么机制不能被触及,没有什么原则不能被打破,而且可能会对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元素进行颠覆,比如家庭和私有财产。不管人们对于这幅革命的景象感到震惊还是鼓舞,一旦一个地方发生了革命,不论是同情还是愤怒的人都会认同,革命笼罩了社会的各个角落。19 世纪的人们甚至意识到革命是一种普遍的、延绵不绝的现实力量。这是一种对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极端表达,而政治则绝不会消亡。同时也还有一些人认为,无论具体的原因和环境如何,起义者和颠覆分子都应该遭到谴责,或者都应该被认可。这些关于革命的神话既造成了许多痛苦,也成就了许多解放。一开始是欧洲,随后欧洲所影响的整个世界都必须生活在对于革命反响强烈的环境里,就如同以前的人生活在对宗教的热忱中一样。这种遗风也是法国大革命影响力的印证。

356

革命与欧洲的跨海帝国

如今所说的“反殖民运动”的历史始于早先美国革命的对外影响;最先见于格兰德(Rio Grande)河以南的地区。相比于英国在北美的活动,18 世纪的西班牙试图在它的殖民地上开展一系列改革。随着波旁王朝代替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西班牙开始了根本性的重构和一开始不太情愿的让步,放宽了以前闭塞的贸易体系。以塞维利亚港为中心的单一的殖民地贸易形式的终结,令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及其海外殖民地都从中受益。不过这些变革并没有解决所有殖民地的不公待遇。殖民地还存在许多公然的暴乱,有一些对殖民地政府威胁很大,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控制。这种在殖民地发展地方武装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也给了殖民地军事力量来对抗西班牙。另外白人之间也产生了隔阂;虽然殖民地的最明显的社会区别存在于白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之间,但是克里奥尔人(*creloes*,在殖民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和半岛人(*peninsulares*,在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之间也有分歧。而且他们之间的隔阂不断扩大。克里奥尔人对他们遭受帝国政府的排挤感到不满。北美殖民地成功从英国的帝国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消息自然被他们注意到了。

1790 年,随着一场英西之间的争端,西班牙君主最终正式放弃了他从历史依据出发,统治美洲全境的要求。在北美定居的西班牙人只有权禁止其他国家的人在其 30 英里的范围内定居或是贸易。西班牙在格兰德河以北的领地又被一系列战争重新划定(1793 年同法国的战争,1796 年和 1805 年同英国的战争,以及最终 1808 年同法国的战争),西班牙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些加勒比海的岛屿,而更大的损失在于 1800 年他们将路易斯安那交给了法国。三年后,西班牙又将它的一块所谓的领地(大体上是从密西西比到落基山之间的全部地区)卖给了美国,这是最大的一份土地契约,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版图变动,这块新加的土地比美国原有的土地面积还要大。而这项举动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历史影响。

除了中南美洲的领地，西班牙在北美还拥有一些地盘，包括落基山以西的地区和红河以南的地区。随着1805年英国在特拉法尔加(Cape 357 Trafalgar)海战中击溃西班牙的军队，西班牙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和保护能力被极大削弱了。甚至在没有英国默许的情况下，西班牙要与帝国内的领地保持联系都很困难。三年以后，法国入侵了西班牙并将波旁王朝赶下台，随后让一个法国人登上了西班牙王位。西班牙国内陷入了内战、无序和虚弱之中，西班牙的解放者(西班牙语 *liberales*，随后这个词被欧洲政界广泛使用)在加的斯(Cadiz)建立了影子政府，对抗法国在马德里的傀儡政权。一些克里奥尔人认为解放的时机到了。

1810年，南美"独立战争"打响。在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拉普拉塔(La Plata)和新西班牙都有起义发生。一开始，这些起义并不成功。在墨西哥，反叛者发现他们的后院起火，印第安人展开了针对所有白人的战争。而身在加的斯的西班牙政府对此毫无作为，他们既不能预防，也不能处置业已发生的暴乱。海上霸主英国在1823年宣称，支持美国发表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宣言，美国宣称美洲"自此之后不应该被任何欧洲国家视为殖民地"，而各个大国任何干涉西半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是针对美国的"不友好的姿态"[①]。促使美国发布这份公告的部分原因在于俄国对西北太平洋的兴趣和西班牙恢复过去殖民地的希望。那时候，一系列的共和国出现在南美大陆，成为第二批与美国并肩而立的欧洲殖民者的海外国家，不过他们与欧洲以及欧洲的国家机制有很大的不同。到1825年西班牙的势力被驱逐出秘鲁为止，伊比利亚帝国在西半球的地盘就仅限于加勒比海和北美部分地区了。欧洲国家在南美统治的结束(除了在北岸的一小块地方)，也包括葡萄牙在巴西的势力的终结。而法国对葡萄牙领土的入侵(1807年)则又一次成为导火索。遭到入侵后，葡萄牙的摄政王子离开

---

① 门罗总统呈递给国会的包含宣言的材料也可以在相关的著作中找到。最重要的部分在以下著作中：*Speeches and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ed. Robert Birley, Vol. II: 1818－1865 (Oxford, 1944), pp. 48－53。

里斯本去了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而这里也就成了葡萄牙帝国实际上的首都。当 1820 年他回到里斯本成为国王的时候,将一个儿子佩德罗(Dom Pedro)留在了巴西作为摄政,而佩德罗旋即领导了巴西对抗葡萄牙企图恢复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经过小规模的战争,他被称为"巴西永久的守护者",并且宣布巴西独立,1823 年 12 月 1 日,他被加冕为佩德罗一世,成为世袭巴西皇帝,这也是欧洲人在美洲留下的唯一一个君主国家。

拿破仑时代的欧洲

虽然有许多日期都可以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但是要说革命什么时候结束却很难。它的影响数十年都没有消散。不过在这方面,1799 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一场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权力到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naparte)手中,他是共和国的一名将军。拿破仑取得政权后迅速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这个政府一直持续到 1814 年,并且将整个欧洲搅得鸡犬不宁,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版图。他在成为新政权的第一执政(First Consul)后,很快又加冕为法兰西皇帝。

358

波拿巴就像很多领袖人物一样,年纪轻轻就取得了权力。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才智和战士所具有的冷酷。他的成功以及他精明的政治意识连同他不羁的行事风格让他具有了极强的个人魅力。在许多方面,他都像是一个 18 世纪典型的"探险家"。在 1799 年,他拥有巨大的个人声望(通过高超的军事指挥和成功的对外征服)和公众支持。除了那些被他击败的政治家,当拿破仑凌驾于他们之上时,他们懊恼不已。很快,他又再度通过军事胜利证明了自己,他击败了奥地利(奥地利又一次加入了反法战争),并且再次为法国带来了胜利的和平。这些胜利将对革命的威胁一扫而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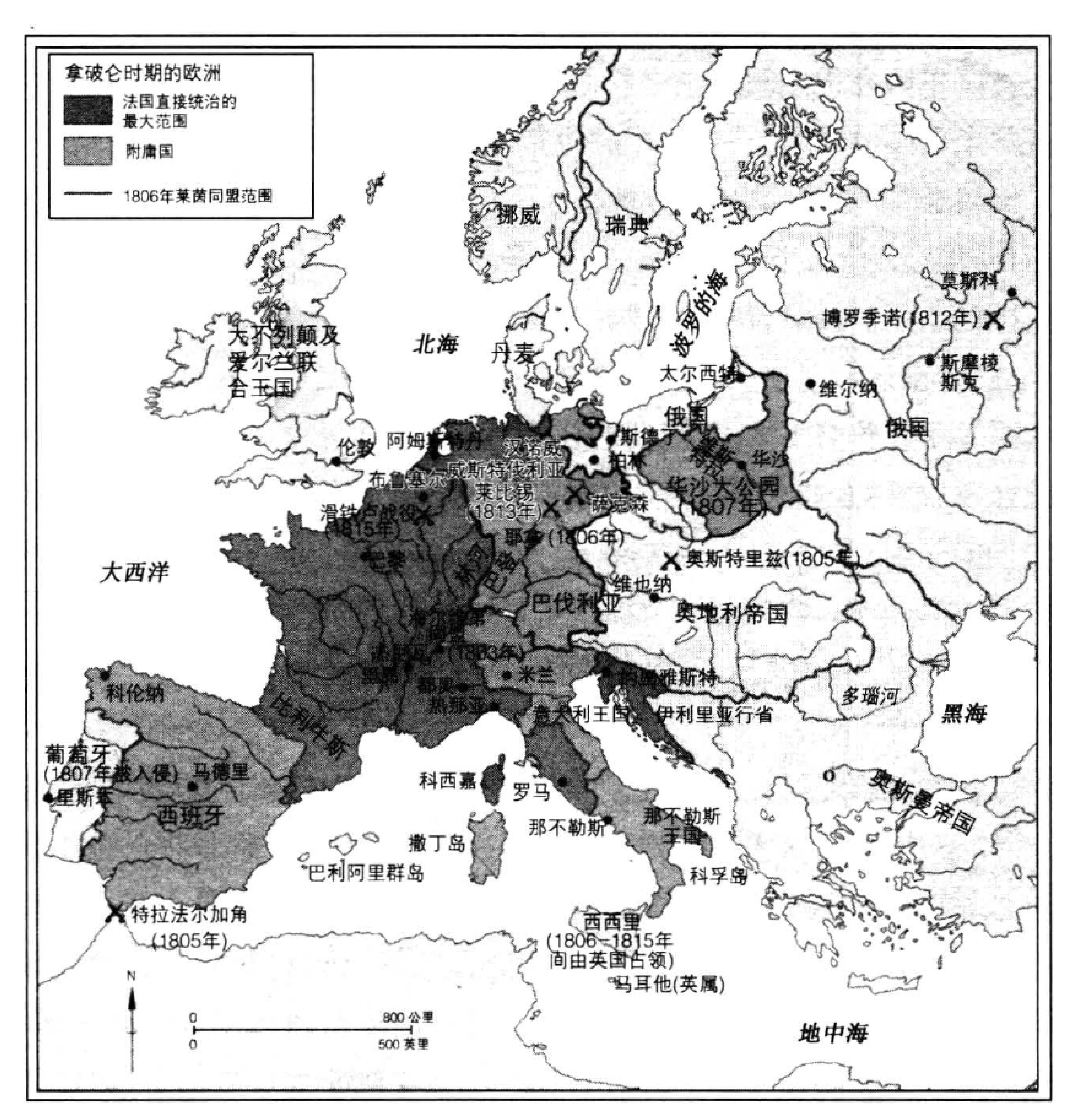
很少有人怀疑第一执政对于革命的承诺,但是这意味着什么?他很快在法国恢复了帝制。1804 年拿破仑(随后在正式场合,他都使用这个称呼)正式称帝。这绝不是一种复辟。实际上,他非常小心翼翼,

他打压了被流放的波旁家族(他谋杀了一位王子),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和他们有染。为了给他的帝国寻求公众的支持,他赢得了一次征求民意的公众投票。法国人投选出的是君主制;而这个制度则建立在民众统治的基础上,实际上也遵从了大革命的精神。作为共和政权,执政府被建立起来,他进一步巩固了革命的成果。

18 世纪 90 年代,所有重大的机构改革都被保留或者巩固。不存在征用教会土地以后售卖土地的干扰;不存在手工业和职业行会的恢复;不存在旧的法律体系的限制;也没有对法律之外的平等原则的质询。而且还采取了一些更进一步的做法。人们长期盼望的民法典诞生了,这部法典到今天还是法国法律体系的基础。虽然这部法典出自革命法学家之手,不过他们在 18 世纪 90 年代的动荡中,再也没有精力来完善它。而这部从 1789 年开始民众期待的法典能够真正实施,还依赖于拿破仑自己的坚持与要求。在政府中,每个部门都被委派了一名行政长官(the prefect),这种行政长官的职权类似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钦差大臣(emergency emissaries,许多之前的革命者都成为了行政长官)。不过在帝国政府的实际工作中,大革命的原则却时常被违反。与 1793 年以来所有的法国政府一样,拿破仑也用严厉的监察制度控制出版业,不经审判就关押嫌疑人,拿破仑总体上很轻视人权,这个时期公民自由十分堪忧。这一时期,拷问已经在法律上被废止,但是拿破仑的秘密警察还在使用它。代表大会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都还存在,只是没有什么人在意。不过这些貌似都是法国民众所希望的,正如他们希望拿破仑能通过英明的决断承认现状,与教皇达成协议,让天主教徒重归政府,并且通过立法来承认教会在法国地位的回归。

359

总的来说,法国国内对大革命成果的巩固和保证,是通过专制统治和对外军事外交力量的加强来实现的。不过这些因素都由于拿破仑的大规模军事战争而逐渐遭到了削弱。战争在一时间令法国君临欧洲,法国的军队东指莫斯科,西征葡萄牙,并在大西洋以及从科伦纳(Corunna)到斯德丁(Stettin)的北方沿海都有驻军。不过军事费用太庞大了;就算是对被占领的国家进行无情的掠夺,也无法无限期地维持



法国的军事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时刻面临威胁——拿破仑傲慢地对欧洲其他国家主张权利,导致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他。1812 年拿破仑领导了一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远征俄国,但是他的军队却在冬季的大雪中被摧毁。经历了这次失败,除非拿破仑的敌人分崩离析,否则拿破仑就难逃厄运了。而此刻,欧洲诸国们团结一致,没有给拿破仑机会。拿破仑一直与英国不睦,除了 1792 年的短暂和平外,他(以及之前的革命政府)和英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决不简单,英法之间的"拿破仑战争"是这一个世纪两国的争端中最后以及最重要的一轮比拼,它代表着君主立宪和军事独裁之间的对决。皇家海军一直把拿破仑的势力限制在欧洲大陆[通过 1789 年阿布基尔(Aboukir)海战和

360

1805 年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也在财政上支持着反法联盟,同时,一支英国军队在伊比利亚半岛持续活动,自 1809 年以来,这条英法战线耗尽了法国的精力与资源,同时也带给欧洲其他国家以获胜的希望。

到 1814 年初,拿破仑只能退防法国本土了。尽管他在战场上竭尽所能,但还是无法抵御东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军,以及西南边英国的入侵。最终,他的大臣和将军们抛开拿破仑,与欧洲各国达成了停战协定。公众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即使这意味着波旁王朝即将复辟,但这并不意味着 1789 年之前的任何特征都将重回法国。宗教协定、行政体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典、代议机构都被保留下来,而且它们的作用更加显著了。实际上,大革命的成果已经内化为法国的一种既成的秩序。拿破仑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安定的社会条件和各种制度保证。大革命的各种制度除了这个时期被确立下来的,其余的则都被抛弃了。

这些成就使得拿破仑区别于当时任何一位有着旧时代烙印的君主,即便是最有近代味道的君主也无法和他相比。但是拿破仑的政策时常体现出保守的特征,这也有些奇怪。不过最后,他还是成了一名革命专制君主。他的权力来自人民,在形式与观念上都是如此,公民选举可以证明这点;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他也需要借此赢得公民的心,以便让法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尽管在他的加冕长袍上,细致地刺上了墨洛温王室的标志——蜜蜂,但他无疑比路易十四更像 19 世纪的统治者。他和路易十四共同分享了将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带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所带来的荣耀,同时这两位统治者也都因此而获得了法国农民阶级的推崇。但他与路易十四还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不仅他所统治的法国版图远大于路易十四,而且由于大革命,拿破仑的统治力也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和国家的局限。拿破仑的结局并不应该令人伤感。实际上拿破仑被认为是伟大的欧洲解放者,他开启了欧洲之后的传奇历程。在 1800 至 1814 年之间,他给欧洲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则是让流血战争和动荡不安充斥了欧洲的每个角落,这些通常都是狂热和个人虚荣的结果。不过这些事件也有意无意地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影

361

响。而最后各种影响汇集起来,一同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传播出去。

新的欧洲版图

地图能够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在拿破仑掌权之前,那张像打满了补丁的破被子一样的欧洲国家版图就已经开始变化了;18 世纪 90 年代,法国的军队在意大利、瑞士和联省共和国建立了新的共和制卫星国家(这导致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终结)。不过法国的军队一旦撤出,这些卫星国家就立刻四散,而在法国的执政府重新在这些地方建立起统治之前,欧洲的很多国家出现了能够历时长久的新的统治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出现在德意志西部,在经历了彻底的改革之后,绝大部分德意志地方政权都将在此后的 70 年中消失。在 1801 至 1814 年之间,德意志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土一直被法国蚕食。而在河对岸,法国的干涉使得许多主教领被还俗,几乎所有的自治市都被吞并,同时法国也划拨给普鲁士、汉诺威(Hanover)、巴伐利亚(Bavaria)和巴登(Baden)一些新的领土,以补偿它们之前的损失,同时,所有独立的帝国贵族头衔也都被废除。这些事件一方面削弱了教会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德意志大邦国的实力(尤其是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也被重新修订,以便落实这些变革。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当 1806 年奥地利又被法国击败的时候,自奥托大帝以来,德意志内部那不太牢靠的政治联系最终烟消云散了。莱茵联盟(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被建立起来,以便作为制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第三势力。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在宣扬法国的国家利益。曾经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已经将法国的边界推至莱茵河一线,不过如今拿破仑更让德意志四分五裂,并且令不同的利益体们相互制衡。但不管怎样,旧的体制都是德意志统一的障碍。之后德意志的境况历经变革,却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民族统一的可能性。最终当反法同盟重新调整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版图时,它们又促成了一个德意志联邦(German Confederation)。与拿破仑时代不同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在这个联邦之内,这就使得它们的土地保留在德意志的范围里,但是这个联邦仍然没有任何统一

的迹象。1789 年,德意志内部存在着 300 多个关系复杂的政治体,而到 1815 年这个数量已经减少到 38 个。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数量还将继续减少。

意大利的重组并不剧烈,其影响也不算大。拿破仑的帝国在亚平宁半岛的南端和北端各建立了一个庞大和表面上独立的政治体,而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包括教皇国)也都被并入了法国,并作为行省接受统治。到 1815 年,法国对意大利的统治中止了,不过意大利的版图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以前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共和国都不复存在了,督政府的军队将它们摧毁,它们的领土随后也被并入了更大的国家里[热那亚被萨迪尼亚(Sardinia)吞并,威尼斯被奥地利吞并]。在拿破仑统治的顶点,欧洲的其他地区大都被法国吞并。当时的法国直接管理着庞大的领土,北边从比利牛斯山直到丹麦,南边从加泰罗尼亚一直延续到罗马和那不勒斯的边界。在帝国之外的是伊利里亚诸行省,包括哈布斯堡和威尼斯的领地,以及如今南斯拉夫的大片地区。那些卫星邦国和有着不同自治程度的属国,一部分由拿破仑自己家族的人直接管理,这些人瓜分了剩余的意大利、瑞士和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地区。在东边还有一块飞地,即华沙大公国,这是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分割出来的。

362

共同经验

在大部分的国家中,共同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机构提供了一种对于制度和观念的共同经验。大革命的原则很难在易北河以东获得认同(除了在波兰的短暂认同),也是因此,法国大革命也成为那些反反复复印证欧洲东西差异的重大事件中的一件。在法国大革命中,德意志、意大利、伊利里亚、比利时和荷兰都在拿破仑法典的制约下,接受了那些关于家庭、财产、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概念,这些思想也随之传遍了整个欧洲。它们时而代替,时而增补那些交织在一起的地方法、习惯法、罗马法和教会法。同样的,帝国的行省制度催生了一种共同的管理方式,各国人在法国军队中服役也催生了一种共同

的纪律和军事规范，法国以十进制为基础的度量衡也正式代替了许多地方的标准。人们不应该夸大拿破仑统治时期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但也绝不能忽视其所带来的创新的重要性。法国的各种规定除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各国的进步人士还从中获得了新的模式和灵感。这些新的模式很容易被接纳和认同，因为法国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有许多都在那些附庸国家工作，而其他民族国家的许多代表也在拿破仑的政府服务。

深刻而频繁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全面影响是近代化的，但却并不包含必要的自由；在法国军队的三色旗下，人权的观念被确立了下来，但却伴随着拿破仑政府的秘密警察、军需官和海关官员的设立。拿破仑时代许多难以处置的问题，都是源于政府的自作自受。在传播革命理论的同时，法国也为自己埋下了许多祸根。革命的核心理论人民主权论与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的理论认为人民应该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的理想单位就是民族国家。革命者由此宣称，他们 363 自己的共和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许多外国的领导者也将这一理论适用于自己的国家；而很显然德国和意大利人并没有自己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理应有这样的国家。另外，法国控制下的欧洲为了法国自身的利益，拒绝承认欧洲其他国家的权利。其他国家的人看到自己国家的农业和商业为法国的经济政策作出牺牲，看到自己国家的人被迫在法国的军队里任职，并且从拿破仑法国(或者他们傀儡政府)的统治者和官僚机构中获得利益。当那些支持大革命原则的人都察觉到这些屈辱的时候，那些原本就不支持大革命的人揭竿而起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在拿破仑时代，爱国主义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激励。不论他们的政府如何考虑，有一部分德意志人开始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威斯特伐利亚人(Westphalians)或者巴伐利亚人；而很多意大利人也认为他们不仅仅是罗马人或米兰人(Milanese)，因为他们在对抗法国方面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在西班牙和俄国，这种爱国主义的观念和对于大革命的抵制运动相得益彰，抵制得非常彻底。虽然拿破仑建立的王朝和帝国被证明不堪一击，但他依然以激怒人民的代价给欧洲带来了

变革。他点燃了其他国家里蕴藏的革命力量,就像大革命点燃了法国,自此之后,人民变革的浪潮就再也无法停止。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份遗产最重要的历史影响,同时也成了拿破仑最大的历史成就,不管他是否情愿如此。

民族主权的理论是这份遗产最核心的部分。大革命以后,没有人(不论是王公、共和寡头统治者还是民主制议会)有权利干涉法定主权和臣民之间的联系,这一观念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的认同;但是法定主权的具体含义现在成了争论的焦点。政府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做任何事情(即使与上帝的律法相违背),这种观念还需要很长时间来赢得全面的认同,很多人还难以接受这种说法。不过到1815年,已经有更多的欧洲人能够接受这样的观点:只要当局能够证明它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当局制定法律,即使这会颠覆长期存在的传统观念也在所不惜。这着实是巨大的进步。在以前的观念里,立法的权利和规则都很薄弱,立法者很难改变前代人留下的法律豁免权和特许自由权,前代的基本律法必须被尊重,上帝的律法更是决不能忤逆,这些行为在社会和法律的层面,就如同在神学层面上一样,是一种亵渎行为。17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和法学家就在能否否定那些关于土地的"基本"法律方面纠缠不清,最终他们认为一部分这类法律必须存在。一个世纪以后,法国的主导法律思想也和他们摇摇欲坠的君权一样面临瓦解。最终,在这两个国家,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国家主权在立法上是不受限制的,立法的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显著特征(其他国家也多多少少有类似的转变),这样的观念也随着大革命传遍了欧洲。

364

在1814年拿破仑战败后,他无条件退位,但这并不是拿破仑故事的终结。仅仅不到一年,他就从流放的厄尔巴岛上回国,将复辟的波旁王朝一举击溃。而1815年6月18日,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将他击败,英国、比利时和普鲁士的联军消除了法兰西帝国再度崛起的威胁。拿破仑对于战胜的一方来说过于棘手,因而这次他们将他送到千里之外的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上去了,拿破仑最终于1821年死在

岛上。而拿破仑最后的这次斗争让列强们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以免重蹈覆辙使欧洲再次面临经由大革命的觉醒引发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不间断的战争。由此拿破仑也延续了欧洲的历史,又一次重现了在法国领导之下欧洲颤抖的记忆。

365

第十七章　欧洲的新财富

欧洲的成员

如果算上俄国(相关的历史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容易获得),欧洲的人口在 19 世纪翻了一番。具体说来,欧洲的人口从 1.9 亿上升到了 4.2 亿,这是前所未有的成长速度。对于大部分的人口来说,他们比自己的爷爷和奶奶都要长寿。有许多迹象都显而易见地表明了欧洲财富的增长,不论是依靠种植还是进口,欧洲显然收获了更多的食物,以便供养更多人口。更多的资源也被开发出来,以供给人们的家庭日用、建设街道、照明和取暖。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获取各种生活所需,这些在 19 世纪初还是无法想象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人们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不过在此之前,这些成就背后更为根本性的进步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但直到 19 世纪,欧洲的生活水平才真正取得了超越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居民的显著提高。

人口增长改变了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世界上其他人群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慢于欧洲。因此,欧洲在 19 世纪初占世界人口比重约 15%,而经过一个世纪,增长到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同时,更多的欧洲人也在不断移居海外。到 19 世纪 30 年代,每年移居海外的欧洲人首次达到了 10 万人;而到 1913 年,这个数字则将超过 150 万。在

人口史方面，长时段的观点更加有用，在1840至1930年之间，有大约5 000万的欧洲人移居到海外其他国家。

不同的欧洲国家，其增长速度也不尽相同。英国一开始增速最快，19世纪初他们的人口大约1 000万，而到19世纪中叶则突飞猛进到2 100万；到了20世纪初，这个数字增长到3 600万。法国19世纪初的人口有2 700万，而到了世纪末增长到4 000万。德国（当然在19世纪初还没有统一）在一个世纪里也将其人口翻倍，达到5 000万。不过对于东欧那些最贫穷的农业地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他们的人口才真正开始迅速增长。 366

这样的事实主要反映了在之前的两个世纪里，拉动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是死亡率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下降，而从更广泛的领域看，这也意味着财富的增长。死亡率的降低从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首先见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从大体上看，在19世纪初，欧洲所有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略微大于人口死亡率。不过这些国家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经济，这些人口变化不足以改变他们日常生活中强大的传统习俗。但是到1850年，影响开始显现了，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死亡率的持续降低在最发达的一些国家已经十分明显了。到19世纪最后20年，他们的人口死亡率从每年大约35‰降低到28‰（而50年之后，这个数字再次降到18‰）。不过许多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欧洲国家，到20世纪初人口死亡率依然有38‰，而再往后50年，他们死亡率下降还是不多，这导致了在不同的地方居住的欧洲人的不平等加剧。在较为富裕的西欧和北欧，大部分人对生活的期望明显要高于欧洲南部和东部地区。

虽然死亡率的下降是拉动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到20世纪初为止，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了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多工作机会，使得结婚的人年龄更小，生育率也有所上升。这个因素产生的影响比以前更加明显，因为儿童长大成人的概率大大提高了。同时，随着接种牛痘和接种疫苗（这两者都是在18世纪引入欧洲并迅速传播开的），更先进的医学技术和更多的医疗服务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医生们仅仅控制了儿童致死率最高的几种疾病,包括白喉、猩红热、伤寒、百日咳,就使得婴儿的死亡率大大下降。而在此之前,社会改革者和市政工程师也作出了他们自己的突出贡献。更好的供水设施、下水道系统和保洁系统使得飞速增长的城市中非致命性的患病率下降。到20世纪初,霍乱这种19世纪30、40年代灾难性的疾病已经在工业化的国家里根除了。而20世纪之后,在西欧也没有再出现致命的瘟疫大爆发,不过也还是有一些瘟疫出现在港口城市[英国的最后一次瘟疫出现在1911年的格拉斯哥(Glasgow)]。各方面的进步都有助于提高人口的寿命;而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25年,大部分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都可以比他们的中世纪祖先多出两到三倍的寿命。

19世纪一个重要的情况是人口中出现了大量的青年人,先是在西欧,而后东欧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海外的欧洲世家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的比例由于平均寿命的上升而有所下降。他们的出现在社会总体和劳动力方面都造成了一些问题,不过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力量、新的复苏和新的活力。这也适度补偿了老龄化人口的增加。而老龄化也使得相关的社会资源重新紧张起来,之前的社会应对年老和体弱的情况绰绰有余,而现在则显得捉襟见肘。到1914年,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贫困和毒瘾问题。

367

新的繁荣

在1815至1848年以及1871至1914年之间,巴尔干以外的欧洲享受了无忧无虑的和平。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和对经济资源的破坏(主要是对农业的破坏),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遏制人口的增长了。有时候战争也会带来饥荒,这是另一个遏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19世纪以来,饥荒和死亡越来越少;铁路和蒸汽轮船使得进口食品更加便利。在许多国家,增长的人口也同时享受着更高水平的生活。平均寿命的增加让我们看到,在出现更多需要养活的人口之前,已经有比以往更多的食物被生产出来,以供养他们。

欧洲的农村

欧洲正在进行的是历史上少有的全面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过程。食物生产的革命自古就有，在这一时期虽然一开始比较缓慢，但很快就全面展开。到 18 世纪，欧洲的可耕地的收成已经比中世纪多两倍半，而之后的一个世纪则将迎来更大的进步。同时，新的作物如土豆、甜菜也更加广泛地种植；随之而来的是日常饮食习惯的变化。从 19 世纪初开始，欧洲的农业生产经计算，大概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这使得之前的进步速度相形见绌。而更重要的是欧洲可以不断地开发世界上其他新的地区。这两项改变背后是一个更大的进程，即欧洲在不断加快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这使得欧洲和北美在 1870 年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汇集地；而这一进程的缘起便是农业进步，人们称之为“农业革命”，不过，没有什么词汇能够真正描绘出 1750 至 1870 年之间世界农业产出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取得的成就更大）。不过这个进程十分复杂，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与许多其他经济部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这也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而且这也是全世界经济转型的一部分，最终这个进程不仅仅关系到欧洲，也同样涉及美洲和澳大利亚。

368

到 19 世纪初，农业技术的进步在英国最为明显，比如首次使用蒸汽动力的犁。不过这些技术已经从英国传播开去，到达了更远的地方。除去那些和过去几个世纪相比基本不变的以外，变革的来源无疑有很多，而有时候进步也是缓慢的。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部分地区，可能一个世纪以来基本没什么变化。针对食品供应缺乏弹性作出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果，而这实际上是许多领域取得成功后的共同结果，包括作物轮种制度、过时的财政政策、低下的耕种和饲养水平以及完全的文盲都得到了改善。收益得到了更好的保证，作物虫害和家畜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新的品种被引进，诸如此类。而如此广泛的基础性变革，通常也要突破一些社会和政治桎梏。

法国在 1789 年正式废除了农奴制，不过当时还残留有不少农奴。

而那一年他们废除的所谓“封建制度”则显得更加重要，其中包括了许多传统和法律规定的习俗和权利，它们阻碍了个人像投资其他产业一样投资土地开发。不过同时进行的大规模财产重新分配，使得这一变革的结果变得难以捉摸和衡量。在短短几年里，许多先前属于教会的土地被卖给了个人。随之而来的，既有人们拥有的土地数量的增长，也有人们平均资产的增长，人们本来期望这些能够引领一个新的农业进步的时代，增强法国的生产力，但却未能如愿。虽然主要的桎梏被消除了，但是在很长时间里，进步还是非常缓慢，像英国那样的财产合并还很少。

这种情况表明，正在进行的这些变革，其节奏和标准的普遍化需要更加谨慎与合理。在 19 世纪 40 年代，所有充满热情的德国人都在巡回展出他们的农业设备，这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正如一位伟大的经济史学家评论的那样，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法国）“总体上讲，在铁路时代以前，没有任何普遍的和彻底的农业进步”的国家[①]。不过，他们在此之前就开始逐步改革那些阻碍农业进步的中世纪体制，同时也给新的进步准备条件。在拿破仑时代，由于法国的财产法和法律状况引入德国，一些地区的变革加速了，此后的机构改革也同样起到了加速作用，比如在普鲁士推行政治改革的施泰因（Stein）的改革。到 1850 年，在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部分地区，被束缚在土地和徭役上的农民已经基本消失了。不过此后很长时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普鲁士、马扎尔和波兰的地主都试图维持自己对于佃户家长制的统治。与西欧相比，保守的统治阶级价值观在东部以更加顽固和集中的方式存在着。容克地主们可以容忍在庄园的管理上引入市场因素，但是决不允许触动他们和农民之间的传统关系。

369

而以传统法律的形式抵制改革时间最长的还是俄国。农奴制度在俄国直到 1861 年才被废止。这一法案一开始也没有将俄国的农业完

① 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 - 1914*, 4th edn. (Cambridge, 1945), p. 52.

全纳入市场经济原则和个人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它却无疑终结了欧洲的一个历史时代：中世纪农业时代。从乌拉尔山到科伦纳，再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农奴耕种土地了，虽然巴尔干半岛上的实际农业形态还很难和农奴制度明显区别开。也再没有农民隶属于一个他们不得离开的地主的情况了(虽然当俄国的农民付不起解放的费用，而用劳动抵偿的时候，对他们离开村庄的行为还有所限制)。这宣告了一个体系的灭亡，这个体系跨越了从古代到野蛮人入侵时代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并成为了一直以来欧洲文明的基础。在 1861 年以后，欧洲各地的农业无产者为了工资和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由 14 世纪农业危机所引发，并在英国和法国传播开来的这种模式，现在变得很普遍了。而两个欧洲的海外国家，美国和巴西也跟随欧洲的脚步，在 1865 年和 1888 年分别废除了奴隶制[①]。

新的欧洲土地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农业产量通过开垦新的土地而缓慢增长。而 19 世纪这一过程也在继续，不过比以往更快，而且实际上这些土地都是在海外，甚而是跨洋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阿根廷和乌拉圭，都很快证明它们可以用比欧洲更低的成本种植作物。对此有一种解释是这些新开发的土地上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的大平原、南美延伸广阔的潘帕斯牧场，还有气候温和的澳大利亚都拥有极好的种植谷物、饲养牲畜的条件。另外在运输领域也发生了革命。19 世纪 60 年代，越来越多的蒸汽驱动的铁路系统和轮船被用于运输，运输成本快速下降，而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也使得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欧洲未来的利益都在于对海外国家的那些山川平原的投资。同样的地区在欧洲内部也存在着，只不过范围小了一点。从 70 年代开始，东欧和德国的农民发现一旦铁路在俄国西部和波兰建成，蒸汽船也在 370

① 1863 年 1 月 1 日的《解放黑奴宣言》仅适用于联邦中的“反抗联邦的人”。奴隶制度的废除是通过联邦在 1865 年 12 月通过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黑海港口出海,俄国的谷物便会以更便宜的成本到达西方,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直到20世纪初,不论欧洲的农民是否意识到,他们工作的环境广及整个世界;不论是智利的肥料还是新西兰的羔羊,其价格都可以在他们当地的市场决定。

工业化

农业首先创造了文明,而后的几千年里,又成为文明成长的限制性因素,但在19世纪,农业重新成为了文明的助推器。突然间,农业可以养活的人比以前多了许多。城市扩张、铁路修建、资本投资,所有这些都在1750至1870年之间推进了两岸相互依存的跨洋经济的增长。农业发展虽然先出现,而且也为其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的投资,不过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成为了一种新社会出现的关键因素,也就是基于大规模工业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宏大的新主题。甚至我们只能管窥一二,难以得其全貌。工业化给欧洲带来了自蛮族入侵以来最剧烈的变革;它甚至被视为自农业、炼铁和轮子发明以来最重要的突破。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大约一个半世纪左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变成了机器管理者和簿记员的社会。有趣的是,由农业而生的工业化终结了农业自古以来的首要地位,它也成为一种将人类经验从历经千年文化演进而形成的分工,带回到普世经验和文化趋同的主要因素。

甚至给工业化进行定义也是很有难度的。虽然它包含了数不清的企业和消费者作出的数不清的有意识的决定,但总体上看工业化似乎还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潮流,用它能够转变一切的力量横扫了旧的社会生活。有一条关于工业化的思路是它用其他资源驱动机械的力量;代替了任何动物的肌肉力量;还有一条思路是以庞大的单位组织生产;另一条思路是不断增加的制造业分工。而工业化最重要的长期特征之一,就是雇用依赖工资分配的生产者成为了主要模式,并且这一现象不断扩散。而工业化所造成的结果和影响,却会让我们思绪万千。

如同农业变革一样,不完全的工业化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原始资本通过农业和商业改革,在几个世纪中缓慢地积累。相关知识也慢

慢地得到加强。查理曼曾建造了运河；不过直到18世纪，欧洲才开始真正地大量建造类似的工程，即便这些成就只能和数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比肩。技术革新的开启深植于过去的历史中。改革者只是站在那些近代以前数不清的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的肩膀上而已，那些先人为以后的变革缓慢积累着技术和经验。14世纪莱茵地区的人成为首先学会铸铁的欧洲人；17世纪初鼓风炉的逐渐普及开始消除之前冶铁高成本的障碍，而到了18世纪，新的发明用煤代替了古老的依靠木材做燃料的流程。更便宜的铁促使人们发展出更多使用铁的方式，虽然在后人看来当时铁的产量还很少；随后更多的发明接踵而至。新的需求意味着那些容易开采矿石的地区变得更加重要。那些湮没了数千年的煤铁产地重新在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地图上闪亮起来，并且使欧洲的地质史显示出其重要性。像鲁尔(Ruhr)和西里西亚(Silesia)这样的地区获得了新的关注。

371

蒸汽动力

更优质的金属和更丰富的燃料对早期工业化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而这无疑要归功于蒸汽机作为新的能源形式的完美表现。同样，这种技术的历史也十分悠久；用蒸汽动力进行生产活动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不过那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直到18世纪初，欧洲对更强的动力有了新的需求，以便在更深的矿井里运作更大的水泵。第一个成功的商业化的蒸汽机就是为此设计的，虽然通过畜力和水力改进了水泵的动力，但作用还是不太明显。18世纪，新的投资和技术细节的改进最终带来了基础性的革新。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冷凝器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这项发明不仅使得热能以一种全新的效率转化为动能，而且很快便生产出了可以做旋转运动的引擎和像泵一样的驱动机械。

新的蒸汽机需要煤和铁，一个用来作燃料，一个用来作材料。因而蒸汽机也间接推动了对煤铁资源的需求。19世纪中叶，最明显和最壮观的事业无疑是铁路建设，这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跨越长距离的蒸

汽动力火车代替了只能用于私人短途旅行的马车，而这种新的旅行方式被称为“梦游”①。铁路建设消耗了大量的铁（之后是钢材）建造铁轨和车辆，而且也消耗了大量的煤用于燃料。他们被建造起来以后，可以用低于以前任何时候的成本来运输货物，而他们所运输的货物中自然也包括煤和铁矿石，因此，即使远离铁和煤的开采地，也可以方便地使用他们。新的工业地区沿着铁路线兴起，铁路可以将货物轻松地运到那些遥远的地区。

372 第一条蒸汽船在 1809 年下水。到 1870 年，虽然还有许多帆船在使用，而且一些国家仍然在建造风帆动力的战舰，但蒸汽船用于跨洋航行已经很平常了。这种技术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1900 年跨越大西洋运货的成本只是 100 年前成本的 70%。蒸汽船和铁路节省的运输时间和空间完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自从人们驯养马匹、发明轮子以来，人们在路上运输的速度受制于当地的路况，而且无论何种距离，一般也无法超过每小时四到五英里的速度；水运相比而言要好一些（而船只也经历了上千年的改造演变，以便提高速度）。不过所有这些缓慢的变革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当代的人在其一生中可以体验马上旅行和在火车车厢里以每小时 40、50 英里的速度进行长距离旅行的不同。

工业化社会

有些经历过早期工业化的人会称这场变革为“工业革命”，这个词最早由法国人在 19 世纪 30 年代提出，不过英国从很早开始，已经有 75 年左右都在围绕这个词发展进步，直到 1850 年，那时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出现了，且很快就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工业化的城镇有许多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方面，这成为了最直观的“革命”形态，前工业化的城镇都以小教堂或者主教座堂为核心，而工业化的城镇则以有冒着烟的烟囱的工厂为核心。这些令人惊异的崭新的工厂是通过机械发动机带

---

① S. Lilley, in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3.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C. Cipolla (London, 1970), p. 206.

动的,不过人们常常忘记,这只是19世纪早期的景象。即使在19世纪中叶,在全世界技术最先进、产业工人最多的国家一英国,一个公司的雇员也少于50人。大量雇用工人的情况只在纺织业中经常出现,庞大的兰开夏(Lancashire)棉纺织工厂首次让这个地区具有了显而易见的城市特征,而这也与早期的手工业城镇截然不同。到1850年,制造业已经很明显地倾向于集中到一起。运输经济、功能分工、大动力机器的使用和更加严格高效的工作纪律都使得制造业更加有吸引力。

到19世纪中叶,依然只有英国具有成熟的工业经济。对此有很多的明证。英国国内的和平和并不贪婪的政府都要优于欧洲大陆,这些培育了多数国内企业投资的信心。农业也比其他地方更早地出现了显著的产品过剩。在两到三代人的发明改进之后,新的技术也令矿业开采十分轻松。不断扩展的海外贸易以及金融业和银行业体系为投资带来了新的利润,因此在工业化之前,各方面的迹象都已经在召唤它出现了。也许商业贸易给未来的变革做好了社会心理上的准备;评论家们曾经说过,他们在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就发现当地人对于金钱和商业机会十分敏锐。最终,这个国家快速的人口增长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对制成品的消费需求。所有这些汇集一处,其结果就是前所未有的、持续不断的工业化成长。

373

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美国也迅速加入了英国的行列,展示出它们自身经济增长的能力,不过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领先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工厂规模和世界领先的地位方面。英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工厂"的居民,他们喜欢不断刷新人们对工业化能够带来多少财富和权力的认识。1850年,英国拥有全世界一半的远洋船只和一半的铁路轨道。铁轨上的列车精确而规律地运行着,车速在100年以内都没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使用有史以来第一本"列车时刻表"来调度车辆,并用电报辅助通讯。而操作这些系统的人们之前仅仅在驿马车或者货运马车上工作过。1851年在伦敦召开了一届盛大的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上英国宣扬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时候英国已经熔炼了250万吨的铁。听起来这个数字似乎不算太多,但这是当时美国的五

倍、德国的10倍。那时,英国的蒸汽机总共可以产生120多万马力的能量,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还多。

到1870年,欧洲列强之间的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英国仍然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已经没有很强的决定力了。而且它连领先的地位也不会保持很久。英国依然比其他欧洲国家能产出更多的蒸汽马力,但美国在1850年已经迎头赶上,德国的进步也很迅速。到19世纪50年代,德国和法国都已经紧随英国的步伐,完成了炼铁方面的重要转变,将燃料从木炭变为矿物。英国的铁器制造业仍然位居榜首,而且它的生铁产出量还在不断增加,不过也仅仅比美国多了三倍半的产量,而比德国多四倍。到1900年,英国已经不再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欧洲也有国家已经超过了它;德国在各个方面都比英国更加先进,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则更加明显。

世界经济体系

欧洲的经济决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割裂开来。欧洲的工厂从海外获得了原料,包括棉花、黄麻、木材和矿石。到1850年,英国工厂的木材都来源于澳大利亚;法国到1914年则有超过一半的木材来源于欧洲之外。一些原料被人们突然发现还有其他用途,19世纪末的橡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也转变了这些材料产出地的经济生活。更多的原料以及食物和工业制成品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贸易,由此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

374

英国是最大的贸易国家,它的进出口总值从1800年的每年5 500万镑增长到1913年的每年4亿英镑。尽管它的总产出已经被美国和德国超越,但是世界绝大部分的船运和货运贸易还是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它依然是最重要出口国,同时也是欧洲唯一一个向非欧洲国家出口制成品多于欧洲国家的出口国。作为最大的海外资本国,它通过主要在美国和南美的海外投资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它的特殊地位巩固了跨国三角贸易体系。英国人用他们自己的工业品、现金和海外产品从欧洲换回商品、工业品和其他货物。他们向海外输出工业品、资本和服

务，并换回食物、原材料和资金。这个复杂的贸易体系意味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不能用原材料换工业品这样简单的模式来解读。

虽然整个欧洲都在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包括食物和工业材料），并出口工业产品，不过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欧洲是世界贸易的动力源泉；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大量贪婪的工厂如饥似渴地引进大量的食物、矿物和木材，同时也生产了大量的产品，并将它们从世界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在 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大部分的食物依然能自给自足，但是到 1900 年，英国 80％的小麦和 40％的肉类已经依靠进口。无疑，加工业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极好的消费国，到 1914 年，它已经是另一个加工业巨人德国产品的最重要的消费国，而德国也是仅次于印度的英国产品的消费国。大量的产品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当然也出口大量的农产品）之间贸易。到 1914 年，欧洲占了世界进口总量的 60％，出口总量的 55％。

到 1914 年，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组成了一个大的贸易圈。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第一次出现。人们可以用世界通行的价格买卖货物；芝加哥的谷物、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肉类、埃森（Essen）的钢材，它们的价格都会影响世界上其他物品的价格。至少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在 19 世纪，“一个世界”和书写一部世界经济史都已切实变成了可能。当中国、日本和非洲最终向欧洲和北美开放之后，这个体系终于形成了。历经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贷和交换模式服务于巨大的全球市场网络，对于这种模式来说最重要的是支付系统，也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欧洲银行家和商人的票据来进行支付（即依靠他们建立的金融机构）。这种模式产生于中世纪就已经存在的，在几个大的商贸中心之间建立的信贷交易。在这个体系完全建成以后，伦敦成为了其中心，直到 1914 年，伦敦一直是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心，并且集中了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大量金融机构。纸张以票据的形式成为了协议、纸币和支票，用以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行。这些纸质可以凭信用兑换其他产品，或者最终兑换成黄金。所有

375

的文明国家的流通基础都是黄金。因此交换频率造成的波动并不大。在金本位制的前提下,你可以用 20 美元或者 100 马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用于支付。国际商贸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便利。

政府有时候也会基于他们认为的恰当理由干预跨境贸易。在萧条时期,他们会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和农业而对进口商品强加“关税”。英国是唯一一个拒绝这么做的大国,它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因为(它相信)这个原则使它成为了贸易大国,并能供给它便宜的食物。但即便有关税,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商人们依然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开展国际商贸活动。

欧洲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地,它通常用借款的方式,以便资本输入地能够购买需要的原材料或者为工农业发展提供资金。这也是美国和南美能够大量修建铁路、非洲能够大量开采矿场、亚洲能够兴建茶叶和橡胶种植园的原因。而投资的利益由兴建的企业的利润支付。不过时间一长,这种模式就不再起作用了。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商人和银行家,似乎拥有了过多其他地区的商业资产,而这些资产都依靠欧洲的资本在运作。当地的商人难免会觉得,本地的利润不应该都进入了欧洲人的腰包。

对于一些欧洲国家来说,这种海外投资所取得的收入要占它们海外收入的绝大部分。英国尤其如此。英国依靠各种的“非贸易收入”——不仅仅是海外投资的红利,还有各种船只运输费用、保险和金融委托的费用——来平衡他们的进出口。这种非贸易收入可以用来与进口商品的开支相抵,从而给英国提供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也是英国政府总是极力维持国际和平和正常的商贸环境的一个原因;同时英国也比其他国家更加依靠下面这些方式获利:大量销售其他国家需要的产品,进行转口贸易,让他们的船队在海洋中自由地开疆辟土,同时让他们的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在海外承担适当的风险开展业务。这个非常复杂的体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经济范畴。它压低了物价,促进了改革和投资,从而推动了欧洲人建立的这种文明形式的前进步伐。在许多领域,它都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人们的

376

事业彼此联系过于紧密时,美洲的谷物过剩也会摧毁欧洲的农民,伦敦银行或商会的倒闭也会让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或者仰光的人失去工作。

贸易的起落——也就是被称为“贸易周期”的贸易繁荣和萧条的模式,首先于19世纪早期在欧洲被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通过关税来寻求“保护”的做法很容易腐蚀全球贸易体系的根基。不过这个体系足够稳固,足以应对各种危机,人们开始认为,这个国际贸易的世界是自然和稳定的。这个体系实际上非常成功,直到1914年它都运行良好,人们甚至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突出的成就来看待。

到1900年,许多英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眼前英国的繁荣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证明了自由贸易学说的无比正确,有这种想法并不会令人惊讶。这种学说甚至被用于评判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市场是否合适。在19世纪中期,有一段时间英国政府甚至希望欧洲的其他国家都能采用自由贸易的政策。一时间,关税壁垒似乎即将瓦解,英国最初在贸易和制造业国家之间所体现出的相对优势亦将延续。不过在19世纪70、80年代,这种优势很快消逝了,到20世纪初,英国又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关税保护的国家,而由于外国(尤其是德国)的竞争压力愈加猛烈和危险,英国国内也出现了质疑自由贸易教条的声音。

即使以现在的标准看,1914年的世界经济依然显现出令人惊讶的自由和自信。欧洲列强之间长久的和平为贸易联系的成熟提供了基石。稳定的货币流通使人们相信世界的价格体系有着很强的韧性;汇兑管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了。俄国和中国此时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市场,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货运价格和保险费率稳定地下降,食品价格也跟着下降,而工资从长期看有所上涨。利率和税收都很低。看起来似乎一个资本主义的天堂即将降临。

城市

19世纪中叶,在第一批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中,只有英国和比利

时的主要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地区。1851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农业依然是英国雇员最多的单一产业部门（在只有国内产业竞争的情况下）。而在那时，制造业不断扩大的规模、新的财富集中地的兴起以及新的大范围的城市化都让人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变革的速度之快，尤其是在 1850 年以后快速成长的英国小镇中，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成为核心的大城市，日后这些城市将成为人们常提到的“有卫星城的大都市”(Conurbations)。而欧洲大陆上也很快进入了同样的进程。不久，欧洲的城市就再也不需要通过农村人口的移入来增大规模了。

377

想要衡量城市化还是有些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同的国家，城市化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其发展的主线还是清晰的。在 19 世纪初，伦敦、巴黎和柏林分别有大概 90 万、60 万和 17 万居民。而到了 20 世纪初，相应的数字变为 470 万、360 万和 270 万。这时，格拉斯哥(Glasgow)、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也有超过 100 万的居民。这些都是超大城市；而除了这些，还有 16 个以上欧洲城市的规模超过 50 万人；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伦敦和巴黎能达到这种规模。这些超大城市和稍小一点的城市（与这些城市相比，之前的小城镇不值一提）反映了在那些工业化首先出现的国家城市化的趋势有多么明显；工业给那些第一次接触它的人带来了财富和工作机会。到 20 世纪初，有 23 个城市的规模超过了 50 万人，而其中的 13 个城市集中在四个国家，它们是英国(6 个)、德国(3 个)、法国(3 个)和比利时(1 个)。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对城市的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主要还是否定的。随着 18 世纪的结束，怀念乡村生活的情感蔓延开来，而这和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几乎同时出现。19 世纪以来风行的美学和道德论调一直反对城市生活，因为在城市里的人们经常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不快乐的面孔。由此城市化被很多人看成是一种令人不快，甚至不健康的改变；并且城市化还被看成是一种对正在蔓延的颠覆力量的赞许。保守的人怀疑并害怕城市。而在许多中心城市，穷人生存的条件十分简陋和悲惨。如果有人想要穿过伦敦东头的贫民窟，那他将会看到让

人难以置信的穷困、淫秽、疾病和荒芜。一个年轻的德国商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4年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来描绘居住在曼彻斯特的穷人令人震惊的悲惨状况，还有许多作家也写了类似主题的作品。在法国，19世纪的前半段，政府满脑子都是所谓"危险阶级"(对巴黎穷人的称呼)的威胁，悲惨的境遇引发了一场持续的革命暴动。人们害怕城市的扩张会引起对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憎恨，这并不难理解，同时这也造就了一股潜在的革命力量。

人们可以合理地猜测，城市也带来了思想的颠覆。它对于传统的行事模式确实是一次摧毁，也是一次对新的社会改革和思想的严酷考验，而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巨大且易于藏匿的灌木丛，其中的人们可以躲避在农村常遭遇的牧师、乡绅和邻居的监视。从这一新的观点来看，城市的空气虽然充满烟尘，但和中世纪一样能让人自由。在城市中(尤其是当文化不断向下层人民普及之后)，新的观点不断地影响之前那些从未遭受到挑战的假设。19世纪的欧洲上层阶级被城市人口带来的无神论和漠视宗教的潮流所深深打击。更多的人感觉到他们深深陷入这种潮流的包围中，相比之下宗教真理和信条则离他们远去(上层阶级长期以来都自若地容忍着各种针对宗教的异议)。宗教依然被视为道德的维护者和现有社会秩序的支持者。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革命作家宣称宗教是"压迫的标志"，但也是"人民的鸦片"[①]。统治阶级当然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他们相信宗教是很好的社会黏合剂。结果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尝试，试图寻找一种方法让城镇重新回到基督教的控制之下。不过这些尝试可能起到了误导作用，他们原以为教会在城市的各个地区中还有一些基础，然而很久以前在人们的内心里，传统的教区体系和宗教机构就在旧的城镇

378

---

① Karl Marx,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London, 1975), p. 175.

和乡村中被扫除了。不过他们还是在城市的郊区建立了新的教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包含福音和社会服务的传教形式,这些让神父和牧师们认清了现代城市生活。到世纪末,宗教思想至少完全看清了自己所要面对的挑战。

第十八章　一种新的文明

379

新的生活模式

要中肯地总结工业化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业化的影响过于广泛、深入和迅猛。甚至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都被改变了。从古代到现代,大部分的经济行为都受制于自然。在农村,一年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务农的方式,哪些事情必须做,哪些事情可以做,都由气候决定。而在一个季节里要做什么事情也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光线明暗、天气好坏来决定更具体的劳作方式。人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工具、家畜以及土地紧密相关,这些东西能够养活他们。即使是在城镇里生活的人,从大的方面看,其生活模式也由自然决定。在 1850 年之后,气候依然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坏的收成可能会使一年的商业活动萎靡不振。不过到了这时候,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已经由其他因素决定了。能够影响人们生活的新因素包括:生产的方式、让机器更加经济地运转的需要、资本投资的多少以及劳动力的充足与否。工厂成了新的象征,机器需要精确的时间控制,由此产生了新的工作模式。不过当这些改变发生的时候,欧洲大部分人还依然作为农业人口依靠土地生活。

不仅新的生活节奏出现了,工业化也通过全新的途径将劳动力和工作联系在一起。要说清楚这些事情的意义,避免掺入人的主观感情

很重要，但是也很困难。工厂的工人们不断地进行重复性劳动，他们的主观创造性根本无法融入工作，他们的整个工作也都是为了给别人创造利润。在意识到这些问题后，工人们感到十分失落，既是因为手工业世界的消失，也是因为他们挥汗如雨，却与他们的劳动成果毫无瓜葛。不过中世纪的农民的工作也是单调的重复，他们也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劳作。其实围绕钢铁产生的新的作息并没有多么令人沮丧，因为这仅仅是一种替换：钟表的滴答代替了日升日落，商业的繁荣和萧条代替了干燥或是狂风暴雨的气候。对此最简单的理解方式是：大范围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谋生的方式，不论我们对这种改变的优劣如何评价。

380 让我们来看看童工这个例子，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对于童工的滥用是早期工业化时期一种臭名昭著的罪恶行为。奴隶的解放和由此产生的普遍认同感为一代英国人树立了道德标尺，而这一代人也深深意识到了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并看到了那些阻碍年轻人树立信仰的事物。这一代人中也有许多人感慨如今的儿童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这些观念都让英国人对童工这个问题过早地产生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使他们忽视了童工问题只是雇佣劳动这种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将儿童作为劳动力并不是这时候才出现的。数个世纪以来，儿童们经常为成年欧洲人喂猪，在田里赶鸟，拾稻穗，做佣人，在十字路口扫街，卖淫，以及做临时苦工，而在许多非欧洲国家，儿童们依然在做着这些工作。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他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 年)中描绘了许多无依无靠的儿童，组成了一幅前工业社会的悲惨画卷。而工业化带来的则是对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工作者必须适应新的工作规律和新的悲惨环境。在农业社会，儿童由于体力不足，无法和成年人承担同样的工作，而机器的使用让儿童有机会直接做成年人的工作。而劳动力市场总是供不应求，这让家长们难以抗拒地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工厂，哪怕只有 5、6 岁，以便补贴家用。这么做的结果不仅仅是那些被牺牲的儿童遭受苦难，革命也接踵而至，既导致儿童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家庭体

系也破裂了。

这些罪恶太令人难以启齿,因而长时间没有得到关注。到 1850 年,英国法律开始介入,试图保护工厂和矿场里的妇女和儿童,而欧洲其他国家随后也开始效仿。在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整个 19 世纪在那些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中,奴隶制还没有被根除,即使是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也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谴责那些欧洲工业化早期的法律制定者,这样做除了自我满足什么意义也没有,因为那些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承受了社会变革,它们还无法很快地根治发展带来的弊端,因为它们还只能模糊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们也无法自觉地走出它们自身不断发展的利益带给它们的误区。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它们用某种方式而弃用其他方式行事的初衷,这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

工业化和思想意识

我们很容易把观念(也就是人们思考和感知的方式)和环境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那些物质和经济环境。如果在行为上做得不好,那将成为一种很危险的误导,但如果在思想上冒失地采用“简化主义”,则如其字面意义上所表述的那样(对观念和态度的辩解,仅仅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和物质存在的表达和结果),很容易被发现和抛弃。由许多人类活动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不清楚的集合成为联系人们的思想与更加明显的物质社会的纽带,不过要清楚地界定这种联系却很困难。要说明这个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最意识形态化的自我意识,人们的自我意识往往都很复杂,有时候很有条理,甚至很系统化。用这种自我意识来进行思考,很容易令人更加关注这些意识产生的历史背景。在 19 世纪早期,这种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自由主义”(*Laissez-faire*),这个词汇是法国人创造的。这种思想显然首先在工业化国家英国被提倡,而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被与此相关的思想所吸引。

381

在工业化早期几乎找不到什么经济理论家或者时政评论家,这些人之后会主张政府对经济采取完全不干预政策。不过这一时期却存在

着一个广泛而持续的论调,认为如果政治家或政府人员不去帮助或者阻碍市场经济,那它会自己运行得更好。一般来说,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人们对经济资源的使用,符合市场的"自然"需求,财富的生产将会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福利的提高。这一规律也可以适应个人主义,只要假设个人能让自己的商业行为最合理化,同时以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基础的社会能够不断加强组织化。

上述观点展现了工业化和自由主义之间长期的政治联系的根源;而保守主义者则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奢望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农业的、等级制的社会秩序,包含相应的各种义务和责任,并注入思想和宗教价值,他们并不希望像他们中某个预言家所说的那样,开启一个"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者"的时代[①]。但是那些希望新时代到来的人,也并非都是一些消极和自私的人;"曼彻斯特"信条(英国的自由主义运动通常都如此称呼,因为这座城市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商贸发展中有着象征性的重要意义)就是那些不仅仅重视自身修养的人更加直率的表达。19 世纪早期,一场持续多年的占据了英国人思想的政治论战让这些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其核心就是一场争取废除所谓"玉米法案"的战役,这个法令是一项关税征收办法,用以限制进口外国的便宜谷物,以便保护本国农民。"废除者"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是一个(并不很成功的)商人,叫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他宣称如今的情势危机重重;一开始,保留谷物税显示了立法体系被用于保证农业利益,以前的立法阶层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权力。而抵制立法阶层的动力则来源于面向未来的态度、自我肯定的心态和一种社会公德心,废除者们试图把经济从这种只顾个别利益的曲解中解放出来。而反对废除玉米法案的人则反驳说,工厂主们的目的不过是进口更便宜的谷物,以便支付更低廉的工资;曼彻斯特的反对废除法案的人声称,如果工厂主们想要帮助穷人,就应该更加坚定和仁慈地改善工厂里妇女、儿童雇工的工作条件。

382

① 这是伯克所说的,见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在工厂里，冷漠的生产流程展现了对弱者的残酷无情，(人们声称)即使在英格兰的乡村，穷人也不会遭受这种对待。对于反对废除法案的人而言，便宜的食物也意味着出口商品成本的降低，像科布登这样的商人，就可以从中牟取更多的利益。科布登认为不受重商主义政府约束的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可以给世界带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进步；贸易让人们联系在一起，交换且倍增文明的祝福，加强进步的力量。他甚至有时候还致力于解释这样的观点，自由贸易是神意的体现(不过他还没有像英国驻广州公使那样，声称“基督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就是基督”)。

任何简介都无法体现出到底有多少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辩(这也是玉米法案所关注的焦点)。越详细地考察这些争辩，我们越能体会到工业化包含着创造性的、进取的意识，并给过去的历史带来了知识、社会和政治上的挑战。这并不仅仅是对扩张的道德评判，虽然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曾这么认为。同一个被证明是一个仁慈雇主的人可能既抵制现行法律避免工人长时间工作的规定，又积极地支持教育和政治改革，以避免因特权而滋生的公众利益的腐败。而他的反对者可能极力反对保护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同时又是一个模范乡绅，一个对待佃户十分仁慈的教区主教，而且他还坚定地阻止任何教会以外的人获得选举权，或者反对任何限制地主政治影响力的措施。用道德来界定这些会变得毫无头绪。而玉米法案这一事件的结果也是出人预料的，正是保守派的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被主张废除法案的观点折服，并于 1846 年说服议会撤销了玉米法案。

只有在英格兰才能如此明确地对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进行争辩，并最终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果。反常的是，在其他国家，最后却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很快从中受益。尤其在德国，有人认为国家经济可以将国内经济自由主义与如同旧式的商业主义那样的经济保护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很受欢迎[1]。尽管由于 19 世纪中叶正处于扩张和繁荣的时期，这

383

① 尤其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观点。

为自由贸易的观点在大不列颠王国之外赢得了一些支持，但这种支持并没有延续。英国因其经济优势所获得的威望令其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暂时的声望，但这一时期的繁荣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影响因素，一旦这些因素衰退，国际竞争就促使保护主义政策（主要通过进口商品的责任"关税制度"加以实施）于 1900 年以前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得以恢复。然而经济自由主义者仍然坚信竞争的优点及个人的潜能。

对于乐观主义者们的坚实倚仗我们今天也很好理解。物质条件支持着他们，欧洲首先在掌握自身资源方面，其次在掌握世界资源方面都做得很好。在 19 世纪，欧洲人通常在自给自足之余，继续越来越多地引进并消费世界各地的商品（但支付的价格都不是很高，因为他们不必这么做），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现象反映他们为何能这样做。欧洲人从 19 世纪开始富裕，然后继续变得更加富裕。复合利益以及某种自我给养的模式正在运作；世界某一地区的新财富为其他地区的某些财富贡献着力量。刚果的橡胶、缅甸的柚木以及西非的棕榈油所产生的利润，大部分都没有在原产国进行再投资。即便是贫穷的欧洲人也能够从不断下跌的天然原料和食物价格中获利。欧洲农民用很便宜的价格就能买到加工好的衣服和工具，而同时代的某些非洲和亚洲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

面对新的工业化社会中明显的贫困，我们总是被它的缺陷所蒙蔽，认为在我们之前的历史中不存在这样的污秽。相较于所有的肮脏和贫穷的人来说，1900 年（当时已达到最坏的情况）欧洲城市中流浪者消费的物品更多，活得也比他们的祖先更长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根据后来的标准，他们的生活已经过得去了，或者说他们应该心满意足了。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通常在物质条件上比他们的祖先或同时代非欧洲地区的人们要好得多。可能听起来很惊人，他们确实属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群体。他们生活得更长久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新贵"；他们的祖先对于这样富裕的生活一无所知。

社会主义

尽管欧洲社会率先拥有了富裕的生活，但这并未减轻他们中间明

显的贫富差异。这到一定的时候就导致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社会和经济活动。当然,财富差异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例如,也总有些人向神职人员反对或指责这样的差异。然而,现在这种差异越来越明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新的城市和新的不为人所熟悉的社会结构中,这样的罪恶非常集中,显而易见。其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批评思想及新的政治术语。 384

"社会主义"一词和相关的"社会主义者"这样的词汇一样,都是新出现的政治术语。它开始包含很多不同的事物。这两个词汇都首先出现于1830年左右的法国,用来描述反对社会进入市场规律,反对经济被自由主义原则所操控的相关理论和相关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富有的人。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和社会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所有社会主义者也都认同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拥有财产者的权力通常支持着不公平的产生;有些社会主义者寻求完全废除个人财产,我们称这样的人为共产主义者。

这样的思想可能很惊人,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也并不是很新奇。"财产即偷窃"就是法国大革命创造的一句口号。历史上,人们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一直很感兴趣。几百年来,欧洲基督教统治者们设法通过宗教行为让社会上贫富之间尖锐的矛盾得到和谐的解决,基督教最杰出的赞美诗就是赞美上帝让挨饿的人获得了美好的事物,而让富裕的人们赤裸裸地离开。19世纪早期出现的情况是,这些或者类似的思想似乎突然之间变得更加危险,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自相矛盾的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本身含糊的继承。这似乎表明,如果公民权和法律上的平等,其实质性内容因建立在某人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而被剥夺,或者因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愚昧而改变了本性,那么这样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18世纪已经有一些思想家看到了财富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和世界上的其他不合理因素一样(他们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加以调整,使之能为最伟大的人群创造最伟大的利益。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些思想家和革命的鼓吹者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后来的几代人将从中认识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然而,平均主义思想只有到了现代才成为社会主义,此时平均主义开始抓住经济和社会变革新时期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化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这些变化只能通过缓慢的进程为大不列颠以外的国家所发现。然而,可能这些矛盾呈献给传统社会时太过明显,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财政和工业集中的微小开端也很容易被人察觉。有些国家尤其如此,如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那样,在这些国家,旧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发生的变迁更为剧烈。抓住社会组织潜在的伟大含义的先驱之一是一位法国贵族——克劳德·圣西门(Claude Saint-Simon),他认为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不仅让预先计划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变得必要,而且暗示着(实际上是要求)取代传统的统治阶级,也就是他们观念中的乡村贵族,而这需要代表着新的经济和精神力量的精英。这样的思想影响着 19 世纪 30 年代的其他思想家们(大部分是法国人),他们主张更高程度的平均主义;他们认为无论是从理性的还是道德的层面,更大程度上的经济平等都是可取的。他们大多乐于将自己和法国大革命相联系,想象着他们的理想作为大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很容易就能实现。法国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阶层也很容易将“六月起义”——1848 年巴黎人民的一次大型起义,视为一场“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因为社会主义的提倡者告诉他们,这次起义的起因就是巴黎人民要求政府撤回减低工资的法令。

385

同年,作为社会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的一本小册子问世。我们通常称之为《共产党宣言》(尽管它问世时并非以此命名)。至此,社会主义的史前阶段就与其自身历史相分离了。这本册子大部分是一位德国犹太青年——来自莱茵省的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他正式宣布与前人创造的“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决裂。空想社会主义者抨击工业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公平;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无关紧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争论说服人们接受变革确实可取的观点。所有事情总是沿着历史本来的道路发展,不可避免地通过工业社会创造了一个新的劳动阶级,也就是工业城市中没有财产的工资赚取者,马克思称之为工业无产阶级。在他看来,这个阶级必定

会践行革命。历史将依靠这个阶级创造革命的能力和精神。工业无产阶级将提供很多条件给它的成员，这些条件产生的唯一合理的结果就是革命，而通过这些条件产生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是错的，而在于资本主义在历史舞台上已经过时，因此必然会被毁灭。马克思坚信每个社会都有属于自己的体制来处理财产所有权及阶级关系，而这又相应地影响着每个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必须表达经济力量。政治制度将会像特定的社会组织那样，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发生改变，迟早(马克思似乎认为很快)革命将扫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社会制度，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扫除了封建社会那样。

这一杰出且鼓舞人心的预言以及马克思个人的斗志、能力和思想优势让他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获得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坚信历史站在革命者的一边，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鼓舞。他们得知，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投身的这项事业都注定将取得成功，对此他们心怀感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基于一种历史的观念，认为人类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因为人类的制度由发展着的生产方式所决定，马克思主义还坚信工人阶级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罪恶的世界进行着朝圣的旅程，而旅程的终点就是成功地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然规律的铁律将不再起效。社会主义革命者因此能够对通往社会主义纪元的进程不可抗拒这样科学的无可辩驳的观点充满信心，而坚持革命激进主义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马克思自己在践行他的学说时似乎更为谨慎，他只是宽泛地运用他的学说，清除历史上个人无力反抗的改变，而且并没有作具体的延伸。这可能并不奇怪，和很多大师一样，他并不认可自己所有的学生：后来他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386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鼓舞、动员了工人阶级。行业工会和合作社在一些国家已经存在；工人的第一个国际组织(不久后简称为“共产国际”)成立于 1863 年。尽管该组织内部包含很多不赞同马克思观点的人(其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但马克思的影响在该组织中是主要的

(他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它的命名让保守派感到恐慌,而他们的直觉无疑是对的。1848年后的几年间,社会主义者承袭了自由主义者的革命传统,他们坚信工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这一阶级在英格兰以外的地区还并不显眼(更不用说在大多数国家占主导地位了),这一信条被添加在传统的观点中,宽泛地说,传统观点认为革命不可能是错误的。从法国大革命中演变而来的政治思想模式因此传播到一些社会中,在这些社会中它们通常能证明该社会的不合理性。

思想和文化变革

现代文明(据我们目前所知,它是第一个在其社会结构的核心位置中不包含宗教信仰的文明)是何时,通过怎样的方式到来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我们希望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不能将城市或工厂在打破传统信仰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与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相分离,比方说,在改变(或腐蚀)文化中科学和哲学所起的作用,或者政治激进派训诫人们宗教是社会压迫的面具这样的行为所起的作用。然而到1870年,一个新的未来在欧洲工业人口中已经显现。在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都具有文化修养,与传统的权威格格不入,关注世俗,并且开始注意到他们这个人群是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而存在的。与以往不同,这是一个文明所依赖的截然不同的人类基础。

而且,在思想活动的更高层面上,19世纪是人类思想产生剧烈动荡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新思想还是旧思想都不断面临挑战。在那个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说清"社会"的总体"思想"究竟是什么,可能试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明智的。例如,当时人们已经指出,很多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让个人变得很渺小,并且让个人的精力都用在了应付生活上——随处可见的大城市不断出现;工业帝国不断建立,人们身在其中只是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政府权力不断增加,所有这些现象让人们产生了消极、冷漠和无助的感觉。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成千

上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已经比过去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科学和技术让他们比过去能更多地控制他们周围的环境，而且他们的口袋里有了少量的钱。电和管道煤气为他们提供了更廉价、更干净且更方便的方法来照亮房子和车间，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自行车一经发明，成千上万的人在移动方式上又获得了新的自由，他们在闲暇和工作时间都可以使用自行车。避孕的方法一经传播，男人和女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他们的家庭生活，而不需要迁就导致怀孕的可能性。

上述自由非常实用，现实问题想必已经显示出在先进的社会中人们观念上的总体变化，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这不仅仅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到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在每个时代，这样有用而又缺乏的商品总是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追寻，这些人都认为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商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19 世纪实际上标志着唯物主义的进步，随着这一理论的继续，越来越多的商品可供利用正好为其做了宣传，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满足。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唯物主义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现象，可能它更重要的是记录了这个时代文化的变化。

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超自然现象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信仰开始慢慢减弱；教会在一些国家从 19 世纪前半期就已经开始衰落。19 世纪末，很多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乐于接受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通常通过自然科学来解释自然和人类世界，而反对任何传统宗教针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解释。但是没有哪种文化的成熟阶段不包含反驳的观点或内部的矛盾，这种唯物主义思想与启蒙运动的遗留思想相冲突，后者的实际成果到 19 世纪才成形。例如，唯物主义被一些人用来暗示：既然某些重要事实通常决定了之后很长时间内将发生的事，而且个人的努力在任何重要阶段都无法影响这些事件的发生，那么个人的命运就不是由人们理性的选择或有根据的意愿决定的(这两者甚至远不及上帝所起的作用)，而是由无意识的自然进程所决定的。在唯物主义世界里，理性的个体可以决定自身命运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是没有立足

之地的。在界定这类决定性的因素时,有些人强调地理和气候的重要性,有些人强调竞争的重要性,有些人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越来越倾向于将其理论归结为世界必然走上它本来的道路,因为物质力量决定着经济生活,我们将看到一个美满的成果,工人阶级必然超越他们的前辈;这究竟让人感到欣慰还是沮丧则取决于你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呈现的这场戏剧。

然而,决定论者的理论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趋向于减轻人们对自身生活的责任感,并且可以随意按照既定的目标采取影响他们的决定。这让决定论者与基督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扎根于欧洲文明;他们也有别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后者探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所追求的个人;他们甚至有别于突破工业社会的人们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相信个人的决定非常重要,而且其实可以改变世界。决定论思想的流行表明,一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最深层次上发生转变。

388

科学

所有文明都为人类不断利用自然作出了贡献。现代科学更是改造自然的利器。一个容易为人所接受的真理就是“没有人或哪个族群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垄断性的贡献”。[①] 但同时也有另一个真理,就是现在世界上所遵循的科学都能追根溯源到 16 和 17 世纪欧洲人对自然界态度的改变中。然而在那之前,很多其他文化中关于自然界的思考已经被吸收进欧洲人的思想中(尤其是观察法的形成),正是因此,现今世界上的科学都是实验方法、机构管理、技术及测量方法的产物,它们的发展正是起源于欧洲的“科学革命”。

到了 1800 年,一个包含特殊科学文化的国际共同体已经建立(而且已经跨越了大西洋)。接下来的 100 年间,该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但最重要的还是在旧的和新的欧洲地区。这既是巨大而复杂

①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 (Cambridge, 1954), p. 9.

的科学事业进步的一部分，也是其真实的反映。人们甚至已经写了一些关于科学发展间接表现的大部头书籍，描述科学上的发明、技术和标准正在以如此快的速度呈指数型增长。作为欧洲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科学在三个方面显示了它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心理和文化上：科学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尊敬，相关从业者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本身成就非凡，并展现出了高效和多样的特质。第三方面体现在科学对那些并非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语言是对地位最有用的向导；19 世纪 30、40 年代，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科学家”一词被引入英语当中。在此之前，描述研究自然及其规律的人通常用的是“自然哲学家”一词。然而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将对自然严谨的实验研究与抽象推断这两者区分开来。人们也越来越感到真正的科学，与人们寻求将知识运用于 1800 年认为仍然被称为“有用且机械的艺术”中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变化与澄清“科学”的本质与其他类型的真理之间的差异密切相关。有人极力主张将科学重新评价为唯一的知识结构，他只是基于可观察到的现象来看这个问题，而且声明这是“实证的”真理。这个人就是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他将“实证主义”哲学建立在差别的基础之上；他的观点在知识分子当中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和马克思一样)是建立在历史运行的方式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孔德认为历史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已经到了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这是实证和科学的时代，而在这之前，人类知识分子依赖的是迷信和宗教的引导。

389

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并没有维持很长的生命力，但在 19 世纪，它伴随着科学家研究的实际成果，促进受教育的民众增强了对科学及其方法的信心。这也相应地给予科学家们自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科学成为神话，甚至成为一种宗教，而以上所说的发展正是这一进程的背景之一。如同曾经的神父宣讲一样，科学家们的意见开始影响到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科学通过解释和控制自然

这种方式产生影响力。从它最夸张的形式上来说,这样的轻信被文化史家称为“科学至上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乐于将科学的方法作为通向真理唯一可行的方式,将其延伸到新的领域中。圣西门设想在科学和工业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重新建构。马克思也希望建立一种社会的科学,其中之一就是由孔德命名的“社会学”。尤其是一些人,寻求建立“社会科学”。英国改革家及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功利主义的追随者之一。边沁希望社会管理以人们回应快乐和痛苦的原则为基础,快乐应该最大化而痛苦应该最小化,这种观点被理解为我们要重视的应该是最多数人的感觉以及感觉的强度。这些(以及很多其他)仿效自然科学的尝试,都以探究普适的半机械化的规则为基础;当时的自然科学正在远离探究这样的规律在此并不重要;非科学家的探究仍然证实了科学模式的声望。启蒙运动时期的见解,即人类自身作为绝对的自然客体可以是研究的主体,开始与狂热相联系,而且不再顾及可能存在的含义和结果。

19 世纪重要的科学方面的进步越来越大,且速度越来越快。一般来说,从一开始,自然科学的范围就限定为牛顿的物理学、拉普拉斯的数学以及拉瓦锡的化学。而且,有关电力现象方面可靠的观察和实验已经开始,系统的热力研究也是如此;很多可靠又具体的观察方面的知识也被纳入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就像 18 世纪的地质学和解剖学那样。19 世纪科学领域的局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 1900 年,物理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当时的化学已经成为一系列科学的组合而不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它在生物本体上的实际应用正处在狂热的试验当中。从奥地利修道士格雷哥·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一系列配种试验中开始衍生出一种新的科学——遗传学(尽管“遗传学”一词并非当时的本名;“基因”一词直到 1909 年才出现),从生物学方面也开始产生一种假说,其应用潜能看起来如此巨大,以至于可能跟两个世纪前牛顿的思想一样重要。

390

要想在本书的范围内全面解释这一切如何发生,以及经过了哪些确切的步骤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试图追溯该进程的尝试都有可能将

整个过程降级为对很多名字不充分的编录。然而，有些名字却不能省略，必须包含：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最早是化学家，后来成为著名的实验主义者；还有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他们为发现和解释电磁学和热力学作出了贡献；以上这些人的研究开拓了科学领域的新视野，科学不再仅仅是大量不同种类的问题的集合。他们让物理学领域的一次改革成为可能，这次改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仍然处于酝酿阶段，因为他们发现了 X 射线以及放射现象。化学在一些人的努力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的领头人首先是德国人，最重要的就是冯・李比希(von Liebig)，他是有机化学的设计师；但后来法国人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得到了公众更广泛的关注。他通过微生物学为建构和支撑传染病理论提供了证据，这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理论很快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外科医生李斯特(Lister)，他将抗菌术引入了手术室(他混合其他物质，将石碳酸喷洒在手术室内，因此让这个伟大的医生懊恼不已的是，他的一些不敬的学生编了令人恼火的歌谣"让我喷洒")。

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在农业、工业和医学上的快速应用广为人知，但是和其他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一样，法拉第、麦克斯韦和李比希的研究成果也很快用于实践。实际应用是科学对其所在的社会最快产生最突出影响力的方式之一。但这不是欧洲人的思想观念被科学所改变的唯一方式。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尤其明显，如果一个人的研究成果的总体影响得到了关注，那么他可能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1859 年，英国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一本书，我们通常称之为《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该书其实是对达尔文和另一位自然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之前一年呈给皇家学会的论文的继续，并且对论文中概述的动物学进化理论做了更完整、更全面的组织。经观察资料证实，其核心思想是生物都有其起源，它们的物种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进化，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很长一段时期，从较早的时候开始不断发生身体上的变化。虽然"进化"一词一直要到 10 年后该书的第五版中

391

才出现，但在达尔文写这本书之前，这个词就已经在使用了[①]；他的特殊贡献及对理论的阐述就是确定了物种进化的方式。他根据植物学、地质学以及动物学的相关资料认为，动物能够在竞争环境下成功求得生存的能力可以遗传到它们的后代身上，因为它们需保证后代能够生存并繁殖。而那些没有适当生存能力的物种则无法将它们特殊的才能遗传下去，因为它们没能生存下来将能力遗传给下一代。这样对于拥有某些特性的生物来说就出现了"自然选择"。后来(并非通过达尔文)产生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法——"适者生存"，这一说法令达尔文的观点更通俗化，但也经常被人误解，被拿来错误地用于概括他的主体思想。

达尔文发表的理论后来被证明是19世纪最具成效的科学思想。1871年，他出版了另一本书——《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在该书中他明确表示他的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适用于人类。该理论与生物科学的关联性很明显。他的思想很快得到了应用，但人们很少对其思想做进一步的理解，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正希望证明政治或社会上的成功(例如，认为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秀这样的普遍看法)需要"最合适的人"来享有。他们影响着经济生活方面的观念，他们让人们相信市场的自由竞争将确保那些有头脑又聪明的人理所当然地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取得成功。这些思想让那些在竞争中获胜的人深感欣慰，它们通常用来暗示人们，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取得成功，那些并不成功的人也借此来缓解他们的痛苦。然而，达尔文思想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宗教思想方面。自然选择的提出不仅冲击了《圣经》关于创世的记载(地质科学已经削弱了这种宗教思想)，还冲击着另一个基础理论，即人类在生物中享有特定的由上帝授予的身份。达尔文的思想让所有认真且思维缜密的人无法接受(19世纪初人们还能接受)基督教的核心文本《圣经》的真实性。

---

① 法国自然学家拉马克(Lamarck)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书中重点阐述了另一项进化理论，将其作为动物变异的理论基础。

科学可能通过削弱《圣经》的权威性以及传统的宗教教条,对宗教信仰和教会产生了最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是唯一致命的影响,科学也不仅仅提出了那些貌似直接且具有说服力的观点来反驳宗教传统上宣扬的教义,它也通过不断上升的威望对宗教产生影响。随着怀疑论不断在能够辩论(或者至少听说过)达尔文观点的精英分子以外的圈子中传播,围绕在科学周围的神秘性也不断增加,究其原因,与通过争论得出的可以确信的观点截然不同。到 1900 年,成千上万不知道李斯特和法拉第研究成果的人却知道,他们现在可以依赖的医药与他们祖父母那一代能够用到的医药极为不同,而且要好得多,他们也能熟练地掌控他们周围正在运转的电流所具有的神秘力量。不管一开始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物质上的进步都不知不觉地让普通大众开始崇拜新的圣物。在 19 世纪,科学最终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显著的作用。例如,对于那些在诸如酿造这样的古老行业中尚未意识到化学反应重要性的人来说,化学通过其在染色方面的重要性首次显现出其用于工业生产方面的潜力。关于化学染料的研究对其他生产领域(医药、防腐剂和炸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自身除了是新的"快速"染色途径外,也有它们在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它们得以让工业工人阶级所穿的布料不再那么单调。在医药方面,化学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19 世纪末阿司匹林得以生产,它可以用来止痛,在此之前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除了用鸦片和酒精外都无法做到止痛。

392

在这样的温床里,科学的神话不断兴盛。现在为人熟知的一个事实就是,科学通过经实验证实的大量不断累积的知识影响着人类的世界观,如同过去大型宗教所产生的效果那样。有些人开始通过科学来为超自然现象的问题寻找解释,有些人用科学来指引人类应该追求的目标,有些人则用科学来设立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所有这一切当然和科学家所追求的科学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只是对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事物给出非正式的由推论得出的认识的结果。除了一些残余观念以外,最终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里没有绝对必要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至高无上的唯心主义。它们在人类认识世界的

过程中似乎不再那么必要了(或者说至少不再被大多数人所需要了)。不管明确与否,现代欧洲文明的核心在于(甚至至今仍然在于)对通过控制自然能够得到什么这一愿望的信仰。基本上,现代欧洲文明宣扬,只要给予足够的资源、知识和金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在现代生活中某些费解的现象仍有其空间,但绝对不是神秘现象。当然很多科学家已经收回了这一结论。它的含义尚不能完全被人们所接受。但它是作为世界观立足点的一种观点,而且在1900年前就已经大概成型了。

第十九章　欧洲新秩序

393

正统性及其挑战

拿破仑的革命年代废止了欧洲大部分的旧制度，并且动摇和架空了其余的大部分旧制度，但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旧制度的正当性。人们不再认为这些制度是统治欧洲唯一必要的方式。而且无论被人们认为适合与否，这些制度都已经可以被质疑和改变。1815 年，欧洲已经有一两个地方开始了缓慢而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人们更加坚信现有制度是脆弱的。这种想法不会是昙花一现，它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将会深深植入那些对现实失望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的脑海中，并使这个群体不断壮大。而他们甚至在许多个国家都控制着政治局势。再加上政治领域的实质性改革和革命与战争遗留下来的思想与诉求，1815 年之后的欧洲无法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样归于平静，这一年反而见证了另一个动荡时代的开始。

透过之后八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洲版图的变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场变革的范围。到 1871 年，当新统一的德国跻身大国之列的时候，亚得里亚海到波罗的海一线以西的欧洲国家已经大多遵从民族主义的原则建国了，且不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民族主义的精神。而东边的欧洲国家也有一部分建立了民族国家。到 1914 年，巴尔干半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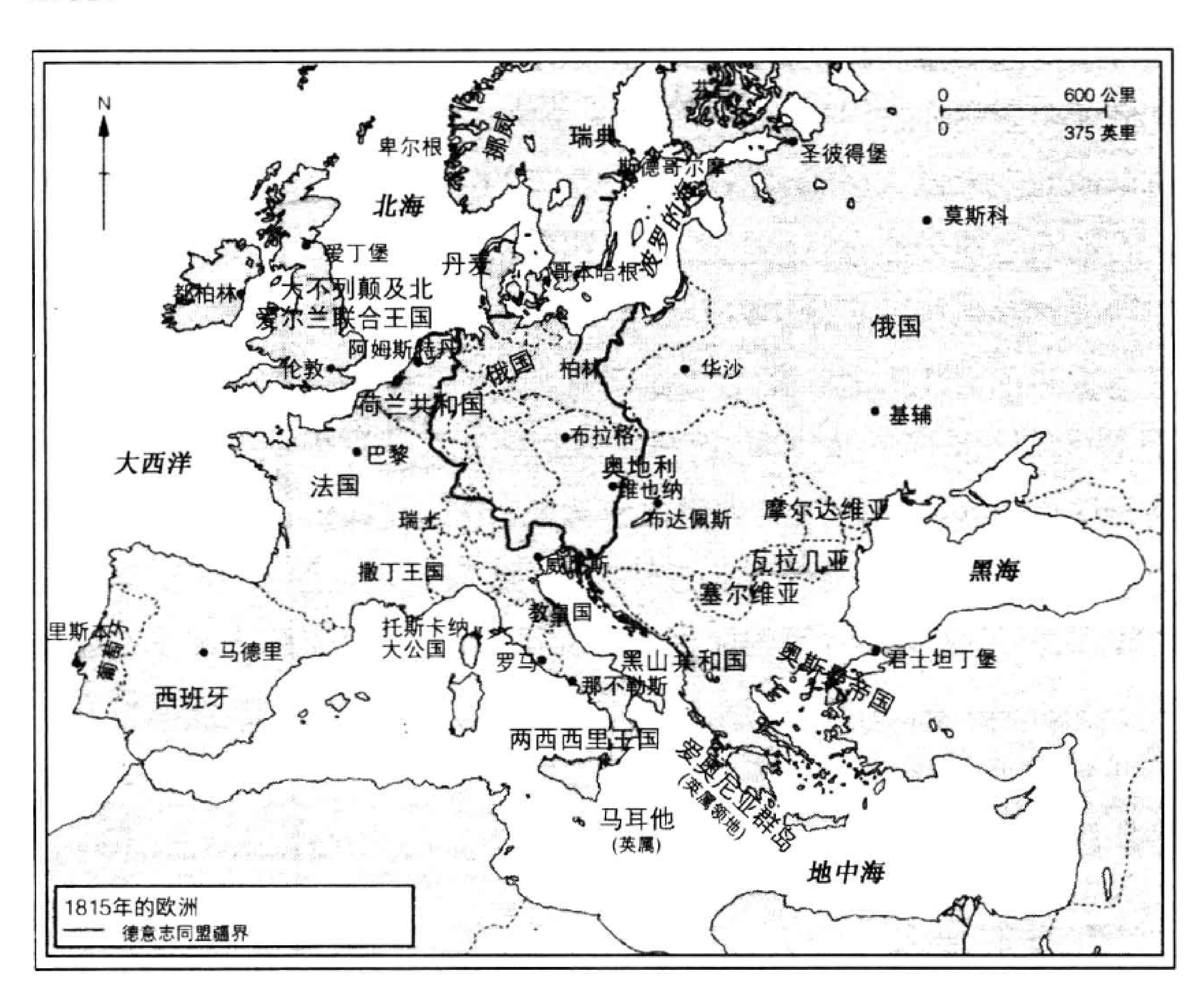
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民族国家，而之后，民族主义的胜利将走得更远。

版图的变化与人们接受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新框架这一点密不可分。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都开始意识到公共利益确实存在，而且比个别统治者或特权统治阶层的利益更重要。政府开始接受这一观点，他们至少要表现得像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行管理。国内关于界定和保护公共利益的斗争也开始合法化。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这样的争论需要特定的场所和机构；旧的司法和审判机构似乎不再适合决定其结果了。而且，这些新政策不像一种新语言或新手段这么简单。它也包含着政治思想在最深层面的变化，以及对理想政治的主张。合乎宪法且优良的政府不再只是保证公民享有法律或传统赋予的权利，政治斗争也不断向着满足公众需求的方向发展。几百年来，对过去历史无比的尊重已经超越了欧洲"政治"，我们这么称呼可能有点过时；也超越了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权力的执行。16世纪，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为了保卫他们法律上及历史上的特权（城镇、行省和个人的特权）就已经开始反对法定的君主制。17世纪，一些英国人为了保卫（他们所谓的）历史上议会的特权起来反对国王，其他人则为王权而斗争来保护历史上王权拥有者的权力。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人说着阿拉贡王国旧部的语言，却反对马德里政府的统治。即便是美国人也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声称他们正在索取跟那些享有王权的国民们一样的权利。在1789年的法国，旧秩序最终被打破，当贵族和法官反对君主擅自使用传统特权的愿望时，革命就爆发了。

394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公民"这句话可以作为变革开始的标志。自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进行试验以后，欧洲政治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得不考虑一些新东西了，对于这些新东西的探究是人们所希望的，也是必需的。这改变了关于服从和义务旧有的观念：问题变成如何界定公民，他们的愿望应当得到关注，应当赋予这个群体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利。在19世纪，应当让谁的权威合法化的问题一直在反复地争论。单单呼吁历史上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它应该得到一些尊重（或者

至少应该对那些主张保护历史上曾拥有的权利的人们表以同情),最终,每个国家首要的政治问题变成法律上谁的意愿应该率先得到考虑。关于这个问题,从民族和民主方面越来越多地给出了答案,但是在一些国家,关于这类变化的组织机构以及对其正式的认识的出现则比其他国家用了更长的时间。在1815年以后的休整期内,民族主义显然依旧是与旧制度(例如王朝统治)抗争的一股力量。而且,尽管在19世纪关于政府应该保护和促进那些人们认为是"历史上"的国家的利益,这样的政治讨论越来越习以为常,但它也伴随着激烈的长期存在的分歧:怎样的"国家"或民族才是历史上的国家,它们的利益应如何确定,谁应该为它们说话,在政治家的决定里它们可以并且应该得到什么程度的重视。 395



这个过程有时候是剧烈的,正当的反对思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悖论:178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只有大不列颠王国(还有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真正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在解释这一缓

慢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革时,会有时代误植的危险:像民主和自由主义这样的词汇我们很难界定,但现在我们却把它们与19世纪早期的历史结合起来,当时还并不存在这样的词汇。我们只能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这样一种总体趋势,即不断接受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作为(即使只是在形式上)将越来越多的人与政府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几乎总是要求让更多的人获得选票,并且要求更好地选举代表。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国家,个人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础。社会、宗教、行业及家庭单元关系与个人权利相比越来越不重要。这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在有些方面则导致了更多的不自由。19世纪,在和国民相关的问题上,国家权力无论是行政上还是司法上都在不断增加。

法国大革命除了在开创这类变革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外,也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并且是这一神话的源头。对于所有希望或害怕法国大革命的人来说,这场运动都在1815年结束了,但它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影响力却仍然存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产生,很多国家的旧制度遭到批判和毁坏,而且变得越来越脆弱。这让激进派和革命者拥有了新的希望和机会。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感觉,就是无论是好是坏,欧洲都面临着重大变革,至少是潜在的变革。这促使支持者和即将成为现行秩序破坏者这类人来改善政治问题,并试图让这些问题适用于1789年设置的原则框架。总体来说,这些思想主导着1870年之前的欧洲,并且使这段时间的欧洲政治充满活力,尽管这些人并没有完全接受人们的建议,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也受到很多的限制,然而他们让19世纪的欧洲成为政治的实验室,这里的实验、发明和爆发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

396

和平的建立

19世纪建立国际秩序的行动就是1815年签订的《维也纳条约》。它结束了法国战争的时代,并试图阻止战争的重复。战争的调停人寻求控制法国,避免革命,他们将欧洲传统思想观念中的核心——合法性

原则作为素材,并作出某些实际领土安排以防止法国将来的再度受侵。这样,普鲁士得到了莱茵河沿岸的大片领土,一个新的君主制国家(拥有相当大规模的选民的立宪君主制)在荷兰国王的统治下诞生,他同时统治着比利时和尼德兰,热那亚由撒丁王国统辖,奥地利不仅恢复了之前其在意大利的领地,还获得了威尼斯,并且获取了绝对的自由来维持其他意大利国家的秩序。在这其中的一些事例中,合法性只能视为权宜之计;那些在巨变时期被掠夺的合法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恢复。但是政府仍在讨论合法性,而且(这种协议一旦完成)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维也纳条约》提供了一个可以搁置争辩,没有战争的社会结构。40年后,1815年建立的社会结构大部分还在,即便某些方面有所削弱。

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被颠覆的恐惧。在所有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中,1815年以后是警察和阴谋家这类人最鼎盛的时期。秘密的社会组织不断激增,这种激增并未受到反复失败的影响,它们并没有显示出无法调和的革命性威胁。奥地利士兵在皮德蒙特(Piedmont)和那不勒斯地区处理预谋的政变,一支法国军队恢复了之前受到一个自由主义组织束缚的西班牙国王的权力,俄国经受住了一场军事阴谋以及波兰起义。在德国的奥地利统治者并没有受到威胁(尽管帝国政府害怕他们已经受到威胁),回顾历史,我们也很难看出在1848年以前,哈布斯堡君主国家的任何一块领土真正存在很大的危险。俄国和奥地利政权,首先被留待后用,其次他们作为1815至1848年间中欧和意大利的主要政治力量,正是维也纳体系赖以存在的两大基石。 397

人们通常都错误地认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是不可分割的;后来证实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在1848年以前很少有人真正寻求用革命来改变欧洲,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其实他们更希望通过改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原则(代议制政府,人民主权,人身及出版自由)和民族主义原则来改变欧洲。很多人把这两者混淆了,其中最著名、最受推崇的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马志尼(Mazzini)。马志尼提倡他的大多

数同胞都不想要的意大利统一，虽然在促成统一的过程中并不成功，但他成为各个大陆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激励者和榜样，也成为激进派最早的偶像之一。但他所描述的这一思想的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

在莱茵河西岸，神圣同盟(这一名词经常用来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三个保守政权的组合)的条约并没有生效，这里的历史完全不同，正统主义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814 年波旁王朝的恢复就反映了对上述原则的妥协。路易十八(Louis XVIII)在他的前任路易十七(Louis XVII)于 1795 年死于巴黎狱中以后，本来应该像法国其他国王那样实行统治。事实上，众所周知，像正统主义者试图制止的那样，他是坐在打败拿破仑的同盟军行李搬运车里回来的，这么做可能让法国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欣然接受，而且可能还得到了法国大众的默许。恢复后的政权属立宪君主制，尽管其选举权很有限。个人人身权利受到正式宪章的保护，从革命中没收和贩卖来的土地协议也未被触动；历史再也不会回到 1789 年前了。《拿破仑法典》继续管理着教会，法国新的部门分配和地方行政体系也保持不变。

然而，对于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随着对宪章的争论(宪章是国王和人民之间的一种协议吗？或者仅仅只是王室施与的一种恩惠，因此这种恩惠要收回就像授予一样容易)，左和右之间的斗争也从此开始，这种斗争在一系列问题中持续着，出现的问题都针对如何处理在这场革命中为自由者和有产阶级赢得的土地的原则。至关重要的无疑是确立大革命中真正获得的成果。下列事实对此进行了描述：那些为了让人们认可自己在旧制度统治下的法国有发言权而竭力斗争的人获得了胜利；这些“要人”(如他们有时所说的)的政治影响力得到了保证。不管是否来源于法国旧贵族，那些在大革命中表现突出的人，如拿破仑的追随者和士兵，或者仅仅是富裕的地主或商人，他们是法国真正的统治者。另一个改变就是 18 世纪 90 年代国家的建立；当时没有哪个个人或团体敢说自己独立于法国国家政府的影响范围之外。最后，最关键的是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在讨论和争辩公共事务时所用的词汇。左和右

399

之间的线如何划分,保守主义的或是自由主义的,现在政治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这条线上,而不在于争论通过君权神授获得的君主特权。当波旁王朝的直系查理十世(Charles X)在 1830 年愚蠢地试图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打破束缚他的宪章限制时,巴黎人民奋起反抗。自由主义政治家们急切地把自己视为“七月革命”的领袖。由于共和党人的懊恼,他们决定让一个新国王代替查理,但“正统主义者”将替代者视为篡位者。

1815—1817 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立

398

1815 年 1 月	意大利由以下地区组成 —撒丁王国:萨沃伊(Savoy)、皮德蒙特(Piedmont)、前热那亚(Genoa)共和国和撒丁岛; —摩德纳(Modena)、卢加(Lucca)和帕尔马(Parma)公国、大托斯卡纳(Tuscany)公国; —教皇国; —那不勒斯(Naples)王国; —圣马力诺(San Marino)共和国。 伦巴第和维尼夏(Venetia)划给了奥地利。
1820 年和 1831 年	在奥地利的帮助下,那不勒斯、都灵、摩德纳、帕尔马和教皇国的起义和政变浪潮最后都被镇压。马志尼(Mazzini)在皮德蒙特(1832 年)和萨沃伊(1833 年)的起义没有成功。
1846 年	庇护九世(Pius IX)当选教皇,被认为是“自由的”教皇。
1847 年	加富尔(Cavour)在都灵创办《复兴报(二)》(*newspaper II Risorgimento*);奥地利占领费拉拉(Ferrara),即教皇国。
1848 年 1—3 月	西西里、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皮德蒙特、罗马涅(Romagna)、米兰和威尼斯爆发符合宪法的爱国(反奥)起义,撒丁王国向奥地利宣战。
4 月	庇护九世作为基督教势力宣称他无意向奥地利宣战;
8 月	撒丁因战败被迫休战。
11 月	罗马爆发起义,紧接着教皇逃离罗马城。
1849 年 2 月	宣告建立罗马共和国。
7 月	法国远征军镇压罗马共和国并复辟教皇国。
8 月	撒丁继续对奥地利作战并战败;被迫赔款,国王正式退位(但是仍然保持 1847 年订立的制度)。威尼斯向奥地利投降。
1850 年	加富尔进入撒丁政府(1852 年任首相);建立反教权法规。
1855 年	撒丁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对俄作战;加富尔运用和平会议公布意大利的困境。
1856 年	在撒丁君主统治下,建立国家社团为意大利联合体服务。
1858 年	加富尔与拿破仑三世签订秘密协定,对奥地利发动新的战争。
1859 年 4 月	奥地利对撒丁王国发动战争。
5—6 月	托斯卡纳、摩德纳、帕尔马、教皇国等地爆发革命;法国在伦巴第击败奥地利;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Peace of Villafranca)。

(续 表)

399

1860 年	拿破仑三世同意撒丁王国(在全民投票后)同帕尔马、摩德纳、托斯卡纳、罗马涅合并,以将尼斯和萨沃伊转让给法国为交换条件。在加富尔的暗中帮助下,加里波第(Garibaldi)带领"千人团"入侵西西里,横扫意大利,摧毁那不勒斯君主国。教皇国内部的起义为撒丁入侵提供了借口,这在后来阻碍了加里波第进攻罗马的步伐。那不勒斯、西西里、翁布里亚(Umbria)和教皇国边界地区经投票决定并入撒丁王国。
1861 年 3 月 17 日	维托里亚诺·厄玛努埃尔二世(Vittorio Emmanuele II)统治下的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
1862 年	由于加里波第(于 8 月 29 日)在阿斯普罗蒙特(Aspromonte)被意大利王国军队击伤并逮捕,意大利军队的远征中止。
1866 年	意大利-普鲁士同盟成立;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七周战争中战败,维尼夏交还意大利。
1867 年	(11 月 3 日)加里波第进军教皇国的步伐,在门塔纳(Mentana)被教皇和法国的军队制止。
1870 年	普法战争期间,法国的卫戍部队从罗马撤兵,(9 月 20 日)在经过炮轰和袭击后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城。经过公民投票,罗马城并入意大利王国,并成为意大利的首都。
1871 年	《保障法》确定了意大利与教皇之间的关系,保证教皇的收入和独立,以及梵蒂冈国家的治外法权。

七月君主政制

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是法国王室旁支奥尔良家族的领头人,对于很多保守派来说,他是大革命的代表,尽管他几乎没有任何革命行为。但是他的父亲曾赞同处死路易十六(不久后他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当时路易·菲利普正在共和党军队中作为一名官员参战,甚至在 18 世纪 90 年代成为臭名昭著的雅各宾派中的一员。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400 路易·菲利普很有魅力,因为他能用君主制提供的稳定来协调大革命。18 年间,他的政府持续运转,并且为了富人们的利益而保持着基本的政治自由,有效地镇压了城市里的动乱(19 世纪 30 年代城市的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使得该政权不得左派人心。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号召他的同胞实现自身富裕,这引起很多人的嘲讽和误解,尽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告诉人们想要拥有选举权,就必须拥有高收入(在"七月君主政制"开始时,拥有国家选举权的法国人只有英国人的三分之一,而法国的人

1815 年以前德国的统一进程

1785 年	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组成了德意志君主联盟来反对皇帝约瑟夫二世的计划，即将巴伐利亚并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版图。
1790 年	普鲁士支持奥斯曼帝国抵制来自奥地利-俄国的压力。
1801 年	奥地利和法国签订《吕内维尔条约》(*Treaty of Lunéville*)，法国由此获得莱茵河左岸，条件是在莱茵左岸失去领土的君主可以从德意志内部地区获得领土补偿。
1803 年	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德意志帝国代表团)决定重组德意志。所有主要的君主都获得了土地，但只有一个以前的教会国和六个自由帝国城市得以幸存。
1804 年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Francis II)获得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的头衔。
1805 年	奥地利(在 9 月 2 日，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与法国签订《普雷斯堡和约》，奥地利向巴伐利亚、符腾堡(Württemberg)和巴登(Baden)出让领土。
1806 年	(7 月)法国建立莱茵联邦(它最终包含了除奥地利、普鲁士、不伦瑞克和黑森以外的所有德意志君主)，(8 月)以神圣罗马帝国结束。10 月，法国在耶拿(Jena)、阿尔斯泰特(Auerstadt)等地打败普鲁士，并进入这些地区。
1807 年	拿破仑用从普鲁士和俄国获得的土地建立新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王国及萨克森国王统治下的华沙公国。
1809 年	奥地利呼吁德意志支持自己，共同抵抗法国人未果后(提洛尔回应)，进一步失去领土。
1812 年	普鲁士和奥地利再次合作，对法作战。(10 月)莱比锡战役后，法国在德意志的霸权主义开始崩溃。同盟国基于莱茵边境的利益向法国提出和约，但法国没有接受。
1814—1815 年	《维也纳条约》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获得了德意志境内的领土，并建立了一个由 39 个国家组成的新德意志联邦，其中包括四个自由城市，该联邦由一名奥地利代表主持联邦政府会议。

口却是英国人的两倍)。不管怎样，该政权在理论上都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这是 1789 年大革命制定的原则。 401

这也给予它一种特殊的国际立场。19 世纪 30 年代，通过瓜分波兰的罪行，立宪制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正统主义者—东部君主制国家之间的差异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占领意大利和德意志附庸国的行为非常明显。君主制帝国并不赞同七月革命。当 1830 年比利时人起来反抗他们的荷兰国王时，这些君主制帝国非常担心，并与比利时决裂，但他们又不能支持荷兰国王，因为英国和法国此时正支持比利时，俄国也很快帮助波兰发起反抗。直到 1839 年，比利时的独立才得以确认；这是 1848 年以前，对《维也纳条约》所建立的政

治体系唯一一项重要的改变，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内部矛盾也引发了很多外交问题。

欧洲东部新问题

在欧洲东南部，变革的步伐加快得更加明显。在那里，一个新的改革纪元正在开启，就像西欧到达其顶峰时一样。1804 年，一位富裕的塞尔维亚猪肉商人领导了一场起义，和他的同胞们一起反抗驻守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无纪律的土耳其卫戍部队。当时，奥斯曼政权为了约束它那些叛变的士兵，乐于在道义上支持该猪肉商人的行为。但是奥斯曼帝国最终付出的代价是塞尔维亚在 1817 年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公国。此后，土耳其人还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割让给俄国，而且被迫承认他们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控制跟形式上一样，真正的政权掌握在当地帕夏的手中。

虽然不明显，但这却是 19 世纪东部问题的开始，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到底应该由谁或以何种形式来继承正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碎片？在欧洲、北非和亚洲，关于奥斯曼继承问题的战争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仍将继续。维也纳体系并不包含被来自各个大国的担保人所控制的奥斯曼领土。革新、宗教、意识形态和外交问题从一开始就纠缠不清。这个问题很快就表现为一场“希腊人”的“革命”(由所谓的苏丹天主教公民发动，其中很多人其实是土匪和强盗)，他们从 1821 年开始反抗土耳其，俄国支持了这场叛乱；这违背了传统的原则，但是舆论(很多都对希腊人抱以同情)、宗教和俄帝国主义者利益的旧有影响力让神圣同盟得以像支持其他统治者一样支持苏丹。最终，俄国单独对奥斯曼作战，并将它们打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19 世纪随着其他民族反抗运动的加入，东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1832 年希腊王国的独立必然影响到巴尔干地区的其他民族。

402

1848

19 世纪 40 年代在很多地方都是经济萧条、粮食短缺、生活贫困的

几年，尤其是爱尔兰，1846 年那里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次年就轮到中欧和法国，那里的经济衰退导致了失业问题。这引发了社会暴力，为各地的激进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一场叛乱刺激着另一场叛乱；这些叛乱极富感染力并且削弱了国际安全组织处理进一步动乱的能力。结果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爆发了革命，一时之间威胁着整个维也纳体系。

其象征性开端发生在 1848 年 2 月的巴黎。当路易·菲利普突然发现中产阶级不再支持他反对扩充选举权时，他很快退位。这就是“二月革命”。当法国建立起共和国的时候，每一位革命和政治流放者都振奋起来。不一会儿，似乎整个 1815 年体系都将崩溃。30 年协定的梦想似乎可以实现，“大民族”将继续进行，大革命的军队将再次前进去传播它的制度。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当然是相当恐怖的。最终，希望和恐惧都成为幻影。法国在进军波兰的过程中作出了外交妥协，它唯一采取的军事活动是捍卫教皇反对罗马的革命。尽管，没有法国的帮助，这一年中在除了伦敦、马德里和圣彼得堡以外的各个主要欧洲首都，政府都被搁置在一边，或者最好的情况也是政府处于守势。一瞬间，几乎其余每个地方的政治都国际化了。

这都只是表面现象。1848 年的革命是因为不同的背景而爆发的，有很多不同的目的，所经历的途径也南辕北辙，非常复杂。在意大利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城市居民反抗他们认为很不公平的政府，因为政府很吝啬；他们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要求就是通过立法保证基本的自由。当革命在维也纳本地爆发时，梅特涅(Metternich)大臣被迫逃亡，他是 1815 年保守制度的设计者和最重要的支持者。维也纳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整个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瘫痪。德意志人现在有发动革命的自由，而不用担心奥地利的干预。在一些较小的国家，旧制度开始崩溃。在奥地利领地的其他地区，意大利人(在一位野心勃勃又心有不安的保守派撒丁国王的领导下)在伦巴第和维也纳击退奥地利军队。罗马建立共和国，教皇逃出罗马城。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Budapest)，捷克人在布拉格发动起义。但这些革命中，有些更多的是追求民族独立，而非

立宪政体，尽管人们一度认为立宪是通向独立的道路，因为它冲击着君主独裁统治。如果自由主义者能够在中欧和意大利所有地区都设立立宪制政府，那么可能真的会出现到目前为止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机构，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这种机构的民族。

403

很快一些消极的因素开始出现；这一充满希望的幻想失去了某些吸引力。例如，如果斯拉夫人（或泛斯拉夫人）获得了民族解放，那么之前被视为德意志人的国家将在他们的领土上与之共享大片的土地，尤其是在波兰和波西米亚。要想接受这一点需要些时间。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在 1848 年突然陷入这一难题，最终导致德意志革命的失败。基本上，他们决定德意志民族主义要保持德意志东部的领土。因此，他们需要强大的普鲁士，并且为了将来组织德意志不得不接受普鲁士的条件。也有其他迹象表明，1848 年末之前形势已经转变。在意大利北部，奥地利军队掌握着撒丁人。在巴黎，一场起义本来可能进一步推动大革命向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迈进，但因“六月革命”中的重大流血事件而被镇压，并于 1849 年结束。撒丁军队是意大利革命唯一的盾牌，在它被打败后，整个半岛上的君主开始撤销他们在奥斯曼政权中止时所作出的立宪方面的让步。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统治者也同样如此。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继续对哈布斯堡政权施压，但是俄国军队加入同盟给予帮助。1849 年底，正式的欧洲体系与 1847 年时别无二致。

自由主义者将 1848 年视为“民族的春天”。假如确实出现过，那在它枯萎之前，嫩芽也没有存活多久。1848 年，民族主义成了一份流行的事业，但它表现得不够强大来维持革命政府，也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觉悟。其失败证明，对 1815 年政治家“忽略”给予它适当的关注这种指控是错误的；从 1848 年以来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民族，也没有谁已经准备好这么做了。其基本原因在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对普通大众来说还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有相对来说很少的一部分人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至少是受过普通程度教育的人才会关注民族主义。将来，民族主义将在国家独立后通过政府和教育逐渐显现，而不是一出现就非常成熟。在有些地方，民族差异也包括社会问题，有些觉得自己已通过

语言、传统或宗教获得身份认同的人有时会采取有效的行动,随之而来的是当地显著的变化,但他们并不能建立新的民族。当哈布斯堡王朝政权允许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加利西亚(Galicia)的罗塞尼亚(Ruthene)农民在1847年兴高采烈地谋杀了他们的波兰地主。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获得满足,然后在1848年继续对哈布斯堡政权效忠。

1848年确实爆发了一些受人欢迎的起义。在意大利这类起义通常发生在城镇而不是在农村;伦巴第的农民为奥地利军队的到来而欢呼,因为由作为他们领主的贵族发动的革命没有让他们看到好处。在 404 德国部分地区,很多地方传统的通过土地统治的社会体系一成不变,乡村有时候秩序混乱。德意志农民像法国农民1789年时的行为一样,烧

1848—1849年:重要历史事件

年	月	事件
1848年	1月	西西里爆发人民反抗运动,并在整个那不勒斯王国蔓延。
	2月	那不勒斯同意立宪;巴黎爆发革命,路易·菲利普退位,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皮德蒙特和托斯卡纳同意立宪。
	3月	维也纳爆发起义,要求捷克和匈牙利自治,维也纳和伦巴第独立;柏林爆发起义,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准许在普鲁士立宪;其他德意志国家也照做。
	4月	匈牙利脱离奥地利,并入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准许立宪。
	5月	由德国自由党人控制的法兰克福议会召开,开始讨论建立一个整体的德意志新立宪政府。
	6月	"泛斯拉夫"议会在布拉格召开;布拉格起义被哈布斯堡军队镇压:反动势力首次恢复。激进的巴黎人民起义在"六月"被镇压。
	9月	奥地利农奴获得自由。
	10月	维也纳起义被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ätz)镇压。
	11月	柏林被军队包围,普鲁士起义结束。
	12月	奥地利斐迪南皇帝退位;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继位。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法兰西总统。
1849年	2月	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教皇出逃。
	3月	奥地利在诺瓦拉(Novara)打败撒丁军队,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 Albert)退位,维科特·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继位;法兰克福议会完成立宪,并授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德意志联合王国王冠——他拒绝了。
	4月	在维也纳采取了中央集权主义立宪后,匈牙利宣布脱离奥地利获得独立。
	6月	法兰克福议会(德国国民大会)被普鲁士军队强制解散。
	7月	法国军队镇压罗马共和国。
	8月	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的反抗;维也纳共和国向奥地利投降。

毁封建主的房屋,这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敌意,更是为了毁掉令人憎恶又恐惧的租金、债务和劳役,但这些行动就是全部了。然而仅仅是这样的405 暴动也让城市的自由主义者像“六月革命”期间法国的中产阶级一样感到恐慌。因为法国农民自1789年以来都是守旧的,法国政府在镇压巴黎贫苦人民的过程中得到了各郡的支持,正是在巴黎人们让激进派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在革命运动中也还是能看到保守主义。德国工人阶级的暴乱让富有者感到恐慌,因为德意志工人领袖提到了“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确实寻求回归过去。在他们的观念里,存在着一个由行会和学徒关系组成的安全世界,他们害怕新机器、工厂,莱茵河上的汽船让船夫失去了工作,他们也害怕一时之间就开始无限制地卷入贸易,也不愿见到那些表明市场型社会已经建立的鲜明标志。自由主义者缺少求助于普通民众的弱点几乎总是在1848年民众的革命中显露无遗。

可能在东欧和中欧的乡村地区,革命将社会改变得最多。在那些地方自由主义原则和对民众起义的恐惧一起迫使封建主作出了让步。1848年,俄国以外的各个地方,土地束缚和强迫农民劳作都得以废除。60年前发生在法国的农村社会革命被引进中欧及东欧的很多地方。这一方式为德意志乡村生活,以及多瑙河流域个人主义和市场秩序的重建开辟了道路。尽管其实践和思想习惯仍然徘徊不前,但中世纪的经济秩序现在实际上已经终结。然而,法国大革命原则中的政治思想要想得到发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克里米亚战争

尽管每件事情都很难立刻改变,但1848年仍然中断了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并将持续很长时间的国际和平时期与一场周期性的战争划分开来(尽管这在当时还很难看出来)。在接下来的25年中,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王国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双方之间充斥着战争(即1854—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法国和撒丁王国同盟对奥地利作战(1859年);普鲁士与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意大利加入

普鲁士一边作战)、法国(1870年)之间也爆发了三场战争。后四场战争与建国有关。前一场战争则是因为另一个东欧问题：俄国是否应该占领，或者可能推翻土耳其？

1854年，就像沙皇为了保卫其国家的利益在有段时间内削弱奥斯曼政权一样，俄国在近东的影响力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打破了几个大国之间长期的和平。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和英国作为土耳其的同盟对俄作战，这场战争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场著名的战争。战争在巴尔干半岛、俄国南部及克里米亚地区展开。最后一个战场最受人瞩目。在克里米亚，联军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此处是沙俄在黑海地区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而其产生的某些结果却很出人意料。英国军队虽然表现尤为突出，但内部行政管理不当，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国内掀起了一场重要的激进派革命浪潮。另一个与此次战争相关但是几乎是偶然出现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妇女职业——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工作让为数不少的欧洲妇女拥有了能够从事工作的机会，自黑暗时代成立妇女教会社团后第一次实现了重要的扩充。作战指挥的新方法也非常引人注目，它是技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大国之间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汽船和火车。

406

尽管这些结果都令人惊讶，但在短期内，它们都没有这场战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重要。俄国战败，其对土耳其的威慑力暂时受到压制。东欧向着建立另一个新的基督教国家——罗马尼亚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一目标最后在1862年实现。而且，民族主义在过去土耳其人的土地上获得胜利。但战争造成的关键结果是神圣同盟最终瓦解。当奥地利警告俄国在战争期间不要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公国(罗马尼亚)，后来奥地利自己又占领了这些地区时，18世纪奥地利与俄国之间关于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该如何处理的矛盾再次爆发。然而就在五年前俄国通过镇压匈牙利革命帮助哈布斯堡王朝恢复了统治。这是两国之间反革命友谊的终点。下一次奥地利面临革命威胁时，它想镇压就再也没有俄国警察的支持了。

版图重构

1856年,无人可以预料还有多快和平就将来临。在随后的10年里,奥地利在与意德的两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中丧失了霸权,而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两个国家,在五年之后实现了国内统一,形成了新的国家。正如1848年的狂热分子所预料的那样,民族主义以牺牲哈布斯堡为代价而获得了胜利,但却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撒丁王国和普鲁士王国不是因为革命,而是因为这两个保守且传统上具有扩张性的国家的野心,才以牺牲奥地利为代价着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但奥地利失去了俄奥联盟,而且1852年后的法国又被一个叫拿破仑的皇帝所统治。这一位拿破仑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于1848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总统,继而于1851年发动政变,弃宪法于一边。拿破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令人害怕的,它预示了一系列的国防重组计划及革命。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二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神话人物,这一从未统治一方的艾格隆是拿破仑的儿子)支持破坏1815年时期的反法举措,因而反

407

德意志的巩固:1851—1871年间普鲁士的胜利

1815年	普奥联同英俄组成四国联盟,以支持维也纳会议上作出的决定。
1819年	整个普鲁士实行统一海关关税。
1829年	普鲁士领导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开始扩大(马上它就囊括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
1830年	巴黎的七月革命在德意志引起了反响;部分皇帝退位并颁布了宪法。
1833年	强烈企图占领法兰克福;奥地利领导了一股新的反抗潮。
1848年	巴黎的二月革命成了加速德意志的革命浪潮到来的催化剂。自我组织的议会(Vorparlament)为国家议会做准备,国家议会于5月18日召开,并任命了全国行政长官,且开始筹划国家宪法。
1848—1849年	柏林和维也纳在不断重建王室权威,而法兰克福议会正争论解决大德意志(即包括奥地利占领的德意志地区的德意志)和小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即非哈布斯堡的德意志)。
1849年4月21日	普鲁士王国拒绝成为新德意志封建王国国王,随后,法兰克福议会解散。
1850年	大多数的德意志统治者受到奥战争威胁(奥尔米茨屈辱),普鲁士企图以多数德意志统治者支持的小德意志线为基准去统一德意志。旧的德意志联盟重建了。

（续 表）

1862年	俾斯麦成为普鲁士第一首相。
1865年	俾斯麦谋划了与奥地利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争议。
1866年	普鲁士与意大利结成联盟。
6—8月	德意与奥发生了长达七周的战争。普鲁士在萨多瓦(Sadowa)获胜。
7月3日	柯尼希格拉茨大捷将奥地利驱逐出德意志，这使普鲁士领导下的莱茵河以北的北德意志得以组织起来，并且为南部各州赢得了独立。法国的赔偿要求被断然拒绝。
1867年	北德意志邦联成立，普鲁士国王任总统，普鲁士控制了武装力量，普鲁士在联邦委员会占有压倒性地位。南德意志州加入关税同盟，新关税议会成立，权力有限，但适用于整个德意志。
1870年	法国就霍亨索伦王室拥有对西班牙王位的可能的候选资格提议对普鲁士宣战。德意志各州联合起来打败了法国。该年冬天，基于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新德意志帝国的协商展开。
1871年 1月18日	德意志帝国（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凡尔赛成立。

对奥地利在德意上的垄断地位。他口中的民族主义，比起其他的统治者来，侮辱意味更少，并且他似乎相信民族主义。他凭借法国的武器力量和外交手段推进了加富尔和俾斯麦这两位伟大的外交专家的工作，当然，并不总是设计好的。加富尔是撒丁王国的首相，俾斯麦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 408

1859年，撒丁王国联合法国迎战奥地利；一场简短的战争之后，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只剩下了维尼夏这唯一一省。现在，加富尔着手将其他意大利州归入撒丁王国，付出的部分代价是萨沃伊必须归于法国。他于1861年去世，而关于他真正有多大野心的争论仍在继续。1871年他的继承者在撒丁国王的领导下统一了意大利，当时撒丁国王获得了补偿，因为撒丁王国的萨沃伊王室承袭了新王国的王位。同年，德国也统一成为一个新的帝国。1864年俾斯麦再次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两年之后，普鲁士在波西米亚闪电战中打败了奥地利，因此最后结束了自1740年弗里德里克二世开始的就德意志最高统治问题的霍亨索伦-哈布斯堡条约。这是对既定事实的某种承认。自1849年（德国自由党并未将德意志王冠交予奥地利皇帝，而是交予普鲁士国王，只是普鲁士国王拒绝戴上王冠）始，奥地利在德意志事务上的势力就遭到了极大的

削弱。那些仍指望维也纳领导并且获得资助的州于 1866 年后就面临了普鲁士的威逼。如今的哈布斯堡帝国绝大多数是多瑙河流域的人，在东南欧和巴尔干地区占有绝对优势。1815 年它从荷兰退出,1859 年放弃伦巴第,1866 年被普鲁士人强迫放弃威尼斯并向意大利人投降，如今又让德意志人自己处理自己事务。很快,在和平之后,匈牙利人抓住机会进而又打败这个已被侮辱的王国。在 1867 年的"妥协"中,他们获得了奥地利一半地区的真正自治。因而哈布斯堡帝国成了"双重王国"或"奥地利-匈牙利帝国",它就这样凌乱地被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仅仅靠王朝本身和共同的外交政策而联系。弗兰斯・约瑟夫的领地分为两半,他是其中的一半的皇帝、另一半的国王。

德意志取得统一还需进一步的努力。它逐渐让巴黎明白,普鲁士在莱茵河外的掌控权声明不会涉及法国利益。法国如今面临的不是一个争论不止的德意志,而是一个受强大军事力量掌控的国家。黎世留开启的时代已在不知不觉中崩裂,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此时拿破仑三世在国内外都陷于孤立中,于是俾斯麦引诱法国于 1870 年宣布开展一场愚蠢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为德国民族国家这一新大厦奠定了基石,因为普鲁士领导了"防卫"德国打击法国战——并且当时仍有活着的德国人记得拿破仑一世领导下的法国军队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普鲁士军队摧毁了第二帝国(法国最后一个帝国),并且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一帝国与它中世纪时期的前任毫不相同。实际上,它是联邦形式伪装下的普鲁士控制区,但作为一个德国国家政权,它令许多德国自由人士满意。1871 年,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从亲王们手中接过统一德国的王冠并戴上了它,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既戏剧性地又恰到好处地)正式成立了。

409

因此,革命在欧洲得到了避免。随后的 50 年,德国取代法国,成了欧洲陆地力量的掌控者,这就像法国在 17 世纪代替西班牙一样。这个事实一直阻挠着国际事务,直到 1945 年为止。它表明,这一绝对的合法性和维也纳决议几乎与更令人害怕的左翼的革命政策毫不相关,除非这些左翼是民族主义者。相较于加富尔、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所取

得的成果(拿破仑三世的功绩一半不是他主观所为),更令人恐惧的阴谋者毫无所获。而这一时期的希望来自革命者,是他们唤起了恐惧,考虑到这一点,上述情况不免有些古怪。社会革命甚至开始发出转弱的信号。到1848年为止,仍有不少革命,但称其为革命也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其中毫无阴谋、阴谋家和檄文。而1848年之后,几乎没有。1863年发生了另一场波兰革命,但这是直至1871年发生的唯一一场在大国土地上爆发的小战争。

1848年后革命的衰退是可以理解的。革命似乎在法国之外毫无进展,在那里革命幻灭了,走向了独裁。革命目标以其他形式达成。毕竟加富尔和他的同伴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赋予它以一种新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对马志尼镇压得太残忍。俾斯麦创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强国——德国,这正是1848年的德意志自由派所期盼的。这两位政治家的极其保守的动机无关紧要,但对于那些被他们激怒的激进敌对派来说,却并非如此。其他要求因为经济进步而实现,出于对贫困的恐惧,19世纪的欧洲越来越富有,并且给越来越多的人民提供了更大量的财富。一些短期因素起了作用。1848年前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大发现提供了大量的黄金,这刺激了19世纪50、60年代的世界经济。这些年,人们信心大增,失业率下降,这利于世界的和平。

革命之所以不常发生的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它们很难实现。政府发现处理混乱更容易了。19世纪诞生了现代警察和国家宪卫队。因铁路和电报的诞生,交流更加便捷,中央政府也因此在处理远距离混乱上获得了新的权力。总之,军队在处理反叛时拥有不断进步的技术优势。甚至在1795年法国政府表明,一旦它掌握并使用常规军事力量,那么巴黎即入其囊中。事实上,在1815至1848年这一长时间的和平期间,欧洲军队越发成为维护安全的工具,这些军队可能大多用于镇压本国人民,而非成为世界竞争的工具,用来抵挡外国军队。1830年和1848年巴黎革命的成功就归因于某些武装力量中的重要部队的倒戈。当这些军队忠于政府时,这样的战争结果只能是反叛者的失败。那年之后,在欧洲主要国家,没有一次人民反抗政府的起义是成功的,因为 410

政府控制着的武装力量并未在战争的失败和颠覆中遭到动摇，并且政府决心使用暴力。

保守主义和现代化：俄国

就像中世纪时期教会与国家之争一样，就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对俄国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又一个欧洲历史经验。俄国曾于1812 年遭到入侵，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将自由理念玩弄了一番，甚至想到了宪法，但是 1815 年之后，一切都毫无踪影。俄国并未完全不受自由主义和革命理念的影响，一些人批评现有体制，并在西欧寻找好模式。一些俄国军官曾经在追击拿破仑的时候去过巴黎，他们将所见所闻与俄国进行比较，发现了俄国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俄国持续政治反抗的开始。一些军官秘密结社，企图在因亚历山大死去而带来不确定性的 1825 年发动政变；这就是十二月党人运动。它失败了，但却使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大吃一惊。这一点至关重要。尤其是因为尼古拉一世强烈反对变动，他的统治负面深深影响了俄国的命运。他终身信奉独裁，十二月党人运动之后，他在俄国主张专制官僚、文化生活控制和秘密警察统治的传统，而刚好此时其他的保守力量正在朝相反方向变动，尽管这并非他们所愿。当然，还有许多要建设。历史已经长时间地将俄国的专制与西欧的君主制分化开来。但是仍需面临极大的挑战，多数情况下，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尽管僵化但在应对挑战时却快速有效。俄国现在获得的仅仅是对专制主义的旧式统治方式表示失望而已，这时的专制是由一个比其前任在此方面更坚决的人在实施。晚至1848 年，这些方式仍十分有效，俄国仍可以既保证国内安全，又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

尽管除了在波兰之外，俄国似乎免疫于曾困扰着其他国家的政治革命，但事实上，该国的民族、语言和地理分化早已在 19 世纪就呈现出重大问题。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俄国开始要面对这些问题。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已经超出莫斯科人的能力之外，也非专制传统可以处理。首先是现代化问题，即假如俄国想继续跻身于强国前列，那么为了

411

使社会富足和提供必要的力量，就会产生发掘和有效使用能源的问题。1770 年后的 40 年，俄国的人口是原来的两倍多。一个曾经多样化且不断增长的社会现在极端落后，大部分城市都成了巨大农村扩张的一部分，而农村扩张经常显得毫不充分且是非永久性的，更像是暂时性的安营扎寨，而非形成固定的文化中心。最大的扩张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嵌入亚洲，亚洲土地上新的精英被包容于帝国结构之中。因为与拿破仑的冲突已消磨了法国及启蒙运动的怀疑观对俄国产生的旧有的威望，尼古拉统治下的俄国基于新的意识形态掀起了对宗教的新一轮重视。因在国家需要什么这一观点上的不同，微小的知识分子阶级分裂了。“西方派”提倡来自西欧的理念和制度，“斯拉夫派”提倡东正教经过更新后产生的能量、传统和原有的制度。

意识形态作为俄国和西方国家分歧的来源而愈发重要。直到 1991 年，它才放弃发展意识形态作为统一力量。然后无论对于文化阶级还是落后的大众来说，这并不意味着 19 世纪中期俄国的日常生活和欧洲东部和中部的其他地方非常不同。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争论俄国到底是否是欧洲国家的原因之一。尼古拉给这样的分歧做了决定性的强调。至少在其他王朝和在 19 世纪上半叶可以感受到的变化的可能性(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已经慢慢地渗透入日常生活)在尼古拉统治初期，绝不允许在俄国出现。严格的审查和警察表明这块土地拒绝任何现代化的可能(尽管俄国社会的其他障碍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同样重要)。

短期来看，这些政策是成功的。整个 19 世纪，俄国并没有革命。1830 至 1831 年和 1863 至 1864 年的波兰起义遭到了野蛮镇压，并且由于波兰和俄国怀有互相厌恶的传统，镇压就更容易了。绳子的另外一头是野蛮原始的农业社会下的持续暴力和无秩，并且越来越多的阴谋、暴力使俄国变得更加无能，甚至越来越远离他们要求的文明政策和共同提出的设想。对于尼古拉的统治，有一些很有名的总结，比如“冰时代”、“瘟疫区”和“监狱”，表明这个时代无法淹没批评了。

尽管对俄国历史来说，这不是最后一次，俄国国内强烈而又不妥协　412

的专制主义与其扮演强大的国际角色是毫不冲突的。俄国的军事潜质很大。当军队满足于前装炮时,当双方间没有重要的科技差距时,俄国所具有的庞大的军队数量是占绝对优势的。正如 1849 年所展现的那样,这些数量庞大的军队足以支持并维系国际反革命安全体系,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同时,俄帝国在欧洲外的地区也获得了成功,主要以中亚、波斯和中国的牺牲为代价。俄国甚至企图在北美扩张,直到 1840 年,俄国在阿拉斯加的要塞仍然存在,并且在北加利福尼亚仍有据点。然而,俄国外交政策的繁荣仍然集中在欧洲西南的奥斯曼欧洲地区。

经过 1806 至 1812 年和 1828 年的战争,俄国的疆界已经跨越比萨拉比亚,到达了普鲁士和多瑙河口。比起瓜分波兰对 18 世纪外交的重要性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命运对 19 世纪外交更为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国卷入其中。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它并未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但是这样的和平使俄国为了一个可见的未来在黑海地区重申了它的传统目标。

战争中期,尼古拉一世去世了。这简化了其继承者亚历山大二世的问题。战争的失败明显地表明变化必须来临。克里米亚战争对于俄国内部事务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因为现在表明 1815 年重建后的军事大国不再享有毫无争议的优势,甚至对于其自己的领土而言也是如此。假如俄国想再成为一个和其强大潜力相匹配的大国,那么其传统模式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一目标似乎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俄国制度的现代化已是必须。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莫斯科南部地区仍然没有铁路。自从 1800 年,俄国曾经对欧洲工业生产所作的巨大贡献已经不再增长,现在已被其他国家远远赶超。俄国是世界上农业生产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俄国人口缓慢上升,对其资源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俄国开始现代化。

事实上,比起其他地方,这里发生的更可以称为革命。在尼古拉的统治下,农民起义、袭击地主、焚烧谷物和伤残牲畜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尼古拉都承认农奴制是俄国社会的大魔鬼。农奴制使农民没有动

力去做更好的种植,使可以为新工厂提供工人的劳动力的自由移动毫不可能。贫穷也使农民对货物的需求量减低。另一方面,农奴制在俄国社会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突然消除农奴制可能意味着政府本身的倒台。独裁依赖于地主承担了当地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骑在大象身上的人想要跳下来是很难的。大多数的俄国人是奴隶,他们不可能仅仅因为法律而在一夜之间成为领取工资的劳动者和小地主。同样,有产阶级也不会因为强征而马上成为穷人。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承担起庄园体系倒台后而落在其身上的行政负担。

413

尽管尼古拉不敢采取上述措施,但俄国政府手中掌握的一张底牌就是君主的绝对权威。现在这种权威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几年来通过研究不同废除形式的相关证据,并权衡其可能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沙皇在 1861 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这标志着俄国历史的新纪元,沙皇自己也赢得了"解放者沙皇"的头衔。这项法令让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并终止了契约劳工。它还给予农奴份地。但份地需要用赎买费赎买,这样加以补偿才能让农奴主能够接受这样的改变。为了确保农奴主能够得到补偿费并避免因获得自由的农奴大量突然进入自由劳工市场而造成的危险,农民在几年中仍然臣服于他所在的乡村社团的权威,由这些社团在家庭的基础上收取份地分配的费用。

后来人们也提出了关于这一措施的很多缺点。但回想起来这似乎还是一项巨大的成功。几年以后美国解放其黑奴,黑奴们得到的比俄国农民得到的还要少得多。美国黑奴生活在一个拥有更多经济机会的国家,但他们被推入劳工市场,被迫直接接触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观念,这导致某些问题激化,其中衍生出的一些结果让美国人至今仍需努力解决。俄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项社会改造措施在这时颁布,而且没有引发相应的混乱,这也开启了俄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是当时世界上潜在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这也让俄国迈出了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使得俄国农民能够实现工业化作业并实现俄国农业的现代化。

农奴解放也开启了改革的新时代;到 1870 年地方政府已经有了代议制体系,还具有改良后的司法制度。但是改革并没有触动君主制的

核心原则。然而这些改革在很多自由主义者那里却很受欢迎,这样的变革不是被视为俄国民众的权力,也不是对正当要求的满足;它们可以根据沙皇的意愿,像他准许这些改革一样被收回。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权批判者不断拒绝向改革妥协,不断密谋并努力要推翻它的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在 1881 年鼓吹"沙皇解放",那天他批准开始实行一项准许立宪的新政策。他的继承者对这项新政置之不理,前者开创了一个更为反动的政权。毕竟,俄国可能并没有正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10 年前,欧洲已经得到警告:如果俄国真正实现了现代化,那将意味着什么?俄国之后就在普法战争中受益,它声明废除 1856 年对其在黑海自由所设的限制。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也是非常实用的一步。在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并开始改善其国内制度之后,俄国不仅预示着它将再次成为其自身领土范围内的主人,而且它也将重新开始现代史上最持久、从事时间最长的扩张政策,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414

保守主义与现代化并存:英国

英国是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先导者(从 1801 年开始,联合法案废除了爱尔兰的议会并给予爱尔兰在威斯敏斯特的代表权)。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它依然在宪法和政治上展现了令人咂舌的连续性。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延续性显然没有被工业化的改革力量所干扰,也没有因为其 1815 年后的卓越成就而受到损伤,因为 1815 年后,作为欧洲力量甚至是世界力量的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的领袖。

在 19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民主"一词警醒着很多英国人。首先,它仍旧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想起法国大革命和军事专政。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也是该联想的核心部分,这也意味着新的危险。另外一个和这个词密切相连的就是美国,它是共和制和其他不受欢迎的趋势的发源地。然而 19 世纪英国在政治上的民主化是其体制发展的重要线索。男性选举权虽然受到全世界的认可,但是这一权利到了 1918 年才得以实现,人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获得这一无法逆转的历史性转变。尽

管英国具有深刻的自由的特点——平等的法律，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措施，基于欧洲标准的多数选民制和反对专制的代表立法系统——但是英国1800年的宪法完全没有包含任何民主的思想。当时宪法的基本原则是王权在议会的绝对权力，议会本身依赖于代表各个不同个体和传统权利，而王权则取决于有条件的法定的任期。

19世纪20年代后期发生了第一次原则上的改变，当时宗教对政治权利的压制已经消除。然而1832年，英国民主化走出了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一步，即改革法案的通过，虽然其本身并不民主（确实，那些支持它的人的意图是将其作为民主发展的障碍），但是它对现有的代表体制进行了重要改革。它移除了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如小选区都由私人资助者控制），同时为议会提供了能更好（虽然还远远不够完美）且能均衡地体现从乡村到工业化城市人民大众需求的选区，总之规范了选举权，并使其更具有连贯性和可靠性。尽管人们对其具体条件的争议千奇百怪，但是一个典型选民一定是在国家占有一定地位的男性，他们要么拥有资产，要么收入不菲。改革法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65万选民，不过下议院的成员似乎看起来和之前并无多大区别。不过，仍旧由贵族掌控的第一个"改革了的"下议院标志着近一个世纪的体制改革的开端，它一旦通过这种方式发生改变，就一定会再次发生改变。虽然这次上议院仍旧没有变动，不过下议院已经渐渐拥有最终决定权。

415

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当中，这次并不完全的民主进程也带来了其他的改变。慢慢地，传统的政治阶层带着些不情愿的思想开始考虑组建政党的需求了，而这政党也并不是议会成员的家族联系或者是私人派系。这在1867年以后尤为明显，因为另外一个改革法案已经产生了200万左右的选民，而且在1872年后还采取了匿名投票制。这就意味着政治家需要讨好大众的意见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讨好旧地主阶层，正如《玉米法案》辩论展现的那样。19世纪所有最杰出的英国议会领导人都是那些有能力不仅在下议院而且在下议院之外的重要部门获取听众的人。第一个或许也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他接受了大众的意见为英国的保守思想注入了灵活性，

防止了英国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陷入纷争。不过十分偶然的是,他在这一过程中导致他的政党解散。他的保守党追随者们接受了 1832 年议会改革,并在 1846 年又勉强对《玉米法案》的废除忍气吞声,但是在此之后农业利益的拥护者突然开始攻击皮尔并抛弃了他。然而他的举措所产生的趋势却为新兴阶层也就是他们所称的中层生产商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英国关税和财政政策的重新定位只是这个世纪中叶英国政治全面走向有限度自由化、实行切实可行改革和成为更有作为的政府的一部分。接下来,地方政府的改革也开始了(明显地,这些改变发生在城镇中,而不是在那些地主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乡村中),新的济贫法得以通过,以解决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救济贫困人口,工厂和矿区立法也通过了,并开始得到了有效的监管,司法系统重组,宗教限制(对待新教教徒非国教信仰者、罗马天主教教徒和犹太教教徒)的遗留问题也被进一步消除,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基督教对婚姻法的主导权结束了,邮政系统建立起来了,并为世界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甚至在公共教育这块长期遭到可耻的忽视的领域也开始有了新的动作。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积极的时代,它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它最自信的标志就是 1851 年那场由英国女王资助、在其丈夫引导下在伦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416

英国的制度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健康,不过,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表示很满意。有些人抱怨着经济特权的丧失;而另外一些人则抱怨着英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中存在着对中央逐渐集权的恐惧,那样这个国家就会走上法国的道路,在结构上政府集权化的法国被看成是没能取得自由的最充分例证,伴之而来的是法国建立的人人平等制度,这是很多英国人公开表示反对的。然而英国仍旧毫发无伤地进行着它对制度的巨大改革,尽管在这个世纪的动荡的前半叶对于改革的恐惧迟迟未能消去。它的崛起伴随着力量和财富的不断增加,自由主义原则也在政治中更为明显。很多国外人都很钦佩,同时也想知道,英国是如何在其工厂城镇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仍旧做到对频

繁发生的大众暴动的控制,因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是硬伤。英国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总是自豪地声称这个国家生命力的精髓所在就是自由精神,引用一句著名的话说就是自由精神"从先例扩展到新的先例,周而复始"。英国人对此坚信不疑,但这并不意味这就是答案所在。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是一个具有诱导性的问题,然而一些历史学家仍旧没有质疑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即何种因素有可能导致革命,英国又是否满足这些条件。而这些问题也许根本就没有承认的必要。也许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导致革命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去的很多事物不管怎么说也已经在英国存在几百年了。无论历史如何对其基本制度进行干扰,留下装饰或是造成锈蚀,它都依然充满了各种可能。即使在没有改革的时代,上议院和下议院也没有像许多欧洲国家的代表体制那样完全封闭排外地进行合作。早在 1832 年以前,英国的体制就已经展现出其满足新需求的能力,尽管速度缓慢,反应迟钝。早在 1801 年英国就通过了工厂法(说实话,并不十分有效)。1832 年以后,人们更有基础相信只要议会受到了足够的外部压力,那么所要求的革命就能得到实行。议会有这样做的权力,且法律对此也十分默许,并未加以阻挠。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多次大规模的暴力突发事件(这是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尤其对穷人来说)当中,最激进的大众运动就是"宪章运动",这一运动召集了大量的反抗力量,要求改革议会使其对大众需求的反应更为积极,但宪章运动者们并没有要求废除议会。

不过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参与,议会也不会进行改革。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所进行的重大改革似乎都是为了满足社会中层以及大众的需求。比起欧洲大陆的官僚体系,英国的官僚体系进入分享政治权利阶段要早得多。他们可以以此来获取他们所要求的改变,而不用联合革命力量,也不用求助那些走投无路而陷入绝望的人们。而且,英国的大众看起来似乎也没有那么愤愤不平。当时来英国参观的人就发现了英国人对上层十分顺从。这里的工人阶层组织积极提供能够代替革命的其他方案,且十分尊崇自助、谨慎、节俭和严肃的维多利亚式品质。

417

在所有造成大规模英国工人运动的因素当中,只有政党这一因素是在1840年以后才出现的,而这一政党后来也被命名为"工党"。英国的"友好型"社会也主张保险并排斥动乱,此外还有合作社,也就是"工会",这些都为个人参与改善工人阶层生活质量进程提供了渠道,尽管一开始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不多,进程也很缓慢。由于英国的社会主义很早就成熟了,因此它显得有点自相矛盾,后期它依赖于保守而非革命性的工会运动,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所渴望的。

19世纪40年代的动乱一过去,经济发展的形势也许同样需要和谐的社会环境。不管怎样,一些激进分子也曾十分遗憾地这样说过,至少他们认为,改良措施的实行说明英国社会并不愿意接受革命性的后果。50年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世界商人、银行家和担保人,它的城市迎来了美好的时代。随着就业率和工资的增长,宪章运动者所号召起来的支持力量也很快解散了,他们也就成为人民的回忆。

这个国家的中央机构:议会和君主,就是英国以不变应万变的标志。威斯敏斯特宫被烧毁后重建时采纳了一个仿中世纪的设计方案,以此来强调议会起源的古老。英国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时代依旧将自己隐藏在习俗与传统的长袍之中。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王权在欧洲政治体制当中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教皇制的古董了。不过无论如何,它也一直在变化。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将王权变得无可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这和女王本身有点格格不入。她并不喜欢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而成为一个形式上的君主,或者是作出让步,对此她毫不掩饰。不过,让步似乎就是在她在位期间造就的。是她让皇室成员更加乐于家庭生活,这从乔治三世时代起还是第一次。这也是女王的德国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帮助女王的很多方法之一,不过他并未因此得到缺乏感恩心的英国大众的感激。

经常让英国人对其包容改革能力感到失望的似乎只有爱尔兰。爱尔兰人在1789年成功地在此酝酿了叛乱。到了19世纪50、60年代,一切都十分平静。但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经历了巨大

的灾难，在经历过饥荒和瘟疫后，土豆也歉收。爱尔兰的人口过剩的问题最终以死亡和移民马尔萨斯的方式残忍地终结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民主独立主义者要求废除联合法案的呼声也渐渐消失，外来人对在此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人口的反感以及修建新教教堂的行为也中止了，当地农民也不再因为自己对远在天边的英国地主的不忠诚而感到十分不安。尽管如此，问题依然存在。在19世纪70年代，新的爱尔兰民族运动又开始出现了，他们要求实行"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一要求总是在英国政治当中萦绕，在这一世纪剩下的岁月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破坏了英国的政治联合，也导致了英国政界的对解决此事形成的法案的不同政见。 418

419

第二十章　欧洲的世界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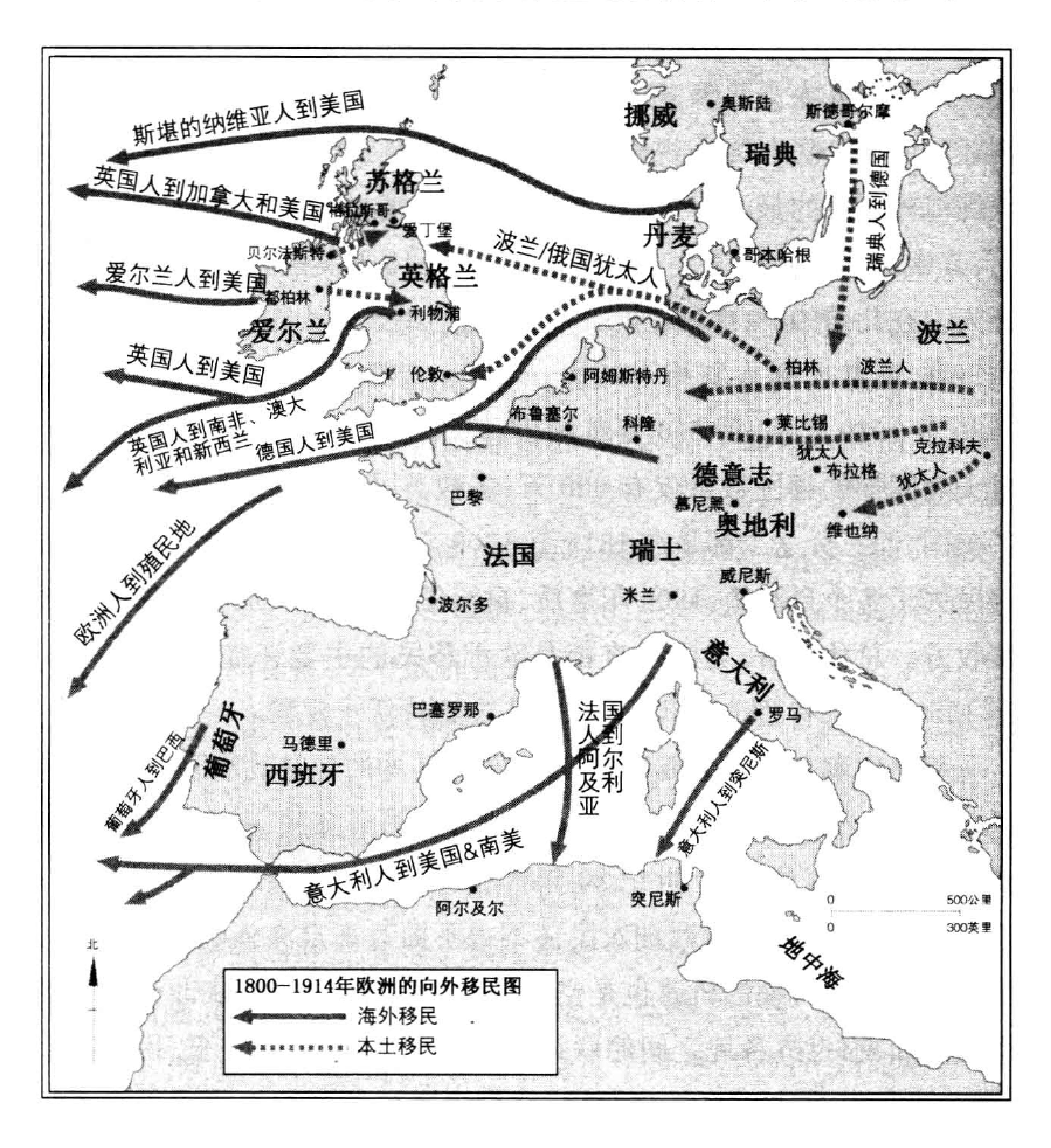
欧洲新的全球定位

19 世纪世界历史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章无疑是欧洲逐渐崛起为世界主导,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的。1900 年前后,欧洲后裔民族从方方面面占据了这个星球,从程度上来说远远超过百年以前。世界的其他地区则更多地是对欧洲行动作出回应,归入欧洲基调;有些非欧民族彻底地归入欧洲,欧洲国家旗帜在这些地区高高飘扬。这是世界历史中非比寻常的一幕,某种文明首次被其他文明作为楷模普遍接受。事实上,在欧洲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逐渐凸显之后,其长远的影响才更加重要。欧洲价值观被推广到全球,成为各个民族学习和羡慕的对象。

历史证明,欧洲对世界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侵占海外殖民地的传统大帝国,其影响较之后者也要深远得多。在很多地方,欧洲殖民地的出现是相对晚期的概念,比如,欧洲的经济侵略进行了很长时间之后,俄国和葡萄牙之外的欧洲国家才开始在中国占有殖民地。在所谓的"欧洲帝国"内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程度,甚至是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关系性质,都差异明显;但若即若离的关系,未必就不如地道的直属地那样重要。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多数大陆无论从事实上来说,还是从法理上来讲,都是完全独立于欧洲的;但澳洲和美洲则是欧洲传统和文化主导的,

只不过又在地方差异的条件下衍生出特有文化。然而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政治抑或经济，直接控制抑或间接影响，欧洲的存在都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对于非欧民族来说，欧洲的介入不一定就是坏事，但他们不得不被动地适应欧洲化的世界，在向欧洲学习的强大动力驱使下，他们无法对欧洲人的进步论理想说不，不由自主地怀揣着一个个“欧洲梦”。

420



欧洲大移民

欧洲霸权的表现之一，是欧洲人在这一时期的大规模向外迁徙，因其给世界人口分布造成的深远影响，人们常将其称为“欧洲大移民”。

到1800年，移民已经初具规模，此时欧洲人向外迁徙的主要目的地已经是南北美洲，经过19世纪人们继续向新大陆迁居，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自治、文化杂糅等性质的英属海外领地，既不享有完全的独立，也不是真真正正的殖民地。至1800年，来自伊比利亚、英吉利诸岛以及德法两国的移民多数来到了美洲，而俄国人也在向西伯利亚迁徙。19世纪，又有约6 000万欧洲人远渡重洋，30年代迎来移民高峰。他们中的多数人去了北美、拉丁美洲(主要是今天的阿根廷和巴西)、澳大利亚和南非。陆上的大规模移民则在俄罗斯帝国进行着。1913年是欧洲海外移民的最高峰，单单这一年，就有超过150万欧洲人离开故土，其中包括超过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约40万英国人以及20万西班牙人。在此前的50年间，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日增，而意大利人则相对减少；英国一直都是稳定的移民贡献国，1880至1910年间，约850万英国人移民海外，包括许多爱尔兰人，而意大利同期的移民数量仅有600万，多数英国人(爱尔兰人为甚)都去了美国，而三分之二都是在1815至1900年之间迁出的，也有很多英国移民去了各个自治领，1900年之后，自治领取代美国，成为英移民主要接收方。总体来看，美国一直都是欧洲移民的主要迁徙目的地，1820至1950年间，有超过3 300万欧洲人在这片沃土定居。

移民狂潮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政治因素，其中尤以1848年之后的德国最为明显。欧洲人口持续膨胀，一直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失业成为欧洲各国不得不重视的普遍问题，欧洲农民还不得不面对来自海外的农产品的威胁。然而这一时期的机遇也是空前的，蒸汽船和铁路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世界各地之间的联通变得更加简单，成本更低，因而在特定的地区，劳动力反而大量短缺；欧洲内部的联通程度也得以大大提升，英国不仅将大批爱尔兰农民、威尔士矿工和炼钢匠，还有英格兰农民送到海外，同时将东欧犹太人以及来自意大利的服务员和冰激凌小贩送到新大陆；波兰人跨越欧洲大陆，从家乡来到法兰西的矿场做工。欧洲征服北非之后，那里也成为欧洲人新的家园，意大利人、西班牙人

和法国人到达北非之后，建立起 13 世纪之后第一批伊斯兰世界中的欧洲人聚居地，并且在那里创造了既不同于宗主国文化，也不同于当地文化的欧洲移民特色的文化。

文明世界

虽然联结方式不尽相同，甚至有时候彼此完全独立，但欧洲的众多海外殖民地从情感上一直都是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它们与欧洲一道，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文明世界”，有时候干脆被称为“西方世界”。现在看来，“文明世界”一词颇具争议，且含义不清，与今日文化多元的时代格格不入；“西方世界”在地理上来说则毫无意义可言，因此两词均为主观判定，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们依然能从中发现：欧洲国家及欧洲化国家的确在思维意识和制度体制上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①]尽管环境不尽相同，历史背景千差万别，“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拥有共同的文化起源、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制度体系，他们借此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应对这个世界。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的世界都是基督教的世界，直到 20 世纪，新的领土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占领的；他们的法律都是欧系的法律，他们都努力维护欧洲文化、坚守欧洲语言。

422

那些坚持“文明世界论”的人环顾世界，发现除了 20 世纪的日本能够被勉强接受之外，能称得上是文明的不是欧洲、就是欧洲的海外殖民地；其他人类都是愚昧落后的野蛮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醒悟，向着“文明世界”的方向进发。这种偏见虽然后来被证明十分不可取，但在当时却是伴随着欧洲取得全球政治和文化优势而产生的，它们也逐渐成为欧洲人对于自身意识和价值观的优越感之表象，在这种优越感的驱使下，欧洲人开始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开始曲解世界，对这个世界不屑一顾。欧洲人最早的种族优越感源自宗教，而进入 18 世纪以来，新的价值观又为其优越感注入了新的元素。至 1800 年，欧

---

① 据我所知最早为“西方世界”一词赋予上述现代新内涵的是巴利·吉本(Bury Gibbon)，在其作品的脚注中出现过“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之字眼。

洲人已经失去了对其他文化的敬仰,似乎其他地区的所谓文化皆为蛮族文化,与欧洲的社会制度相比不值一提。他们还用类似的视角审视同伊斯兰世界几百年来的恩恩怨怨,认为穆斯林最终从伊比利亚撤出,以及在中欧和东南欧的式微根本是源自其文明的落后性;再或者,他们会将中华帝国长时间的裹足不前甚至可以说是逐渐衰落归咎于其相对于欧洲文明的不足。欧洲殖民者有时视美洲印第安帝国为野蛮和残暴的化身,因此将他们消灭殆尽也是正义之举。

后世的欧洲人听说"野蛮民族"仍有吃人的传统,就连印度都保留着童养媳和对寡妇施以火刑的陋习,便好意地将这些受苦的人们解放,就像他们解放黑奴那样。然而这样的选择性观点让绝大多数欧洲人都看不到历史的另外一面。虽然很多西班牙传教士为美洲印第安人苦苦抗争,虽然 18 世纪的欧洲活动家为破除奴隶制度奔走劳碌,他们却从未想过拯救这些地区的文化。即使是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依然相信欧洲带给世界的是无限的福祉,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后来,欧洲人和美国人又开始广泛弘扬和推广更加世俗的价值观——个人权利、教育权、投票权以及保护妇女、儿童和动物的思想,直至今日。即使是那些反对殖民主义的慈善家和进步人士,依然坚信欧洲文明的价值观理应和其医药、卫生知识一道推广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将这些价值观发扬光大,甚至慢慢成为欧洲人的权力与职责。而科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也成为将欧洲的思维意识推行全球的工具,人们借科学扫除迷信,合理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创立完整的教育体制,并用统一的文化压制落后的社会习俗。时至 1900 年前后,欧洲人原本认为的"异教徒也可以很高雅"的论调已经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普遍认为自身的价值观要远远优于其他民族(在很多情况中确实如此),却在与此同时忽视了这种优越感给其他文化带来的伤害。

423

直接的影响

很多维多利亚时代宗教赞美诗中所唱的"被黑暗笼罩的大地和居于其上的民族"在 1900 年时已经直接处于欧洲统治之下。包括殖民地

统治者在内的很多接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人，开始将铁路、西式教育、医院、法律秩序植入这些地区，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地的本土制度显然已经在和西方文明的对垒中败下阵来。虽然有些地区的本土制度被保护了下来，但也是出于居高临下的殖民文化优越感的一种施舍。

明目张胆的文化优越论如今已经站不住脚，但它也在某一方面促成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就连最严格的反殖民主义者都会承认，虽然有些人也在质疑欧洲人的原始动机。这便是欧洲人在其势力范围所能及的地方废除了奴隶制度，事实上这还不够，他们还动用外交和武力，尽力让其他地区也走出蓄奴阴影。废奴运动最重要的进展发生于1807年和1834年，英国议会先是禁止了奴隶贸易，然后宣布彻底废除帝国内一切奴隶制度。作为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商业帝国，英国的行为也影响到了他的邻居们，其他欧洲国家很快宣布效仿。至19世纪中期，皇家海军已经开始在非洲和印度洋严厉打击阿拉伯奴隶贩子。社会各个阶层，文化界、宗教界、商界和政界，都投入到这场奴隶解放运动之中，人们至今还在争论到底是何方贡献了主要力量。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欧洲仅仅是在奴隶贸易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00多年之后才宣布废除这一罪恶制度的，但他已经是不借助外力，自愿斩断毒瘤的唯一人类文明。在我们的20世纪，奴隶工人在欧洲依然存在，但这些充其量只是依靠暴力限制人员流动，称不上奴隶制度。虽然可能冒犯到他们，但这个世纪的苏联人曾建立很多集中营，强制"奴隶"劳动，并美其名曰"再教育"或"司法管制"，虚伪的观念入侵了这些奴隶主的脑袋，道德便所剩无几。纳粹将他们的奴隶制度掩盖得很好，并以"科学研究"之名说服、安慰自己。

奴隶制度很好地说明了欧洲文明如何重塑了其他民族的社会制度，但这并非唯一途径。另一种途径便是通过间接渗透，侵蚀异域文明原本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而后在政治上施加影响，瓦解它们原本的政治权威。欧洲影响侵入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便是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刺激本应促其崛起，但日本是19世纪唯一在西方刺激下奋发图强，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民族。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想明哲自保，与欧

424

洲脱开干系是不可能的，忙碌的欧洲商人奔波在世界各地，他们就能证明这一点。地理上偏安一隅，似乎可以暂时逃避欧洲人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的西藏也在1904年遭到英国人入侵。埃塞俄比亚是绝无仅有的未接受西方现代化，还能维持独立的国家，他们在19世纪先后击退了英国和意大利的入侵者（埃塞俄比亚在其14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中，多数时间都为基督教国家，因此在心理上更胜西方一筹）。

基督教伦理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约束着人类的思想，因此一直都是欧洲文明向外扩张的主要中介之一。教堂组织发展壮大，遍布各地，教职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19世纪迎来了自使徒时代起基督教的最大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传教活动再次兴盛，罗马天主教为传教划定目标，新教国家则纷纷建立海外社团，以支持福音广播。但与其宗旨相矛盾的是，本应扎根各地区本土特色和文化的信仰，最终却仍然带有十足的欧洲味道。在多数受到影响的地区，基督教对于本地人来讲，都是欧洲文明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欧洲人播种、本地人培育的神的旨意。举个例子来说，欧洲传教士往往过于注重外表和着装，17世纪访华的耶稣会教士起码谨小慎微地着起华服，19世纪的传教士则让班图和所罗门岛民都穿上欧洲人的衣服，显得极不和谐。这样一来，基督教传教士传播开来的不仅是宗教，他们为其他地区带去饥荒中紧缺的食物、农业生产技术、疫苗、医院以及学校。通过帮助其他地方发展，他们在潜意识中认定这些地方只是向着欧洲方向前进的“落后地区”，这种文明进步论，毫无疑问地会破坏受欧洲影响地区的自我发展轨迹。

只要是欧洲人，不论是不是传教士，都来势汹汹。最终，世界上几乎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欧洲人的身影，他们总归可以借助武力强行进入。除了几次特别例外的情况，比如189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在阿杜厄（Adua）全军覆没。19世纪的欧洲在通讯和武器上全面领先，这令他们享有当年攻击卡利卡特的葡萄牙战船所没有的优势。其他民族后期虽掌握了这些技术和武器，却依然无法运用自如。在1898年恩图曼战役中，苏丹马赫迪（Mahdist）出动大量军队，最终也

没能突破英军防线,英埃联军以死亡 48 人的微小代价毙敌 1 万余名。除了在技术上面很难赶超,非欧民族如想借助欧洲技术向欧洲挑战,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也不可小视。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常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这种说法很少有人会反对。整个 19 世纪,欧洲各国都在为争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相互攻伐,但大英帝国是他们无法跨越的障碍。虽然近代殖民主义疯狂扩张的帷幕已经拉开,外交纷争由此产生,但这一时期的情况,与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完全不同。任何一国的商人都可以在全球各地自由航行,而不至受阻。英国皇家海军在海上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这不仅是欧洲文明传播世界的保障,更是英国人追求全球商品市场的保障。

海外新欧洲

18 世纪,英帝国和法帝国解体。西班牙帝国的解体,以及后来巴西从葡萄牙帝国中独立出来都让一些人相信,英国殖民地在不远的将来,也将摆脱伦敦的控制。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一预言成真了,但历史并非同预言百分之百一致。1783 年,现实教给英国政治家宝贵的一课,他们意识到移民与殖民并非一本万利。殖民地不容易操控,母国需要出资供养,又不像贸易一样能够提供丰厚收益;殖民地可能将母国拉入毫无意义的战争,或者是同其他国家,或者是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殖民者最后可能寻求独立,甚至反咬一口。欧洲国家不值得为追逐利益而过分参与到殖民地事务中,在远东尤其如此,因为大家可以在不需要移民的情况下直接做生意赢利,况且一旦发生纠缠,皇家海军也鞭长莫及。

从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意见在 19 世纪的英国政界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在处理现有殖民地事务时,他们的最主要着眼点便是节省开支、避免冲突。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广袤土地上,殖民者与帝国政府虽时有摩擦,但总的来说很少有流血事件发生,两地最终还获得了帝国议会席位,代表各自“国家”参与投票。1867 年和 1901 年,加拿大自治

领和澳大利亚联邦相继成立。在相对独立的“国家”出现之前，两地都接受了伦敦授予的自治权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领土广阔，人口稀少，民族认同感是经历很长时间才发展出现的。最后，来自外部的潜在威胁促进了两国民族认同感的培育——美国对加拿大进行经济渗透；大批亚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当然还离不开英国的影响。新西兰也在19世纪获得了自治权。18世纪90年代，欧洲人最初到达这一岛国，那时当地的毛利人已经创造了先进、复杂的文化，但他们的文化体系行将瓦解。紧接着到达的是基督教传教士，教士竭尽所能地阻止更多的西方商人和移民者上岸，但丝毫不起作用。察觉到有法国商人开始行动，加之英国政府受殖民者所压，英国最终于1840年对新西兰宣布主权。新西兰在仅仅16年之后便获得自治权力，但英国军队一直同毛利人作战，直到1870年才撤出。1907年，新西兰获得完全自治权力；同年，英国及英属殖民地在伦敦召开联邦会议，决定从此用“自治领”一词指代所有拥有自治权的英国旧殖民地，“自治领”也就是“白人移民自治领地”。1910年，南非联邦加入英自治领系统。

426

从前殖民历史来看，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命运远比其他英属自治领要坎坷得多。英国势力在1815年之后才进入南非，当时出于战略考虑，英国政府出兵占领了17世纪荷兰在好望角建立的殖民地。“好望角殖民地”很快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英国移民，虽然他们人数上较之荷兰人仍然不占优势，但有英国政府撑腰，因而英国式制度和法律都建立起来。“好望角殖民地”另一点与众不同的是，它同北美或稍晚的澳大利亚不同，一直保有大量土著人口，并未被赶尽杀绝。南非土著在荷兰人进入之前便生活在这片大陆，人口一直稳固增长。即使到了1900年，欧洲人(以英国人为主)开始大批向南非移民，白人人口依然只相当于黑人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国殖民者与荷兰农民(又称“布尔人”)在如何对待非洲土著的问题上观点不一，很难站到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也面临着其他问题。荷兰人依靠习俗、语言和宗教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希望有外部力量影响自身生活方式，而英国人却将英语设为官方语言，英国律法也后来居上，取代了原本的荷兰法律体系。更让布尔人恼火

的是，他们一直想方设法让非洲人改宗基督教，而英国传教士自打上岸，便开始保护所谓的土著人权利。英国政府在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之后，英布双方又就赔偿问题纠缠不休。

尔后的 1835 年，大约 1 万名布尔人携家眷、牲口和各式财产，向北迁徙，越过瓦尔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非大迁徙”(Great Trek)，这也是后来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布尔人共和国的由来。“大迁徙”被视为布尔人南非的建国传奇。几年之后，英国人在纳塔尔(Natal)建立新的殖民地，取代了原先的布尔人共和国，更多的布尔人北上，期冀与同族共同生活。之后的几十年里，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布尔人时而混居，时而各霸一方，关系一直比较紧张。非洲土著民族的命运也被牵扯其中，一些土著民族本可以威胁到英布双方的，祖鲁人对布尔人的挑战便是例证之一。 427

至 19 世纪中期，北部的奥兰治自由邦(Boer Orange Free State)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由布尔人控制，南部的好望角殖民地和纳塔尔则飘扬着米字旗。英方殖民地由选举出的议会掌控，满足法定经济标准的少数黑人也可参选。当时南非也有少数土著王国由英国保护。好望角自 1872 年开始拥有自治政府，同期，由于南部发现丰富的钻石矿藏，英国人在橘自由邦以北地区也获得全方位的优势，这令布尔人心怀不满。后来英国人又支持与布尔人作战并被打败的巴苏陀人(Basutos)，进一步激化了英布矛盾。再后来，好望角殖民地的英国总督愚蠢地出兵占领了德兰士瓦共和国，这项过激的举动于 1881 年被纠正过来，但从此刻开始，布尔人对英国南非政策的不信任，已是无法挽回的了。不出 20 年，战端再开。当时德兰士瓦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工业革命，1886 年发现金矿，随着矿工和投机者不断涌入，约翰内斯堡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长为非洲大都会，它也是赞比西河以南的唯一一座 10 万级以上人口的城市。看起来布尔共和国资金充足，极有可能摆脱英国的宗主控制。与此同时，欧洲列强正在忙于瓜分非洲，而英国政府认为，保住好望角，对于大英帝国控制住通向东方的海上航线异常重要，他们自然不会允许德兰士瓦掌握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因为有朝一日，这种便利条

件或被欧洲敌国利用。

理想主义的帝国主义者、好望角政客、英国煽动政治家和坏名声的金融投资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人凑在一起，于 1899 年再次和布尔人摊牌，挑起第二次英布战争。英布双方交战，结果没有悬念，正如维多利亚女王[①]所说：英国战败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英国的海上力量完全将南非孤立，因而欧洲国家无法插足，布尔人在人数和资源上的优势迟早都要被消耗干净。然而，英国的胜利代价高昂。超过 25 万英军士兵被送到南非战场，国内政界一片哀鸣，英国的国际形象也严重下挫。世界将布尔共和国看做是反抗压迫的独立国家——它的确是独立国家，只不过这次和以往很多情况类似，19 世纪的人们过于关注民族主义，却忽视了很多其他重要的东西，比如非洲黑人的境遇问题。1902 年，英国在战争大获全胜的情况下，高姿态地主动议和，并抛出条件宽厚的和约。虽然战后布尔共和国不复存在，但是英国依然不断退步，1906 年，德兰士瓦成立自治政府，次年布尔人通过选举成功入主新政府。布尔人一上台，立刻立法禁止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移民。1909 年通过的南非联邦宪法草案明确规定，英语与荷兰语在南非享有同等地位，更重要的是，规定了诸邦应依照各自的选举法，自行选举议会议政。在布尔人控制的邦，选举权并未被赋予黑人。在当时来看，此种和解办法还行得通，不过危机被深深隐藏起来，假以时日才能显现。

428

英国国内的慈善家、传教士，以及对移民者高度不信任的移民部(Colonial Office)时常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行为进行有力的声讨，这也让我们不得不谈一谈南非的土著民族。英国的多数殖民地都同印度次大陆情势不同，迎接现代化的是当地不堪一击的原始社会，有些社会的发展程度还相当低。加拿大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人数毕竟有限，他们对开发西部和西北部的白人移民威胁不大；而美国人遇到的是极力反抗、希望保护自己世代生活的狩猎场的印第安人，后者最终遭遇灭顶之灾。澳大利亚土著同样遭到血腥屠杀，大英帝国内部大概再没有哪个

① 女王陛下的战略决断远好于很多帝国大臣。

民族如同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一样命运悲惨了。新西兰的毛利人也有相近的境遇，人口大幅度减少，不过同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相比，减少幅度相对缓和，并且人口在后期慢慢回升。在南非和英属东非，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一些民族直到20世纪都还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生活方式几乎没有改变；另外一些民族被驱逐出家园，甚至遭到种族清洗；还有一些民族被卷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洪流，逐渐接受新的角色与身份。总而言之，在欧洲帝国的控制之下，土著民族的命运不由他们自己掌控。短期来看，他们对欧洲殖民者构成相当大的军事威胁，比如萨奇瓦约(Cetewayo)的祖鲁人，还有毛利人的全民战争；但他们最终都无法形成对欧洲人的有效抵抗，在这一点上同当年的阿兹台克人(Aztecs)并无二致。对于非欧民族来说，他们唯一的出路是效仿欧洲。

对于欧洲殖民者的所作所为，当时很少有欧洲人会以为不妥，将其原因简单归结于欧洲人都是邪恶、贪婪的恶棍似乎过于武断，毕竟还有很多欧洲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的工作让最极端的反殖民主义者也不能妄下结论。问题的答案一定隐藏于复杂的人类心理。尽管欧洲人看到了自己的到来(无论初衷是正是邪)给原住民带来了灾难，但并不会将这种灾难性后果与欧洲文化的侵略性联系起来，当时的欧洲人还不具备这种程度的人类学知识，或者说眼界。殖民者的基督教观念是错误的，他们自认为代表了发达与进步，然而这种高等级文明的优越感，让欧洲人认为弱肉强食理所应当(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16世纪荷兰和葡萄牙海盗猖獗也是如此)，并且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原本残酷的现实：人们各据一方，享受部落生活的权利被剥夺；通过渔猎轻松过活的人被强迫到工厂做工。

帝国崛起

429

“帝国主义”一词大概是19世纪50年代才出现在英语中的，因此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19世纪中，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直接统治别国，这似乎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含义。依照这一定义来看，美国也可以

算得上一大帝国,不过只能是特例。由于日本是唯一有能力扩张的非欧美国家,因此帝国崛起在大体上仅指起源欧洲的白人国家。19 世纪帝国主义扩张的黄金时期,可以以 1870 年为界限,分为特征明显的两个不同阶段。

俄国、英国和法国一直都在扩张其领土范围,因而可算做老牌帝国。而西班牙作为古老的欧洲王国,虽然在 19 世纪也获得了新的领土,但总的来说失大于得,19 世纪末美西战争结束之后,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已经丧失殆尽,它便从此退出帝国竞赛。而没有惨痛战败经历的葡萄牙和荷兰,处境也与西班牙类似。至 1900 年,新诞生的欧洲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已经加入到海外攻城略地的队伍中来;历史稍长的比利时也是如此。帝国的崛起,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乍看之下,俄国的扩张道路一方面与美国类似,欺侮弱小的邻居与落后的原住民,霸占土地直至占领整片大陆;另一方面又与将印度作为战略缓冲地带的英国相仿。但事实上俄国是有其独特的历史经验的。俄国西侧强敌林立,在这些发达的欧洲邻国面前似乎没有可能再取得新的领土;多瑙河地区也是如此,各种势力复杂交织,很有可能随时介入地区事务,将俄国一军。因此俄国主要的进军方向就是南部与东部,它在 19 世纪从这些地区掠取了大量土地。1826 至 1829 年对波斯战争大捷,俄国海军从此进入里海,占领亚美尼亚。在中亚,俄国不断向突厥斯坦(Turkestan)以及布哈拉(Bokhara)和希瓦(Khiva)绿洲进发,最终在 1881 年占领整个里海地区。在西伯利亚,俄国疯狂扩张,并强迫中国交出黑龙江[1]以北的大片土地,他们于 1860 年在那里建立起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2],后来的远东第一港。不久,俄国以割让阿拉斯加为代价,将对美国的债务一笔勾销;若非如此,今日的俄国将是跨越亚太地区和美洲的国家。

19 世纪上半叶,最具扩张性的国家无疑是英国和法国。1815 年,

① 俄国称阿穆尔河。——译者注

② 1860 年以前属于中国领土,中国传统名为“海参崴”。——译者注

英法缔结和约，战胜方英国以牺牲法国为代价取得大量利益，从此英国凭借各地分散的海外根据地，如马耳他、圣卢西亚(St Lucia)、爱奥尼亚诸岛、好望角、毛里求斯和亭可马里(Trincomalee)等，钩织出庞大的海上势力网络。1839年，奥斯曼帝国爆发内部危机，英国趁机夺取亚丁，亚丁作为葡萄牙曾经的殖民地，扼制住通往印度的必经要道。蒸汽船和煤矿产业普及之后，皇家海军更加所向披靡，亚丁之后的新殖民地接踵而至。特拉法加战役之后，再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阻挡英国的脚步了，倒不是因为其他国家不能掌握英国那样的资源，他们也不是绝对无法挑战英国的海上优势，1781年的约克镇就是证据，但其他国家如想超越英国，需要花费的力气太大了，事实上大家都觉得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英帝国在海上主导一切，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英国海上警察的工作让很多人从中受益。对于英国自身来说，国际贸易有了强大海军的支持，才能更好地保障其殖民地能够参与到世界贸易体系中来，并从19世纪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获益。早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国的贸易政策相比西班牙和法国来讲，都是成功的；旧有英属殖民地先后在帝国贸易中发展壮大，后来的自治领同样获益匪浅。

430

大英帝国主义，深受地缘因素与历史因素影响。1783年之前，当时的英国人正在探索南太平洋，对亚洲的贸易也开始显著增加，一些人便开始考虑日后帝国与亚洲的联系问题。后来，因为与法国的小盟友荷兰作战，英国人又将目光转向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英国对印度的渗透稳步进行。至1800年，对印贸易往来已经成为英国商业利益的核心；而到了1850年，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要占据那么多殖民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住印度。印度，毫无疑问是大英帝国主义的重中之重。

印度：英国势力深入

印度，这个国家改变了近代英国历史的走向。自1784年初开始，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共享”印度的状况有所改变，东印度公司势力

逐渐减弱,而英国政府的权威逐渐增强。1813 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垄断被打破,英法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英国在南印度的势力进一步增强,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多样的,有时是强行占领,有时是间接控制本国统治者。1833 年,公司又一次得到英国政府颁布的英印贸易特权,至此,整个印度次大陆只有西北一隅完全独立于英国的政治影响。19 世纪 40 年代,随着(Punjab)旁遮普和信德(Sind)相继沦于英国之手,克什米尔被英国势力范围所覆盖,英国此时已经成为印度的宗主国。

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完全是一个政治实体,1833 年商业特许状剥夺了它的对华贸易权,也终结了公司垄断中英贸易的历史,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从此之后的亚洲,成为自由市场;从此之后的印度,也面临更多的历史抉择与突破,古老的次大陆也投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表象看来,莫卧儿皇帝的名字不再出现在货币名称中,波斯语也不再是历史和司法的标准语言,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英语教育也随之兴盛起来,这一变化的影响非同寻常,印度长久以来相互制衡的民族关系被破坏,英国化的印度教徒因比穆斯林更加具有开拓精神,在英属印度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在高度多样化的印度次大陆真正得到推广,离不开用英语授课的初等教育的普及。

431

与此同时,在历任印度总督开明专制的统治下,印度迎来了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的时代。各地兴建宽阔的大路与沟渠,1853 年,印度第一条铁路通车;英式法律制度被引进;为了向东印度公司输送合格人才,大批英国人被送入刚刚成立的印度大学,印度首批三所大学均成立于 1857 年,随之建立的还有各级教育机构;其实早在 1791 年,就有苏格兰人在贝拿勒斯(Benares)成立了第一座梵语学校,被称做印度教的罗德斯学院。其实印度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很多成绩,并非直接出自政府之手,而是受益于让类似机构可以落地生根的自由土壤。1813 年开始,英国传教士开始进入印度(此前这是被东印度公司所禁止的),英国国民从此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在印度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不再是受到官方的引导。因此,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维,实用主义者重

视现世的愉悦,而基督信徒强调灵魂的解放,两派均自认为代表印度的利益,都从英国的角度出发,居高临下地看待印度文明;他们也都在不知不觉中改造着英国对印度的看法,因此可以说,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英国的大众思维。

蒸汽船问世之后,印度离家更近了。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印度谋求发展,英国在印度的移民社区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8 世纪,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人毕竟是少数,他们满足于近乎流放式的生活,为追逐商业利益而来到这片神秘的大地,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同本地的印度人融为一体。他们过着印度绅士一般的生活,有些人穿着印度传统服饰,品尝着印度美食,甚至像印度人一样娶妻纳妾。而到了 1800 年之后,信奉改革的英国官员来到印度,决心要废除这里落后愚昧的社会风俗——在那个丢弃女婴、自焚殉夫还在不断上演的时代,这确实是必要的;教士们宣扬的基督教义也在不断侵蚀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社会体制;而那些追随丈夫来到印度建立家室的英国妇女,一样推动着印度的英国移民社区改头换面。英国移民越来越疏离印度人,他们普遍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统治印度,是由于英国拥有更加先进的文化和道德水平。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同被统治阶级划清界限。曾经有生活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官员谈及调赴印度的同行们的工作时,如此评论道:“他们要将欧洲文明的精髓,带到这片人口密集的大陆上去,那里的人们自大得令人作呕,笃信各种愚蠢的迷信,因相信命运而死气沉沉,对生活中的罪恶熟视无睹,习惯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出击迎接挑战、战胜困难。”[①]这种激进的观点同 18 世纪的英国“老好人”相比,自然相去甚远,后者只是想通过劳动在印度致富而已。而在如今的 19 世纪,一旦那些制定法律的激进主义者侵犯到本土印度人的利益,两者之间的社会接触也变得越来越少,他们把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发配到政府的基层岗位去,自己则缩在白人的小圈子里作威

432

① Fitzjames Stephen, q. by J. M. Brown, *Modern India: The Origins of an Asian Democracy*, 2nd edn (Oxford, 1994), p. 105.

作福。从历史看来,以前占领印度的民族最终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印度社会同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则凭借不断更新的现代科技,与本土的联系不曾断绝,再加上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更加进步的文化与宗教认识,印度文化未能反噬英国。同时很多证据表明,印度对英国并非完全没有产生影响,比如流行英国的印度式早餐和晚宴,以及英语中的印度元素。总而言之,英国人虽然没有将印度全盘西化,但印度已经不是过去的印度了。19 世纪英语中“盎格鲁-印度人”(Anglo-Indian)一词并不是指英印混血,而是指在印度谋求发展的英国人,这部分英国人有着独特的文化与社会身份。

印度:民族大起义

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盎格鲁印度人”被彻底从印度社会中剥离出来。简单来讲,几名印度教士兵不愿触碰用动物油包裹的子弹,遭到英印政府制裁,这一事件虽小却影响深远,士兵因极度不满掀起兵变,紧接着一环接一环,事端扩大。多数暴力事件都象征着传统社会对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自发抵制。有时候,英国政府也会得罪当地的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统治者,他们会在旁边煽风点火,他们有些人后悔接受现代化而导致传统权威丧失,希望借印度民族暴动的机会,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英国人在印度只是少数派,但这一小撮人镇压起义毫不手软,他们与忠于英印政府的本地士兵一起,把兵变镇压了下去。虽然之前也有英国俘虏被起义者屠杀,也有英国兵团在勒克瑙(Lucknow)被围困数月的事情发生,但总体来说,起义未能对英国统治构成致命威胁。

对印度民族起义的残酷镇压,从精神层面沉重打击了英印政府。德里的起义者宣称其领袖为莫卧儿末代君主,完全不顾英国人已废黜了莫卧儿皇帝这一事实;事实也不是像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英国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印度起义同所有那些被拿来构建民族国家的元素一样,被人们神化并加以传播,它促进了印度民族主义的成型,而绝非是民族主义推动了起义的产生。历史上真实的印

433

度起义,只是单纯的抗暴运动,完全没有后人赋予它的那许多深层意义。它所造成的最主要影响,就是伤害了部分英国人希望帮助印度的善心,以及他们对印度的好感。无论随后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如何转向的,在印度的英国侨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他们记忆中的印度人,已经成为极度不可信任的民族。起义的影响,无论对盎格鲁印度人来说,还是对印度人来说,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放大、被神化。英国人的确残暴地镇压了印度士兵,但印度人又添油加醋地中伤英国人,以更好地证明英国政府在印度施行暴政,进行社会阶层隔离。从印度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印度起义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终结了东印度公司控制印度的历史,从此以后的印度总督都是女王身边的大臣,直接对内阁负责,这也奠定了英属印度的制度基础。如果非要说民族起义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话,它也是在其旧有的发展轨迹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未改变其基本方向。

19 世纪印度与英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空前发展,同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相比起来的话,经济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左右着历史的走向。商业利益是英国在印度次大陆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影响英印两国发展的重大因素。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英国对华贸易发展迅速,印度也成为中英贸易的中转站,与此同时,英国以纺织品为主的很多产品开始大量涌入印度。截至起义爆发之时,英国在印度的商业利益已经远非东印度公司时代所能比,驻扎在这片大陆上的英国商人和英国公司也比从前多了很多。英印贸易,在此时不过是英国制造工业席卷全球、世界商贸网络初具形态之世界大趋势的一部分。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极大地降低了欧洲到亚洲的海运成本;至 19 世纪末,英国对印度贸易额翻了四番之多。然而讽刺的是,英印之间贸易的红火发展,反而阻滞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英国这个竞争对手,印度的工业化也许会更加顺利。虽说如此,19 世纪末的印度面临西方威胁,统治阶层期冀保存自身的文化和权力,他们还是十分乐于接受现代化的洗礼。

民族大起义之后,印度的政府体制和行为方式并未得到很大改观。1877 年,印度国会授予维多利亚"印度女王"的称号,英国人有的表示

不认同,有的大加嘲讽,多数人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们大都自信地认为,由于英国文明优于印度,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应当可以永存,或者起码是长存,所以名分什么的并不重要。他们倒是能够就新的执政方式达成一致,用当时一名英印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英国人不是好惹的",只有通过强权政府,印度才能避免更多的暴动。还有一点大家也都普遍认识到了,正如英国总督在 20 世纪刚刚拉开帷幕时所说:"拥有印度,我们便是世界帝国;失去印度,我们立马就会变成三流国家。"

434

这句话是否正确,我们无法考量。但能够肯定的是,印度人的确在为庞大的印度军队埋单,而印度军队不光保卫印度,也会被调集到其他国家保卫大英帝国的利益。印度的海关特权也一直被英国人掌握,为英国工商业者的利益服务。然而这些不过是事实的一个方面,英国也一直在给印度输血,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人都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群体性违法事件做掩护,英国人也是一样,他们的理由是他们都是在印度行善,他们认为自己背井离乡,清心寡欲地在异国他乡过着流亡一般的生活,就是为了将和平带给被战争困扰的民族、将秩序引入混乱不堪的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根本就没有想清楚自己在印度的作为到底性质如何,只是盲目地相信他们从欧洲带来的,一定好于印度本土的,因此自己的行为一定是在帮助印度。深深藏于这些想法背后的是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以及这个世纪越来越猖獗的种族歧视思想,还有一定的"适者生存"的味道在里面。

另外一点能够肯定的是,印度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界限明晰,这一点在当时看来,还不是很清楚。虽然在暴动之后,英国当局允许一部分印度乡绅和本地统治者进入政府司法机构,但直到 19 世纪末,印度人才能通过选举进入政府任职。即使政府公职的大门向印度人敞开,他们也很难进入到决策层面之中。在军队中也是如此,高层军事领导几乎没有印度人;英国海外驻军,最大的一部分永远都是在印度,他们掌握着重武器,控制印度军队的人事任免大权,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暴动的惨剧重演。同欧洲国家一样,铁路、电报和先进武器的引入也让英印政府实力大增,但英国人的信心不止源自武力

方面的优势。据 1901 年印度人口普查显示，当时的印度人口接近 3 亿，统治他们的欧洲人只有区区 900 人，军队中基本上是一个英国兵对 4 000 个印度兵。用当时一个英国人的话来讲，如果所有印度人一起吐口水，也能把英国人淹死。

英印政府的统治，毕竟不能完全依靠武力，还需要谨小慎微的政策导向，以及印度方面的支持。暴动之后，很多人提出要尽可能少地干涉印度政务。英印政府将丢弃女婴的恶习视为谋杀，严加管制，却对一夫多妻制和童婚不加干涉(1891 年之后，同 12 岁以下女孩结婚被明令禁止)。在印度教律法允许的情况下，政府法律也是能不管就不管。对于印度当地的统治阶级，英国人的态度也越来越趋向保守。虽然暴动中多数地方权贵是支持政府的，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不满英国人借他们之手统治印度，因而随社会潮流而动，参与反英斗争；暴动之后，他们的权力得到英印政府的保护，英国允许地方大公在自己的土地上施行自治，不对政府负责，只要接受英国巡查官长期居住在他们的庄园，并不定期检查就好了，这些自治地区统治着超过五分之一的印度人口。英国政府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从统治阶级入手，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

435

与其他很多封建政府一样，英印政府阻碍了印度前进和变革的脚步，这种阻碍作用，甚至要强于其他多数地方的政府。英国人巧妙地瓦解了原本可能出现的战争，人口压力增大导致粮食危机，进而造成饥馑；同时在很多政策(尤其是英国的关税政策)的阻碍下，工业化难以施行，农业要独自承担养活众多农村人口的任务。因此慢慢崛起的工商业者对政府并没有好感，甚至关系相当紧张。这一时期接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人也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发现在印度的英国人所言与所行相去甚远。那些去了牛津、剑桥或者律师学院的人真正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也更加认识到英国人的虚伪：19 世纪末，英国人在本土建立起印度国会成员委员会(Indian Members of Parliament)，而在家乡印度，英国大兵会随意骚扰印度学生。这些留洋海外的印度人也会从书籍中寻求答案，约翰·穆勒和马志尼的作品都对印度有着很大的影响。

讽刺的是，最初发掘传统印度教文化，让印度民族主义者再次昂头

挺胸的,是19世纪初的英国东方学者。如果没有欧洲人的指引,印度学者还不会去研究被历史埋没的梵文经书,让印度教古文明重见天日。至19世纪末,针对雅利安文明和吠陀文明的研究已现成果(印度伊斯兰教文明则没有得到重视),印度教徒从此可以更自信地面对基督教士,并从文化上进行反击。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种民族意识只有一小部分印度人才有,他们是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有的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家世显赫。印度教徒,尤其是以孟加拉印度教徒为主,在精神上成为印度的脊梁,一旦他们认识到知识并不能让他们自主地决定印度的命运,英国人也并不会因此对他们更加尊重,失望之极,是难以言表的。

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的国民大会还是最终成立了。起初成立国会的想法,就是由政府的一则提案引出的,接着,欧洲人呼吁提高印度人地位,实现印度人与欧洲人的司法平等。1885年12月,国会第一届会议在孟买召开,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名英国退休政府官员,事实上英国皇室官员也有参与。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都在国会中占据重要职位,国会的决议也要事先得到伦敦的建议或指导。第一届国会会议召开的时候,印度代表身着正装,戴着象征上流社会的帽子,而英国人虽然也着正装,但服饰打扮略显随意,这种滑稽的场面,恰恰印证了欧洲之于印度多方面的复杂影响。

436

法国的海外领地

大英帝国只是欧洲一个杰出的范例。同样,从1815年开始的几十年内,法兰西帝国得到了很大的扩张。法兰西帝国第一个清晰的扩张信号在北非发出,由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南岸和东岸正式统治的衰落,那里成为易受帝国主义侵略者攻击的猎物。法国在这个地方的利益是自然而然的,一点也不令人吃惊,这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它在黎凡特国家贸易中的大扩张和1798年波拿巴对埃及的远征。

尽管如此,法国直到1830年才犹犹豫豫地开始占领阿尔及利亚。紧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争,不仅与当地居民开战,还与摩洛哥苏丹开战,

到 1870 年,法国占领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到那时,法国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突尼斯,后者自 1869 年政府破产之后接受了英-法-意联合行政机构的财政控制。此时突尼斯贝伊仍旧处于奥斯曼苏丹的宗主权之下,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则为了争取本国国民的特权而争吵不休;之后法国的一次入侵(借口是骑兵从突尼斯的边境进入阿尔及利亚)刺激了这种局面,之后于 1881 年,贝伊接受法国成为其保护国。土耳其和意大利强烈抗议,但无效果。这使得欧洲向这两个奥斯曼附属国的移民浪潮一时兴起,一些城市中的欧洲人口也有了显著增长。这也使得法国统治的情况更加恶化。像阿兹特克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那样被灭绝或是几近灭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非洲阿尔及利亚人不会遭到这种对待。无论如何,这个社会的抵抗更为顽强,毕竟它是在与基督教王国对抗的伊斯兰文明的严酷环境中形成。尽管如此,阿尔及利亚依然深受其苦,欧洲大陆法的引入打破了其传统习俗,市场经济的全力冲击又让农民们陷入贫困。

法兰西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行动并不限于马格里布。在非洲的地中海沿岸东端,早在 19 世纪就有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尝试,这个发生于埃及的尝试由第一个伟大的非欧洲国家的本土改革者(现代化推进者),奥斯曼苏丹的大臣(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所发起。阿里是欧洲的仰慕者,想要借助欧洲方法来宣布自己的独立。同样,衰落的帝国给他提供了诱惑和机遇,当他帮助奥斯曼政权反对希腊革命时,阿里试图要求得到叙利亚作为对他的奖励。这引起了一场国际危机,因为它危及到了奥斯曼的稳定,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对此表示满意。法国站在阿里这边——但是没有成功。但是,这使得法国重新审视其在黎凡特和叙利亚的利益,而其最终后果是法国政府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短暂建立。

法兰西帝国在亚洲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虽然有着相同的背景:衰落的帝国),而且必须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来理解。虽然印度是欧洲在亚洲统治的最大的独立人口实体,但是有关欧洲长期利益的、有着稠密人口并能威胁到其行动的其他地区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这

437

无法一概而论。有一个负面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每个地方的现代化进程都将侵蚀本土文化。1880 年,东南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仍被本土王公独立统治,虽然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向欧洲强国做了让步。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有所改变,体现为英国对缅甸的吞并和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马来亚的苏丹们在其宫廷中接受了英国居民,他们通过在当地统治来指导制定政策,同时,"英属海峡殖民地"作为殖民地被直接统治。到 1900 年,在这一地区的王国中只有暹罗仍然保持独立,虽然越南(在法国的亚洲扩张早期阶段中作为印度支那的一部分被称作安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在这个概貌之外。

越南由于其与中国紧密的文化联系而显得特殊(中国对其享有宗主权)。而且它在欧洲帝国时代到来之前就有着这一地区最长的民族认同的传统和反抗的历史。法国在这个国家的利益也有着深刻的根源,能够追溯到 17 世纪的基督教传教。19 世纪 50 年代,基督教的迫害使得法国人(暂时与西班牙人一同)对南越南(那时被称做交趾支那)进行干涉,因而带来了与中国的外交冲突。1863 年,安南皇帝被迫向法国割让部分交趾支那,而柬埔寨接受法国作为其保护国。随之而来的是法国的进一步行动和印度支那人的反抗。70 年代,法国占领了红河三角洲;不久,其他的争端导致了与中国(此地区最高统治力量)的战争。但是,这加固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控制。1887 年,一个印度支那联盟建立起来,它是隐藏在一系列保护国关系之后的中央化政权。安南皇帝以及柬埔寨和老挝的国王依旧保留其王位,但是文化同化成为法国殖民政策的目标。法国文化被引入新的法国国民当中,其精英将把高卢化作为现代化和文明化的最好方式。

同样,在更南边的地区,法国至少有一个间接的历史影响。19 世纪末,印度尼西亚大约有 6 000 万人;人口压力尚未如之后那样造成很大负担,但是,它是除印度之外的由一个欧洲国家统治的最大的非欧人群。荷兰在这里统治了近两个世纪,不时给印度尼西亚造成痛苦的经历,之后,法国大革命使得联合省遭到侵略,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开始解体。另一个后果紧随其后,英国人占领了爪哇,他们通过大大改变关

税体系进一步引起了水域的动乱。其他令人烦扰的影响此时也在发挥作用。虽然印度文化在印度崭露头角,但是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许多印度尼西亚人至少在名义上是穆斯林。他们与阿拉伯建立了长期的重要贸易联系。在19世纪早期,所有的这些都有了新的意义。印度尼西亚的朝圣者(其中许多都是出身高贵的人)去麦加朝圣,有时去埃及和土耳其,在那里他们熟知了远西地区的思想。这种情况的不稳定性在1825年荷兰人返回并与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王公打了一场"爪哇战争"时显露出来。它持续了五年,毁坏了这个岛的经济,迫使荷兰引入进一步的变革。其结果是,考虑到殖民政府的财政利益,当地建立起一个加强农作物种植的农业体系。 438

"帝国主义浪潮"与国际关系

如果我们撇开南极洲不论,1914年,世界上超过五分之四的土地属于欧洲帝国或欧洲殖民而建立的新国家。只有少量国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基本没有本土政权能够享有完全的自治,就像中国、波斯、摩洛哥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那样。大不列颠和俄罗斯这两个帝国占据了世界大约三分之一土地。与1800年的情况的对比是令人吃惊的。欧洲帝国有条不紊的扩张作为这一切的根源大多数发生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1880至1900年之间,英帝国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同一时期,法国领土增加了约350万平方英里,德国约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这是开始于400年前的进程中最大也是最后的浪潮,它在不久以后就将结束——虽然没人知道这些。

在这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人们经常争论"帝国主义浪潮"的原因,但是,认识它往往比解释它要难。一时间似乎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具吸引力而使得人们不想吞并它的,而且,比以往更多的国家开始了帝国建设。不仅仅是新意大利和德国,还有新的欧洲海外领地,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随着1900年的到来加入到了这个竞赛当中。当时的解释经常采用拥护或辩护的形式(当然,有趣的是,人们认为辩护是需要的)。有些人强调帝国海外扩张的一个方面,认为需要缓解本土的人口

压力。他们强调工业社会的弊病和贸易圈对雇佣关系的影响所呈现的危险;向殖民地的移民也许能够提供安全的渠道来抵消本土的不满。另一些人用回应或扭曲了的达尔文生物学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因为白人在种族上的优越性使其从基因上就注定要统治世界。科学,无论被理解与否,被认为支撑了这些观点,提供了所谓在人类争夺资源的斗争中白人种族取得更显著效果的证据;他们被认为更加聪明、在实质上更适于竞争,在脑力或体力上都更胜一筹。随着时间流逝,能够听到的更多的解释是(虽然仍没有辩护多)出于经济竞争性的解释,与不真实的关于与生俱来的种族特性以及从中流溢出的自然的竞争性的推测无关。它认为,欧洲民族被内部的结构性力量所驱动,为获得新的市场和新的廉价原料及初级产品而竞争,从而获取海外土地。这发展为更为明显的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作为一个系统,其实质是推动政府通过对一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即使是间接的)来寻求投资机会,而投资的回报在这里往往会比在本土获得的要高。

439

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实践和技术原因应当得到重视。欧洲人所得到的力量不再仅限于武器和航海技术上的优越,这些使得他们的祖先在 15 世纪对整个世界发动猛击。例如,科学帮助欧洲人更容易进入非洲这块长久以来吸引人而“黑暗”的大陆;对其进行完全探索最终在 19 世纪 70 年代成为可能,那时药物开始使人能够更容易抵抗热带疾病,也更容易维持长期的基地。同时,汽船开始使得进入未知的大陆更加容易。这些可能性重新点燃了人们的经济希望——它们通常是没有依据的,也常常使人失望——但是它们加速了进一步的扩张,有时导致了诸如吞并等政治结果,或是与当地人签署商贸条约等协议。

帝国主义扩张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到最后“原因”这个概念已经不是十分有用了。部分解释是纯粹的驱动力、新的形式以及日渐积累的力量所带来的感染性的效果。随着达到新目标可能性的增大,追求和视野也在不断变化。显然,仅仅经济利益已经无法成为唯一的解释,因为它本身也是由其他变化所促进的。同样,显然经济帝国主义常常是

很不成功的。无论如一个英国政治家所称的“不发达的财富”的非洲有多大吸引力，或是臆测的由中国数百万贫穷人口所构成的广阔消费品市场有多大吸引力，工业国家仍然认为其他的工业国家是他们最好的消费者和贸易伙伴。对于海外投资来说，不是新获得的地区，而是前殖民地或现存的殖民地吸引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英国的海外资金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和南美洲，或者“旧的”迁占殖民地；相比非洲，法国投资者更愿意向俄国投资，德国的资金也大都流入土耳其。

经济期望的确刺激了个人行为，但这是另一个很难总结的随机因素。探险家、商人、士兵和冒险家有时采取的行动会导致政府行动，无论其愿意与否。他们中的一些成为大众英雄，因为这一欧洲帝国主义最活跃的阶段伴随着公共事务中大众参与的显著增长。通过购买报纸、投票选举或是在街上欢呼庆祝，群众感到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政治当中，而政治（和其他的东西一起）认为帝国竞争是一个好的东西。像在今天的运动中一样，它在国家地位通俗化的浪漫主义时代以国家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新的廉价的出版物和大众小说家通过将殖民地探索和殖民地事务戏剧化来迎合这一口味。而且，一些愤世嫉俗的政客认为，本国统治向新地区的扩张意图有可能会抚慰选举者，虽然专家知道除了付出代价什么效果也不会达到。贫民窟居民因自己对其政府统辖下遥远的“野蛮”人的优越性而感到一些小小的欢欣。但是，愤世嫉俗已经不再是全部内容，还有利益的驱使或是过分刺激了梦想的自我。驱动了许多帝国主义者的理想主义抚慰了更多人的良心。那些相信他们拥有真正文明的人注定要统治他人，这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这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 440

1870 年之后，在变换的国际关系将其自身逻辑强加于殖民地事务的背景中，这些元素（许多交织在一起）需要找到新的立足之地。两个持续的事实凸显出来。一是大不列颠的中心地位。作为唯一真正的世界范围的帝国力量，它比其他国家有着更多的欧洲之外事务上的争端。它在各处都有领地，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仅仅专注于印度，同时也获得了非洲的领土作为好望角航道（以及一条新的取道苏伊士的路

线)的护卫,并经常因作为印度缓冲地带的中亚地区的危险而感到不安。在1870至1914年,大不列颠陷入的唯一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危机(与另一个大国的争端)远在阿富汗和尼罗河上游地区。它在埃及与法国有着持续的争端,其他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争端则要稍稍不那么辛苦。不仅仅是与法国,在西非和刚果,它与德国也有着边界的争端。它与德国还在新几内亚和波斯问题上,与俄国在中亚和阿富汗问题上有着进一步的争端。其关注范围如此广泛,使得其他国家常常联合起来反对英国。

第二个也是更为矛盾的事实是,虽然40多年来欧洲外交官们一直在为海外事务争吵,尽管美国和西班牙发生了战争,但他们对非欧世界的持续瓜分显然是和平的。即使在1900年以后,对非欧事务的争吵也明显转移了欧洲自身的敌对,而后者是更为危险的;19世纪它们甚至可能帮助保持了欧洲和平。当世界大战最终在1914年爆发,英国、俄国和法国这三个之前还为帝国和殖民地问题彼此争吵的国家能够站在统一战线上。仅仅是几个月之前,英国和德国就一个对葡萄牙帝国的可能瓜分达成了友好的协议。海外殖民竞争不再像18世纪那样将欧洲引入战争。

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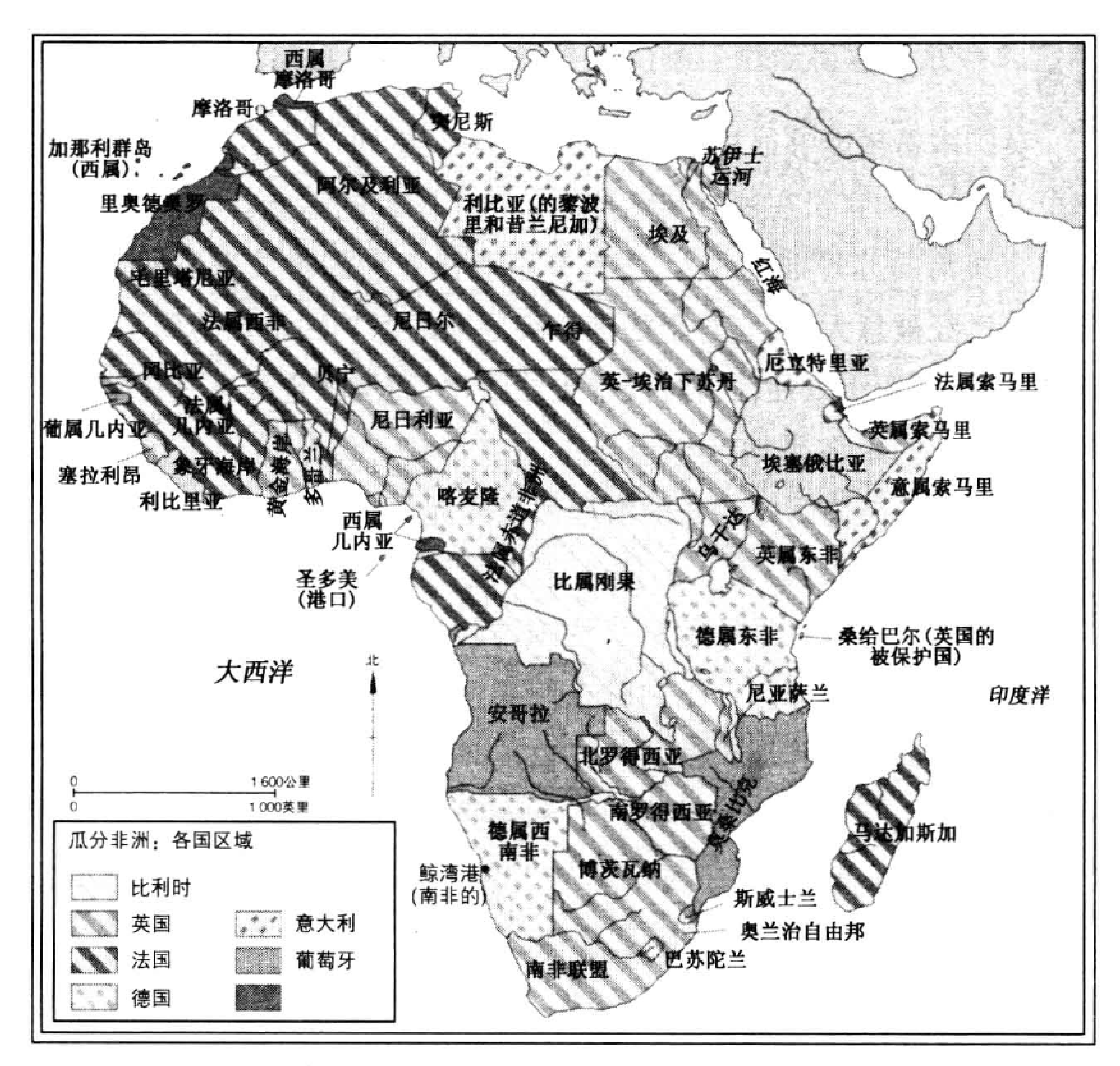
对非洲的争夺

非洲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欧洲帝国主义最后一个高潮阶段的竞争导向、自我供给和复杂本质。19世纪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反对奴隶制的士兵们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在“黑暗大陆”统治的扩张是正确的,那里文明和幸福的扩散可以证明。在非洲海岸,几个世纪以来的贸易证明,在非洲内部可能获得的是理想的货物而非奴隶。好望角的白人向更深的内陆推进(部分由于波尔人对英国统治的憎恨)。非洲在1881年就已经不稳定了,那时英国派出一支军队到埃及,以确保这个国家政府对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它害怕其可能会威胁到苏伊士运河的安全)的压制。欧洲文化的腐蚀性力量——由于它成为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源泉——因而触发了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另一个阶段——其时,

埃及仍是其名义上的一部分。它同样引发了被称做是“瓜分非洲”的浪潮。

英国本希望能够很快从埃及撤军；但是到1914年，其军队仍然在那里，而英国的官员在那时实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运转。其他地方，英埃联合统治向苏丹推进深入，土耳其在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西部省份已经被意大利（它对于法国在突尼斯的保护国地位感到不满）占据，阿尔及利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法国化，而法国也很享受在除西班牙驻扎之外的摩洛哥地区相当自由的决定权。但是这远不是全部情况。从摩洛哥向南到好望角的海岸线已经完全被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所瓜分，唯一的例外是独立而落后的利比里亚黑人共和国。撒哈拉空旷的荒野被留给了法国，同时还有塞内加尔盆地和刚果盆地北面的大部分地区。比利时在刚果盆地的剩余部分安顿下来，那里不久后被证明是非洲矿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更东一些，英国的领地从好望角一直延伸到罗得西亚和刚果边境。在东海岸，其被坦噶尼喀（1914年属德国）和葡属东非与大海所隔开。从肯尼亚的港口蒙巴萨开始，另一条英国领地带穿过乌干达延展到苏丹边境和尼罗河源头。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由英、意、法所控制）将埃塞俄比亚孤立起来，后者是除利比里亚之外唯一的独立于欧洲统治的非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通过军事胜利避免了欧洲占领的国家。其他国家没能成功抵抗，正像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叛乱的镇压，葡萄牙在1902年和1907年在安哥拉的征服叛乱（多少有些困难），英国对祖鲁和马塔贝列人在南非和东非力量的摧毁，以及最糟糕的，1907年德国在西南非的埃雷罗（Herrero）的大屠杀所证明的那样。 442

欧洲势力的巨大扩张大部分在1881年之后完成，而且其一个值得注意的成就是这是在避免了帝国战争的基础上达成的。它改变了非洲的历史。最终，欧洲谈判家的磋商、偶然的发现和殖民统治的便利造就了非洲进入现代史的方式。虽然在这里，伴随着瓜分非洲而产生的复杂多变而又令人着迷的故事与欧洲相关的部分仅仅在于其吸引了欧洲的精力、注意力和资源，以及其在帝国最终退却后在欧洲纠缠不清的网



络所留下的东西。

通过经营非洲，欧洲本身也有了一些变化。它意味着欧洲能够也的确已经更为容易地掌控可利用的财富，但是似乎只有比利时从非洲获取的资源对它造成了实质性的改变。同样，对非洲的开发有时也触发了本土的政治争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统治下的刚果暴行和葡属非洲的强迫性劳动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但是其他地方仍然有帝国政权默许下为了利益而对非洲自然资源——人力的和物质的——无情开发或掠夺的例子。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征召非洲士兵（虽然只有法国希望能够雇佣他们去欧洲服役以制衡德国士兵的数量）。他们希望为能够缓解社会问题的移民找到出路，但是非洲为欧洲提供的居住机会是混杂的。两个最大的移民区是南部的波尔人和英国人，以及之后肯

443

尼亚和罗得西亚将会为白人农民提供的土地。除了这些,非洲的移民据点包括了法属北非的几个城市,以及安哥拉的虽小但却不断成长中的葡萄牙社区。意大利在非洲的希望落空了。德国的移民规模很小而且几乎完全是暂时的。

帝国主义欧洲和远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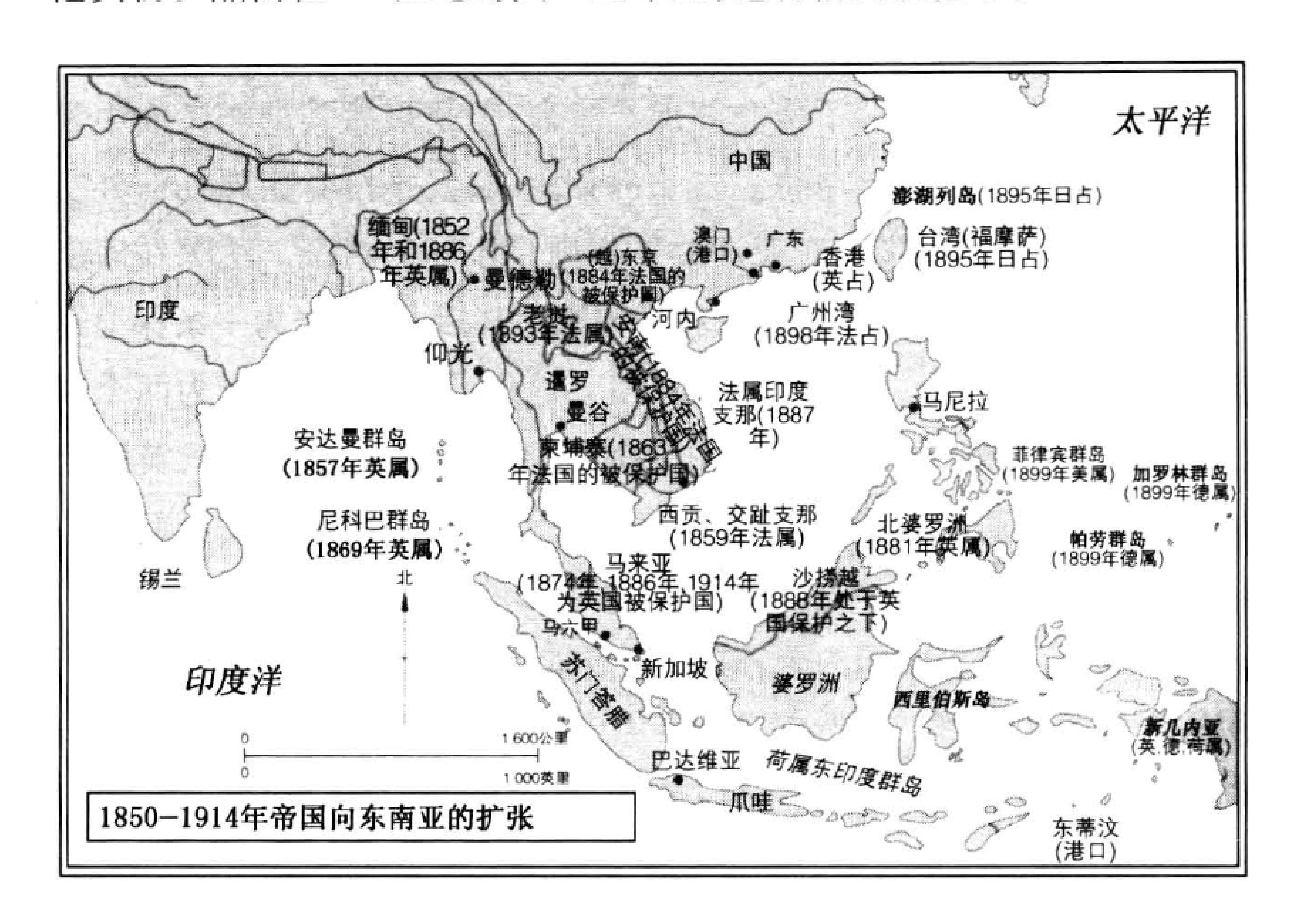
太平洋地区的瓜分不像非洲那么激烈,但是最后其岛屿民族中没有剩下任何独立的政治单位。与非洲相比,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外交争端。英国、法国和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则是不同的情况。法国在印度支那建立政权,英国则在马来亚和缅甸紧随其后,将其作为一条保卫通向印度道路的途径。暹罗仍然保持独立地位,因为它可以作为两个强国间的缓冲地带。同样,英国宣布了其在中亚的权力,1885 年,英国因阿富汗问题威胁与俄国交战,并且在 1904 年,为了印度的安全而对中国的西藏进行了远征。这些地区(比如俄国陆上扩张区域的许多地区)许多在名义上仍属中国的统辖之下。这个事例部分反映了欧洲影响下另一个帝国的衰落。虽然它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要比在奥斯曼和波斯所发生的事情更为重要。一时间,似乎对中国的瓜分将会紧随对非洲的瓜分之后,而美国加入的可能性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中国:蛮族的突击

中国在之前几个世纪内都是亚洲最强大的陆地国家,可能在世界上也是如此。19 世纪与欧洲的遭遇使得它暂时地衰落了。虽然在几百年间深受欧洲贸易和文化的影响,但 1800 年的中华帝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面临着许多有挑战性的国内问题,但仍为精英文化自信的价值观所统治,对欧洲来的“蛮族”及其产物持蔑视态度。与之相比,100 年后的帝国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许多中国港口掌握在异族人手中,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已经脱离其传统,心灰意冷。有的人认为帝国已经在分崩离析的前夕。

导致这一结果的历史逻辑在声名狼藉的“鸦片战争”时期能够很容　444

易被找到。从 16 世纪开始,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就被欧洲人所诟病,因为欧洲无力生产中国人需要的商品。因而,在中国的欧洲商人就必须用白银这种中国的基本通货来支付他们所买的货物。18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向东运输大量银块来支付其从广东买的茶叶和其他货物。然而在 19 世纪的头一些年里,这种情况改变了。



1850—1914年帝国向东南亚的扩张

鸦片是一种从罂粟中提取出的止痛药。在一些文化中它也被用做和其他文化中的酒精同样的功用,虽然严格说来其功效并不完全等同,因为酒精不仅能够引发身体崩溃,还能够引发兴奋和喧闹,而鸦片带来的常常是昏昏欲睡、迷雾般的快感,最终结束在睡眠和美梦中。英国发现了鸦片这种中国人想要的商品,而且它可以在印度种植。不幸的是,像其他许多药物一样,鸦片容易吸食成瘾——人们开始依赖它,并为了寻求他们对其的渴望而打破社会生活的许多常规法则。鸦片的其他效果(昏睡、对未来的漠不关心、无责任感)对中国官员来说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而他们禁止鸦片进口(在他们看来,鸦片另一个不受欢迎的原因是它由国外而来,所以可能导致中国对外国的依赖)。所以,中国的

不了解的，所以介绍时必须突出产品的优点特征。产品的特征，是指某一产品存在的征象，是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标志。只有抓住特征介绍产品，才能把性质相近的产品区别开来，让其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留下深刻印象。

2. 必须实事求是地介绍产品

在产品介绍中不应渗进主观的估价、推测，而应该如实地反映产品的本来面貌，不夸大也不缩小。作者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介绍。

3. 语言必须准确、通俗

产品介绍不需要华而不实的词藻、巧妙的修饰和复杂的句式。产品介绍的语言基本要求是准确、通俗，用浅显易懂的词语表述产品的本质特征，不用艰涩、生僻的词句，也少用文言词语、专用语及外来语。

（二）产品说明书的写作要求

产品介绍的写作要求同样适用于产品说明书，而产品说明书比产品介绍在某些方面要求更严格、标准更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内容必须更真实客观

真实是撰写说明书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对产品说明书的最起码要求。所谓真实，就是确有其物，确有其据，确有其性，确有其效，所言科学诚信，所述准确可靠，唯有真实才能使这种指导性、说明性文字真正地教人以用，而避免对消费者产生误导。1995 年底，《中国消费者报》、《南方周末》分别登载了以《违法药品说明书险要人命》、《病起说明书》为题的文章，披露的就是上海黄海制药厂“卡马西平”药物中毒事件。事件主要原因就是生产厂家在说明书中未能真实介绍该药的毒副作用而造成的。目前此类因说明书问题而引发的事故仍不断出现。

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政府官员也不能参与程度过大。如果官员保护传教士,那么他们自身将不受欢迎,如果他们不保护传教士,那么传教士就会被杀,本地欧洲领事就会派出炮船或一些士兵来逮捕杀人者,就会显得帝国政府无力在外国人面前保护其臣民。

446 这些紧张态势所出现的背景也几乎与深刻的社会压力和日渐危险的革命所一致。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认识到这一逐渐到来的危机,他们没有忘记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经常会遇到困难。它总是能够克服它们。中国文化是如此具有优越性(他们是这样确定)以至于无论不好的情况会持续多久,经过一定的时间它必然会重新获得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同时,少数人认为应当从异族那里寻找蒸汽船和加农炮的秘密并为帝国所用。然而,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认为,中国的传统不应有很大改变。然而这就是事实。19 世纪 40 年代开启了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并花了一个世纪才完成这一阶段。它逐渐作为双重的拒绝展现了自己:既是对外国人的拒绝,也是对中国过去的拒绝。然而它日益以欧洲世界的模式和话语来表现自己。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力量无法包含在传统的框架内,它们最后将会被证实是至关重要的,那时中国人将想方设法移除现代化和民族力量的障碍,想要永远粉碎掉几千年来作为中国生活基础的社会体系。

中国:让步与衰落

根深蒂固的态度使得中国很难有效面对有力的欧洲人。毫无热情的学习借鉴是一种反应;欧洲人被雇佣为军事援助(就像西罗马帝国晚期雇佣蛮族来抵御他们一样)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这是 1850 至 1864 年间的一次大的动荡,其领导人的思想部分来源于美国传教士的影响。最后,起义被镇压了,只付出了 2 000 万人牺牲的代价,但是清政府在这之前就被迫对外国作出了更多的让步来争取时间和支持。在骚乱当中,1856 至 1860 年间每年英法军队都对中国采取行动,其中一次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劫掠并焚烧了圆明园。

还有其他的屈辱事件。1858 年,黑龙江以北的中国省份被俄国占

领,两年之后乌苏里半岛(俄国准备在此建立符拉迪沃斯托克,中文名为“海参崴”)也落入俄国手中。在中亚,除新疆之外的中国大块领土也被俄国占领。俄国的胃口很大;它有着与中国接壤的最长的陆地边界,并在这之前的数十年就已经向中亚推进,在彼得大帝时期就觊觎黑龙江地区。但是欧洲其他国家也在逐渐蚕食着中国。中国曾经一直对缅甸和印度支那地区拥有宗主权,但是现在都失去了。在这个时期结束之前,或许是受到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影响,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害怕中国全面崩溃的话竞争对手会领先于自己,欧洲又开始转向对中国本土的侵略。俄国占领了旅顺港;英国、法国和德国通过长期租约占领了其他海港,葡萄牙将在澳门的旧租约换成了直接的所有权(据他们所说)。即使是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但是失败了。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的行动是更多的土地割让、贷款协定和对中国行政的干涉,所有的这些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日益被外国统治的国家,即使其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同时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殖民化进程。

447

这就是为什么1900年许多欧洲人认为中国即将分崩离析,就像奥斯曼帝国即将发生的那样。当一位英国首相讲到国家的两个等级——“活着的和濒死的”的时候,中国被归为后者的典型代表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中国已经远不是拿破仑所警告的将要觉醒的巨人,而是似乎要受千刀万剐而死——这是传奇的但是当时仍在实施的中国刑罚——被西方掠食者一点一点分割干净。然而,到19世纪末,一些中国人下定决心要让中国避免这样的命运。他们注意到了彼得大帝的行动以及当代的另一个亚洲社会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留学生首次被官方派出到欧洲和美国学习。然而,即使是这些寻求改革的人也觉得应当扎根于儒家传统,这一思想很难被动摇。无论怎样,1898年他们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扫清。

几乎同时,大众传统势力在各个省份都爆发了一些骚乱,这些骚乱大大受到正在广为传播的“义和团”的影响;其成员被简称为“拳民”。他们武力排外,袭击中国的基督教徒,并在不久后开始袭击传教士。中国官员和朝廷秘密支持并希望能利用他们,这是一个错误的估算。外

交抗议很快产生,要求政府对其进行镇压。太后及其代理人煽动的拳民叛乱全面爆发,欧洲的军队占领了中国要塞来保卫通向北京的道路。太后对所有外国力量宣战,德国驻北京领事被杀,领事馆被围攻;其他地方,超过 200 个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被杀。报复很快来临。一支国际联军杀出了通向北京的路,俄国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部。朝廷逃离首都,几个月之后不得不接受条约:惩罚相关官员、巨额赔款、拆除要塞以及让外国驻兵。拳民起义不仅失败了,还进一步破坏了已然动摇的政权。

日本:达到霸权的水准

1800 年时还没有人能想到孤立的日本帝国可能会比中国更加成功地应对来自欧洲化世界的挑战。所有的表现都是保守的,日本在两个世纪内将自己孤立起来,这遮掩了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以及其军事系统的衰落和社会不稳定的日渐增长。一些日本人明白,与西方思想的绝缘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可能了。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对在长崎(这是仅有的一个例外)进行贸易的荷兰人带来的书籍十分感兴趣。然而,日本与中国非常不同。许多日本人渴望向欧洲人学习,似乎并不像中国所陷入的困境,他们并未受到其传统的妨碍。当日本突然需要面临新的未曾预料到的外部挑战时,其情况并不像中国那样不利。

448

19 世纪 40 年代,日本统治者观察到中国日益增多的警报事件,局势日渐明晰,欧洲和北美似乎都对打入亚洲贸易有着新的兴趣,而其力量不可抵挡。荷兰国王警告幕府将军,闭关锁国政策将不再现实。但是日本统治集团没能很快决定抵抗和妥协哪个更好。因而,1853 年,美国总统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派了第一支外国舰队航行至日本水域江户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舰队返回,并迫使日本签订了首批“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警告。无疑,一些日本人这样认为,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对蛮族威胁的反应依旧模糊不清(甚至有进一步以武力驱逐外国人的尝试),而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一些新的应对才很好地确定下来。在这之前,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和荷兰取得了贸易特权、西方居民的

领事裁判权、外交代表的任用权以及对日本港口进出口鸦片的控制权。不久之后,幕府政权走向终结,帝国宫廷和行政机构在1861年的“明治维新”中重新掌权。

其标志性的开始是宫廷从旧的首都京都迁到江户(今东京)。接下来是废除封建制度、从大地主手中收回政府土地。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日本发展了郡县制、邮政体系、日报、教育部、军事征召、第一条铁路、宗教宽容和格里高利历法。所有的这些都是对欧洲的刻意模仿。地方政府代议制在1879年宣告成立,十年之后,一部新宪法成立双院的议会,贵族阶层在为上院的成立所作的准备中被创造起来。

虽然改革热情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衰落的迹象,而且明治维新之后仍有许多旧日本的痕迹,但是同样,许多旧日本的现象也得以消除,再也没有恢复。日本寻求用外国方法来训练陆军和海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军事顾问被免职,而德国的取而代之;英国则为其海军提供指导。年轻的日本人被派往国外,学习欧洲和北美强大而具有威胁性的力量的第一手秘密。 449

人们很难不被这些年轻人及其长辈的热情所感动,更不可能不对其成就印象深刻。其影响超越了日本和那个时代。它鼓舞了从印度到中国的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同时,改革者的成功很快被印证。对西方技术和知识的借鉴并不是日本经济增长并长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中所无法匹敌的全部原因。这个国家的幸运在于已经准备好了一批视利益驱动为当然的企业家。农业产量保持增长,尽管在1868年占人口总量五分之四的农民并没有从中获益多少。尽管如此,日本能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在其快速崛起为国际大国的过程中,土地税帮助日本进一步获得了外国的保护。矛盾的是,它通过对中国的战争第一次获得证明,后者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元气大伤。

这场战争也证明了欧洲世界霸权的另一个后果,即:霸权本身的结束。它在欧洲国家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唯一参与者时就已经被充分证实。的确,日本对其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要求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欧洲国家结成联盟来反对其在对中国的胜利后拿走全部的战利

品。同样,美国是另一个非欧洲的世界“玩家”,其在西半球的霸权早就被欧洲国家肃然接受。而当其中之一的西班牙在1898年被美国夺取了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时,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已经展开了将近半个世纪。最后,整个亚洲的新的民族主义的第一个萌芽也开始兴起。

第二十一章　有序与无序的国际政治

450

影响国力因素的新变化

1871年的重要事实是新德意志帝国取代法国成为俄国以西欧洲大陆的主要强国。这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因变量。德国在军队数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军队数量不是评估是否为军事强国的唯一标准,但是,如果其他因素是相同的话,毕竟它是一个好的直观的指示器。甚至在1900年欧洲的高级军官还认为农村是提供兵源的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农民被认为很难或者不可能一致地挑战国家的权威,所以随着20世纪历史的脚步,强制征兵依然很容易。1900年,法国仍然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然而从整个19世纪来看,其农村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从世纪初的15%下降至世纪末的10%,而统一后的德国这一比例在世纪末则达到14%,本世纪中期战争的另一个输家——奥匈帝国这一比例也在下降,尽管至1900年它仍然高于法国为12%。同一时期的俄国依然保持人口大国的地位,自从1800年开始其人口总量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从21%增至24%。

每一国的政治家都必须考虑这些变化,并据此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政策。德国政府选择了阻止海外移民,因为它担心兵源因海外移民

而减少;法国政治家一直殚精竭虑地提升出生率;同时,人口增长的压力、对就业率的担忧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令英国采取了鼓励海外移民的政策(在英格兰的历史上,这并非第一次),并且反过来影响了对殖民地的感情和政策。尽管供养军队需要支出大量的军费,但英国并不在意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到1914年它仍然是唯一一个没有实施征兵制的军事强国。不过,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也没有打算放弃在这支海军赚来霸权的地方采取独立行动。

451 大不列颠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些年它一直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德意志统一时还是工业强国的领头羊,尽管德国正在飞速追赶,甚至到1900年在些许方面已经超过英国。这些事实又必须被视为评价军事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无疑经济实力是衡量一国国力最为重要的标准,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可是,美国内战的重要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被欧洲人忽视了。但那些睿智的观察家仍能看出,制造业能力、现代交通手段、现代技术对这场战争胜负的重要性。铁路在欧洲的作战计划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71年之后尤为明显。然而,更重要的是武器的进步:大口径和强大杀伤力的大炮、刻膛线的轻武器、机枪、坚固的头盔、更优越的军舰发动机。德国在统一之后经济实力大大攀升,因此它在军备竞赛上准备得最为充分。尽管俄奥两国在军力上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它们还是无法与德国同日而语。另外,国家的凝聚力也必须予以考虑。这三个东部的帝国都是多族群的国家,可是对德国而言,族群问题带来的军事负担要少一些,不至内部虚弱。由于要面对大量掣肘的问题,俄国被视为帝国利益和大不列颠海外利益等量齐观的仅有的欧洲强国。

民族主义

在军队里有一些士兵并不可靠。19世纪末,对于多民族的帝国而言,人们不再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被训练为具有对国家同样忠诚的国民,例如执掌哈布斯堡军队的领袖不得不考虑,如果某些措施欠思量,那些军队中的斯拉夫族士兵可能的反应。德国的军队中甚至没有使用

统一的语言;下达命令时使用德语,但说意大利语和克罗地亚语的新兵必须掌握的词汇量却不足百字而已。数十年过去了,国家忠诚的问题变得更为棘手,这是因为这些年民族主义在潜滋暗长,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藏身于背后的民族主义至少存在了两个世纪,常被视为现代政治的最成功的革命力量。至 1871 年,它在助益德国和意大利统一之后,又开始了大展拳脚的征程,并且新的力量正准备推波助澜。处在发展中的社会,旧有的社会联结和忠诚观念正在解体,这个真空需要填补。个体和集体的认同被重新界定,新的情感焦点得以建立起来。当一种崭新且较之先前更为及时的信息和情感传递,通过更高的识字率、更广泛的传媒和更快捷的信息交流变得更加有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另外,不管是提倡秩序还是主张自由的政治家都在利用民族感情:保守派以传统的名义赞美它,自由派把它看做民族自觉的依据。它也可以是既得利益集体又是政治煽动者释放的烟幕弹。 452

到 1871 年,事实上依赖于假设的民族主义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按照民族主义的假设,欧洲应该是一个国家体系,而这个国家体系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能代表同一民族。它应该,并且有时已经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哈布斯堡在 1867 年向匈牙利人让步从而避免了一场内战(尽管人们一般不会想到这是因败于普鲁士而被强加的结果)。并且,1905 年挪威通过签订协约和平地从瑞典独立出来。但是,在 1871 年还不能说这些前兆意味着美好的未来,到这一年为止的大半个世纪到处是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发动的革命和战争。所以,对于依靠不同制度管理的欧洲三大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而言,考虑到上述诸多麻烦,它们的未来看起来不甚乐观[①]。

尽管在 19 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获得了成功,尽管

① 尽管一个讨厌民主制的作家指出,俄国和土耳其是仅有的完全(注意我用的斜体)拒绝代议制政府理论的欧洲国家(缅因州[Maine],《公共管理》,1885),但直到 1900 年黑山(Montenegro)是欧洲另一个没有议会的国家。

一些新的民族国家在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建立起来，但民族主义破坏欧洲稳定的威胁没有消退。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要求建立其他新民族国家的努力没有衰退的迹象，另外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黑山(Montenegro)在19世纪70年代诞生了，1913年阿尔巴尼亚从欧洲土耳其的残躯上极其艰难地分裂出来，第一次出现在地图上。甚至，克里特此时也获得苏丹的许可在希腊政府管辖之下建立自治政府。总之，这40年里，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的诸多民族向欧洲的政治家提出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亟须解决的问题。所有的欧洲外交官都知晓，他们可能破坏稳定的局面，因为他们动辄就以援引大国加入他们的争端相威胁。

在俄国，尽管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都有民族主义的冲动，尽管芬兰丧失了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享有的自治权，内部的骚乱很少具有国际影响力。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斯二世更为反动的政权似乎能轻易地控制住骚乱，并且可以维持俄罗斯民族对其他帝国臣民的事实上的统治权。在奥匈帝国，因大国关系紧张而迟早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匈牙利担忧此起彼伏的革命；在匈牙利的一些地区作为多数民族的斯拉夫人感受到了压迫，他们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期待塞尔维亚人能成为他们反对匈牙利人统治的未来的保护人。在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存在大量罗马尼亚族人口，他们可能会积极地响应来自刚获得独立的罗马尼亚王国同胞的呼唤。在奥地利，波斯米亚地区的民族感情略淡一些，但不能说那里的民族主义不是个问题。维也纳正详细地论证可行的政体方案，以满足其他民族的要求。当时联邦主义者和三国联邦主义者(trialist)的方案颇为流行，但这些方案经常因遭到匈牙利人的激烈阻挠而流产，因为他们是1867年形成的二元君主政体的利益攸关者。

453

另一个大国，大不列颠，也要着手处理两次不妥协的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都发生在爱尔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天主教爱尔兰运动都十分活跃。到1900年，尽管“地方自治”的目标没有实现，通过贿赂的手段也获得一些让步。“地方自治”是自由党于1900年提出的。

但是阿尔斯特的新教民族主义坚决地反对通向这一目标。显然,他们获得了保守党的支持。相反,他们的方向绝不是让爱尔兰走向独立,而是维持现行的符合宪政的与英格兰合并的状态。如果国会承认了有利于爱尔兰统一的地方自治议案,它的领导人就唆使诉诸暴力。结果却对欧洲产生了影响。当地方自治法案最终在 1914 年通过时,阿尔斯特的骚动竟让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联合王国将因革命而瘫痪。

存在于大国国民中间的民族感情,或在第一个大众媒体时代由报纸鼓吹起来的这种感情,是另一个潜在的干扰性力量。1871 年,德国作为对胜利的纵容夺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导致德法之间民族感情上的激烈对抗。法国人一直悯怀被割让的领土,他们的民族感情极易被煽动起来,一些政客又伺机培养、利用民众的复仇情结。法国的民族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常常现身。它提出了对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乃至对共和国本身的忠诚问题。英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同一个民族(或者他们这样宣称,并乐意这么想)。他们的头脑受到沙文主义(jingoism,发明于 18 世纪 70 年代的一个词)的浸染,并且时不时地对民族的象征表现出不断增加的亢奋。到了这个世纪临了的时候,英国国民尤其按捺不住对帝国和皇家海军霸权的狂热。因为德国超越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中获得了成功。英国人被激发出对抗德国的民族情绪,他们认为德国超越英国的危险就在当下。事实上,两个国家可以彼此成为对方最好的市场,但在那爱国主义觉醒的世道,双方的利益却无从顾恤了。

在威廉二世于 1888 年获得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这双重宝座之后,英德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争吵令英国人的公众情绪(常常是焦虑)厚了几层。同时德国的民族感情也被激发出来。不幸的是,早在 30 年前德意志尚未统一时它就存在了,甚至当俾斯麦试着寻求民族主义政客的支持时,它就出没了。民族情绪很容易演变成分裂这个新国家的危险力量。他经常讲,心向罗马的德国天主教徒和谈论国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是帝国的敌人,同时,他将内政视为意识形态的战场。在简单地安抚了工人阶级之后,威廉二世对革命的危险感到焦虑,也积极地

454

向民族主义者寻求支持。

俾斯麦还是相当谨慎的。他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德国外交政策开始追逐尊严和威信（这是老首相讨厌的词儿）这等虚名——正像某些人所说的，这是一种“太阳城”（a place in the sun）。在皇帝授权之下，德国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制定了一个远大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仅界定了德国在欧洲的新地位，而且设计了自认为适合自己地位的全球构想——世界政策（*Weltpolitik*）。它受到一些人的热烈欢迎，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经济利益。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德国开始筹建一支庞大的海军。起初英国人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英国人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将注意力集中在确保自己的海上力量凌驾于法俄之上，而忽视了德国的野心）。可是，到了 20 世纪初，英国人开始质问德国组建公海舰队如果不是针对英国那它是针对谁。此时，欧洲的许多国家对德意志帝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致的印象是耀武扬威、飞扬跋扈，这种印象尽管忽略了更为复杂的一些背景，但是它却给予公众一个极易明了的观感。这个突出的实例可以说明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干扰性的和无法预料的影响，至少对于宪政国家来说，政府不能忽视民意。

危险的举措

尽管如此，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欧洲列强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极其成功地处理了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他们不时爆发出争吵，却设法避免发生战争。甚至还可以乐观一些。经过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动乱之后，国际战争大为减少。另外，国际仲裁被普遍接受且被频繁地运用。1899 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制定了更好的仲裁条款，而且目的在于限制军备扩张。尽管裁军的目标失败了，但由此而诞生了海牙国际法庭，它给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希望。代表大会还致力于减少战争的残酷性，各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在战争期间拒绝使用毒气、达姆弹，甚至空投炸弹。1900 年，德国皇帝派遣参与远征中国的联军，当他闻知义和团攻击欧洲人的暴行，怒不可遏。他激励他的军队采用“像匈奴人那样”的行为予以报复。他的鼓吹颇具影响，并广为

455

传播。事实上，至1900年没有人提倡欧洲士兵采取野蛮的行为方式，即便他们常常如此，但是战争中艰难的人性化措施被威廉二世摒弃了。他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士兵丢掉“文明战争”的枷锁，恣意胡为。

欧洲外交另一个让人感到乐观的方面是，欧洲仍然处在世界事务的核心位置，掌握着世界事务的决定权。在国际外交事务中，除了西半球和远东的事务之外，西方的政治家皆可从容应对，当然对他们彼此之间的外交事务还仍要劳神苦思，是国际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的国际冲突自然十分尖锐，但还是避免了走向战争，不过真正的危险却日益迫近。

在这些外交事务中，欧洲东部的君主国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唯一的角色。他们内部的宪政制度似乎与历史发展的趋势越来越相背离。德国有成文法、代议制、普选权、由司法独立保障的个人权利。它的法律允许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然而，它的统治者尤其是皇帝本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识到国家非凡的经济成就产生了社会势力与政治势力的对抗，两者越来越难以通过保守的手段来调和。社会势力发现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参与的空间，甚至也没有了声音。而真正的事实是，往往是决定性的，权力仍不正常地由皇帝、保守的普鲁士土地权贵以及军队掌控着。德国的保守势力有时声称，好像他们仍然相信神圣同盟时代的旧观念，政府是被统治者的天然敌人。

这种看法也许更容易被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上层所接受，即使君主制下也存在议会制度，即使帝国颁布了新的宪法，并体现出了一个民族(匈牙利)意志的胜利。到1900年，有更多的迹象显示帝国在没有打破附庸民族容忍限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完整地维持结构。奥地利公国的社会变迁(例如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工业化)也激起了公国内部的矛盾。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些矛盾被讨好社会的政策缓和了。比如，工厂对工人人身的保护、保险以及工作日的限定。加上社会主义组织的压力，帝国政府执行了一个比俾斯麦德国政府还要激进的社会福利政策。

此一时期，俄国也发生着剧烈的变革。独裁政治和恐怖主义联手　456

摧毁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改革的前景,但没有阻挡住经济革命的步伐。为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俄国政府向国外借贷大量资金,因此制定财政政策榨取农民的财富以偿还贷款和利息。但是至为重要的工业化产生了新的麻烦。工业无产阶级开始在制造业发达的大城市聚集。可是,社会和国家自由化的条件仍不具备,独裁者在掌权。农村的骚乱从未停歇,此起彼伏,并且恐怖分子一直在招兵买马。俄国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它自己的特征。这些矛盾继续发酵,终于导致了 1905 年的革命。

这些看得见的事实越发地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主、自由、政治风格及和平(偶尔值得兴奋的)进步不相协调。普选权的扩大就是这种趋势的显著标志①。其他标志是现存宗教特权的消退、人民在法律面前所取得的平等地位,以及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获取。政党的数量激增,并且组织和鼓动的能力也大为精进。所有这些都与人们对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一贯的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在 20 世纪初它们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由于左翼势力的煽动,欧洲保守势力的恐惧加剧了。宪政国家也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和由阴谋家发动的暴力事件。然而,国家机器在每一个方面都比先前强大了,1871 年在法国爆发的一个血淋淋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这个事实。普鲁士围攻巴黎之后,一个吸纳了许多激进分子和改革人士的民众政权在首都成立了,它被称为"公社"(Commune)。这个名字能够唤起人们对中世纪城市独立传统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对 1793 年巴黎议事会(Commune of Paris)的记忆。它是革命的中枢。在 1871 年,法国临时政府没能够解除首都市民的武装,也正是依靠这些武装的巴黎市民成功地抵挡住了普鲁士军队的围攻。然后,公社接取了权力,因为战败激起了巴黎市民的愤怒而去反抗让他

① 到 1900 年为止,实施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国家有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挪威。英国选民的范围经 1871 年、1885 年两次扩大,意大利选民队伍的扩大是在 1881 年,荷兰也有两次,分别是在 1887 年和 1896 年。

们蒙羞的无能之辈,而且他们还认为这些家伙准备复辟君主制。经过短短几周的平静政府开始反扑,巴黎公社节节败退,即使左翼人士声援也于事无补。它的许多支持者将它看做社会革命的化身,而另一些人则怀疑它是"臭名昭著"的共产国际阴谋策划的产物(事实上它不是)。

457

法国当局实施了残酷的镇压。政府将俘虏赎回,重新集结为军队。巴黎顿时变成战场,血流成河。再一次,训练有素的士兵很快突破了工人和小店主草草设置的障碍。无论如何,巴黎公社令人惨痛的失败(超过 2 万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杀,30 万人被捕)都应该终结革命者的神话,不管是恐惧于革命的力量,还是受鼓舞于革命的力量。然而,革命没有终结。非要说的话,恰恰相反,它增强了革命者的信心。保守势力发现,巴黎公社的后备军正在唤起蛰伏于社会深处的危险力量,时刻准备喷薄而发。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有增无减,并且传给了 1789 至 1848 年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的接班人。另外,也使怀抱革命神话的社会主义组织获得新生。

社会主义

马克思抢先为社会主义发明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并为之礼赞,在一篇颇具影响的短文中他将公社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巴黎公社是许多复杂的不同的力量共同参与的结果,在行动中也绝少采用平等主义的方式,而是将"科学"社会主义丢掉了一旁。并且它发生在巴黎,这个城市尽管规模不可谓不大,但不是制造业中心,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该在此瓜熟蒂落。然而,那些工业发达的城市却顽固地保持沉默。实际上巴黎公社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传统的巴黎激进主义革命。

尽管如此,马克思将它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中心议题,并且从 1871 年之后社会主义前所未有地制度化了。第一国际仅涉及笼统的教条,有基本原理,也有策略。对他而言,抱负比高效的机构更重要。19 世纪 70 年代第一国际解体之后,马克思继续斗争将第一国际的秘书处转移到美国,并亲掌秘书处。1889 年人们所熟知的"第二国际"建立,它

统一了社会主义政党、欧洲工会以及其他工人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尽管它不排斥非马克思主义者成员,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加入。到19世纪末,被它的敌人和社会主义者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来源于马克思教学和著作的思想体系,正式被社会主义者广泛地接受,即使他们在实践上与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明显的区分。尽管马克思本人在晚年不承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也反对他的追随者如此称呼他,但是他仍自信地断言,历史将不可避免地抛弃资本主义,并建立一个有着合理秩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个人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对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新宗教的核心(从所产生的阐释、注疏和异端来看,它与旧信仰没什么不同。

458

第二国际得益于30年中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力量的发展,尤其是在宪政国家。工会在大多数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有时是在政府的打压之下)壮大起来。到1900年,社会主义还不是左翼力量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然而,它的成功的确是个令人惊奇的现象,简而言之,尽管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主张革命,但他们也越发成熟地在工厂和投票亭使用他们的力量,以便为他们的成员在资本主义社会赢得利益。事实上,这有助于减轻可能引燃革命火花的民间疾苦。这是生活水准改善的另一个方面。

观念的变迁

在传统势力和保守势力看来,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社会和知识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三者以联合之势手拉手地削弱现存的结构、传统和习俗(它们被视为社会的防腐剂),这令他们大为失望。他们的见解的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他们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则毫无疑问。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仍在进行——或者说业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些人认为始于宗教改革,更极端的观点是始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无疑弱化了传统思想的控制力量。不过,对挑战宗教的知识革新感到恐惧的人似乎有些杯弓蛇影,学者和哲学家的思想并没有那么锐利。在信仰(或者无信仰)与变化显著的物质生活以及由它产生

的期望和假想之间很难建立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与知识相关联的是《圣经》研究的学者,从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开始摧毁《圣经》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的许多轻浮的假设。经过学者的长期努力,《圣经》变成了一种像其他历史文本一样可供批判接受的一种历史文献。获得极大成功也激起极大反感的一本著作《耶稣传》在1863年出版,它的作者是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内(Ernest Renan),这本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圣经》作为欧洲文明核心的历史文献从黑暗时代出现以来第一次在持怀疑态度的精英中间恢复到它本来的位置。

然而,由思想家群体对基督教所作的古典学和文献学的批判远不如来自科学的批判有力。后者志在打击《圣经》所记载的虚假信息。当经验证据显示《圣经》所说的内容显然与事实不符时,攻击《圣经》内在和逻辑上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第一枪是在地质学界打响的,时间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30年代,苏格兰科学家乔治·莱伊尔(George Lyell)出版了《地质学原理》一书,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此书用力的作用学说解释地貌成因和地质构造,书中说所有这些不是一次简单的创造,而是由风雨等自然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埋藏在不同地质岩层中的各种生命化石说明新生命的创造过程在每个地质时期不断地重复,那么《圣经》中的上帝造物的故事自然站不住脚。另外,在英国的许多洞穴中发现的石制工具以及现代动物的骨骼化石也证明人类的存在比《圣经》所叙述的要早得多,于是,依据《圣经》的记载来推测人类发展的历史就变得荒诞不经。接下来,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版给上帝造物说(以及关于人类独一无二身份的谬论)以致命的打击,也比之前的许多理论传播得更广泛。在《圣经》批判研究和地质学的联合支持下,他的著作让任何一位谨慎博闻的人不得不相信《圣经》的记载是荒诞的。

459

《圣经》权威的下降体现了科学对时人观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正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它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身份,即:控制自然的高级工具。先前人们是无法抗拒自然的,然而17世纪和18世纪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没有影响到匹夫匹妇日常生活的

变化,19 世纪的科学成就做到了。那些寻求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人也在努力塑造科学的权威。教育和学术研究(不仅在医学领域)给科学以广阔的空间以吸纳更巨大的科学成果。这也大大增加了社会对科学的投入。从大约 1700 年开始,世界上科学家的人口数量每 15 年翻一番,到 19 世纪科学的成就是以指数曲线的速度在增长。科学对人们行为和观念的影响很难衡量,也许绝不可能有一个精确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伟大成就,那是不可想象的。

罗马与现代性

新教与天主教的教会一样在大革命之后很少有适应后革命时代环境的观念,除了建造一些建筑之外。并且,它们对虚假教义、信仰不虔诚和"伏尔泰原则"("Voltairean" principles)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敌对意识,比如:庇护八世在 1812 年从巴黎的拘押所回来之后,禁书名录制度和异教审判所被再一次建立起来。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在 1832 年发出的一则通谕谴责宗教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之后的 40 年中,格列高利十六世采取了相似的政策,但是他发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了意大利统一越来越容易联合起来反对天主教会。对于支持天主教会的意大利人来说,教皇世俗权力的解体及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本身是这些年教会复苏的合理的后果。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教皇本人认为教会不受欢迎,从梵蒂冈退休的庇护九世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从那时起的 60 年中,他和他的继任者从没有现身拉特朗圣若望大殿)。

460

在这之前,庇护九世的统治扩大了教会与时代精神之间的鸿沟。1854 年,庇护九世将圣母马利亚无沾成胎说作为教义,要求所有的天主教会认同,并大力传播。所谓无沾成胎说是指圣母马利亚不像其他人原罪怀孕,而是不受原罪沾染圣洁地生下了基督。这是从特利腾大公会议以来第一次添加教会教义,也是基于教皇仅剩的权威作出的决定。这个教义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中世纪时圣方济各会士信奉此一教义以攻击多明我会士(托马斯 · 阿奎那就不支持这种信仰),并且是很

多地方公众祷告的目标。它的内蕴复杂、晦涩，并且与现代欧洲的公众意志格格不入。

10 年之后，《现代谬论集》一书出版，书后附一篇教皇的通谕。通谕对现代性事物表达了明确和详细的抗议。在这篇通谕中，教皇不仅仅谴责诸如理性主义、社会主义、共济会制度等显著的革新，而且宣布"那些相信罗马教皇能够且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当代文明和解乃至迎合的观点"是地地道道的谬论。然后，1869 年在梵蒂冈召开自特利腾大公会议之后第一次全基督教会议，会议开了 10 个月。大会决定教皇以宗座权威称信的信仰和道德是绝对可靠的。很明显，无论教皇的权力和控制的疆域缩小了多少，它仍反复地宣称其对基督徒的权威是自中世纪以来空前强大的（也许，对他们的大多数人而言，这只不过是对过往的怀念）。

奥地利政府在 1855 年与教皇有一个宗教事务协定，标志着所谓的"约瑟夫敕令"(Josephinism)的终结。该敕令宣布从 18 世纪皇帝约瑟夫二世开始，奥地利国对教会拥有主权。现在，随着"教皇无误论"传播了些时日，奥地利政府废除了"约瑟夫敕令"。"教皇无误论"很快令教会陷入了与几个大国关于权威的争吵的漩涡。王朝复辟以后的数十年来，教会和政府保持着合作的关系，并且再次分裂为两大阵营。真正的原因常常藏在背后。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了教皇谴责新生的意大利，也让他们宣布意大利天主教徒通过投票参与宪政生活不是上策。"教皇无误论"表面上引出了在德国持续了 10 年的大论争——文化论争，事实上卷入了德国的党派斗争；希望中央党(Centre party)在新帝国内保护天主教徒利益而支持中央党的天主教徒选民在联邦诸选区内占据多数，他们致力于保护自身的特殊利益，反对支持新教的普鲁士。结果德国政府在下个 10 年实施了一系列的损害天主教徒利益的惩罚性措施，包括驱逐耶稣会士和干涉教会制定神职人员戒律。直到 1879 年紧张的空气开始缓和，当时俾斯麦再次基于国内政策舒缓了压制天主教徒的政策。同样在法国，宗教问题也因内政而变得复杂。普法战争失败之后，实际上第三共和国的未来从建立第一天起就充满各种变数。

461

在共和党人眼中,那些努力恢复波旁王室势力的立法者因与宗教人士甚至接受教皇极端权力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历史的联合而变质了。打算支持觊觎王位者夺回御座的其他保守势力正不遗余力地尊崇法国天主教传统,并且,广大农村乡民对天主教保持着强烈的忠诚。另一方面,共和主义是一种狂热的革命传统;一些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希望弥合两派的鸿沟,结果从没有成功,甚至产生了流血的悲剧事件;两个巴黎大主教分别在 1848 年和 1871 年死于巴黎革命者手中。右翼人士不提倡 1793 年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恐怖政策。10 年之后,共和党人认为共和国安全无虞了(尽管王党分子仍伺机颠覆现政权),他们的立法包含反基督教的内容,尽管教会与拿破仑皇帝的关系颇为暧昧。

从天主教国家教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权力日益增长的时代趋势。公民的结婚与离婚,对教会救济和免税问题的规定,控制言论与出版自由,教育问题,这些棘手的问题在互不妥协的气氛之中越来越难以处理。首先,对于所提出的问题中的教育,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采取了学校教育的方式解决了,老一点的民族国家像法国在学校里展开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与过去的方式决裂。而考虑到庇护九世对教皇绝对权威的声明及对他愚民政策的批判,这些时代的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

利奥十三世在 1878 年登上教皇权位,这是个个性独特和敏捷灵活的教皇。他希望通过改变天主教政治家(在法国,这些人被认为是支持共和的)的行为来恢复天主教教会对政府的影响。他在比其前任更宽松的政治气候下实施的一些措施,比如对社会主义的焦虑(特别是在德国),得到保守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认可。在他的任期内,天主教政党开始登上舞台,并且利用投票箱施加自身的影响力。对他而言,"自由"这个词包含着太多的反天主教意义,但他被称为自由的教皇,不仅仅因为他极具洞察力地看到民主政治和宪政机构保护宗教的可能性,还因为第一次由教皇宣布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1891 年他颁布的《新事物通谕》)。但是,他在对待统一的意大利问题上没有妥协,仍公开表态反对意大利的天主教

徒参与政治。

俾斯麦的欧洲

1871 年刚诞生的德国并不受到它的第一位统治者——威廉一世的青睐。德国皇帝是个纯粹的老保守,反对任何革新。他认为做普鲁士的国王比被一群开明人士拥戴做联邦国家的皇帝好。他总是迁怒于他的老首相——俾斯麦,这个德意志统一的设计师。他们商定普鲁士(以及新德国)现在是一个餍足的国家,不再像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那样改变版图和疆域。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和保守集团东普鲁士地主阶级的代表,俾斯麦的目标转向了维持欧洲和平。战争可能威胁到君主国的稳定,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倾覆提供了前车之鉴,彼时革命的危险就隐藏在巴黎公社的暴动和社会主义分子的骚乱之中。

对法国而言,它最需要的是什么? 它憎恨让它孤立的加富尔-俾斯麦时代的国际秩序,甚至在没有一个成功的复仇之战的前景之前,找不到想要的盟国。无疑它迫切希望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具体地讲,由俾斯麦主导的孤立法国的政策意味着化解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敌对(毕竟,法国最近冒犯过这个国家,那就是怂恿撒丁岛抢劫它在意大利的行省),维护普鲁士与俄国的传统友谊,并且伺机挑起新意大利与法国的争端。大不列颠绝不可能与任何一个大国结盟,自然会丢下法国不管,德国需要做的仅仅是使英国进入一个仇视法国的状态。这样的机会也因英法在欧洲之外利益纷争的加剧而随时可能产生。确保和平的唯一的困难可能是罗曼诺夫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在东南欧长期的对峙,即使小有潜伏,也会再度兴起。

463

它的根源就是 18 世纪东欧革命。1800 年之后,这个问题因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拿破仑时代的国际动荡以及奥斯曼政府在满足和控制其臣民上面越发无能的应对,而一次次加剧。克里米亚战争是个分水岭(1849 年,俄国受同情心和良知的驱动曾帮助过哈布斯堡王朝,但这场战争摧毁了俄国的同情心和良知)。显然,当奥斯曼帝国在东欧的统治瓦解之时,谁或者由什么来填补权力真空的问题

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危机,甚至走向战争。奥地利人不想俄国及其附属国阻挡他们循着多瑙河南下,俄国人也不愿奥地利人及其附属国妨碍他们向土耳其海峡推进。英国和法国对俄国毫无障碍地出入于地中海的忧虑要甚于奥地利在多瑙河流域的霸权,所以他们动辄以战争相威胁,但是,他们宁愿尽可能地保存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残躯,万不得已时方才倾向于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

1876 年,俄国再次入侵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此时背叛奥斯曼帝国加入俄国一方。根据俄国与土耳其签订的城下之盟,一个面积不小的独立的保加利亚国家将要建立起来,且它的南部疆域濒临爱琴海。顿时,奥地利和英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以抑制俄国的贪婪。1878 年在柏林召开的欧洲会议就是为了解决帝国间的矛盾。这是俾斯麦导演的一出好戏。他使每个与会国都分到了利益,既不牺牲与彼得堡或维也纳的友谊,又确保了和平,可谓左右逢源。会议上签订的《柏林和约》有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新的协定以取代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协约。《和约》还规定"三皇同盟"于 1884 年再次生效。

巴尔干地区没有马上平静下来。由于保加利亚政局动荡,新一轮的保加利亚危机于 1885 年出现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保加利亚年轻的德裔大公不睦,致使保加利亚没能脱离土耳其的统治。当保加利亚人声称东鲁米尼亚是保加利亚一部分时,柏林协约面临第一次重大挑战。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证明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协约在巴尔干民族问题面前很容易灰飞烟灭。此时,希腊正与巴尔干交战,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开火。尽管俄国人不满意,保加利亚的新大公还是登基了。在整个事件的结尾处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变成了奥地利的而不是俄国的附属国。大国之间的和平尽管得到维持,但是就在此时俾斯麦发现比起 1878 年时德国想同时拥有俄奥这两个朋友越来越艰难。

464

19 世纪最后十年的国际关系

经过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一系列危机,奥地利和俄国对东南欧的争夺缓和下来(确实,在 90 年代两个君主国好像有一个不破坏现秩序的

协定)，但是柏林会议规定的秩序慢慢地被高涨的民族主义破坏。民族主义不仅仅发生在哈布斯堡的被统治民族中间，还有奥斯曼帝国治下的斯拉夫人，他们渴望效仿第一个脱离帝国统治的塞尔维亚人。在匈牙利人的压力之下，奥地利政府对塞尔维亚保持警惕，相当多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长期将塞尔维亚视为威胁(它可是未来包括所有南斯拉夫人的国家的核心)。而统治者不仅不可能而且更不愿意限制激进民族主义者以塞尔维亚为基地在波斯尼亚实施的恐怖主义和颠覆现政权的活动，波斯尼亚本是奥斯曼帝国的省区，在《柏林和约》生效之后归奥地利统治。历史既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给人们教训。维也纳也轻易地看出塞尔维亚打算在多瑙河流域扮演撒丁岛在意大利扮演过的角色的图谋。与此同时，俄国对外政策也不得不考虑一个新因素，即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兴起，它的门徒要求俄国支持其他斯拉夫国家。1876年，一些俄国人煽动、支持保加利亚，这是泛斯拉夫主义第一次显示它的重要影响。

然而，更为复杂且微妙的问题是，1882 年由俾斯麦一手缔造的三国同盟中的两个强势搭档德国和奥地利(第三国是意大利)在许多方面很不相配。哈布斯堡王朝与霍亨索伦王朝相抗衡的一个世纪在 1866 年拉开了距离，此后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增长使这一距离变得更大。在俾斯麦时期这种差距并不影响大局，但到了他的继任者时期，德国人开始驱使奥地利人。尽管越来越艰难，俾斯麦仍尽力维护与俄国和奥地利的友好关系，直到 1887 年三皇同盟仍得以维持，便是他努力的结果。俾相尽其所能确保和平绝不是无足轻重的鸡毛小事，但他也不能长期地压制俄奥之间的对抗。不过，在《三皇同盟条约》终止之后，他仍通过签订德俄《再保险条约》保持与圣彼得堡的关系。当 1890 年辞去首相职务时，他感觉到这种关系将很难持续。是年 6 月该条约终止，他的继任者无意续订。

他的继任者缺少他的才能和卓识，但却面临比他更复杂的国内形势。新的利益攸关者纷纷表达自己的要求。国内形势的变化开始溢出国门，这不仅仅归咎于活力四射的威廉二世，即使是俾斯麦也在晚年诉

465

诸殖民扩张以转嫁国内的不安情绪，尽管他能将殖民事业从属于德国的欧洲政策。他也逐步意识到欧洲政策与其工业强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工业强国要求向全球推行冒险事业，要求向东欧迈进。一旦他辞职之后，这些要求便有了得以兑现的广阔的空间。所以怀抱扩张志向的新任德皇现在不必理会国家的前任首脑了，他相信他拥有绝对的权力。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在加速抛却前 20 年谨慎的外交政策，但是，尽管德国的国际影响不可估量，这 10 年里欧洲国际关系结构最重要的变化却与德国无关。这个变化就是法国从 1891 年起经过三年努力终于与俄国结盟，从而结束了孤立状态。对许多法国人和一些俄国人来说，法俄结盟实现了他们的夙愿。同时，这两个国家与英国的关系相处起来也变得容易。起初，他们与不列颠在许多地区都有摩擦和冲突。俄英在中亚、中国和伊朗有争端，法英在暹罗、西非特别是在埃及有纠纷。但是，他们却是怀着各自的目的修复彼此的良性关系。法国人是为了获得一个反击德国进攻的保障性措施，俄国人关切的是如何能够经由土耳其海峡走出黑海，英国人仍将土耳其海峡视为军事重地，禁止俄国军舰通行。1891 年，法国首先承诺在外交上支持俄国对抗英国，并达成协议：两国任何一方若遭到第三方国家的入侵，则采取一致的抵抗行动。翌年，两国又达成了一项有利于法国的军事公约，但没有正式生效，直到 1894 年开年的第一周这个协议才付诸实施（由于法国内政的关系该协议仅作为一个军事协定而不是一个条约）。双方达成的协议完全是为了针对三国同盟：若法国遭到德国的攻击，俄国应援助法国；若俄国遭到德国或者由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的攻击，法国应援助俄国（倘俄国单独受奥匈帝国的攻击，法国将无此义务）。由于走漏了这个协约的部分内容，德国人就认为德法两国必有一战，所以它的战略计划就是率先与法国决战——这是其战略的基点。

19 世纪 90 年代开局，英德关系还蛮好，两国曾为解决许多有关殖民地争端的棘手问题签订了协议。王室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至少从英国这边看）延续对新政权的友好政策（俾斯麦对温莎王室没有好感，也厌恶英国王室对德国的干涉）。不幸的是，王室间和睦的关系在波茨坦

466

遭到破坏。"世界政策"的提出及其炮制过程中的误解与曲解,再加上皇帝威廉二世的秉性,都加深了柏林的紧张气氛。1896 年,英国冒险家的一次愚蠢行动(即詹姆森袭击德兰士瓦共和国)促使德国人以果敢姿态支持布尔人(所谓"克留格尔电报")。此外,法俄两国对英德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忧虑,德国政治家致力于维护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三角关系的失败,两种因素促使法俄同盟的建立。

不过,法俄同盟的影响没有马上显现出来。19 世纪的最后五年俄奥关系修复,这两个老对手在巴尔干问题上签订协约也有了可能。英国要处理在全球许多地区特别是与法国和俄国的争端。尽管这几个国家有可能走到战争的边缘,但英国依然延续了"光辉孤立"的政策,这是它外交政策的基点。不列颠遇到的不间断的帝国冲突掩盖了法俄同盟带来的欧洲进一步分裂为两大阵营的事实。然而,英国政府却埋头清算外交上的争端,显然它与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争端更多一些。90 年代中期,奥斯曼帝国曾屠杀境内亚美尼亚的基督徒,英国政府对屠杀事件不以为意,却触怒了英国公众(在其他国家未见此反应)。不得已英国政府干涉这一事件,结果碰了钉子。随后英政府作出一个战略决定:为维护通往印度道路的畅通,在埃及驻军保护苏伊士运河的安全成为必要,从而放弃支持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海峡的势力。

显然,这个举措减少了与俄国发生冲突的机会,另一方面它提高了英国人对埃及战略地位的警觉,在那里,从 80 年代早期以来英法之间的争夺就不断发生。法国政府不愿与英国政府合作,致使英国人在控制埃及政权上取得了优势。法国人的回应是赶在英国人之前控制非洲中部和尼罗河上游地区。1896 年,一支英国和埃及联军沿着尼罗河向南推进,进入苏丹。1898 年,联军在恩图曼(Omdurman)进攻苏丹领袖迈赫迪率领的穆斯林军队。之后,一小股远征军继续循着尼罗河谷前进,希望能与另一股来自乌干达的英军会师。结果他们在法绍达(Fashoda)看到随风飘扬的法国远征军旗帜。英国人声称法绍达是埃及人的领土,拒绝与法国人谈判,直至法国人撤军。尽管英法之间有发动战争的危险,俄国人并没有支持法国人。法国人在法绍达撤军之后

467

不再声称拥有对尼罗河地区的权利。然而,巴黎的仇英情绪又加深了。

1899 年发动的布尔战争让英国有利有弊的“光荣孤立”政策陷入了窘境。一方面,它的行为被所有大国视为惨绝人寰;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时的战略目标,它又无所顾忌。像法绍达危机一样,布尔战争显示,无论战场在哪(除了西半球以外),只要英国的海军能够到达,英国人就可以像在帝国内部和殖民地一样处理任何事件,对于那些利益集团来说,只要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做这些事情不过是弹指一挥而已。

当 19 世纪结束时,欧洲的大国仍可以考虑维持和平。至少,避免在巴尔干发生冲突的前景依然像最后五年那样明朗。俄国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远东而不是这里。1895 年,贯穿西伯利亚到达贝加尔湖的铁路铺设完毕。也是在这一年,它发现为了阻止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胜利后攫取过多利益很容易与德法保持一致,之所以如此,法国是为了能在对东南亚的政策上得到两国的支持,而德国的目的是获得国际声望以及获取在中国采矿的权利。一些欧洲的政治家开始盘算如何和平地瓜分中国,并希望未来任何的战利品都能够友好地分配。看来,欧洲的前景未必不光明。

第五卷

20 世纪的欧洲：欧洲内战时代

469

“欧洲”是一个类似于“亚洲”或“非洲”的术语——或者，就此而言，以不同的层次审视，如“博洛尼亚”和“伯恩茅斯”一样——由那些出于特殊原因而谈论它的人来定义，有时，这是出于政治研究，有时又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欧洲”指的是发生了特定事情的某一部分世界，但这无法以一种方式来精确定义。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或者一个拥有永久内容的集体品格；它指有着共同经验的地方。虽然如此，本书已经唤起了对某些事实的注意，即在欧洲生活的一些人中(无论被如何特殊地定义)在某些时代同样意识到他们共享着一些经历(我们可以选择性地称其为“欧洲的”)。这在最近几个世纪内尤为明显。或许到 1900 年为止，他们中的大部分能够意识到他们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不同。他们中的一小部分能够略微感觉到，其祖先的共同经历和奋斗使得他们兴盛起来，这是尤为让人满意的。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不用回溯得太久远)，能够在实际上看到欧洲集体的和个体权力的增长。这有时由于它的表现方式而被忽视了。尽管如此，个人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力量，比如，通过他们居住区的管道供水，以及打开煤气开关甚至是电开关的能力来获得，就像他们的统治者通过分红和战舰所获得的道理一样。许多欧洲人在 1900 年已经开始享有物质特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居民还对此闻所未闻。一些欧洲人在管理公众事务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使得他们能在一起和平共处；总之，30 年间都没有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而且的确整个 19 世纪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用比喻的手法来说，这种自信的基础被后来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两次欧洲战争驱散了。将它们称做“内战”是另一个比喻，

470

但其缺陷可以被轻易地认识和理解。对处在世界的某一特定区域的、早已自主处理当地紧张不安的独立体系来说，上述描述引起了对其瓦解趋势的关注。它们至少证明了这一能力不再存在。欧洲陷入了内部冲突，尽管如此，这也是它的人民所共同经历的。正因为不断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冲突变得空前巨大和残忍。战争摧毁了人们对日积月累的信念的信仰，并戳穿了支撑以往成功的幻觉。到 1945 年，欧洲从他们的废墟上观察着一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他们再也不能发挥自己之前的作用，那些都已不复存在。可以说，欧洲历史作为一个可辨识的和独立的进程已经结束了。

第二十二章　压力和张力

471

变动世界中的欧洲认同

1900 年,欧洲世界与其他地方——一方面与欧洲的海外领地,另一方面与非欧世界——的裂痕在许多方面都比之前任何时候要大。欧洲人从未对其他文明和文化有如此之多的了解,以至无论何时想到这些文明的时候都可以区分他们的不同。他们认为异族文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他们。在物质生活和期望值上的差异可能会比以后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尽管这很难得到完全的确定。然而,欧洲方式的侵蚀性力量已经开始侵入亚洲和非洲数百万人的生活,就像欧洲力量已经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遭遇一样。

并不是所有爱思考的欧洲人都是自信或自满的,即使很多人(并非只是他们中那些不善思考的人)是这样。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欧洲文明内部的压力和张力的迹象开始显现,即使这些迹象并未在社会(这些社会仍然有着公开的信心,充满着进取意识)上引起广泛关注。在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的世界及其自身的历史中,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洋洋自得和自我陶醉的。在他们眼中,他们是"文明世界"的核心,这个定义不清的概念混合了基督教王国的回忆、关于欧洲血统(不管事实上他们的差异有多大)优越性的种族观念、共有的历史经历和神话,以及相似

的制度和思想。当然,他们通过许多方式进行了自我划分,最基本的方式是民族和国家。一些组织的范围超越了欧洲国家的边界——欧洲邮政联盟、斯堪的纳维亚或拉丁货币联盟,这些都是协商和便利的产物,就像那些管理大河,或管理欧洲在欧洲以外的利益的国际团体。只有少数的狂热者偶尔会思索德意志联邦或瑞士联邦或将成为将来全欧联盟的范例。然而,主观地说,如果含糊地讲,"欧洲"在 1900 年时是个含糊却熟悉的概念。

472 随着下一个世纪亚洲、非洲和南美洲死亡率的降低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欧洲占世界人口的巨大份额急剧减少。长远的视角在这里是有益的。虽然欧洲的人口持续显著增长,但世界人口在 20 世纪初至 1990 年之间已经增长了两倍。1950 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 25 亿,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翻了两倍多,超过了 50 亿。欧洲人口在这一庞大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在 19 世纪末仅为九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之间,而在 1900 年,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之间。

欧洲人口的增长率在 1900 年已经开始显现出减缓的趋势,在主要的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它们已经展示出通过思想教育控制家庭规模的成果。19 世纪已经首先为较富裕的家庭,接着为比较贫困的家庭提供更好的设备和技术来补充传统的避孕知识(或迷信)。随着这些措施的广泛采用,它们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将会在将来变得重大,其作用远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口数量。紧随其后的是平均寿命的增长,以及日益增长的阶级间,甚至更为重要的性别间的平均寿命的差异。

重要的地区间差异已经很多。1900 年,地中海和东欧地区很难表现出新的人口趋势。那时,它们迅速增长的人口已经比北欧和西欧的人口稍显年轻——当然,虽然他们相应地有着比今天更多的年轻的人。由此造成的压力一部分由移民的迁移而得到缓解。

1914 年之前的那些年里,欧洲人口向海外的输出是空前的;即使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许多人仍然追随他们的步伐,尤其是到美洲去。接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美国入境的严格的法律限制),使得这一潮流逐步减退,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

即使在那时，依然有欧洲移民，尤其是去往法属北非和英国海外领地（当意大利政府试图殖民于其非洲帝国的努力明显失败后）的移民，以及德国犹太人的移民活动。1945年以后，这一模式再次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自身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大增加；而这也将刺激不久之后向欧洲移民的新现象，尤其是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去往英国）、北非（去往法国）、亚洲（去往英国和荷兰）以及土耳其（去往德国）的移民。这一现象很快给那些接收移民的"东道主"国造成了明显的紧张局势；它也被认为煽起了对不同大洲人口数量的平衡问题的重新关注。在1988年列出的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前10位国家中，只有一个"欧洲"国家榜上有名，那就是苏联——而它拥有庞大的非欧人口。已经使得欧洲死亡率降低的那些动因正开始在亚洲和美洲发挥作用。

19世纪，人口过剩的马尔萨斯危机对欧洲人来说已经不再可怕。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交通运输的改善，除了个别特别贫困的国家之外，在其他所有地区，饥荒已成为临时的、偶发的灾难。这也使得欧洲在享受其短期内创造的世界已知的最快增长的财富的同时，可以将马尔萨斯的警告抛诸脑后。

473

在大多数国家，增长的人口带来了更迅速增加的产量；例如，1871至1900年之间，德国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但其生铁的产量却翻了六番。1900年，几乎没有人怀疑经济会持续增长下去，不管将会遇到什么问题。新能源被广泛发掘：石油和电力已经加入了传统的能源如煤炭、木头、风力和水力资源的行列中。一个世纪之前甚至都无法想象的化学工业已经存在。铁路、有轨电车、汽船、汽车和自行车为数百万人的出行提供了新的可能；这是交通资源自几千年前动物被套上缰绳用以驾车以来最大的革新。1900年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的人，在消费领域，甚至是健康领域他们能得到的服务，都比一个世纪之前的祖先要好得多。如果说这些进步依然与一些人擦肩而过，比如说俄国和安达卢西亚的农民（虽然对这些分类的概括很难得到明确表达），但是，能够惠及整个欧洲的繁荣的关键似乎终于被找到了。

尽管有如此欢欣的局面，质疑声仍然不期而遇。获得新财富所付

出的代价,以及对这些财富如何分配的社会公正性的抗议,都是非常麻烦的问题。以今天的标准来看,1900 年,大部分的欧洲人仍是非常贫穷的。如果他们生活在富裕国家,那么这种不协调会被认为比早期更加难以接受。在社会有如此明显的力量去创造财富的情况下,忍受贫穷甚至目睹贫穷变得更加痛苦。一些众所期待的转变已经开始了,而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其他的转变。当男人(以及一小部分女人)思考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谋生能力的时候,更大的疑惑出现了。有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失业了,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前所未闻的是,繁荣和衰退中的不可捉摸的力量能够在突然间夺走一个大城市中数百万人的工作。这就是"失业",这个发明于 19 世纪的词语似乎就是专门为这一新现象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能力的必然产物。

特权和民主

这些不安全因素给那些饱受 19 世纪革命威胁的欧洲统治阶级带来困扰。这些统治阶级的构成和特性由于国别的不同而不同。瑞士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容克地主差异很大。但是,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的组成中的一大部分是来自基于血缘和贵族地位的古老的世袭阶层,以及富豪集团或职业的代表。这反映了社会习俗的巨大不同和统治精英内部的许多差异。他们中一些人的行为仍然受到在今天看来很奇怪的习俗的支配。即使在最为发达的国家,土地在维持财富收入上依然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然而,当这些事实都被给予了应得的重视后,我们却只能保守地给出乏味的总结,即 1900 年的欧洲由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所统治。

474

这并没有告诉我们非常多的有助于着眼于任何国家的细节。欧洲的某些地区的统治阶级依旧生活在前 19 世纪而非前 20 世纪的精神世界中,虽然这些地区可能很容易通过铁路到达。在这一领域内的一个极端便是: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准家长制的关系和土地领主对生活在其领地上的人的传统权力依旧未受损害。这些社会仍然盛产贵族保

守党,在精神上他们不仅反对对他们物质特权的侵犯,还反对被称做"市场社会"的价值观念。另一些如此极端的例子能够在不列颠联合王国找到,那里的贵族早已习惯了这一观念,即法律面前有平等的权力,不管社会和经济权力以及地主的现实情况如何,虽然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依旧在一旁发挥其作用,甚至通过民主选举制度,与商人、银行家甚至一小部分工会主义者分享权力。

欧洲任何地方的统治阶级都会赞同的一个准则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间的差异对于某些特定目的(主要是社会目的)来说是重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逐渐模糊,在很大程度上,西欧保守主义思想在 20 世纪早期狭隘化,并越来越退回到对资本的保护上,当然,这一定位在半个世纪前的许多地方都由于其个人主义倾向而被认为是激进的自由主义。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工业保守主义——越来越尽力地反对自身,它表明了与财富的冲突,随着国家在管理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种冲突日益加剧(1911 年,英国上院的世袭权力试图抑制下院的选举而最终失败,这一危机导致了 1688 年宪章的遗存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这样,到 1914 年,即使是法国也接受了所得税的原则(虽然并没有实际征收)。

这些让步是政治民主化的逻辑的一部分。到 1914 年,法国、德国和一些小的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成年男子全民选举权;英国和意大利也有足够多的选民以接近这一标准。结果,许多富人感到恐惧,认为这预示着劫掠和社会革命即将来临。自由主义和民主带来的收益是带有凶兆的;进而,更加激进的威胁性发展可能会需要抵抗,必要的情况下,甚至需要使用暴力。

政治和社会中的女性

475

也许是出于心理因素,一个政治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它与一个不可抗拒的逻辑一同出现,这一逻辑产生自欧洲的民主发展进程之中,并给这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带来了困扰。这一问题是:如果男人可以,那么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参与国家政治呢?这一议题在许多国家的另一个

30 年中依旧悬而未决。它已经在英国政治中引起了骚动,但这只是欧洲妇女对其社会角色的新主张的最公开的体现,它同样表现在关于妇女的教育、工作和法律地位的争论中。政治权利仅仅是大量问题中的一部分。

欧洲文明的总体偏见(和其余在它之前的文明中所包含的偏见一样)是由男人的利益和价值以其压倒性的优势决定的。然而,在欧洲,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对妇女的传统角色产生真正的质疑。妇女受教育、工作、掌握自己的财产、精神独立甚至穿更舒适的衣服的权利,随着 19 世纪时间的推移而备受争议。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被解读为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这取代了作者的本意:为个人独立辩护)。从那时起,一场真正的革命开始了。欧洲和北美妇女的要求威胁了已经被熟悉和接受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观念和态度。这些要求激起了复杂的情感,因为它们曾和根深蒂固的关于家庭和性别的观念紧密相连。正因为如此,一些人(男人和女人)更为它们所困扰,其程度甚至比社会革命和政治民主的威胁还要深。的确,他们将感受到一股真正的、拥有世界性影响的革命力量。在早期欧洲和北美女权主义运动中埋藏着的这些种子,其爆炸性的内容不久将被传播到其他的文化和文明中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妇女的政治化,甚至其对法律和制度结构(她们认为是压制性的)所造成的成功的政治冲击,给大多数妇女带来的影响远比其他改变要小得多。有三个缓慢发展的变化,但最终却对腐蚀固有的产生了巨大作用。第一个是先进的工业经济的增长和经营。到 1914 年,这在一些国家已经创造了大量新的女性的工作——如打字员、秘书、接线员、工人、百货商店售货员以及教师。这些在一个世纪之前几乎都不存在。它们给妇女带来了经济能力重大的实质性的转变:如果她们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那么她们将会踏上一条最终将通向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角色的道路。矛盾的是,20 世纪工业社会的战争需求会加速这一进程,因为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妇女们的就业范围更大。甚至到 1900 年,对于越来越多的女孩和妇女来说,在工业或商业领域的工作已经意味着一个机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她们脱离父母管

束或逃脱婚姻这一"苦差事"所造成的困境。到1914年,并不是大多数妇女都获益颇多,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正在进行中,因为这些发展将会刺激其他的需求,如对教育和对职业培训的需求。 476

避孕是转变妇女生活的第二个重要力量。同样,到1914年,避孕尚未展示出其全部的潜能,甚至还没有新的工作机会所展示出的潜能多。尽管如此,它已经开始影响欧洲的人口。未来的前景将是人们观念上的革命,例如更多的妇女会吸收这一思想,即她们可以控制其生育和抚养孩子的需求,这些需求从古至今一直主导并组成着她们的生活。在这之上的是另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直到1914年才开始显现,一些妇女逐渐发现她们不必迈进长达一生的婚姻责任中也可以追求性满足。

第三个大的趋势将妇女们从古老的方式和设想中解脱出来,这一过程细微但却无法抵抗。很难给它一个独特而显眼的名称,但如果说有一种力量控制着它,那么就是科技。许多发明(其中一些在1900年之前已经缓慢积累了好几十年)的总体趋势打破了家庭日常生活和艰苦劳动的残酷的时间表,并且在这之后依旧在滚滚浪潮中继续发展。自来水、暖气和燃气的出现是第一批例子;电力的清洁性和灵活性带来了更多明显的影响。更好的商店是零售分销领域的突变的先头部队,它不仅给人们以不同于"富裕"的"奢华"的概念,还使得日常的需要更容易被满足。经过更好加工和保藏的进口食物慢慢地改变了家庭以往的日常备办食物的习惯——就像今天在亚洲和非洲的习惯——每天(或两三天)去一次市场。虽然在1900年,清洁剂的世界和更易洗涤的人造纤维尚未出现,但肥皂和洗涤碱已经可以轻易且廉价地购买到,同时第一批家用电器——煤气炉、吸尘器、洗衣机——已经出现了,至少是在富裕的家庭里。历史学家们能够立刻意识到在早期马镫或机床引入的重要性,却奇怪地忽略了这些如此温和的动力所产生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它们意味着一场革命。很容易理解,在这个世纪初期,它们的长期意义所引起的兴趣要比"妇女参政论者"(在英国对想要参选的妇女的称呼)这一滑稽的东西所引起的少得多。对她们这些通常是暴力

活动的一个直接的刺激是政治制度的明显的民主化，这使得更多的男人受益。这是她们的竞选所预设的背景。从逻辑上说，跨越性别的边界来追求民主的确有其基础，即使它意味着选民规模将会翻上一番。但是，在1914年，芬兰和挪威是仅有的妇女在国家选举中有投票权的欧洲国家。

477

大众社会的政治

选举权和正式且法定的代表机构并不是政治获得越来越多的"大众"或民主特性的全部方式。民众必须被组织起来。到1900年，已经出现现代政治党派以迎合这一需求，它们为了竞选而将议题进行简单化，为了传播政治意识而设置了一些机构，并设立了为其特殊利益服务的教化手段。党派政治的观念、话语和制度从欧洲和美国扩散到全世界。旧式的政治家谴责政党的大众化形式，这绝不是不怀好意的，因为它带来了公共舆论的腐败，并且需要传统的精英们的政治适应路人的方式。

19世纪对公众舆论的新发现就已经含蓄地体现出变化的开端。在英国发生的反对《玉米法案》的斗争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870年，拿破仑三世发现他无法抵抗人民对一场他所惧怕(也将会输掉)的战争的呼声。即使是俾斯麦这一标准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到最后也发现他必须给公众舆论让路。由于读写能力的广泛传播，公众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被操纵(至少报纸的业主和政治家相信如此)。人们强烈建议，为了适当地使用选举权而教化民众的大众教育的投资是必要的，但是，最为明显的后果之一似乎是出现了一种迎合情绪主义和哗众取宠效应的新型的廉价印刷品，以及给广告活动(19世纪的另一项发明)的设计者创立了一个机会。20世纪早期，英国的《每日邮报》和法国的《小巴黎人报》的发行量都超过了100万。

尽管如此，1914年，欧洲只有两个国家的制度既民主又共和，它们是法国和瑞士。其他地方(一些古怪的僵化地区除外，如安道尔和圣马力诺)，世袭王朝依然是国家的主要制度形式，有时甚至是在有着广泛

的公民权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是民主制度的国家。最晚到1914年，一个新的国家(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君主政体，如果从其诞生于奥斯曼的遗产之上来考虑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一致性掩盖了许多差异；几乎没有君主对这一制度持如爱德华七世一样的坚信态度，他对它的尊敬已经扩展到南太平洋的海军将领，然而，至少德国的皇帝认为英国的君主政体一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政体。广泛地说，在两种君主制国家之间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是君主立宪制度，英国是其显著代表。其余的可以在以下国家中看到，如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19世纪一些巴尔干的新建立的国家，最为古老的是新建立的希腊。在这个分组中，权力的现实在很多方面是有差异的，无论正式的宪法协议是什么。在这些新建国家中(尤其在巴尔干地区)有一些例子在这一类型上毫无前途。尽管如此，君主立宪制在1900年仍是一个成功的、可辨识的以及被公认的欧洲现实。

478

另一种主要的君主制形式依旧最好被称为王朝制。当联姻连接的网络将君主立宪制政体和仍能在它的朝廷之上见到的旧式态度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国家和社会利益从属于统治家族长期利益的这一关系在三个主要的多民族帝国中显现出来，不同的是，有两个帝国的表现更为明显，而第三个帝国则更为模糊不清。哈布斯堡帝国(二元制帝国)和罗曼诺夫俄国能够清晰地体现王朝原则。在霍亨佐伦德国，许多谄媚堆积在皇帝身上，其权力自身也是各种修辞夸张的对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夸张)，但是，威廉二世是一个立宪制和封建制王朝的合法元首，他的国家由有着自身利益和统治者的邦国组成。然而现实是，德意志帝国由普鲁士主导，而普鲁士的实际统治者是普鲁士贵族。君主制的普鲁士国内的现实是——虽然所有人都焚香敬拜“战神”(就像威廉二世喜欢称呼他自己的那样)——他不能超出普鲁士统治阶级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外(对于这一紧张关系之可能性的一个例子是，在腓特烈三世的三个月的短暂统治时期，他的早逝使得某些害怕他可能采取行动的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这三个君主国家中，君主的个性和气质似乎

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他的能力或无能。

因而,政治上不同的两个欧洲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组成其国家所基于的设想。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也少有其他君主)能够如威廉二世一样将其表达出来,他在一封写给他侄子沙皇的私人信件中所说:“民主的国家被议会里的多数派统治,正好与君主制国家相悖”[①],但是,即使在这样偏激的误解中,仍然存在一丝真理。人人都知道君主的力量在这三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分量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重。但是,几乎在所有地方,“民主的”和“民主”这些字眼仍然能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他们仍旧被世袭贵族和公社的美好回忆所主导,甚至一些英国人在举杯为印度的“万王之王”祝福的时候都会因获得其效忠而兴奋的战栗。

社会恐惧

到 1900 年,西欧人大多数是城镇居民。到 1914 年,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城市已超过 140 座。他们的生活远未摆脱不幸,这些不幸给早期工业社会的观察家和批评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数百万人的住宿条件恶劣,无法呼吸到新鲜空气,更不用提教育和娱乐(除了街道上的那些),虽然有些时候,从他们的努力所创造出的财富的角度去看,他们是成功的。“贫民窟”(这是一个在 19 世纪由于人们感觉到的需要而创造出的一个词)经常引发恐惧。它滋生了一个对城市不信任的长期传统,因为城市被认为是犯罪活动、歹徒及革命的中心。当然,对其他人来说,这也带来了希望:城市似乎对不满的气氛富有刺激性,以致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对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的革命将势必会发生。最终事实证明,这种乐观和革命性的思想和保守派沮丧的预言一样夸张。尽管骚乱令人担忧地爆发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里,革命(哪怕仅是暴动)成功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小。

479

可以认为,俄国是强国里一个特殊的例子,虽然它的地方性的社会

① 《德皇给沙皇的信,威廉和尼古拉斯的通信》(1903 年 11 月 19 日),N. F. 格兰特编,伦敦:1920 年,第 98—99 页。

骚乱通常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尽管俄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欧洲范围的发展中,但它在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都落后一步。19 世纪的行政和政府改革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其专制统治。一个后果就是它无力扼杀持续的革命运动,却导致了大量恐怖分子的产生(虽然目标不同),他们刺杀了政府官员以及一位沙皇。农村的剧变使破坏性的威胁持续升级;20 世纪初期,袭击地主及其警卫的运动达到了高峰。1904 年和 1905 年,紧跟在农村骚乱之后的是由于日俄战争战败而导致的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动摇,其结果就是以城市为基础的抵抗第一次引发了革命。这迫使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出了更多的、更为实质的特许权。尽管如此,它们仍未触动专制政治的原则。

在较西面的意大利也是同样,在一些人看来,它似乎不包含任何革命的因素,无论是在 1898 年当大炮 50 年来第一次在米兰的大街上开火,还是另一次在 1914 年的“红色周”,一些地方当局(意大利采取了法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体系)暂时脱离了罗马的控制。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巴塞罗那在 1909 年爆发了流血的街斗(被称为“悲惨的一周”的一部分而载入西班牙左翼的史册;或许,这些名称说出了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性情的不同——或者甚至是结果的不同)。其他地方也是同样,罢工和示威游行经常是暴力的。在战争前 10 年,法国多次调动士兵镇压产业工人的骚乱(共和国未来的救星克列孟梭正是由于 1908 年第一次当选总统时作为罢工破坏者而声名狼藉),即使是在英国,1914 年之前骚乱中的暴力死亡也不是没有耳闻。当时,公众想象力继续被无政府主义者深化,19 世纪 90 年代他们用投弹轰炸和暗杀为自己赢得了公众的注意力。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有共同的目标,但是他们都是最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都对整个社会表示抗议(他们认为它的本质是不公正的),而不仅仅是抗议某些国家的政府结构。 480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然而,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宣传和辞藻更加让资产阶级害怕。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看起来非常成功,即使不是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工人

阶级组织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这些组织旨在通过选举进行政治斗争,通过工会引导产业工人斗争。1871 年之后,到约 1950 年之前,社会主义(无论其定义如何宽松)长期地支配着左翼文化;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集体主义的、平均主义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分配解决方法)逐渐为相信并想逐步实现社会进步和改善的人所接受,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样,几乎在任何地方,社会主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形式,开始变为稀释的或纯粹的(关于其解释有许多争论)。重要的可选择的传统仅存在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那里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的工联主义在适合的环境中繁荣发展),此外,尤其是英国,那里早期呈现出合法且人数众多的贸易联盟运动,并通过建立政党和政治程序而达到变革,它们的可能性造就了有效的非革命性的激进主义。

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彼此充满敌意的成见一度左右着社会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形式上的胜利表现为 1896 年"第二国际"(为了协调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于七年前建立)将无政府主义驱逐出去,后者到那时为止仍一直从属于它。四年之后,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办事机构。在第二国际领导的运动中,德国的人员、财产和信条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由于德国的迅速工业化,尽管有警方的迫害,社会民主党仍然发展起来,到 1900 年成为德国政治的一个既成现实,成为其第一个真正的民众党派。单从人员和财产来看,马克思主义(德国政党的官方信条)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官方信条。

然而,尽管它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中引起了这些恐惧,一些明智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注意到:大约 1880 年之后的事实并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神话和话语的显著例证。显然,许多人开始享受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制度在其自身复杂度上的演化,并非像马克思主义预言的那样简单化和强化了阶级冲突。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对工人阶级也有用;尤其在德国和英国,重要的法定利益正是通过议会实现的。在等待革命到来的时候,选举是一些社会主义者无法忽视的武器。这导致了为了将这些趋势考虑进去而重新诠释官方的马克思主义

481

的尝试;他们被称做“修正主义”。广义上来说,修正主义者主张通过非暴力斗争来实现社会的转型,这是进步的。如果人们乐意称呼到来的“社会转型”为“革命”的话,那么就仅仅是一个关于用法的争论了。在这种理论的姿态及其引发的冲突内部,蕴含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纪末成为首要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应不应该做“资本主义”政府的大臣?

这一争论持续了许多年。结果就是,在国家政党——尤其是德国政党——继续实践着修正主义,为适应现存的制度而做努力的情况下,第二国际对修正主义进行明确的谴责。他们的辞藻仍然是关于革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甚至希望,如果战争爆发,应征士兵会拒绝为资本主义政府战斗。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俄国政党的多数派,继续强烈谴责修正主义;它无疑认识到了俄国状况的特质——有效的议会活动机会极微,以及根深蒂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传统。它被称做布尔什维克,俄语里是“多数派”的意思。

欧洲公共生活中的宗教

迄至 1900 年,基督教久已丧失其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暴力的潜在遏制力量的权威地位。在欧洲统治者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由宗教信仰或联盟引起的克制从未发挥决定性或持续的控制作用;即使是将希望寄予这样一个抑制手段的做法,到 1900 年在实质上也不复存在了。基督教王国的概念不再包含任何政治内容。19 世纪,宗教就仅能起到对冲突的缓和或减轻作用,甚至有时起到了煽动的作用;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甚至是福音派的英国人)都更容易被煽动去反对屠杀基督徒的土耳其人。

1882 年,德国先知和预言式的哲学家尼采已经宣布“上帝死了”:他说,宗教信仰已经不再适合聪明的人类,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化中心的灵肉二元论也不再维持了。不管这是否是真的,如果它是,那么其原因是宗教信仰的普遍丧失,还是因为宗教被认为也许能暗示什么或要求什么这一观点的不断变化,这是一个更难阐明的问题。1900 年,仍

有非常多的欧洲人定期参加宗教礼拜,大多数人去基督教堂和礼拜堂。很难辨别这对教会组织的实际力量意味着什么。19世纪末期,他们的权力显然已今非昔比,无论人们感到赞成还是遗憾。50年前,查尔斯·狄更斯已经指出,并不是焦煤镇的工人填满了它的教堂和礼拜堂。482 然而,许多欧洲人仍然保留他们信念中和《圣经》叙述中的简单和朴素的信仰,即便其他人对牧师的权威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质疑,进行越来越激烈的争辩。欧洲精英阶层的确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威胁并挑战传统信仰。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坚持具有普遍的反宗教和怀疑论本质的伏尔泰式的观点。19世纪他们见证了其他腐蚀信仰的观念的影响力,最初,只有这些精英关心这些观念,但随着廉价的印刷品和大众文学的传播,它们逐渐有了范围更广的受众。

大多数已经建立的教堂都受到了这种智力竞争的影响。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受到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在许多国家,后者被尴尬地卷入政治当中。由于对国家主权的有意识的敬意,司法、财政和教育问题新近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们引导政治家们去抨击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久已被接受的特殊关系。同样,随着这个世纪的发展,罗马教廷对于人们对这个时代的轻信问题提出了日益增长的意识形态的和智力的要求。像其他的教会一样(尽管有少量革新成功的例子如救世军),它看起来不可能再开发出新的装备(比如大批量发行的报纸)来帮助它。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罗马天主教断然宣布它对这些进步的不信任。

利奥十三(他于1878年继承了庇护九世)年代,在一些国家,罗马教会的政治地位有所改善,然而,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反教权主义和戏谑牧师的行为持续上演,而政府不断蚕食教会先前统治的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争吵滋生了不妥协。在法国,最终的结果是旧的宗派协约的终止和1905年的政教分离(更进一步的结果是激起了法国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划分)。另一方面,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关系在庇护十世时期得到改善。冲突还导致了这种观念的产生:无论从罗马教会的教条取出何种观念,它仍旧可以在笃信的人中获取大量忠诚。更何况,它仍通过海外传教招募新的信徒,在那里,他们很快就会入教,

而随着人口的发展趋势,这群人也会不断增多。虽然教会无法在欧洲新的城市定居者中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他们还未接触不适当的传教机器,未被他们沉浸其中的世俗文化缓慢玷污从而异教化,它还远不到濒死的时候(就像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那样),更不用说灭亡了。的确,将教皇从他现世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会使更多教徒更容易体会到对天主教的坚定无比的忠诚。

发展中的智力

我们已经讨论过,逐渐损坏大众对传统宗教的支持最为有效(虽然通常是间接的)的力量之一便是科学,虽然它的作用很难被确切衡量。483 到 1914 年,科学的应用比以往更为明显。无线电报可以穿越大西洋送达,无需依靠气袋支持的飞行器(飞机)变得十分普遍,汽油发动的汽车是城市街道上十分常见的事物,至少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对麻醉学、蒸汽涡轮、更坚硬和专业的钢铁、电话以及其他更多甚至在半个世纪之前都不存在的奇迹感到习以为常。通过电车和火车、工厂里的电力发动机以及出现在街道上和家里的电灯,廉价的电力改变着城市的布局和活动。甚至动物的数量也受到了影响:1900 年,英国有 3.6 万匹马来拉煤车,到 1914 年只有 900 匹。大多数这些变化最终归功于科学的实际应用。然而从 17 世纪开始,从未有这样明显的来自科学活动的科技扩散,科技长期被局限于弹道发射学、航海和绘制地图、农业以及一些初级的工业生产方法之上。到 20 世纪,人们很难想象离开了科学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虽然在工程学和制造业方面,人们对科学的敬意通常成比例地增长以至达到惊人的程度,但基础科学仍取得了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进步。医学领域很容易取得了一些成效。虽然 1914 年的欧洲医学在今天看来还十分原始,但是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防腐剂和麻醉剂已被引入临床(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即为宣传新型医学手段的先锋),公主或王子出生过程中麻醉剂的使用有助于赢得社会的认同。药理学也有了很大发展,例如 1909 年撒尔佛散的发现,

是传染病个别治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病理学家识别了疟疾的携带者,X 射线被发现并在随后被引入医学临床中。

然而,矛盾的是,到 1914 年为止,科学不仅由于其对自然的日益增长的掌控而有助于增强一个文明的信心,也促成了一种不明确的紧张的感觉。科学在以下两方面不断发挥其作用,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的掌控程度的不断增强,文明的自信心不断地增长,另一方面是一种模糊的紧张感。毫无疑问,这些作用在传统宗教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它也作用于经常受其发现鼓舞的决定论上,或是受到人类学和对人类思想的研究影响的相对论上。科学本身将会削弱对客观性和合理性价值观念的信心,而这些价值观念对科学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到 1914 年为止,已经有迹象表明,自由、理性且启蒙的欧洲和一个传统、宗教而保守的欧洲处于同样大的压力之中。一些人发现,已经很难确信有绝对价值之类的东西的存在。尽管如此,在变化方面,对于大多数人,这在他们的头脑中意味着什么还很难说。

484

欧洲世界霸权的裂缝

20 世纪初,在一些欧洲圈内和流行媒体上有一些关于“黄祸”的论调,它的起源似乎在中国或日本。同时,更为严格的,其他的圈内也有熙熙攘攘的感谢声,因为对日本绘画或非洲雕塑的认识和乐趣刺激了欧洲艺术,并使其形式多样。1900 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一个主要吸引力,是向法国人揭示了其殖民帝国的多样异域珍宝和多种多样的民族。尽管如此(关于对非欧世界印象的相同接受能力,还有许多例子,无论这些印象是险恶的还是令人愉快的),这些不断增长的意识几乎没有达到普遍恐惧、迅速增长的危机意识、非欧世界来的挑战或竞争或是欧洲与非欧世界的关系的根本变化这样的程度。威胁性变化的迹象和萌芽都已显现,但是它们看起来太过微小。

大部分非欧世界已被欧洲人或有欧洲血统的人控制的傀儡完全地统治着。即使在 1898 年,西班牙这一最古老的强大帝国丢掉了它最后一块主要的殖民地,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一情况依旧是符合这一命题

的——美国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源自欧洲的跨大西洋的强国，被明确认作“文明的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认为它通过这场斗争而达到了它自身19世纪的帝国主义成就。在关于文明世界的观念中，有一条信念几乎是被普遍持有的，即：一种固有的优势，无论是暂时的、文化上的，还是永恒的、种族上的，都证明了欧洲对非欧民族的统治的合理性。甚至还有一种感觉，认为西班牙多多少少给自己的一方丢脸了，而美国将接过“白人的负担”去统治菲律宾，当它卸下这一重担时，情况将会比西班牙要好得多。的确，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头十年，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欧洲帝国主义自信的衰落，即使官方人士会怀疑它的实践价值和实际消耗(尤其是由布尔战争所诠释的)。欧洲人已经开始关心如何合适地管理殖民地，以及以人道主义来对待它们(当比属刚果的暴行被曝光之后，比利时皇帝对其管理不当的默许着实震惊了舆论)，“反殖民”的组织也已经在许多国家活跃起来。尽管如此，帝国主义仍旧是被接受的，并且，的确被认为是事情的正常状态。

1914年殖民帝国的结构确实令人难忘。英国在其国境之外有将近4亿臣民，法国有超过5 000万。德国和意大利远远落后，各自大约拥有1 300万，但是这些人口已经比有些欧洲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了。的确，这些庞大的结构能够更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是微小的。已经没有剩余多少“欠发达的地区”等待他们去获取。美西战争是一个伏笔，预示着未来帝国的增长只能以另一个帝国的损失为代价；德国和英国曾谨慎地讨论瓜分葡萄牙在非洲处在两者之间的殖民地的可能性。在其他地区，事实证明中国也是使殖民者失望的地方。即使俄国依然想象着以对中国的全部割占来作为其两个世纪以来对其侵犯的完美总结，但是中国似乎最后将会被激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可能性。1900年之后，能够进一步掠夺的主要对象似乎只剩下正在衰退的奥斯曼帝国。

485

新的竞争者：青年土耳其党

新世纪第一场欧洲政治危机发生在1908年。这时，哈布斯堡王朝

将已经占领了将近 40 年的奥斯曼帝国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Herzegovina)正式吞并。这大大地刺激了俄国,但也引起了其他重要的反响。其中之一是奥斯曼政权内部的变化。被它的失败和软弱所激怒,一个自称为"青年土耳其党"(这个名字是为了回应 19 世纪 30 年代马志尼的话语"青年意大利"和"青年欧洲"而产生的)的团体已经在 1907 年筹划了一场成功的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将欧洲的实践作为榜样(讽刺的是,这些实践大都是 19 世纪欧洲强国强加于苏丹的),努力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他们以欧洲为模型探寻宪政统治,与其说是为了其自身,倒不如说是以此作为复兴帝国和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如同明治维新的改革者一样,青年土耳其党想要通过现代化来抵制欧洲对其国家事务的干预(例如,通过掌握财政来制约埃及政府),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躲藏在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败退背后的、欧洲长时间的侵略史。通过欧洲化来实现现代化是成为强国的一种方法。

一开始,国外的自由主义者对青年土耳其党规划的宪政抱负加以赞许;看起来,奥斯曼帝国的暴政最终会结束。接下来,一次反革命的尝试使得青年土耳其党在 1909 年策划了一场政变,废黜了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并建立了在宪政君主国背后的独裁统治。新的论调和计划的确宣告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以作为奥斯曼人而荣耀",一个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如是说,并宣称不再存在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以往的朝贡体系的多元国家正要转变成一个民族国家。

欧洲强国必然对这些进步产生很大的兴趣。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很可能在遥远的战场上就已感觉到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事件的潜在意义和反响。首先,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以及哈里发的所在地。不仅如此,虽然在 1900 年它的欧洲领土已经所剩无几,但它仍然统治着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大片非欧领土。帝国的边界从高加索沿着波斯的疆域蔓延,一直到位于底格里斯河口的巴士拉(Basra)附近的海湾。在波斯湾的南部,其边界绕过科威特(其酋长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又回到海岸地区,南部最远到卡塔尔。从这里开始,

486

阿拉伯海岸直到红海的入口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处于英国的影响之下,但是其整个内部和红海沿岸是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年前,西奈沙漠在英国的压力下向埃及(其名义上仍是君士坦丁堡的附属)总督投降,但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土地仍在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即使在伊斯兰历史上的中心地带,也已经有迹象表明,1914 年之前,新的政治力量已经兴起,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久已建立的欧洲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要比在埃及强烈得多。法国的影响力已经渗入了这些国家,通过美国的传教力量以及学校和大学的建立,吸纳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各个地方的阿拉伯男孩,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黎凡特地区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进步,接受了教育。世界大战前夕,除埃及外的奥斯曼帝国疆域内发行了超过 100 种的阿拉伯报刊。

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于 1912 年占领了的黎波里(他们将这看做是哈布斯堡王朝 1908 年获益的部分赔偿)。不久之后,帝国的丧钟似乎已经敲响,因为在 1912 年,巴尔干国家的联盟集合起来,在一年之内占领了帝国剩余的欧洲领土。尽管战利品的划分和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确切身份不易确立,而且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又将在胜利者之间爆发了。奥匈帝国和俄国没有参战,但是这是帝国覆灭的危险警告。

青年土耳其党厌恶这些失败,但他们自己的"奥斯曼化潮流"在帝国的亚洲部分也激起了动乱。1913 年召开了一次阿拉伯会议(在波斯)以讨论伊拉克的独立。阿拉伯流亡者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成立了秘密团体和公开组织,以巴黎和开罗的最为著名。在这一背景下,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者们对苏丹的忠诚看来并不坚定。事实上,青年土耳其党为自己激起了新的困难,尽管这些困难将来才会显现。他们描绘了民族国家化和现代化这一土耳其尚不清晰的未来。虽然到那时为止,他们已经失去了奥斯曼帝国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以及北非的的黎波里和利比亚,但实际上,这些损失使他们的一些目标更容易达到了,虽然他们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传统仍旧拖累了他们,1914 年,他们对抵御欧洲国家的入侵无能为力。同样,当 1914 年出现了看来似

乎是有利的历史偶合时,他们选择了战争作为解决帝国问题的唯一出路,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487

新的竞争者:远东

奥斯曼帝国将抵制欧洲压力和侵犯的愿望与源自欧洲观念的抱负结合在一起,其雄心勃勃的结果和中国的情况有些相似。这个国家可能曾一度是"混乱"的。19 世纪末之前,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传统的秩序无法衍生出足够必要的力量以抵御新的"蛮族"。但是,以改革的途径去重建帝国的尝试失败了。一些中国人转向革命。日本人(他们是成功地逃脱了传统落后困境的亚洲人,在年轻的中国激进派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乐于支持可能会削弱其邻国力量的颠覆活动。心怀不满的被流放者和国外的中国商人帮助、支持了一个年轻人——孙中山,他于 1905 年在日本建立了一个革命的联盟,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宪政以及进行土地改革。1911 年,一场起义最终演变成一场成功的革命,虽然起义是以孙中山的名义进行的,但他本人此时正在国外,对此事毫无准备。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退位。共和国已被宣布成立。但中国要想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更不用说恢复曾经强大一时的帝国的影响。尽管如此,它已经开始了通向这个目标和现代化的漫漫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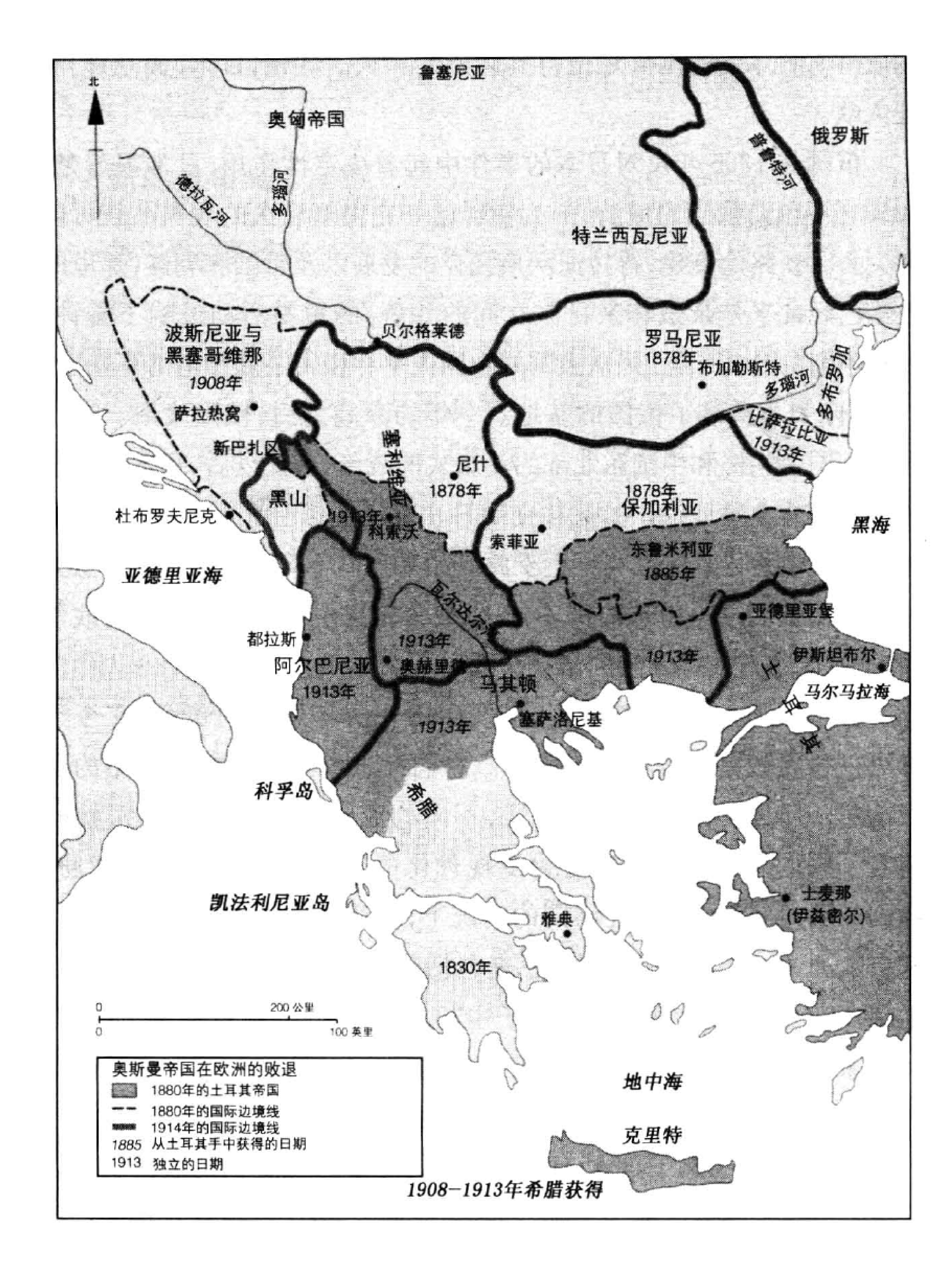
矛盾的是,中国最仇恨的对手,并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亚洲国家,该对手也同样仇视中国。中日战争后随着日本的胜利而带来的是民族耻辱,俄国、法国和德国强迫日本接受了一项和约,使得它的获益比之前它强加于中国的要少得多。此时的日本将对欧洲的怨恨与对亚洲的扩张热情融合在一起。公众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是如此之高,而这种失望使其成为头等问题。不久,西方强国就清楚了和日本打交道的方式与侵略中国的方式应当大相径庭。与其他非欧国家不同,日本逐渐成为"文明"国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899 年,作为欧洲优越标志的"治外法权"在日本被废除了。不久,日本加入到对抗义和团的国家行列中。接着,1902 年英日同盟建立(英国没有参与 1895 年强加给日本

的耻辱),日本新的国家地位得到明确的承认。据说,日本(成功地)脱亚入欧。

俄国在1895年反对日本的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日本很清楚,如果它不预防俄国的威胁,那么朝鲜这一它渴望已久的战利品就可能会失去。铁路的修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发展以及俄国和朝鲜(那里的政治已经几乎是亲俄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的贸易活动敲响了警钟。更为不利的是,俄国已经从衰弱的中国人手中租得了旅顺港海军基地。488 1904年,日本突袭了俄国的基地。一年的激战之后,俄国战败。这结束了俄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沙皇式的统治,自此以后,日本在这些地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移交到日本手中的领土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但是日本的胜利不止于此。489 如果我们不算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远征的胜利这一特殊的例子,日俄战争是自中世纪以来在重要战争中,非欧国家对欧洲强国的第一次胜利。

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以及中国在次年爆发的革命,在今天都可以被看做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亚洲对欧洲侵略的反应的第一阶段的结束。毫不奇怪,不同的亚洲国家对如何应对挑战有着不同的反应。日本通过接受现代化的"病毒"使自己抵御威胁。中国却竭力避免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变革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都来自欧洲——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这成功地包括在一个例子中,而另一个例子中却没有。同样,在每个例子中,亚洲国家的命运不仅决定于其自身作出的反应,还决定于西方列强彼此间的关系。它们间的敌对引发了19世纪90年代对中国港口和特权新的争夺,这不仅警醒了日本,还吸引了日本。日本与英国的联盟使得袭击它们最害怕的俄国成为可能,并且由此发现,俄国是孤立无援的。几年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将参与到一场欧洲战争中去。同时,日本的例子,尤其是它对俄国的胜利,对其他亚洲国家是一个激励,这是强大的也是唯一的理由,让它们能够仔细考虑欧洲的统治是否是它们的必然命运。1905年,一位美国学者已经称日本为"与西方人同等的人";它将欧洲用来对付它的技术和思想加以改造的做法,亚洲其他国家不能采用吗?

488



489

混乱的帝国

欧洲在亚洲各国的代理已经引发或已经帮助引发了导致欧洲政治霸权消融的改变。那些欧洲代理带来了他们关于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的理念,基督教传教引起的当地社会和信仰的混乱,以及一种新的有悖

传统的扩张意识。如印度叛乱、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这样的原始的、盲目的回应是最先的、显而易见的结果,但是还有其他的、会对以后造成更重要的影响。这是印度第一次明确的反应。其国会建立后不久,即致力于清晰而明确的欧式目标:国家统一和重建。尽管此前并无印度国家或印度国家理念,国会并未追求印度自治,它仍然宣称其对英国王权"毫不动摇的忠诚"。国会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种媒介,将印度意识传递给总督并希望引起他的注意。此后的20年,国会的态度由于其受到来自英国居民的诽谤而变得尖酸和强硬(这些英国居民宣称国会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它对于一个通过为更为传统而保守的社会势力工作的行政机构没有任何回应,因为它开始试图讨论印度独立的可能性。

1905年,孟加拉的一个新的行政划分产生了一个印度教徒占主体的西孟加拉,一个穆斯林占主体的东孟加拉。(人们)对这一分裂的愤怒点燃了大量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极端分子被反分裂暴动所刺激。人们装备了一种新式武器以对抗英国,一场联合抵制(这个术语因帝国的困难之源—爱尔兰而在不久之后首次进入英语)英货的运动开展起来。国会希望能将这一方式扩展至其他的消极抵抗形式。至1908年,极端分子被逐出国会(国会此时正寻找一种能让英国白人统治者满意的印度自治方式),显然他们已转向暴力。马志尼信条中已经加入了俄国的恐怖主义,意大利独立运动中的游击队英雄领袖加里波第的例子也对新兴印度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人们认为,政治谋杀并非普通谋杀。刺杀和随后的炸弹袭击都被特殊的手段所镇压。 490

更为重大的影响是,这一分裂使伊斯兰教的印度和印度教的印度的政治分裂日益扩大。原因甚至应当追溯到叛乱之前,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1857年试图恢复莫卧儿帝国的尝试使穆斯林丧失了英国的信任,加之可能被其文化传统所阻碍,他们在赢取政府的职位或法庭的席位方面几乎毫无成效。相比之下,印度教徒对统治者提供的教育机会作出了比穆斯林更为热切的回应,他们在商业上的分量和对政府的影响力都要大得多。穆斯林也找到了英国支持者和赞助者——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穆斯林学院,为穆斯林提供所需的英

语教育以对抗印度教徒,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了穆斯林的政治组织。一些英国官员开始认识到,这给了统治者一个平衡印度教的压力的可能性。

1905年,一如往常的分裂成为印度政治的基础假设。反分裂主义者开展了反对印度教的标志和口号的活动。东孟加拉的一个支持穆斯林而打击印度教徒的英国总督被免职,但是这也给这个社会打了一剂预防针:孟加拉的穆斯林对他的免职深感遗憾。看起来,英国-穆斯林谅解似乎正在形成。这必将激怒印度教的恐怖分子。而这些发生在经济紧张和物价上涨的时期,这就使得后果尤为严重。1909年的政治改革并无成效,尽管他们为印度人在立法委员会中争取了更多的席位。但是选举将会由具有共同基础的选民决定,也就是说,印度教的印度和伊斯兰教的印度的分裂被制度化了。

1911年,英国在位的国王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印度。盛大的接见仪式在德里举行,从这时开始,英属印度将其首都从加尔各答(Calcutta)迁至德里这一莫卧儿帝国的旧统治中心。印度王公前来觐见,国会也并未质疑其对英国王室的忠心。乔治五世在前一年的即位打上了让步的记号,这一让步是真实且具有象征意义的,它的最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孟加拉的重新统一。如果说印度的统治曾经达到其巅峰,那么无疑就是这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时,英国政府已经着手转变叛乱后的专制独裁,建设一个有效代表印度人民的政府,在经历了分治政策导致的敌对行动后,即刻转变了这一不受欢迎的政策,并含蓄地承认(通过与一个亚洲强国结盟),他们或许无力独自面对大量亚洲当地的挑战而维持大英帝国的统治。此次访问后的第二年,总督在一次恐怖炸弹袭击中受伤。

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也有自己的困难。有着拿破仑时期传统的行政机构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当地政府只是傀儡,但是法国人令当地机构元气大伤,却没有将其更换为能够赢得当地百姓忠诚的政府。这是一步险棋。法国人也带来了他们的关税政策,这些政策减缓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在官方建筑上和第三共和国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一则激励人

491

心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它使得印度支那的商人——就像他们的印度同行一样——开始去反思他们的国家到底应该为了谁的利益而运转。关于印度支那的设想(印度支那作为法国固有的一部分,其居民应当成为法国人)给深度儒家化的印度支那统治阶级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法国关于财产的法律和观念打破了原有的村庄土地所有制结构,并将权利交给了放债者和地主。随着水稻种植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这必将为未来的革命埋下伏笔。

传统的越南人的民族主义很快显现出来。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得一些越南青年人前往东京,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孙中山和一些日本赞助者,他们宣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这些越南青年人中的一个组织了旨在建立越南共和国的社团。这些并未给法国人带来多少困扰,因为在 1914 年之前,法国人可以轻易控制这些敌对行动,但是,这同时引起了华人阶层保守的敌对活动。尽管法国人曾在 1907 年开办了一所大学,但由于惧怕社会动乱而不得不几乎立即停办了(直到 1918 年才重新开办)。在法国统治确立的最初几十年中,越南人主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经大大背离了法国统治。

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是印度教文化圈而非中国文化圈的组成部分。19 世纪末期,那里的一些荷兰人开始对其殖民地政府的作为感到不安。这一情况以其态度的一次重要转变而达到顶点;1901 年,一项新的“伦理政策”宣布实行,主要表现在权力的下放和旨在通过乡村行政改革而实现进步的运动中。但是,这项政策被证明是如此地具有家长主义作风和干涉主义性质,以至于有时甚至被第一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利用以激起敌对行动。1908 年他们建立了一个旨在促进国民教育的组织。三年后,一个穆斯林社团出现(虽然其早期指向中国商人的活动与指向荷兰人的一样多)。至 1916 年,在仍保持其与荷兰的联盟的同时,这个社团已经足以要求自治。在此之前,一个以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包括任何种族)名义建立的真正的独立党已于 1912 年成立,其三位创始人中有一位是荷兰人。1916 年,荷兰还是迈出了满足这些团体要求的一步,授权给议会来给印度尼西亚以有限的权力。

492

在 20 世纪初的几年中,民族主义的欧洲观念在整个亚洲都表现得极为明显。他们有不同的表现并面对着不同的可能性,并非所有的殖民政权都表现得一致。英国人支持缅甸的民族主义者,而美国则在丑恶地镇压了最初是反抗其前任西班牙人的叛乱后,固执地推行其在菲律宾的仁慈的家长式统治。西班牙人,就像在亚洲其他地区的葡萄牙人一样,几个世纪以来热情致力于推广基督教的信仰,而英国在印度的政权仍然十分谨慎地干涉当地的宗教。通过不同的殖民方式,历史刻画了亚洲殖民地不同的未来。历史的可能性和历史惯性的作用可能会在中国和日本得到清晰体现,欧洲在那里的影响虽然与在印度和越南的影响一样引人注目,但势必不如其那么直接。国际环境在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未来的塑造中也具有决定性影响。

到 1914 年为止,民族主义被证实是欧洲输出的最为成功的理念。在这样的联系下,欧洲的犹太人成为最后一批接受这一理念的人似乎就尤有象征意义。汇聚在欧洲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在 1897 年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年,旨在建立稳固的民族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出现。在犹太人漫长的历史中,与当地社会的同化(在许多欧洲国家都没有实现,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作为一种理想被领土式民族主义的理想所挑战。这一历史现在作为一种理想受到了区域性民族主义的挑战。但这样令人满意的地点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在不同时期,阿根廷和乌干达都曾被议及,但是直到世纪末,根据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见最终选定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向这一地区的移民于 1914 年开始,尽管仍是小规模的。

第二十三章 国际秩序的解体

493

态度和期望

要理解1900年的欧洲,我们思想上所需的最困难的飞跃之一,就是承认当时没有人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将会在14年后终结。我们被"后见之明"所妨碍。1914年及其之后几年所发生的事情给欧洲人的记忆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甚至给我们现今对20世纪早期历史的解读也投下了阴影。摧毁了旧式欧洲的大战似乎是无法预先避免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多数欧洲人几乎直到最后一刻仍无法想象到这一事件的结局会是怎样。之后,历史学家长期关注于能够证明(或似乎能够证明)引起列强间大战的逻辑必然性的事件和真相。尽管环境造就了逻辑,但大部分情况确实直到非常晚的阶段才发挥作用。

将导致战争的途径作为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中心主题去集中考虑,这在1939年仍是显而易见的,此时,另一场欧洲大战开始了。但这并未使历史学家受到限制。仅仅由于1914至1918年太过可怕的经历和太过广泛的革命性影响,1939年许多历史学家都为他们认为的将会面临的状况而深深忧虑。结果,事实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远比前一次要可怕得多,剥夺了其作为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这一可怕特性。尽管如此,开始于1914年的战争仍然是到那时为止最血腥、最激烈的战争,

其地理范围也最广。每个大洲都有国家参与其中。同样,它比之前任何战争的代价都更加昂贵,它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吞噬着资源,而这些资源的提供要求全社会以新的规模来全体动员。这也是第一次展示了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全面影响的战争。这些事实证明了它所声称的独特性,并且有助于解释其空前的心理和文化影响。它们同样解释了参加这场战争的人给予它的简单名称:大战[①]。

494 把1939年将要发生的事情放在脑海中有助于我们理解另一个能够证明这场战争独特之处的事实。像其他国际大战一样,它包含了许多开端清晰的冲突。一些人认为它也许能被称做"巴尔干战争"(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后的第三次)。在另一方面,这是另一场奥斯曼帝国继承战争。但是居于其核心位置的是德意志问题。和25年后的情况一样,欧洲战争的核心议题是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对德国力量的控制,同样,在某种意义上,大战开始于德意志战争。它将需要一场第二次德意志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两次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最终使欧洲丧失其霸权。不管怎样,虽然不经历战争这也可能会发生;但是没有战争的话,它的这一地位似乎能够维持更长时间。但是这仅仅是假设:战争的作用仍是决定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将整个时代看做是一场欧洲内战,倘若我们还记得这一比喻的话。能够牵制内部混乱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前提;在这一意义上,欧洲从未统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因此并未发生内战。历史上,欧洲从未能从战争中脱身。但是,它是世界的权力体系和一个文明的起源与所在地,尽管这一文明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1914年,欧洲刚刚经历了其主要国家之间的一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久的和平。至少欧洲知识分子感觉到他们已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欧洲人一样,虽然当他们注视着那些由其他文明构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有时甚至是险恶的神秘事件时,他们并未认识到这一问题。所有这些事实在该世纪中期消失了;这使得内战的隐喻作为1914至

① 该名称也曾一度用来指1815年之后大不列颠与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

1945年间相互残杀、自我毁灭的疯狂行为的简写而被接受。

当足够多的有势力和有利益关系的人开始感到一场战争(虽然并不是像1914至1918年实际发生的战争那样)及其可能性比持续的和平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给他们时,这些破坏性开始显现。这打乱了近40年里维持国际秩序运转的平衡。这些人在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统治圈中尤其重要(但却不是唯一的),同样也可以在别的国家中找到他们的身影。这一切往往发生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乍一看来,它是由复杂的外交关系、责任和协议形成的。这使得国际冲突无法轻易限定在几个国家的范围之内。这一背景的另一个因素是,公众心理在其本质上变得更为反复无常、难以控制,并且比早先的任何时代对政治家都更具影响力。到1914年,"公众舆论"已经有着更大的作用;那一年的战争并不仅仅是精英们挑起来的。大众的情绪很容易被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刺激所唤起(就像许多在最后40年发生的小插曲)。同样,战争的危险性及其实质影响被无知所掩盖。即使是应当比一般人了解得更多的士兵们,大多数也以1870年的法国和1866年的波西米亚为依据来考虑战争。他们本应认识到现代战争的第一场战役所展示的真正的本质和损耗——仅仅几年之前在弗吉尼亚和田纳西由后膛炮和来复枪所造成的杀戮。商人、银行家以及经济学家也都沾沾自喜;他们认为,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战争的消耗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承担,他们最多将"现代"战争看做是简单的事物。极少数有远见的人认为,虽然一些知识分子相信战争能够释放情绪、能够净化无生气、无目的的感觉,是一个表达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和腐败的不满的机会,但是,一旦战争到来,它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远比这些知识分子所给予的嘈杂的热烈欢迎要重要得多,但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并没有撼动人们对于一场新的战争根深蒂固的错误想象。事实上一些革命者也期待战争,因为他们相信战争能够提供变革的机会,不管是民族变革还是社会变革;然而,必须指出,他们几乎没有努力抵制认为灾难不会实际发生的广泛的社会信心。

495

应该以此为背景去理解外交官和政治家所做的努力。他们中的大

多数都并非不胜任或缺乏才智,只有少数非常邪恶或愚蠢的人足以招致灾难。他们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许多棘手而艰难的问题。然而,直到一个相当晚的时刻,他们中才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中隐藏着以后会让历史学家着迷和困扰的问题,即大战的起源。

联盟与纠缠

国际协定和良好的外交规则都承认,所有的主权国家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但是,1900 年有六个主要的欧洲强国: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比 1815 年的强国要多两个。关于意大利,俾斯麦曾毫不客气地评论道,它胃口巨大,牙齿却不行。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被当做古代国家而被彬彬有礼地对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帝制国家,但是在战斗力和财富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这六个强国间不时分分合合,使得它们所建立的体系带有组织化结构的假象。历史上,其中之一是三个东方帝国之间的保守联系,其最后表现形式是三帝同盟,但是它到 1900 年就消失了,即使这三个皇帝中的两个(威廉二世和尼古拉斯二世)都倾向于认为他们在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主义上享有共同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应当会影响其国家政策。两个主要的组合打破了这一旧的意识形态观念,它们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与俄法同盟。前一个联盟将两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和一个宪政的意大利王朝联系起来,而它有着悠久的反奥政策的历史;另一个联盟联结的是所有王朝中最反动、最专制的国家和欧洲唯一的共和力量——法国,它是革命的自觉的继承人。共同的需求使它们结合到一起。并不是这些联盟中的所有条款都为世界所知。每一条都是在特殊的环境中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而设立的,它们并不表明欧洲一开始就自动和必然划分为两个阵营。但是,如果环境以一些特定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发展下去,它们在最后可能会产生那样的结果。

比起联盟国家自身的统治者,其他人更应当重视这一外交框架,但是这绝不是塑造欧洲外交考量的全部因素。联盟里的每个参加者都有着其他利益,形式上不受这些条约的承诺和谅解所影响。同样,其他的

非联盟成员,甚至非欧洲国家有时也会被考虑到,例如美国、英国的海外领地、日本甚至中国。影响了国际关系运转方式的许多历史因素似乎离这五个欧洲陆上强国非常遥远。

尤其是英国有着特殊的利益;人们很久以前就知道它们有着塑造国家政策的深刻历史根源(甚至是史前根源)。它所关注的领域是海洋,就像一个英国首相指出的:“我们是鱼。”[①]正是因为这些,1900 年英国在南非打了一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规模最大的殖民地战争,其他的欧洲强国几乎普遍持不赞同态度,尽管如此,它们却什么也不能做;不列颠人统治着海洋。没有欧洲国家与引发布尔战争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大英帝国仍有许多利益已经引起了与其他欧洲强国的冲突和对抗。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认为它仍然可以置身于欧洲的联盟之外;这是有利的,虽然它可能不会持久。同样,最古老的工业国家为其经济地位的动摇而日益烦恼。到 1900 年,一些英国商人已经清楚认识到德国是其主要的商业对手;许多迹象(无论是在规模还是产量上,在技术还是方法上)表明德国的工业已经大大优于英国。旧的地位已经不再;自由贸易本身已经遭到质疑。政治方面,北爱尔兰的暴动、妇女参政论者以及关于社会立法问题而与上议院进行(他们决定保卫经济利益)的愤怒斗争,促使到 1914 年,一些人开始怀疑议会本身是否受到了威胁。维多利亚政治中期的那种持续的社会一致性已经没有了。然而,许多人对英国制度和政治习俗仍然很坚持。议会君主制被证明有能力坚持下去并使其自身适应巨大的变化。

法国也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和英国一样辽阔(如果不能说面积一样大的话)。但是,法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关注于欧洲内部。回顾过去,1898 年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转折点。法国政府决定不在法绍达对抗后向英国施加战争压力,这含蓄地承认了,在遥远地区的进一步帝国政策可能会危害法国在欧洲行动的自由;在欧洲,许多法国人(政治家说是

497

① 萨里斯伯里勋爵所说。见《德国外交档案》(第一卷),E. T. S. Dugdale 编著,伦敦,1928 年,第 249 页。

大多数)最重要的困扰是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自从1871年它们被德国占领,法德两国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到1900年,这一事实比以往更为清晰,即如果法国依旧孤立,那么在这一问题上(或其他问题上),法国远不是其邻国的对手。它不能扩充兵力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在工业增长方面,法国较其邻国也相形见绌。直到1914年,法国的产煤量仅是德国的六分之一左右,生铁产量不到德国的三分之一,钢只有德国的四分之一。如果再有一次1870年的战争,法国很清楚它需要盟友。这是法国政策的中心基点。它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国家,即使其弱点迫使它沉默。它在政治上也是动乱的,虽然看起来不稳定仅仅是表面的;它反映了法国政治家之间激烈争论的传统,他们努力让1789年的神话、革命与反动的修辞保持生机。工人运动的力量很弱。第三共和国是保守的,并且其社会可能和欧洲其他政权一样稳定。

俄国已成为法国寻求联盟的最佳对象。它也是唯一的在帝国利益和已唤起的关注上能够和英法匹敌的国家,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俄国的政策开始强调在远东的扩张主义,同时开始避开巴尔干地区。俄罗斯帝国长久以来对中国的东北部和山海关以内(20世纪,已经没有国家能够从清帝国攫取更多的领土)有着巨大的野心,并且看重它在中亚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上与英国之间长期僵持的敌对,以及它们在阿富汗和波斯各自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帝国政府永远无法放弃斯拉夫欧洲。如果进一步的革命性变化在那里发生,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很可能成为多瑙河流域和君士坦丁堡无可置疑的主导力量。随着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已经开始显现,舆论意见甚至在俄国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同伴的抱负同样可能使沙皇的大臣们面对一些不是由其造成却需要俄国作出反应的情况。如果这一情况发生了,它将不可避免地与奥匈二元王朝敌对。

给未来投下阴影的是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他们在二元帝国的外交事务中扮演着非常有影响力的角色。在其统治的那一半国家,他们拒绝给人口众多的非马扎尔人以公正的对待,尤其是他们想要确保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会对抗斯拉夫国家的野心。

498

塞尔维亚是俄国的卫星国和被保护国,是南斯拉夫扩大的塞尔维亚统一范围的愿望的焦点。马扎尔人害怕他们的斯拉夫臣民会对这作出反应。通过证明塞尔维亚无力达到变革的目的,马扎尔人急切地表明,他们将不能从塞尔维亚那里得到任何希望。40 年前意大利统一时加富尔的皮得蒙特-撒丁尼亚这一缓冲带所发挥的作用永远不会被遗忘。

尽管如此,1900 年俄奥的关系还算不错。尽管三帝同盟已经失效,而德奥建立了一个没有俄国参与的同盟,近来俄奥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相互之间的关系,19 世纪 90 年代,两国都不想打破重新修订的柏林条约所维持的现状。俄国准备容忍奥地利对前奥斯曼帝国省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有许多喧嚷的亲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的占领,而且(如果这样的描述不恰当的话),世纪初的俄国似乎是一个在欧洲感到满意的国家,并没有打破外交现状的倾向。

尽管如此,19 世纪里建立起来的一些巴尔干国家感到不满和痛苦。塞尔维亚人谴责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以及马扎尔人统治下斯拉夫人的边缘地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塞尔维亚作为多瑙河流域未来组织形式的关键。罗马尼亚人对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王国的另一部分)的 300 万名同胞的生存状况反应强烈。仍然处在奥斯曼的统治之下,并常常处在动荡中的马其顿被保加利亚和希腊所觊觎。但是,欧洲外交家对由奥斯曼帝国所带来的危险已经非常熟知,并因而经常小心翼翼地监控着它。迄今为止,它们由列强间的协调行动而得以安全地处理;1900 年,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殊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似乎有着更深刻的间接影响;巴尔干继承国家间的冲突似乎比欧洲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更能够引起动乱。 499

意大利是另一个心怀不满的国家。对罗马的占领终结了其宪政和区域组织的时代。在国内,它的统治者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国外,任何意大利政府都不能与英国发生争执,它是意大利的老朋友和意大利统一的支持者,并且是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拥有者——漫长的海岸线让意大利尤其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是,意大利同

它的另一个前支持者法国在北非发生了摩擦，并且同样看重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野心，这也促使它对奥斯曼帝国为所欲为。最重要的是，对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复兴运动并未完成。仍然有意大利人处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如威尼斯朱利亚（Venezia Giulia）、克罗地亚和特伦蒂诺（Trentino）。这些地区组成了爱国主义言辞上所说的“未收回的”意大利（或“应由意大利收复的地区”）。所幸的是，许多意大利人也明白，他们国家的“牙齿不太好”。

普鲁士曾在1866年帮助意大利走向统一。三国同盟里，新德国是意大利的正式盟友。但是，到1900年，它已经不是俾斯麦的德国，保守而小心，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与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并致力于避免战争。相反，德国在欧洲体系中已经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外交政策上的“新方案”绝对没有给它带来明显的稳固收益，并且引起了原本可能轻易避免的压力，比如与英国的关系。德国对外政策中许多表面上的不稳定都根源于其心理状态——有些是集体心理状态，有些是个人的，而不是出于国家利益或现实政治的计算。权力和决策实质所在地的含糊其辞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尽管如此，1900年德国并没有什么尤其值得关注的焦点（它表现出对欧洲秩序的潜在威胁）。

那一年，事实上欧洲的大使几乎都没有关注（因为没有理由去关注）任何能从中分辨出14年后冲突根源的东西。1900年，法国和俄国绝没有预想到欧洲体系的崩溃，它们重新建立起的军事协定仍在设想着盟友双方找到对英国作战的可能性。俄国依然忙于远东事务，其他的欧洲国家（甚至是意大利）也紧盯着在中国获益的可能性。法国正在巩固其在北非的地位。巴尔干地区相对平静。但是，或许长久以来用谈判而不是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成功（外交家也已经表现出他们卓越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外交机制已经如此多次地成功运转，以至于当它面临非同寻常的顽固问题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似乎一度被那些需与之打交道的人所忽视。1914年7月，在大战前夕，政治家发现很难解释为什么另一场大使会议甚至欧洲代表大会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将他们从那些难题中解救出来。

500

国际变化的开端

欧洲强国间下一阶段国际关系的驱动力首先发源于欧洲之外。它对欧洲强国重要性的第一个迹象与英国的帝国和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一同到来,它表现在与非欧强国日本的结盟。19 世纪 90 年代,这两个国家都因俄国影响力在远东的成功扩张而惊恐,尤其是在中国东北部,并且察觉到其在朝鲜制造的危险。这是 1902 年英日同盟的背景,这一同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首次在和平时期建立的同盟。它作出了以下保证:如果同盟的一方发现自己必须通过战争来保卫自己在远东的利益,那么另一方必须善意地中立;如果第三方加入了这样的战争,那么未被卷入战争的一方有义务成为其盟友的援助。显然,最可能的假想敌是俄国及其盟友法国。

但是,尽管在布尔战争期间法国的仇英心理日益尖锐,到 1912 年,英法之间建立更好关系的道路被打通了。随着内阁的更替,1898 至 1905 年任法国外长的德尔卡塞(Declassé)清楚认识到了法绍达的重要性。他认为,这表明有关欧洲之外的次要的议题的争论,应当服从于改善法国在那里的外交地位的需要。例如,它应当寻求英俄关系的缓和,并降低其盟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这意味着忘记旧的敌意。伦敦和巴黎的大众情绪由于法国总统和英国国王的个人访问交流而振奋起来。官员们致力于思考一个大范围的利益互惠的商业活动。其成果是 1904 年的英法协定。该协定的核心内容是,一方面保证英国对法国在摩洛哥利益发展的认可和友好(在那里,法国对未来的可能性野心勃勃),另一方面,法国许诺不再进一步阻碍英国在埃及的行动。由于英国对埃及的长期占领而引起的摩擦可以暂时平息了。

然而,英法协定远不仅于此。它结束了其他许多长时间的争论。西非、纽芬兰渔场、暹罗、马达加斯加和南太平洋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例证;英国尤为乐意去解决持续已久的痛处。然而,即使这样也没有将协定制订的重要性探讨彻底。这是一颗可以生长出谅解的种子——(源自)在其他事务上的理解,或者如后代所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其意义依旧模糊不明,未包含在条约形式之下,而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而更加强有力。但是所有这些都要在将来才能看到;它并不是协定者的本身意愿,它将要求其他人的行动来将这可能性变成现实。

501

也许,对于它的谈判者来说,他们不应当吃惊于以下事实:威廉二世及他的一些大臣认为,由于未同德国(或除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国家)商议,摩洛哥殖民地的命运已使德国蒙羞。柏林决定必须有所动作;德国应当向法国表明它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些事务中来。国王乐于作出这种姿态。那时的法国正在逼迫摩洛哥的苏丹进行改革。在1905年3月对丹吉尔的访问中,威廉做了一个煽动性的演讲,强调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它远比英国在此的商业利益要小得多,更别提法国的了)和维护苏丹独立的重要性。这引起了惊愕,或许更加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特别确定他的意图。这一被视做愤怒的尊严的再次主张和追求声望的积极尝试孕育了一场危机。

在其解决过程中,德国获得了胜利,但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场国际会议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因而含蓄地作出让步,承认欧洲在摩洛哥的命运的管理上有着共同利益。但是,德国没有获得任何其他实质上的东西,并且在会议上除奥地利外没有国家支持它。

英国外交部官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他们——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英国的公众舆论——已经意识到英国因支持法国而获得的利益,如果欧洲列强的平衡还能保持,而德国不再在每一个新的问题上坚决维护其利益的话。困难已经过去了,一方面有着1904年对特殊问题的协定,另一方面,是"谅解"。德国已经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一个秘密的英法同盟;现在它已驱使这两个国家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且有可能再加上一个国家。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召开之后的一天,英法军事对话已经开始在两国的总参谋部代表间展开。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还将有其他的)并不是使得欧洲走上通往1914年这一不归路的关键,但却是事态变得尤为紧急的时刻之一。正如一位英国外交部长在直到1914年英国卷入战争的前几天还坚持声明的,军事对话并不是联盟;它们绝不会将英国政府束缚于任何特定的行动。但是,它们却又宣布了英国在欧

洲大陆及其自身政策设想中的孤立阶段的结束。1902 年和 1904 年的协定寻求对英国海外利益的关照。摩洛哥使得英国恢复了其欧洲势力均衡的政策。

非欧议题上的另一友好行为发生在 1907 年,同样引起了柏林的疑虑——当时那里流行将它叫做“包围”。这就是英俄协定。实际上,它将名义上独立的波兰划分为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为阿富汗的中立做准备(而这一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并保证两个政府都不(就像英国已经做的那样)干涉中国的西藏(无论如何,中华帝国都对西藏宣称其宗主权,而这是英俄政府都意识到的)事务。像 1904 年的协定一样,这些决议的范围为参与的双方提供了有限的却是实际的利益。这是英德关系上空的又一片乌云,而令人更为不安的原因是随之而来的两国日益增多的摩擦和大张旗鼓的海军军备竞赛。德国对其要在北海建立一支抗衡英国的海战舰队(那儿还没有其他能够与英国匹敌的舰队)的意图已经宣传了一些年了。1907 年,英国提议裁减军备以缓解两国的经济负担。1908 年英国海军预算已经在实际上减少了,而德国仅仅同意将放弃其扩建计划以作为在一场法德战争中英国无条件答应中立的报答。这一切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后将变得不再可能。然而,对英国海上霸权的威胁必然会警醒英国的大众意识,加深英国政治家和官员对德国政策的恼怒(这种恼怒通常是由于不理解而造成的),并且增加两国纳税人的经济负担。

502

巴尔干问题再度出现

紧张局势在这一更为恶劣的气氛中在巴尔干地区复活,这打开了通向 1914 年大战的大门。1900 年之后,巴尔干适度稳定的局势已经维持了一些年,而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内部变化也仅仅是缓慢和平淡的。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也许是由于鲁莽地执行了俾斯麦外交准则的原因。奥斯曼政府在马其顿面临着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运动,运动久久未能得到平息,除了给奥斯曼的统治带来不良反应外,也促使了巴尔干国家卷入这场动乱。紧接着是青年土耳其革命,

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阶段。它很快显示出,如果一个经过改革的奥斯曼帝国有可能重生,那么对巴尔干地区的外交政策就需要新的设想。

潜在的不稳定仍然可以避免,而不会招致灾祸的固有观念使得哈布斯堡和俄国的政策依旧关注于维持现状。当小的国家想要破坏现状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会联合起来以控制马其顿的局面。不幸的是,1906 年当哈布斯堡王朝开始了一场与塞尔维亚的关税战争时,其政策一改以往小心谨慎的姿态。而这时,经历了在远东被日本击败的灾祸之后,俄国转而对东南欧重新燃起兴趣。这里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对俄国来说,其对海峡的兴趣已不再是重现拜占庭帝国辉煌的"新希腊"帝国的历史梦想,而是俄国谷物通过黑海运往其远在西方的市场的渠道。

503 哈布斯堡王朝对塞尔维亚政策的强化反映了匈牙利政权在维也纳的分量。与可能满足其斯拉夫臣民的渴望而作出的让步相反,外交部就南斯拉夫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被长期怀疑支持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塞尔维亚,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获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一个可能的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如果奥斯曼帝国一旦放弃对它们的合法主权的话;因此,二元帝国对它们的正式吞并将会结束塞尔维亚获得它们的任何希望。这将给如同南斯拉夫所期待的拥护者一样的塞尔维亚的威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哈布斯堡的行政机构必须认真着手处理那里真正的恐怖主义问题。如果这些省份能够并入王朝的奥地利部分,那么当匈牙利脱离王朝的时候,哈布斯堡统治也可以展现出其对斯拉夫进行恰当管理的能力。青年土耳其党成功的政变使得人们开始接受,合并很快就会发生;但这并不适合于在这些省份重建一个改革的和有效的奥斯曼机构。

原则上,俄国并不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取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它所要求的仅是明显的、适当的补偿,以平衡二元王朝的所得。俄国外交部长相信他已经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部长那里获得了一个许诺,这个许诺将保证这一补偿。在一场国际会议上(出于将 1878 年协议的修正合法化并达成一致的需要而召开的),俄国将提出巩固其在黑海海

峡地位的要求，而二元王朝（作为最有利益的力量）将会支持它。不幸的是，在这一重要的会议上，两个政治家遗留了对实际上已经达成一致的问题——或许他们以后会这么说——的不同看法。一场外交灾难紧随其后。

在会议不久之后，奥地利的正式吞并于 1908 年 10 月 5 日正式发生。当俄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会得到所期待的补偿时，便开始强烈抗议这一行为。德国为英俄协定所感到的苦恼使得它无条件地支持奥地利，这迫使俄国认识到，如果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联合在一起，它是无法打败它们的。法国不想卷入这场战争，而俄国的被保护国塞尔维亚也极有可能完全保持缄默。俄国人不得不让步；他们在没有获得补偿的情况下正式承认这一吞并的有效性。但是他们很愤怒。不久，俄国外交部长倡导了一个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巴尔干同盟，以抵制进一步的侵犯。

在十几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之后，这时巴尔干地区事实上又重新产生了二元王朝和俄国彻底冲突的古老危险。南斯拉夫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不久之后的 1909 年，这一问题被进一步激化，根据奥地利外交部和塞尔维亚密谋伪造的证据，一个克罗地亚领导小组被指认在萨格勒布犯罪：伪证在上诉时败露，他们被无罪释放。恐怖分子开始获得更多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秘密帮助；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被袭击。504 俄国政界被旧的柏林-圣彼得堡联盟最终解体的现实深深伤害，并且日益担心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关于俄国军队的重组和重新装备的主要计划开始实施，以至于再没有像 1908 年那样破坏专制政治声望的灾难发生，也再没有人怀疑将来俄国为了支持其斯拉夫弟兄会陷入危机中。

俄国的复原和强力

虽然 1905 年对日战争的失败和 1908 年精神上的战败（如人们所见的那样）都很重要，但是它们自身并没有为理解俄国在剩下的和平年代里的政策进程提供足够深刻的透析。在这些事件之前，缓慢的现代

化进程正在俄罗斯帝国内进行着。到 1900 年,俄国很明显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工业强国。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农奴解放。40 年之后,虽然大多数俄国人仍旧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农民,但他们的税收都被用于必要的基础设施、铁路以及蒸汽发生装置的建设。与经济的增长相应,商人和农民的人口缓慢增长。发展本可以更快,但是尼古拉斯二世是最缺乏想象力的沙皇之一。1905 年被日本击败后,俄国爆发了革命。俄国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一度将希望寄托于体制改革。一个被称做"杜马"的咨询委员会从革命中产生,似乎被耽误了很久的俄国人民自治的训练最终能够开始。不幸的是,杜马仅存在了数年,而在这几年中又充满着挫败。同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活跃起来。

1914 年,俄国的大国地位再次变得毋庸置疑。它正成功地迈向重要的经济强国。虽然比起德国和英国它还差得远——其钢产量仅相当于前者的四分之一,而生铁产量是后者的三分之一——但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比这两者都要快。更为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俄国的农业最终可能会摆脱困境,有能力生产比人口数量增长更快的农业产量。新的立法已经加速了农民中一个新的阶层——富农(库拉斯)——的出现,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提高了农业产量。他们证明了农奴解放时期强加在个人主义上的约束的消失。同往常一样,负责这一有希望的改革的部长斯托雷平(Stolypin)被沙皇和皇后强烈厌恶,所以当 1912 年他被刺杀时,他们几乎毫不关心。他的被杀是长期无法消灭革命和恐怖主义传统的信号,因而也是国家体制在政治上的失败的信号。

1914 年,依赖于日益强大的铁路系统和工业基础的军队数量和现代化武器使得俄国统治者依然对维护其大国地位充满信心。但是仍然有持续的弱点。俄国只是名义上的欧洲国家,它仍显示了其亚洲部分令人惊骇的贫穷,那里经常发生饥荒,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盲人口。那一年,只有不到 10%的俄国人居住在城镇里,且他们之中只有 2%的人在工厂工作。它仍旧是一个依赖于外国资本(主要来自法国)的国家。自由主义传统有限且弱小。东正教会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混迹于政府和社会已达一个世纪之久,而这在西欧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过去。

505

俄国已经拥有一两所好的大学和学校，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但是沙皇的绝大多数臣民是无知迷信的农民。总之，这个国家的政府依旧依赖于最后一个手段，即君权神授。这是一系列事情的结果，即俄国同样是唯一一个存在着非常乐于以暴力推翻政权的十分险恶的革命运动的强国。俄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和平的终结

1914 年，没有国家比德国对俄国的增长和潜力更感威胁。当时德国的军事计划员认为，随着三四年之后其战略铁路体系的完成，俄国在军事上将可能无法被征服。但是，德国已通过六年前的波斯尼亚危机对俄国的这一进程造成了很大破坏。然而，那时的国际关系是否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全面战争依然是不能确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也需要花费六年的时间来证实。否则，许多事情可能在那时发生。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即另一场摩洛哥危机，再一次由德国引起。摩洛哥似乎是另一个“垂死的”帝国。法国从 1905 年开始巩固其在那里的地位和特殊影响，而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的经济活动也紧随其后。它们希望能在摩洛哥的潜在矿产的开采上有重大的发展。这使得欧洲对这个国家持续关注。当一场反对苏丹的叛乱发生的时候，巨大的利益和投机促使法国派出远征队占领了该国的首都菲斯（Fez）。德国政府决定建立其自身的地位，以便此后如果法国在该国持续扩张，它能够对其提出强硬的赔偿要求。它选择的方法是派出一支战舰到摩洛哥的阿加迪尔（Agadir）港口，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德国的国民（事实上那里并没有德国国民）。它真正的目的是表明德国意在商业并且试图胁迫法国同意给它赔偿。1911 年 7 月 1 日，“豹”号炮舰在阿加迪尔下锚。

但是，这一行动是无端的挑衅，同样也是拙劣的。巴黎的有关部门有意与德国进行调停，但他们马上发现，“豹号事件”激起的法国人的情绪使得他们难以作出任何让步；在保卫法国利益上，它不允许自己示弱。阿加迪尔事件同样使得英国感到惊愕。虽然海军部看起来并不是　506

很关心这件事,但是外交部却感到十分困扰,媒体也被所谓的德国正在摩洛哥海岸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事实上,德国并未打算建立)的威胁所唤起。英国认为需要作出一个姿态来回应这个事件,结果是,一位英国部长发表了讲话警告道,如果法国卷入对德战争,英国将会支持法国。

外交官及时地通过协商解决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获得了比其原本面积稍大一点的领土(在刚果)。但是,这一危机的重要性在于,它终归是发生了。这大大加强了英法谅解,并为其在英法公众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英国再一次为德国海军的威胁而感到焦虑,1911 年两国舰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或将再次)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小。另一方面,德国的反英主义者坚信德国已忍受了太多由于英国的威胁而带来的"耻辱"。这一成效在次年显现出来,德国宣布了规模空前的建设计划;英国增加了其主力舰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将地中海舰队撤退到本土海域;这一年晚一些时候,法国舰队进驻土伦(Toulon)。很明显,英国海军战略上假想的潜在敌人现在只有德国。这一假想和不断增加的海军建设使得 1914 年英国在北海的海军优势比阿加迪尔时期的还要强。

这些并不是危机仅有的影响。意大利对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合并获得波斯尼亚心神不安。也许是出于模仿,这时它开始寻求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支配地位的"赔偿"。最容易寻求到赔偿的地方是奥斯曼帝国。1911 年 9 月,在对苏丹宣战后,意大利军队在的黎波里登陆;之后,他们又在奥斯曼帝国的多德卡尼斯(Dodecanese)群岛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当土耳其人宣布封闭黑海海峡时,俄国发现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由于没能与土耳其达成一致,它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求帮助。意大利引发了一场新的巴尔干危机。意大利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的非洲部分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并煽动其他国家认为在欧洲消除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时机可能已经到来。相互矛盾着却是不断积累的疑虑(对奥斯曼帝国复兴能力的怀疑)和恐惧(害怕青年土耳其党也许会成功地使复兴成为可能)促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于 1912 年结盟。俄国发现这将是有希望的;这一联盟将会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在巴尔干地区的进一步活动,还能

诱发土耳其人的思考，更能检验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希腊人加入了这一联盟，并开始计划他们想要的"赔偿"。这进一步暗示俄国的外交家，其结果可能有助于维持俄国在黑海海峡的利益。同样，他们也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无力帮助其他斯拉夫国家。所以，俄国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处境：需要承担起一场小国反对土耳其的可能战争。

507

最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由黑山于 1912 年 10 月 8 日挑起。面对黑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土耳其匆忙与意大利签订和约，割让了在非洲的领土。列强开始对家门口的危险感到恐惧。二元王朝认为不能允许塞尔维亚得到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就像 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认为不能允许布尔人得到太平洋的港口一样)。很快，出于对保加利亚人一路战斗到君士坦丁堡并将之占领的恐惧，俄国进入战备状态。这些反应使得协商行动更容易达成。大使会议在伦敦召开，避免了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为了将塞尔维亚与海洋隔开，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被创立，它是最后一个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新国家。这使得奥地利安心，并且，由于保加利亚终究没有能力到达黑海海峡，俄国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不幸的是，胜利者很快为了战利品争吵起来。

这引起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为了将塞尔维亚驱逐出被其武力占领的部分马其顿地区，保加利亚对它发动了进攻。紧接着是保加利亚进一步的攻击，这次的对象是希腊，同样是就马其顿提出要求。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又一次推测战争可能性的好机会；罗马尼亚则选择这一时机去进攻保加利亚(趁着它的力量陷在西方)，以使多布罗加从保加利亚分离出来；土耳其很快重新占领了亚得里亚堡。由于列强没有出面调停，保加利亚几乎失去了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得到的一切。只有德国认为必须有所动作：威廉二世促使奥地利就塞尔维亚入侵阿尔巴尼亚对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最终撤军。

这些事件在比较边远的国家显示出未来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这些大国的首都城市居民和报纸读者都对这些事件详细真实的情况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难以驾驭的小国家以意大利为榜样进一步掠夺土耳其的领土，而列强尚无法进一步阻止它们对已经认可解决的领土的侵

犯。塞尔维亚已经比原先多获得了150万的人口,但仍因为其接壤亚得里亚海的希望被阻挠而对维也纳怀恨在心,且比之前任何时候更甚。同时,维也纳对塞尔维亚野心的恐惧与日俱增;它打算与塞尔维亚和解的紧张不安的想法与15年前英国对布尔人的想法类似,虽然不是完全相同(最重要的不同是,非洲不是欧洲,而且1899年并没有其他列强认为它牵涉到自己的重要利益,所以,英国可以在不引发危及国际和平的危险下行动)。这时,保加利亚对其新邻国和一个不愿出手援助的俄国充满了新的怨恨。有一个小的抵消因素:随着英德两国在伦敦会议上的共同努力,最终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一点小的进展。它们就处置另一个似乎要崩溃的帝国葡萄牙(最后证明,它几乎是寿命最长的帝国)以及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建设提议做了秘密协商。这本应当使德国安心。不幸的是,德国的官员并非如此解读时势;他们将英国对这些问题的反应看做是其信心缺乏的一种暗示,他们满怀希望地推测,如果德国袭击法国,最终英国很有可能不会真正支持法国。

508

这一袭击在德国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长期占有基本地位。到1913年,德国的政治家开始在圈内谈论"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①],并且在一个高涨的爱国主义(作为拿破仑法国"自由之战"的百年纪念)氛围里,一项专门的军队提案被提交到德国国会。很明显,俄国的现代化(尤其是铁路的现代化)和重装军备(这将在1917年完成)警醒了德国士兵。但是,它自身很难解释德国情绪的恶化,这一情绪的恶化已经引起德国政策的危险转变,德国认为对俄国和法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德国希望其自身在欧洲的应有地位应该得到确认的话。许多德国人感受到了阻挠德国强力发挥的"包围",并且认为应当突破这一包围,哪怕只是为了尊严这个理由。其他的德国人认为在东方更加可能获得领土和物质收获。极少数人考虑到殖民的可能性,这在19世纪80、90年代已经惹来非议且困难重重,而且其结果也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殖

① 这一表达由德国国务卿在与议会代表于1913年4月的机密谈话中所使用。见F. Ficsher,《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目标》(伦敦,1967),第37页。

民竞争在最终通往战争的路上没有发挥作用。

危机及之后

到 1914 年,俄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已经少于对奥斯曼帝国的关注了。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明显加强。德国是列强中唯一一个从未占领一寸前奥斯曼领土的国家。1913 年,一位德国将军指出要控制奥斯曼在黑海海峡的力量,于是,一支德国军事代表团重组了奥斯曼的军队。相对而言,传统的与二元王朝的竞争在俄国的观念中有所减弱。但是对德国来说,接受与俄国战争的必然性给了它的盟国新的价值。这意味着,一旦战争爆发,奥匈帝国与俄国的绵长边境至少能够约束大量的俄国军队。所以,对于维也纳和俄国重新开始的对抗,德国领导者并未试图制止它,相反,还积极地怂恿。当然,它本身依旧不会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直到最后危机的最后几个小时之前,德国和其他强国都没能正视这件事。但是,一旦冲突真正开始,军事计划本身就已经使得战争很有可能发生,更何况到处都充满了危险。

的确,到 1914 年,这些危险在不断增加。匈牙利的行政管理依旧给维也纳造成困扰。匈牙利王国不仅有许多不满的斯拉夫人,还有 300 万罗马尼亚人。一位俄国大臣在访问罗马尼亚的过程中,惹人注目地跨越边界到特兰西瓦尼亚去查看二元帝国的臣民的生活状态时,便引起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警觉。因而,计划月底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的王室访问继续进行,即使维也纳的情绪已经高涨(维也纳认为,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应当同样面临着王朝内部支持民族统一运动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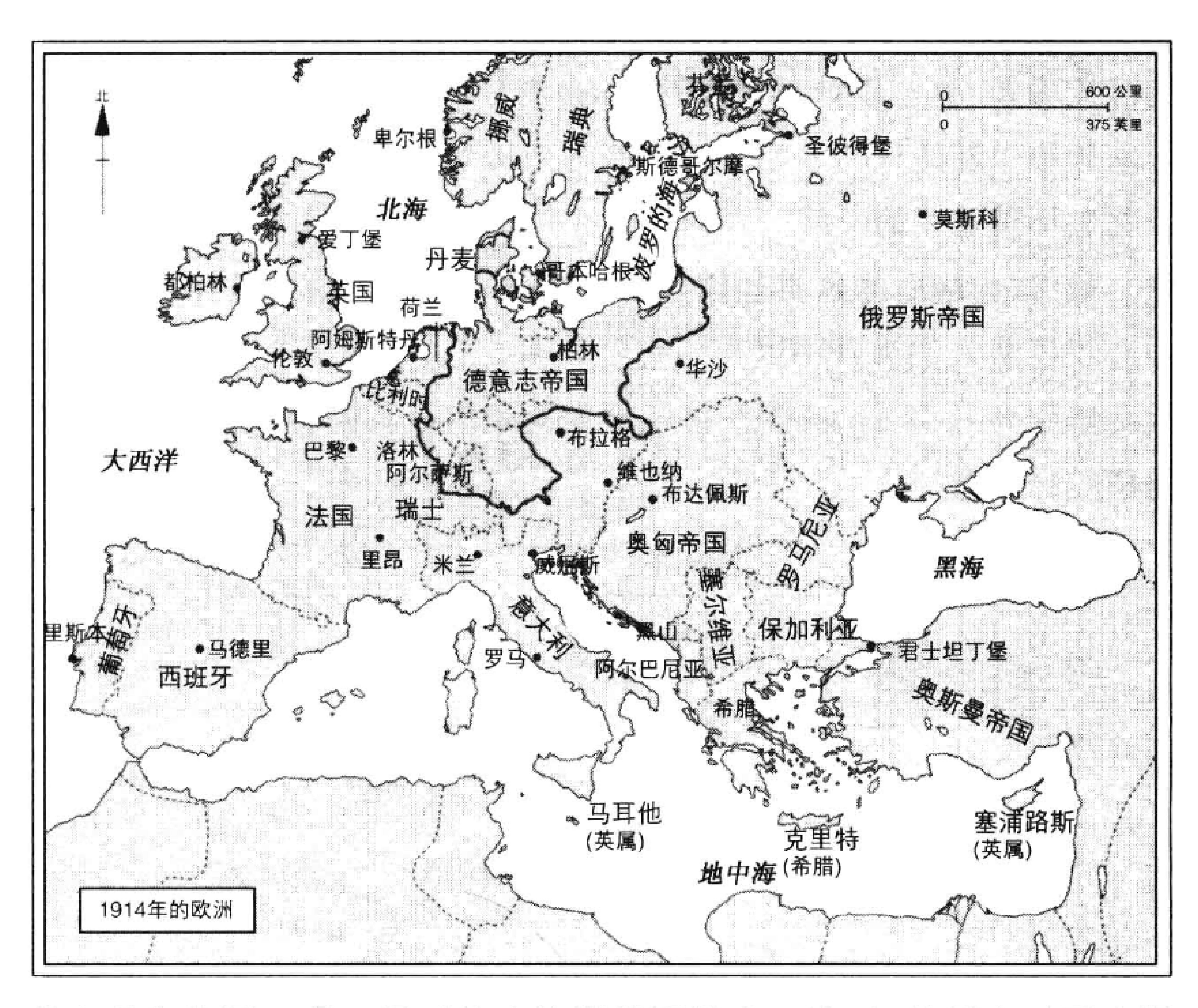
509

6 月 28 日,王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及其妻子在萨拉热窝的访问几乎刚刚开始,二人就被一个年轻的波西尼亚的塞尔维亚族恐怖分子所枪击致死。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团伙中的一员,那天这个团伙已经无法按照原计划执行刺杀;当时出现了一个意外,这名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补救其同伙的失败。维也纳立刻感到,同塞尔维亚清算的时刻到了。塞尔维亚的特工被认为是幕后指使(他们中

的一些人的确与恐怖分子有联系,但是没有必要经过塞尔维亚政府的委任)。当德国立刻热情支援,对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典型的是,威廉二世及其总理在未经过咨询德国外长的情况下提供了这一援助),其审慎的商讨却悄无声息。德国希望俄国感到无力支持它的斯拉夫弟兄——并且,像 1909 年那样接受这一结果——但是,如果俄国不这样,德国的将领们已经准备好了作战。7 月 23 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政府发出了一个侮辱性的最后通牒,要求它采取行动反对已经介入塞尔维亚政府内部的南斯拉夫恐怖主义。俄国建议塞尔维亚不要抗拒,英国提出要做调停人。塞尔维亚接受了大部分的条款。然而,已经决定在这时将塞尔维亚一举消灭的二元王朝,几乎没有等待任何进一步的声明就于 7 月 28 日对塞尔维亚宣战。

德国对奥地利的支持使得这一结果不可避免。至此仍不确定的是谁将会参战。德国的军事计划总是自然地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交战,那么法俄联盟迟早会起作用。德国将领已经得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德国不得不两线作战,那么就必须在俄国缓慢的动员能够为其盟国提供有效帮助之前打败法国。在东边,空间和俄国行政与物质上的落后将在一段时间内有利于德国。因而,德国总参谋长从 1891 至 1905 年就已经在酝酿一个闪击法国的计划,其目标时间甚至比 1870 年所计划的还要快。但是,这要求一个借道比利时的巨大的侧翼包围,而比利时是国际担保下的中立国家。它提高了英国介入以保卫比利时中立的可能性。施里芬计划(1895 年以德军总参谋长的名字而命名,那一年它获得正式通过)承担了这一危险,德国将领也因而承担了战争扩大的风险。

510 一旦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便立刻开始动员。尽管如此,它仍是谨慎控制的;只有可能需要去压制二元王朝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即使有这些自身强加的不利因素,但这对柏林来说也已足够了。德国在 7 月 31 日发布动员令,并在第二天对俄国宣战——虽然其盟国奥匈帝国仍在只是对塞尔维亚而不是俄国的战争中。德国要求法国宣布中立。法国的回复审慎且不具有煽动性;因而,一场所谓的法军对纽伦堡



的空袭为德国8月3日对法宣战提供了说辞。这时,德国在对两大强国作战(这是由它自己发起的),而奥匈帝国的作战方却没有一个强国。

英国立刻警告德国,禁止其在英吉利海峡进行对抗法国的海军行动,但是也仅限于此。虽然一些人认为这个国家应当在勇敢面对德国上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许多人不这么认为。法国感到惊愕。8月3日,德国对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其境内为德军开辟一条无障碍通道,这解决了英国政府的难题。第二天,英国要求比利时中立(英国被尊为比利时中立的担保人)。德国对这一要求不予理会,接着,英国对德宣战。因而,德国使得第三个强国成为自己的敌手,而奥地利仍然一个也没有面对。 511

虽然这一系列事情是不幸的,但是里面充满了矛盾。最后,法俄联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德国在它可以起作用之前就对法宣战了。英国在8月4日对法俄仍然没有条约责任,无论法俄对前者承担着怎样的道德责任;英法军事对话只是由于德国的军事计划而成为现实,这一计

划给了英国政府一个机会,未经严肃的讨论、在一致的公众舆论(就像到今天为止,这些事情仍然是可能的)的最前方加入了战争,以保卫国际法则和小国的权利为名义。这些与殖民竞争和海军竞赛(过去看来常常破坏英德间的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毫不相关,与联盟体系也毫无关联。最终,当最后的危机显露出来的时候,40 年来令人担忧的外交的中心议题从人们视野中退出。直到 8 月 6 日,二元王朝最终对俄国宣战。直到 8 月 12 日,英国和法国开始对奥宣战。归根到底,这场大战是由柏林制造的。

第二十四章　欧洲革命

512

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主导权在 1900 年是国际秩序的基础，而在 20 世纪却被一扫而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是世界史和欧洲史一个阶段的终结。这一进程伴随着欧洲内部的革命，它参差而又凌乱，但其影响证明，无论是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和文化的变革意义上，它的确是革命。矛盾的是，20 世纪的主要特征是越来越广大的非欧世界对欧洲思想、制度和标准的日益热情的接受，而这使得欧洲人丧失了作为其文明根基的众多设想和信念的信心。

在这些巨大的转变中——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根源被证明隐藏得很深——世界大战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催化剂。在地理范围上，它很快蔓延开来。日本和奥斯曼帝国很快加入战争，前者加入了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的组合)一方，后者加入了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得到协约国保证其得到奥地利领土的许诺后，意大利在 1915 年背弃了前三国同盟的盟友而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参战国通过提供在胜利的和平到来之后可以兑现的支票而获得新的支持，意大利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保加利亚在 1915 年 9 月加入了同盟国，而罗马尼亚在第二年加入了协约国。希腊在 1917 年成为协约国一员。葡萄牙政府试图在

1914 年参战,虽然由于内部动乱而未能遂愿,但最终还是于 1916 年应对德国的宣战。因此,至该年年底,最初的问题完全被其他争端搅浑。巴尔干国家正在进行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最后一场欧洲的奥斯曼继承战争),英国正在对抗德国的霸权及其开始显现出来的海军强力,意大利则开始了其最后一场复兴运动的战争。同时,英国、俄国和阿拉伯开始瓜分奥斯曼在亚洲的部分,而日本开启了其帝国在远东的另一个代价低廉却收益丰厚的扩张时代。

513 1915 年和 1916 年参战国急于寻求同盟的一个原因是,到那时为止,战争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它陷入了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困境。战争的性质令人吃惊。德军原计划闪电入侵法国北部却没有完全成功,虽然除了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一小部分,其余都纳入了德国的领地之中。在东线,俄国的早期攻势被德国和奥地利遏止。此后,虽然西线比东线更惹人注目,但由于现代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战场似乎陷入了规模空前的围困战争中。连发步枪、机关枪和带刺铁丝网能够在粉碎轰炸实施前阻止任何的步兵攻击。伤亡人员的名单证实了这一情况。到 1915 年底,仅法军就阵亡了 30 万人;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在 1916 年,凡尔登战役前的一场长达七个月的战役中,又有 31.5 万法军死亡,同时有 28 万德军阵亡。这种情况依然在继续,另一场发生在更北部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国阵亡、伤残和失踪的人数达到 42 万,德军的伤亡与此不相上下(仅在战争第一天,英军就有 6 万人受伤,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死亡)。

战前人们认为,现代战争的消耗必然使任何斗争都很短暂,但不久这一判断及基于这一假设的政府政策就被证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914 年 7 月战争前夕,德国仍然在进口谷物;没有任何粮食管理或对工业经营的计划:“即使我们的弹药也没有为一场长期战争作准备”,一名德国政治家如是说[1]。然而,接下来工业社会所显示出的庞大的

[1] F. 亨利·柯德·迈耶:《德国思想和行动中的中欧: 1815—1945》(海牙: 1955),第 123 页。

财富和战争能力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到 1916 年底，参战国家充分证明了其远比想象中更为强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征召和组织自身的能力，它们为新的军队提供了空前数量的武器和新兵。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参战；1916 年初，英国军队仍是志愿军，而当征兵制（这在 1914 的欧洲大陆强国中早已成为传统）被采纳的时候，这一政策由于政治原因而不适用于爱尔兰。另一方面，英国在战争初期仍有进口税，而法国则没有，由于战争，其标准税率从原先的不到 6％涨到了 1914 年的 25％。全社会都在竞相动员国民；由于工人阶级坚持反对战争，其国际性团结可能从未被考虑到，统治阶级对它们的反对颠覆的国际性利益也从未加以考虑。一个英国公务员谈论到英国粮食部时，说它像是"完全的压制性的私人企业"[①]。这种说法是夸张的，但是战争使大部分欧洲在实践中首次尝到了社会主义的滋味。

514　无法在战场上通过猛击而使对方屈服，这使外交家们不断寻求新的盟友和将领。1915 年，协约国对达达尼尔（Dardanelle）进行攻击，希望能够击败奥斯曼帝国并从黑海开辟与俄国相联系的交通（这一希望没有实现）。之后，对撤退路线的搜寻使得不久之后在萨洛尼卡（Salonika）产生了一条新战线，并因此取代了在塞尔维亚战败后业已衰落的那条。同样，殖民领地也确保了战争从一开始就将是世界性的，即使比在欧洲的规模要小。德国的大部分殖民地都很容易占领，这多亏了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虽然在德国的非洲殖民地激起了一些更为长久的战役。欧洲之外最为重要和规模庞大的行动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和南部。一支英印联军进入了伊拉克（那时还被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另一支军队从苏伊士运河向巴勒斯坦进军。沙漠里一场阿拉伯反对土耳其的叛乱为减轻工业化战争的残暴血腥增添了一段小小的浪漫插曲。

到 1916 年，欧洲的食品加工厂、制造厂、矿井和锻造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运转着。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前者原本是中立的，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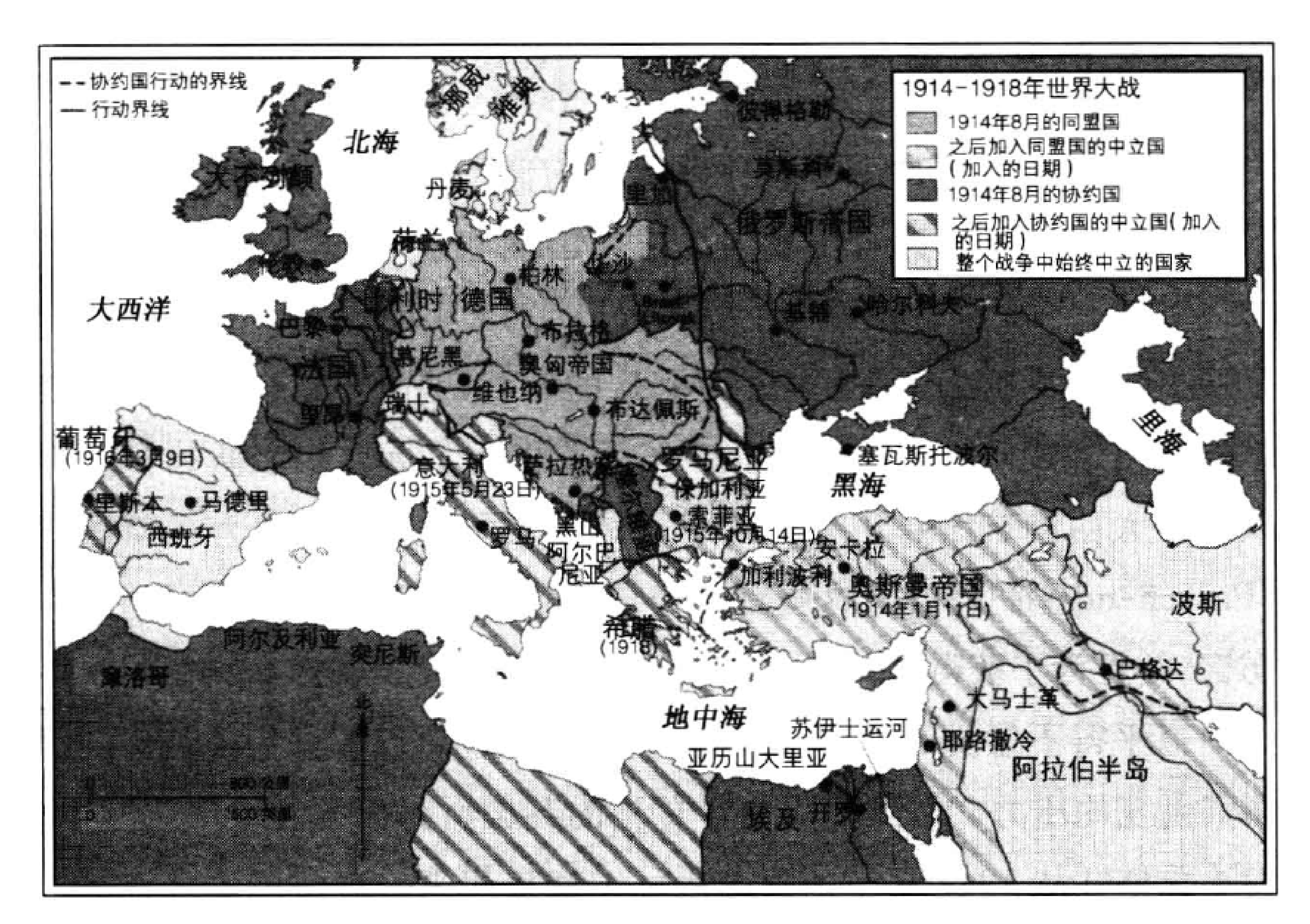
① W. H. 贝弗里奇：《英国的粮食控制》（伦敦：1928），第 338 页。

多亏了英国的海上力量,它更加同情协约国而不是联盟国。维持数以百万人作战所需的并不仅仅是武器和弹药,还有大量的食物、衣物、医疗设备以及机器。虽然战争耗尽了数百万的畜力,但它同样是第一场使用了内燃机的战争;卡车和拖拉机大量消耗石油,就像马和骡子食用饲料一样。需求的大量增长反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在各个国家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劳动力的配置(有时是征用)、妇女雇佣制度的革命化以及新的卫生和福利服务的引入。这些同样传播到海外。随着协约国将其投资出口到美国以支付它们所需,美国不再是一个债务国,协约国反而成了债务国。印度工业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刺激。阿根廷和英国自治领的大农场经营者和农民的辉煌日子也到来了。后者同样要分担军事负担,需要派兵到欧洲并且抢占德国的殖民地。

技术发明使得战争耗时耗力。这不仅仅是因为机关枪和烈性炸药使得杀戮可能更加残忍,也不只是因为如毒瓦斯、火焰喷射器或坦克这样的新式武器,这些武器是为了帮助士兵努力突破战场僵局而发明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参与了战争并且同时成为战争行动的目标。以平民工人和选民的斗志、健康和效率为目标,攻击以封锁、偶尔是直接轰炸或是空袭的形式进行。当这些行为遭到谴责的时候,谴责本身就成为另一场战役的武器,即宣传的战争。为了争取大众舆论,大众文学和新近发明的电影业可能补充或替代了旧的方式,如讲道坛和学校。英国人控告对伦敦施以空中轰炸的德国人是杀婴犯人,而德国人反驳道,也可将同样的指控给予维持英军封锁的水手。德国婴儿死亡率日益增长的数字证实了这两种指控都是正确的。

515

英军封锁的缓慢收紧似乎给德国带来了不可抵抗的束缚,另外,由于德国不想使战舰陷入险境(它们的建造严重损害了战前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感情),德军最高司令部开发了一种武器的新用途,其威力在1914年尚未被重视——潜水艇。它对协约国商船以及为协约国提供补给的中立国船只发动袭击,并且经常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向非武装船只发动袭击。这最早发生在1915年早期,虽然由于其数量尚少而



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那一年，一艘巨大的英国班轮遭到鱼雷袭击，使得 1 200 人丧失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在遭到了强烈抗议之后，德国宣布取消无限制潜艇战。然而，到 1917 年初，人们很清晰地看到，如果德国不先使英国人饿死，那么它自身将因英国的封锁而窒息。这年冬天，巴尔干国家和维也纳都遭受了饥荒。法国已经伤亡 335 万人，英国超过 100 万人，德国将近 250 万人。德国仍在两线作战，而这是施里芬计划原打算避免的，罢工更加频繁；婴儿死亡率比 1915 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认为德军东西两线作战要比英法这样做更容易实现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比起在西线防守地区作战，这似乎更有利，德军总参谋部在这些情况中选择了重新开始无限制潜艇战。 516

这带来了战争的第一个革命性转变。无限制潜艇战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公民的安全。德国知道这将使美国卷入其中，但是它下了赌注，要在美国下决心参战前让英法向自己跪地求饶。当美国政府同样发觉德国希望与墨西哥和日本商讨建立联盟来对抗美国时，由潜水艇引起的敌对变得更加坚定。不久，一艘美国船只在没有得到警告的情况下被击沉，在那之后不久的 1917 年 4 月 6 日，美国宣布参战。

战争的革命化

通过短期的全面战争来打破欧洲的僵局是不可能的了，这将新大陆吸收到了旧世界的征战中。协约国满心欢喜；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然而，一场不同类型的斗争代替了1914年的计划。英国和法国很快就面临甚至比1916年更加黑暗的年代。不仅仅是因为掌控潜水艇花费了数月时间（直到1917年5月引入了远洋护航队才开始得以保护大西洋航线），还有法国一系列可怕的战争（统称为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这些都给英国的国家意识造成了不可消除的伤害，并且为了获得5英里土地又使40万人丧生。英国统帅坚持执行这一似乎得不偿失的浪费其军力的行动，部分可以解释为他们想要缓解其盟友的压力。法国军队由于早先的英勇行为而疲惫不堪，此时不得不重整并从1917年一系列的叛乱中恢复起来。对协约国来说最糟糕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崩塌。

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的领袖、正流亡瑞士的列宁说道，他这一代人将不能活着看到俄国爆发革命。然而，到那时为止这个帝国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俄国革命的发起者是德国军队。最后，战争使即使是长期坚持的俄国士兵也感到伤心。他们的家人在挨饿（虽然粮食产量的确减少，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交通系统的瘫痪）。统治他们的政府不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并且贪污腐败，像害怕战败一样害怕宪政和自由主义。1917年初，保安部队自身也不再可靠。2月，粮食暴动爆发，紧接着是兵变。专制政府瞬间变得毫无力量。一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临时政府组建起来，沙皇宣布退位。新政府蹒跚而行，最后倒台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它试图做它做不到的事情——继续这场战争。俄国人想要的是和平与面包，就像列宁（这时他已经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从流亡中回到了俄国）所认为的那样。他决心并准备从温和的临时政府手中武力夺取政权，这是临时政府失败的另一个原因。要主持一个分裂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军队，还要面对城市里没有解决的贫困问题，临时政府在第二场变革中自己退缩了，这场政变被称为“十

517

月革命”,与美国的参战一同标志着1917年成为欧洲历史的断层线。先前,欧洲的事务由它们自己解决;现在美国势必对其未来有着更多的发言权,俄国成为一个由其建立者的信仰支持的国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目标是对整个战前欧洲旧秩序的毁坏,它是世界政治的一个真正的和有意识的革命中心。这是战前的社会主义者所从来没有梦想过的。

新俄国(它从1923年开始被称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建立的最直接而明显的后果是一个新的战略局势。布尔什维克通过解散(既然不能控制)基于全民选举的(1990年之前都未实现)唯一的自由选举的代表机构来巩固他们的胜利,并通过许诺土地与和平来获取农民的支持。如果他们能够坚持下去,这将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努力掌控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支柱只有一些城市中小规模的工人阶级。和平谈判开始了,但是最初德国要求的条款引起的争议如此之大以至于俄国退缩了;不久他们就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性后果。1918年3月,《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使俄国人丧失了大片领土,但是也使他们获得了和平的新秩序以及它急切需要的处理内部困扰的时间。

协约国暴怒了。它们将布尔什维克的行为视为一种背叛。俄国对他们的国民的革命宣传也未能缓和协约国对这一新政权的态度。俄国领袖期待一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工人革命。这给协约国对俄国的一系列军事“干涉”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些军事“干涉”开始于1918年8月英军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登陆和日本在西伯利亚的挺进。其最初的目的是战略性的,为了阻止德国趁机结束东线作战,但是这一行动很快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和全体布尔什维克解读为反共产主义的征服运动。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卷入了内战,这对新政权来说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即使是没有列宁及其同僚借以观察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渗入,这些事件似乎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腐蚀新俄国与其原盟国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这意味着一个必需的、不可预知的、不能根除的敌意的实证。他们的记忆长久地扎根于苏维埃的理念中。这也有助于说明俄国革命返回到专制政府的原因。作为旧秩 518

序的修补者和地主阶级的保护人,他们对入侵者的恐惧,加上俄国的专制和警察恐怖主义传统,扼杀了新政权自由主义化的任何可能性。

革命和战略

布尔什维克坚信革命即将在欧洲其他地方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关键的地方是错误的。战争的最后一年,欧洲革命的可能性的确开始清晰显现,但是是以民族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协约国自己形成了(部分是被布尔什维克所激起的)一个革命的策略。1917 年底的军事形势对它们来说是黯淡的。很明显它们将要在春天面临德军对法国的攻击,而且没有俄国作为盟友来帮助分散敌人的力量。同样,距大批美国军队到达法国予以支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呼吁颠覆奥匈帝国的民族主义潜在势力看来很有吸引力;革命也成为协约国的一种策略。在美国眼中,这有助于进一步强调协约国在意识领域的地位,因为此时他们已不再与集权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额外的好处。相应地,1918 年宣传直指奥匈帝国的军队,对捷克和南斯拉夫流亡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资助也在进行中。其结果是,民族感情再度觉醒,加上最终使得协约国在德国投降前获胜的巴尔干战争的联合作用,二元王朝逐渐瓦解。这是旧欧洲的第二场重大的革命。接邻乌拉尔、波罗的海和多瑙河平原的整个地区,其政治结构在这时遭到了质疑,而这是之前几个世纪都没有的。甚至一支波兰的国家军队也重新出现,德国对其进行资助以作为对抗俄国的武器,同时,美国总统宣布一个独立的波兰是协约国缔结和约的必要条件。1914 年东欧和中欧的所有政治必然性似乎都被放入了熔炉之中。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也已经成为问题的主题。青年土耳其党充满了乐观主义,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和外交影响是长期而潜移默化的,1914 年 9 月几艘德军战舰出乎奥斯曼帝国意料地到达黑海海峡,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加入了战争。在其战舰轰炸了俄国港口的几周之后,

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直至英国参战,其支持奥斯曼帝国反对俄国的历史残留也消失了。英法背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外交政策,它们与俄国签订了秘密协定,承认其在和平时期应占据君士坦丁堡。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另一个严酷的后果紧随其后。虽然协约的达成和在摩洛哥的胜利消除了法国对埃及的虎视眈眈,但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倾向于重新建立法国在黎凡特地区传统的特殊地位。一些狂热者幼稚地玩弄着召唤圣路易和十字军的把戏,这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无可否认,法国政府宣布对奥斯曼领地天主教的特殊保护已经长达一个世纪左右,尤其是对叙利亚(拿破仑三世在 1860 年向该地派驻了一支军队)这一能够激起一些法国人热情并充当外交杠杆的地方。当时的文化影响通过黎凡特地区法语的广泛使用和法国资本的大量投资表现出来,而这些同样尚未引起重视。

519

然而,1914 年土耳其在欧洲之外的主要军事对手可能是高加索地区的俄国和西奈沙漠的英国。人们很快就清楚苏伊士运河并没有受到奥斯曼军队的威胁。但是,接下来的事情暗示着其他新的因素将进入到这一平衡中。它们意味着整个近东地区的变革。1914 年底,一支印英联军在巴士拉登陆,以保卫来自波斯的石油供应(这时的皇家海军的新建船只都是用石油燃料发动的),这是这一地区历史命运中石油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开端,其全部意义直到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才能显现出来。另一个新的因素是英国决定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或者可能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东西加以利用。

随着欧洲的战争越来越血腥但却始终无果,打击德国盟友的计划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欧洲人在 1915 年试图通过海陆联合作战而威胁达达尼尔海峡、希望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打开一条通向俄国的新道路,但最终陷入泥潭。赢得阿拉伯盟友的行动受到限制,但是却在 1916 年初与侯赛因(麦加首领)达成了合作。由于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这一合作需要与法国协商。英国和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也为将来留下了许多未决的问题,包括伊拉克的地位,但是胜利后应当建立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这一提议,这时已得到协

议双方的同意。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计划已经成为现实。

许诺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挑战。阿拉伯叛乱仅仅是战争的主要舞台上的小插曲,虽然其规模浩大并成为一个传奇。不久,英国感到他们必须承认侯赛因为汉志(Hejaz)的国王。1917 年,英军和帝国军队奋力前进攻入巴勒斯坦,占领了耶路撒冷。1918 年,他们将要与阿拉伯人一同进入大马士革。然而,在这之前,美国参战;在对战争目标的陈述中,威尔逊总统说道,他赞成奥斯曼帝国内非土耳其民族的"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自治进程"①。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布尔什维克公布了其前任统治者秘密外交的俄方记录,并揭露了英法对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的提议。

520

这些提议中的一部分是同意巴勒斯坦应当处于国际共管。另一个刺激了阿拉伯人感情的事件是,英国政府宣布其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1917 年 11 月的《贝尔福宣言》可以算做是到那时为止锡安主义最大的胜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背离对阿拉伯人的许诺,但是阿拉伯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总统也加入进来,他提出了保护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条件,这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随着战争走向结束,奥斯曼统治替代品的本质变得非常混乱和不确定。能够确定的是,"东方问题"再一次有了新的形式。

第一次德意志战争的结束

西线的重要战役在这一日益激烈的革命背景下进行。到这一年夏天,协约国已经能够阻止德军最大的攻势。德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仍不满足。当协约国军队反过来开始胜利前进,而德国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德国领袖试图寻求结束战争;同样,他们也考虑到了他们所见到的革命的迹象以及在本土的革命迹象。德国皇帝宣布退位,第三帝国结束了;哈布斯堡王朝已经衰落了,而霍亨佐伦王朝刚刚从其老对手手中

---

① 见"十四点"第 12 点,例如引自《美国历史的演讲与文件》(第四卷,1914－1939),R. Birley编,牛津:1942 年,第 41 页。

逃脱出来。新的德国政府要求休战;这很快得到认同,战争走向结束。

大战的消耗从未被精确计算过。然而,其规模已经足够清晰：大约1 000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疾病方面,仅在巴尔干地区,伤寒就可能使100万人丧生。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死于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从表面上看是战争在欧洲的起点,也是参战国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个——相当于其1914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即使是这些可怕的数据也还没有完全表明残疾、失明的身体损伤,失去父亲和丈夫、子女及其爱人的家庭的损失,以及对理想、信心和善念毁灭性的精神浩劫。欧洲人看着他们巨大的墓地和医院,感到惊骇。经济遭到的破坏也是巨大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挨饿。战后一年的制造业的产出量还不及1914年的四分之一;俄国只有那时的五分之一。一些国家的铁路和水路运输几乎完全瘫痪。国际贸易复杂而脆弱的机构被粉碎了,其中一些永远无法被替代。处在混乱中心的是一个筋疲力尽的德国,它曾经是欧洲经济的发动机。"我们处在财富的萧条期",一个年轻的参加了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这样写道："我们对自身物质安乐这些最紧迫的问题之外的感觉和关注暂时失色了……我们已经超出了承受的限度,需要休息。在当下生活的人们的一生中,人的灵魂中的普世因素从来没有如现在这般闪烁得如此朦胧。"[①]

521

和约的签订

1918年底,巴黎和会的代表已经在巴黎聚集。他们的失败将会是巨大且显著的,但他们所面临的任务的重要性、其远景和应得的认可,应当使他们的作为受到尊敬。这是自1815年以来最重大的和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不得不协调人们对难以应对的事实的巨大期望。做主要决定的力量非常集中：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和美国总统主导了谈判。这是胜利者之间的谈判;战败的德国随后出席有关其问题的协商。一个关于欧洲安全的中心问题存在于有分歧的法国利益和盎格

① J. M. Keynes:《和约的经济影响》,伦敦：1919年,第278页。

鲁-撒克逊国家的利益中,前者特别注意要避免德国侵略,第三次重复这一可怕的危险,而后者则要当心不陷入到这样的危险中去,但是许多其他的问题环绕并遮盖了这一问题。相当重要的是,和约是一个世界性的条约。它不仅处理欧洲之外的领土问题——就像以往大的和约那样——许多非欧洲国家在条约的形成过程中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签署主要条约的 27 个国家代表中,有 17 个国家是其他大洲的。美国是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它与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一起成立了一个被称为"主要"战胜国的小组。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条约,没有来自俄国的代表参会是不幸的,而它是唯一拥有欧洲和亚洲疆域的大国。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个包含了一组不同条约的和约不仅是与德国签订的,还是与保加利亚、奥斯曼土耳其和替代了二元王朝的继承国家签订的。这些国家当中,复兴的波兰、扩大的塞尔维亚、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协约国出席了和会,而被大大削弱的匈牙利、日耳曼中心的奥地利则被作为战败的敌人来对待。所有的这些带来了棘手的问题。但是,和会的主要关注点是与德国签订的条约,这一条约于 1919 年 6 月签订,被包含在《凡尔赛和约》中。

《凡尔赛和约》有意地具有惩罚性质。它同样明确指出德国要为战争的爆发负责。这一联系是令人误解和遗憾的,因为这一最为严酷的指责并非出自对道德过失的推测,而是出于法国的愿望,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因此束缚住德国以打消这两个国家间任何第三次战争的可能性。边界被重新划分,它并不只是为了纠正 1871 年的不公正,更是为了削弱战败国。经济赔偿的目的也是如此,条约所规定的德国对协约国的赔偿要花费数年。经济赔偿是和约中最欠考虑的部分,这一经济上的无理要求激怒了德国人,使得他们更加难以接受战败,因为这使得他们的个人经济变得极为困难。协议似乎也并不能保证将来德国不会用武力颠覆这一决定,除非战胜国准备好要对德国进行长期占领。德国如此之快地接受了休战协议,因为它意识到了在德国土地上作战的军事失败,以及其军队被明显毁坏的现实。不用说,德国丧失的领土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其他的丧失在东方最为巨大(割让给波兰);在西

522

方，让法国感到最为确定的担保是莱茵河德国沿岸的"非军事化"，以及协约国对特定地区的暂时占领。但它仍然认为这是不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和约的签订

年份	日期	事件
1918	3.3	德-苏《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4.10	罗马召开奥地利臣民会议。
	5.7	德国-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条约》。
	6—9月	协约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独立。
	9.30	协约国签署对保加利亚的休战协议。
	10.29	南斯拉夫宣布独立。
	10.30	协约国签署对奥斯曼帝国的休战协议。
	11.3	协约国和奥匈帝国间的休战协议。
	11.9	德意志共和国宣布成立。
	11.10	罗马尼亚作为协约国一方重新参战。
	11.11	30天的休战结束了西线的战争。
	11.13	奥地利共和国宣布成立。
	11.16	匈牙利共和国宣布成立。
1919	1.18	和会在巴黎召开。
	6.28	与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9.10	与匈牙利共和国签订《圣日耳曼条约》。
	11.27	与保加利亚签订《纳伊条约》。
1920	6.4	与匈牙利签订《特里亚农条约》。
	8.10	与奥斯曼王朝签订《塞夫勒条约》。
1921	3.16	土耳其的凯末尔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
1923	7.24	《洛桑条约》以及新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之间最终的和约条目。

523

和约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它接受了自决原则和民族原则。有时这只是简单地意味着承认现有事实；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和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南斯拉夫将来也要以战前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为核心建立。1918年底，这些原则已经在旧的二元王朝的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地位(不久之后俄国的前波罗的海省份也将如此)。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也瓦解了；其继承国(虽然不是连续的)则比它们长久，存活了近一个世纪。

不幸的是，民族原则并不总是有效的，虽然自决原则允许特定的地区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现实打破了民族原则理念。当这一原则胜过了这些现实——就像在多瑙河经济统一体的破坏中的那样——结果可能是糟糕的；当现实胜过原则

的时候,结果可能同样糟糕,因为它给人们留下了愤愤不平的感觉。东欧和中欧散布着拥有着充满怨恨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这些少数民族对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忠诚可言。波兰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讲波兰语;超过三分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由波兰人、俄罗斯人、日耳曼人、马扎尔人和鲁塞尼亚人组成;扩张了的罗马尼亚现在包含了超过 100 万的匈牙利人。在一些地方,对上述原则的违反被尤为尖刻地认为是一种不公正。德国人憎恨现存的、通过原先的德国土地连接波兰和波罗的海的"走廊",意大利则深感失望,因为盟国在需要其帮助时所许诺的亚得里亚海并未兑现,爱尔兰最后仍然没有得到地方自治。

在处理前德国殖民地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发明。旧式的殖民体系并不为美国所接纳;相反,对之前处在德国和奥斯曼统治下的非欧民族的监护,由托管制度予以保证。委托管理将正准备自治的领土交给战胜国(美国拒绝了所有交给它的)去管理。托管体制是从和约中诞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想法,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是欧洲帝国主义被体面遮掩的最后一次扩张。这在前奥斯曼土地上最为明显。对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托管(在一段时期内)决定了数百万阿拉伯人陷入英法政策的矛盾中的命运。在奥斯曼的阿拉伯臣民的政治追求觉醒之后,贝尔福宣言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而许多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在这一时期的问题被遗留给了托管强国。

国际联盟与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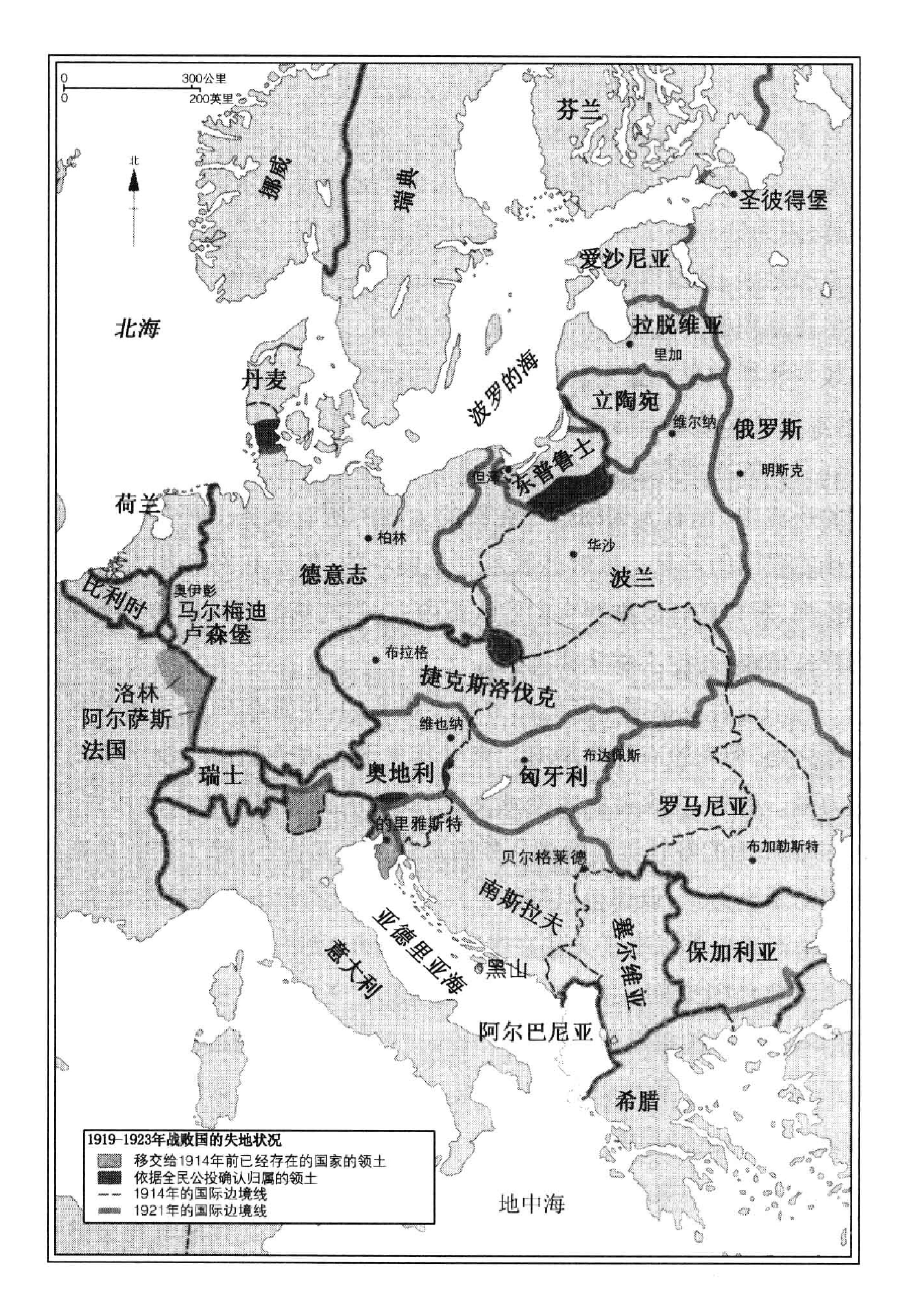
一个最具创造性的理念在巴黎得以制度化,它同时也是和约中最具创造力的部分:国际联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热情,他确保了《国联盟约》(国际联盟的章程)作为《凡尔赛和约》第一部分的首要地位。这个名称是重要的;它进一步正式宣告了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超越了欧洲;它是新时代的另一个标志,其最初的 42 个成员国中有 26 个都是非欧洲国家。不幸的是,美国并不在其中,这是国联的几个重大的弱点中最致命的一个。然而,也许它本来就不能满足其自身唤起的所有期望。

524

国联的另一个缺席者是新俄国。同样,它也没有出席巴黎和会,而它的缺席的意义甚至比美国更为重大。塑造了欧洲历史新阶段的政治协商并没有咨询苏维埃的意见,虽然它们要求在东欧划分边界,而这是任何俄国政府都必定会非常感兴趣的。的确,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为其被排除在外提供了原因。他们通过革命宣传与主要的强国交恶,因为他们坚信资本主义国家决意推翻他们。在与这个新政权打交道的时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威尔逊事实上比许多同僚和选民更加灵活——甚至是同情。另一方面,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则激昂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也因而获得了许多法国投资者的支持(凡尔赛会议是第一场由长期认识到使国内选民失望的危险性的政治家们召开的欧洲和会)。但是,不管谁承担怎样的责任,结果是,在新欧洲的形成中,没有人询问这个在新的大陆的所有事务上都有着最重要分量的强国的意见。虽然苏联当时是弱小的,但是它将会加入到对条约不满、想要修订或推翻它们的队伍中去,它的统治者厌恶和约所保障的社会体系,并拒不承认和约。

和约饱含着希望。它们通常是不现实的,尽管和约有显而易见的失败之处,但它也有好的地方。有时其失败是因为超出了制定者的控制力量。首先,在狭隘的政治意义上,欧洲的世界霸权被大战所终结。1919 年和约的签订者在欧洲之外的影响力极其微小,除了在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之上,但那也只持续了几十年。旧的帝国警察或是消失了,或是被严重削弱以至于无法在帝国内部运作,更不用说在帝国之外了。欧洲需要美国来确保德国的溃败,但现在它正准备将自己陷入一段时期的不切实际的孤立当中。布尔什维克俄国也从未想过帮助欧洲稳定下来。一方面是其国家力量的内收,另一方面是其意识形态的无用状态,使得这个大陆只能寻求自保。一旦没有革命在欧洲爆发,苏维埃领导者就奉行孤立政策;威尔逊给了美国一个参与维持欧洲和平的机会,但是美国人民拒绝了。这两个决定都不难理解,但是其影响将会造成一种错觉。大多数欧洲政治家相信其事务是自主运行的,但它已经不再是现实的,也不再是解决其问题的恰当框架。 526

525



0 300公里
0 200英里
北
芬兰
挪威
瑞典
圣彼得堡
爱沙尼亚
北海
拉脱维亚
里加
丹麦
波罗的海
立陶宛
维尔纳
俄罗斯
东普鲁士
明斯克
荷兰
柏林
华沙
德意志
波兰
比利时
奥伊彭
马尔梅迪
卢森堡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
洛林
阿尔萨斯
法国
维也纳
布达佩斯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罗马尼亚
的里雅斯特
布加勒斯特
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
亚德里亚海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意大利
黑山
阿尔巴尼亚
希腊
1919–1923年战败国的失地状况
移交给1914年前已经存在的国家的领土
依据全民公投确认归属的领土
1914年的国际边境线
1921年的国际边境线
地中海

526 和约最严重、最直接的弱点是其所假定的新结构的经济脆弱。1914年复杂却卓有成效的体系被无可挽回地毁坏了。战后的国际交易被严重增长的限制所束缚，因为新的国家要通过关税和交易管制来努力保护其新生的经济，大一些和更古老一些的国家则试图修复其破碎和衰弱的经济。健康的货币体系被通货膨胀一扫而空。《凡尔赛和约》通过加重德国负担而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国家，而现在背负了无限的实物和现金赔偿的负担。这不仅扭曲了其经济发展，使其复苏延后了很多年，而且在骇人的通货膨胀到来之时，剥夺了许多能够刺激经济运转的因素。在东方，德国最重要的潜在市场——俄国，几乎被完全阻挡在其边境之外，几乎没有贸易；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是德国商业的另一个重要地区，但或被分裂或穷困潦倒。这些困难被美国愿意出借的资金（虽然并不要求欧洲以货物偿还，但事实上已推后了其关税壁垒）逐渐克服。但是，这带来了对美国持续繁荣的依赖的危险。

民族自决也有其缺陷，那就是它经常使得经济混乱不堪。但是，很难看到有什么理由去反对民族自决原则。协约国的胜利与和约缔结的修辞，使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巨大胜利。四个集权的，或者说不民主的、反对民族主义的狭隘的帝国倒塌了，而至今为止和约仍保持其特性，即历史上唯一的、由全部是民主政体的强国所缔结的和约。自由主义式的乐观主义也从威尔逊惹人注目的单纯上得到了大力体现；他竭尽全力想让人们明白，美国参战的性质和协约国有着根本的不同，是被高尚的理想和信仰所鼓舞的（他令人厌恶地不断重申这一点），这一信仰即如果其他国家能够放弃其古老的有害的方式，那么这个世界能够为民主政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些人认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新的国家（尤其是德国）采纳了自由主义、议会宪政并常常是共和主义的形式。最后，还有国际联盟的幻想；这个建立一个新的非帝国的、超越民族国家权力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

所有的这些都植根于谬误的前提。原则在实践中被严重玷污。和约的缔结使得不满的民族主义充斥着各处；它在德国制造了新的、激烈

的民族主义愤恨。也许这并无实际作用,但它是许多自由主义之外的东西得以生长的土壤。更何况,新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此而言,古老的国家的也是同样)在一个贫穷、苦难和失业加剧了政治斗争的世界里起步,在很多地方,对民族主权的崇拜所造成的特殊的混乱,使得这种情形更加恶化。在战争中旧式经济交易模式被打碎了,这使得在国家内部处理农民贫困和失业问题更为困难;俄国曾经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粮仓,但现在在经济上很难再现。这个背景是革命者所能够也将试图利用的。

527

如此之多的国家抱有修订和约的野心,至少包含着妄图如此的有着重要地位的少数派,这大大增加了革命者的机会。许多意大利人将南斯拉夫看做是实现对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地区扩张的古老梦想的障碍,其他意大利人则希望得到原先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希腊人有着相似的期望。立陶宛和波兰为它们对维尔纳的要求而争吵。对波兰和德国就西里西亚领土要求的一项公民投票,更使得该地区长期充斥着憎恨和强烈情绪,至少在一个双方均感满意的条约达成之前都是如此。匈牙利人悲痛和憎恨于其古代王国领土的大片丧失。垂落于几个世纪以来的东欧和中欧的新俄国的阴影,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

革命和新俄国

布尔什维主义,如同 1917 年"十月革命"缔造的新俄国政府所宣称的革命信条那样通常被称作的,在战后的年代里被许多欧洲国家视为双重的威胁。很快各欧洲国家都发现,国内有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它对工人阶级的国际事业以及这一事业在莫斯科的领导权效忠。共产党引起了很大的惊慌。这是由其诞生环境决定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 1919 年 3 月由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在莫斯科建立,用以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领导,他们害怕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再次陷入之前的缺乏革命热情的领导人手中,而第三国际的领导人认为没有抓住战争的机会应当归咎于此。列宁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检验依托于共产国际,其政策谨慎而严格,富有纪律性和坚定性,这与其

认为需要一个有效的革命政党的观点相一致。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都将社会主义者划分为两个阵营，彼此为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竞争，因此严重削弱了大多数国家的左翼力量。一些社会主义政党依附于共产国际，并常常以“共产党”为名；另外一些，甚至当宣称自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却仍然留存在自分裂中产生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工会之中。后者中最显著的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党。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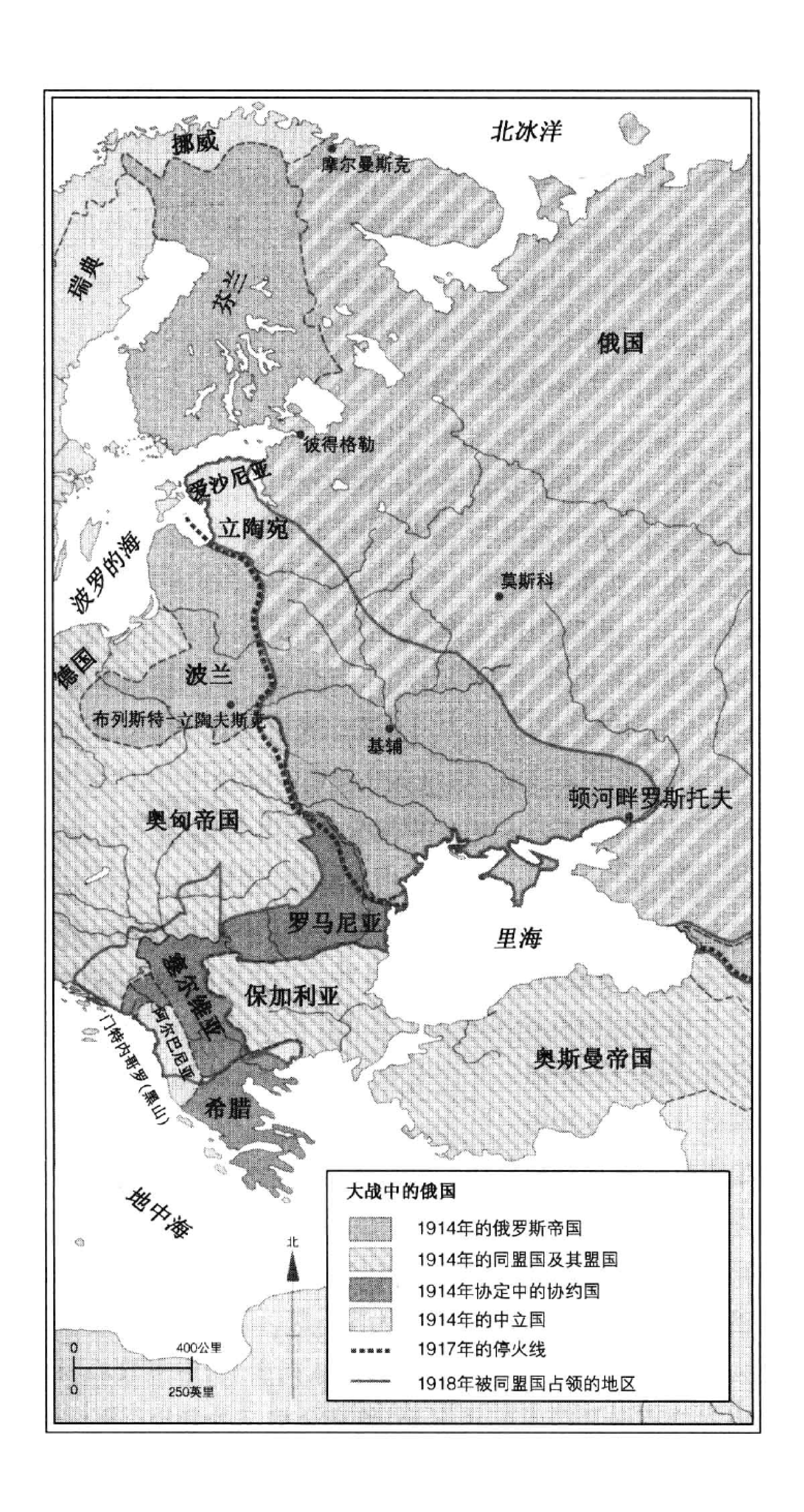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许多欧洲人认为，即使是温和的社会主义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战争之后似乎有大量的革命可能性可以被利用。在匈牙利，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实际上有过短期的执政，但是也许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德国不断的共产主义起义的尝试，有些获得了短暂的胜利。讽刺的是，甚至是在共产国际建立之前，这已经迫使在战败后不久成立的新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由社会主义者主导的政府，为了避免革命而不得不倒退，依赖于保守力量——尤其是旧军队中的专业士兵。这给德国左翼的分裂平添一个特殊的苦难。但是在各个地方，共产主义政策使联合抵抗保守主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时刻警惕着以革命修辞来伪装其阴谋的温和派。

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有意分裂，以及其中一些新的由苏维埃激发的、在意识形态上对宪制政府和任何似乎赞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权的疏远，将欧洲从文化上和政治上分裂开来，这是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通常是少数派的这一事实，许多年来被掩盖在其在各个国家里接连获取左翼领导权所表现出的策略这一面具下。在“客观的”意义上（就像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所运用的那样），他们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因为他们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效忠于一个分裂的、并不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事实上，欧洲与东方再次有了分界线。关于俄国是否是欧洲国家这一古老问题此时被以一种新的方式解答了，因为苏联断然宣称，在最为重要的方面，它不是欧洲国家。

人们并不总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苏联外交政策的执行中，很难将共产主义从传统的俄国主旋律中区分开来。在东方尤为如此。1918 年之后，其邻国开始害怕来自新俄国的社会和民族的

联合威胁。长远看来,布尔什维克以一种理性而合理的方式,应用和操纵国际共产主义的目标来为俄国的民族利益而服务,其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世界革命的未来要依靠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它将成为国际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在内战初期和布尔什维克力量对整个国家进行缓慢巩固的年代里,这一信仰促使其为了占领资产阶级政府而煽动对国外的不满情绪。但是在东欧和中欧更为严重,因为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一地区大部分领土的实际主权仍然存在争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里直到 1921 年 3 月才结束,俄国和新波兰签订了一项和约,规定了两国的边界,直到 1939 年一直发挥着作用。波兰是传统上最反俄国的,宗教上最反布尔什维克的,也是欧洲"新"的东方国家中领土最大和最有野心的。530 但是俄国力量任何的复兴都会使这些国家中的所有人感到威胁,尤其是当与布尔什维克所宣称的社会革命相联系的时候。这种联系引起的恐慌,促使许多国家在 1939 年之前就成为有着强大的反共产主义阵线的独裁或军事政府。

东欧和中欧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在战后经济衰退的年代中,以及对波苏战争结局的不确定(华沙自身曾一度受到威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21 年之后,随着和平的最终到来,以及俄英两国有序的外交关系象征性的建立(英国是第一个寻求这种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一个显著的缓和出现了。其部分原因是苏维埃领导力量在严酷的内战时期所形成的自身意识。它并没有产生更好的外交方式,革命的宣传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谴责仍在继续,但是现在布尔什维克能够将精力转移到重建他们自己的破碎的家园上来。1921 年,俄国的生铁产量是其 1913 年水平的五分之一,煤产量只有 3%左右,铁路运输上只有相当于战争开始时不到一半的火车在运行。牲畜产量下降了超过四分之一,谷物成交量不到 1916 年水平的五分之二。在这种穷困的经济下,1921 年一场旱灾降临在俄国南部。超过 200 万人死于灾后的饥荒;有报道说甚至有食人的情况。经济的自由化引起了一个转向。到 1927 年,工业和农业产量都几乎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北冰洋
挪威
摩尔曼斯克
瑞典
芬兰
俄国
彼得格勒
爱沙尼亚
立陶宛
波罗的海
莫斯科
德国
波兰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基辅
顿河畔罗斯托夫
奥匈帝国
罗马尼亚
里海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
门特内哥罗（黑山）
奥斯曼帝国
希腊
地中海
北
0
400公里
0
250英里
大战中的俄国
1914年的俄罗斯帝国
1914年的同盟国及其盟国
1914年协定中的协约国
1914年的中立国
1917年的停火线
1918年被同盟国占领的地区

这些年,这个政权的领导阶层内部经历了变动。这在1924年列宁去世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其公认的统治地位使其已经可以支配维持平衡的军队,他的离去开启了一个进化的新时代,并引起了或直接或含蓄的争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不质疑集权化,这是这一政权的专制本性。没有人认为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里,政治自由化是可行的,秘密警察和一党专政也不应该被免除。但是,他们不同意经济政策和策略。个人竞争有时给它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概括地说,关于苏联将要采取的通向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革命要依靠农民大众的友善。布尔什维克首先允许他们接受土地(这是因为他们不能阻止农民这么做,而他们对这一事实的接受赢得了农民对革命的支持),接下来,尝试牺牲农民利益来供养城市却引起了对抗,不久,农民就被经济自由化和“NEP”(即新经济政策)安抚了,这一政策是列宁作为权宜之计而批准的。在这个政策之下,农民被允许为自己赢利,因而也就开始生产更多的粮食并出售到城市。另一种观点也接受相同的事实,但却是将其放在长远的视野里来看。对农民的安抚将会减缓工业化的进程,而工业化正是苏联要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所需要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党的恰当做法应当是依靠城市中革命的激进分子;应当剥削未布尔什维克化的农民来满足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加强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国外的革命。共产党领导人托洛茨基持这一观点。这些是通向现代化的可选路线。

531

故事可以简单地继续讲述。概括地说,托洛茨基被排挤了,但是他的思想开始盛行。在党内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最终其官僚成员中的一位开始掌权,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他远远比不上列宁和托洛斯基睿智,却同样的冷酷甚至更令人不悦,但是有着更大的历史影响。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监察部人民委员、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最终成为的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完全地却静静地以军事力量武装了自己,这一力量是他之前用来反对其同僚和旧布尔什维克的,对待

他们就像对待敌人一样随意。据说,内战结束两年后,苏维埃社会处在其"实质的统治之下,但却没有意识到统治者的名字"[①]。他的名字开始成为苏联最著名的名字。

应该说,斯大林最终完成了革命,这是布尔什维克掌权者开辟的道路所通往之所,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苏维埃精英。对他来说,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推动力是其权力的至高无上。如果农民无法实现更多的利益,那么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在于找到一个方法以迫使农民通过提供它所消耗的谷物来为其埋单。两个"五年计划"规定从1928年开始执行工业化项目,其基础是农业集体化。

最终,党征服了农村。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这被称为一场新的内战,数百万农民被杀害或被流放,谷物征集又带来了饥荒。但是,城镇被供养起来,虽然消费被尽可能地抑制,实际工资水平也下降了。最为重要的是,从1928至1937年,苏联工业产量的80%来自厂房的建设。为了使苏联成为强国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集体化仅仅在强力下才得以实现,其规模比沙皇时代要大得多;斯大林所维持的国家机器,远比旧的专制时代要高效和集权得多。他是一个多多少少有些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者,马克思主义教导说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政治。斯大林恰恰颠倒了这一命题;他解释说,如果有意愿运用政治力量,经济基础就能够被强制革命化。虽然他是格鲁吉亚人,但他也许最被看做是俄国的大人物、一个专制的沙皇、一个伊凡雷帝或彼得大帝,而不是一个理论家。然而,其他国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评论家经常抬高苏俄,他们认为苏联是一幅美好的图画,是一个社会可能取得文化和伦理生活的进步与复兴道路的例子。苏联的建立和欧洲在新的形式上的划分,事实上只是世界在新的意识形态上划分的开始,它将会持续70年,欧洲不得不作为这个背景的一部分来走它的道路。1914年单一的文明世界在许多层面上有着共有的设想,其实现相同目标的进步趋势似乎势不可挡,但是

532

① I. Deutscher:《斯大林》,第二版(伦敦:1966),第228页。

现在这一切已不复存在。

因此,俄国革命似乎应当被认为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最深的印记,其最大的重要性也在于此。它成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和武力基地(也培养出了许多领袖和总参谋部)。这种中心应当存在,这对于世界历史来说是一个新的事实。在这个层面上的另一个新事实是,苏联提供了一个维持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神话,这给其他发展迟缓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对可利用的方式(即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替代品。当然,这两者都是欧洲的产物。

这就是欧洲历史越来越难以与世界历史分割开来的原因之一。俄国革命通过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间接影响了欧洲,如同它通过给予纯粹欧洲政治的新形状和内容直接影响了欧洲一样。现存的政治力量很少有未受其影响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它所引起的争端和恐慌所改变。在欧洲国家关系方面,只有一个很小的改变,即曾经有段时间俄国的外交政策失去了其传统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残存的宗教意味;但是,在与欧洲大国内部的关系上,俄国革命可能恰恰延缓了那些如果没有革命将会更快发生的变革。俄罗斯帝国有能力逃脱战败并成为 1918 年胜利的协约国之一,他们的宿敌奥匈帝国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德国被非军事化,俄国立刻就可以呈现其大陆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苏联仅在 1945 年才显示出来。总之,这在神圣同盟的前工业时期就已经被暗示了。也许(我们稍稍进一步看)达达尼尔战役的失败,使得俄国被驱除出原本想要占据的欧洲地位达 25 年之久,因为克服协约国的物资孤立加速了其军事和经济的败退,而这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性。同样,毫无疑问,革命延缓了俄国战后从经济破坏中的恢复,它关闭了苏联的外国投资,并因此使得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一再拖延,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都是如此。于是,斯大林将国家置于比沙皇政权更为残暴无情的统治道路上,但是,即使到 1941 年,也很难确定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苏联能否在德国的猛攻中存活下来。当然,也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联的发展使得其可能性增大,或是其他政权可以更为迅速地达到这个结果。

洛迦诺

1922年,德国和俄国政府的举动令整个欧洲大吃一惊,它们突然在洛迦诺就交换大使和一些经济问题上的合作达成一致。这在修正主义下正式宣布了这两个国家的固有利益;双方也各自宣告开始摆脱外交孤立。这在其他国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法国。同时,英国和法国已经逐渐淡化了法国对德国强制执行的严厉的经济赔偿(它在1923年达到极点,当时一支法比联军占领了鲁尔地区,并在事实上关闭了德国最大的工业地区)。

这是战后初期最糟糕的时刻。然而,占领鲁尔地区并没有使法国得到它想要的,还很快危及了法国的财政稳定。法国政府的换届推动了与德国友好关系的逐渐恢复,美国的财政行动缓解了赔偿问题。美国向德国投资的一股新潮流开始了。政治家开始谈论德国的"缓和",以及与它的"和解";一系列行动逐渐地开启了通向1925年底《洛迦诺公约》签订的道路,它结束了"敌国"和"协约国"力量的划分,并在保证法国、比利时与德国边界均不会受到另一方攻击的情况下,法国和德国达成了(形式上)的和解。重要的是,关于德国东部边境的问题并未涉及。当次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看起来最终通向和平、乐观和繁荣的新世界的道路畅通了,这是西欧自1918年起就梦想的,而且这一梦想的实现被证明是如此困难。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形的最终的幻觉之一。

534

第二十五章　崩溃的基础

态度和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之前的文化已经经历了深刻变革。我们很难自信或精确地谈论它们。尽管如此,欧洲世界霸权的衰落年代显然伴随着人们对欧洲内部确立的观念和价值的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证明。很难构建这样一个联系,但是,对的确有这样一个联系的假定似乎也很难被推翻。这一趋势似乎在 1918 年之后开始加快;随着旧的思想体系和旧的价值观被日益破坏,出现了认可坚持和理智的新主张。对过去的怀疑使得人们完全拒绝承认绝对标准的可能性。

虽然将知识分子和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明确言论与整个社会的态度和行为区分开是困难的,但是即将出现的迹象在 1914 年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分裂的力量已经在理智和自由文化中开始运作,这一文化是欧洲时代高度文明的产物。甚至在 19 世纪,人们就被一种感觉所困扰,这种感觉认为,传统文化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它没有包含藏在潜意识里的情感和经历。与其他人不同,一个人在该世纪初期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用来探索这一领域并提升信心,这是通向生活中许多东西的钥匙,这个人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在文化史上,他应当与牛顿和达尔文比肩而立,这并不是因为他

有着与后者一样的智力高度,或是由于他对科学所作的贡献,而是因为,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他改变了受过教育的人思考自身的方式。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神话、一种理解的方式和一套表达它的习语。他的一些思想很快以其特有的方式进入到平常的谈话之中:我们给予“情结”、“潜意识”和“强迫观念”这些词以特殊的意义,并且熟知如“弗洛伊德式失语”、“力比多”之类的术语,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成就。他的影响很快进入到文学、人际关系、教育和政治领域。他的言辞经常被曲解。人们认为他说过的话比他具体的诊断研究重要得多。

535 与牛顿和达尔文一样,弗洛伊德的影响力超越了科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他的影响力比另外两位更受争议)。像他们一样,弗洛伊德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设想,它像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设想一样,将被证明有着高度的颠覆性。普通人从他的教条中得到的信息是:潜意识是许多行为的真正根源,道德价值和态度只是浇铸了这一潜意识的、有影响力的事物的投射,因而,责任的观念最多是一个神话,而且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神话,也许理性本身就是一个幻象。一些人认为弗洛伊德的主张是荒谬的,这一论断到底是真的还是遗漏了他的众多特质,这都不重要。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他所显示的,并在今天依旧有人这么认为。这些观念对自由的文明、理性、责任心、自觉积极个体的基础提出了怀疑。这是另一种决定论。

他似乎进一步认为,许多先前认为好的东西事实上是坏的。良心(不管你管它叫什么)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好的力量,不仅可以制止有意识的不道德,还可以控制邪恶的冲动;现在人们被要求去面对“自我控制可能对精神健康有害”这一观念。我们没有必要夸大。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造成确定性丧失,和认为“人们脚下几乎没有坚实的土地”[①]这一感觉的唯一智力力量。但是,在战争期间它与马克思主义是最醒目的。由于要努力克服他带来的洞察力或艺术的混乱和20世

① 他的基本著作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但是,直到1923年,他的《自我与本我》才出版,比他的其他著作都更明确地提出了对道德生活的精神分析研究。

纪基督教的虚弱或科学世界的不可知性——爱因斯坦的出现使得拉普拉斯和牛顿横遭抛弃——人们更加忧虑地投入到新方向的寻求中。政治上，这将许多人引导到新的非理性主义，或者一些旧的主义(如民族主义)更为暴力的状态；人们对宽容、民主以及先前为保护个体理性意志的实践而设立的自由几乎提不起兴趣。或者，至少是欧洲自觉的文化生活似乎暗示了这一点。

同样，艺术为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明显征兆。从人文主义运动最初的三四个世纪开始，欧洲人认为艺术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深刻的见解和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容易感染的快乐。即使在创作中它们被升华到这样一个异常美好的高度，或者被格外浓缩到有时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欣赏的形式中。但是在那时候，人们认为只要假以时日、经过学习，一个有教养的人完全可能从一堆艺术作品中辨别出他的时代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以一种共享的标准表达了一种共享的文化。的确，这一观念在 19 世纪被弱化，当时，随着浪漫主义运动而来的是将艺术家理想化为天才——贝多芬是第一批例子中的一个——并且明确表达了“前卫”(“先锋”)的概念。但是，紧接着就是艺术文化的更大的分裂。到 20 世纪的前十年，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很难从提供给他们的众多艺术作品中辨别出同时代的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的作品。

536

一个例子是绘画中影像的混乱。最晚到立体主义时期，这一领域对表征技巧的挣脱依然与传统有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到那时，这一联系已经停止很久了，这对于一个“有着平均教养水平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的确存在的话。艺术家隐退到越来越难以接近的个人想象的混乱中，这在 1918 年之后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中达到了顶峰。20 世纪达到了新的分解；超现实主义中，甚至客体这一概念都已不复存在，更不用提它的表现了。许多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通过巧合、象征、冲击、暗示和歪曲来寻求对意识本身的超越。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艺术表明，虽然许多人仍坚持传统的做法，但是引领思想和观念的精英中的许多人发现传统的基础不再坚固。人们依然定期参加宗教活动——尽管在天主教国家也只有那么一小部分

人——但是工业城市里的大众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的世界，在那里，制度和宗教符号的物理变革几乎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影响，而大众娱乐的产业使得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节奏被节日和庆典所打破。长期理解的参照物开始变得不再可知。或许知识分子面临的是比宗教信仰的丧失更为严峻的问题，因为从 18 世纪开始一度有助于取代基督教思想的自由主义观念，如今也正在被取代。20 世纪 20、30 年代，每一个领域都会感觉到彻底的变化。个人自治的自由主义式的必然性、客观的道德标准、理性、父母的权威以及一个可解释的力学世界，似乎一起沉没了。

形式上的帝国的最后岁月

出于多种原因——一些是类似于削弱了欧洲对文化确定性的自信的原因，另一些是由来自经验的明显事实所引起的，一些欧洲人不再像其 19 世纪的先人那样对欧洲世界力量的基础感到确定。自由主义的必然性和对其价值普遍性的主张，在很长时期内促进了其对统治权力的质疑，尽管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考虑了民主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但是，至少在一小部分人当中，仍然有一种世界现状正在改变的感觉。随着这个世纪的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谈论“黄祸”和“垂死的帝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的出现表明了欧洲不再是国际权力体系的唯一中心。 537

虽然德意志这一在相对近代才建立的殖民帝国在 1918 年消失，其他欧洲列强的帝国却并非如此。不久之后，它们中的少数实际上变得更加壮大。但是，在 1939 年之前的这些年里，欧洲的动乱束缚了其政府在世界其他地方有效运转的能力；用纯粹的欧洲语言来说，这是表明欧洲历史不再是一个自主过程的另一个信号。

最明显的迹象首先在亚洲显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在亚洲的力量被证明一度是不容置疑的，也的确未引起争论。其最伟大和壮观的时代在 1914 年已成为过去。英国这一最强大的帝国力量与一个亚洲国家结盟，这完全是出于它的需要。有着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广阔的亚洲领土的俄国，成为第一个在战争中败给亚洲强国的“白种人”

国家,并且到1914年,其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回传统的欧洲利益上来。中华帝国这一没落的、曾经是出类拔萃的帝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也不再向欧洲帝国主义者割让任何领土——虽然在到那时为止的很长时间内,列强认为它最有可能被瓜分——并最终开始了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1914年之前,欧洲的亚洲帝国内部还有许多迹象表明了它的困难。

英属印度

英国在1911年作出让步之后,其统治者在印度的政治地位并没有减弱。或许他们使得情况更为糟糕。暴动和恐怖主义依旧持续。统治者表现出的对穆斯林的偏好使得印度教徒更加愤恨。穆斯林则认为政府取消孟加拉分治违背了与他们的协议。随着愿意与英国合作的穆斯林精英日渐感到自己被更易受泛伊斯兰呼吁所煽动的穆斯林所威胁,这种紧张的状态更加激烈。他们感到英国对基督教国家攻击(1911年在的黎波里,此后几年在巴尔干)奥斯曼这一哈里发的所在地袖手旁观:英国没有给予其数百万臣民所信仰的宗教的精神领袖以任何支持。当1914年奥斯曼帝国决定对英国开战,一些印度穆斯林在密谋革命。

尽管如此,大多数印度政治家在战争中仍然支持英国王室;印度为帝国战争提供了人力和财力(这其中包括圣雄甘地,他相信这将适时地给印度带来它应得的奖励,他日后被尊为印度国父)。191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希望平稳地建立一个全印度的"可靠的"政府(即地方自治),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一些印度人所要求的自治领地的标准。因而,虽然从这时起就可以将英属印度的历史书写为持续衰落的历史,但这未免有些过于简化了。接下来的20年里仍有起伏波折;英国从未陷入没有退路的境地。

538

然而,维持在印度的政治地位变得日益困难。除了因帝国力量在印度退让而产生的大量持续而喧闹的反对声(尤其是在保守党当政的一些地区),印度的英国居民的言语和行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影响——好的坏的都有。其他误解还有,大多数居民倾向于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只是一小部分野心勃勃且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的事情。他们强烈要

求英国政府依靠警察手段来镇压阴谋和暴动；对这一观点的支持不仅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威胁（事实上，直到 1923 年印度共产党才建立）所产生的影响，还出自其自信而过时的种族偏见。

1919 年为了处理引起了甘地第一次罢工运动和人民反抗的密谋，正常的合法程序第一次被暂停（这违背了总督立法委员会中所有印度成员的意愿）。这时的甘地在印度国民大会党里已有大批的追随者。尽管他努力反对暴力，但是暴乱和杀戮仍有发生。在旁遮普，英国人遭到袭击，一些人被杀害。发生在阿姆利则（Amritsar）的惨案比其他事情对统治者造成了更大的精神创伤。一个历史清白且有着优异成绩的印度军官，为了表明其国人对控制动乱的决心，动用武力驱散了人群。这一交火结束时，将近 400 名印度人被杀害，超过1 000 人受伤。这对印度舆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且由于陆军准将戴尔的进一步行动变得更糟。虽然，他在不久后辞职，但是对英国声望和名誉所造成的打击却无法弥补。一些议会成员和印度的英国居民对戴尔所作所为的熙熙攘攘的支持，使这一情况变得更糟。

接下来国内进一步动乱。甘地的方案被国会正式通过，尽管他坚持其方案是非暴力的，但事实并不能如此，并且会引发动乱。1922 年，他第一次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尽管如此，接下来的几年里，国会内部出现了热情衰退和分裂的迹象。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裂痕加深了。他们引发了公共骚乱和流血事件。到 1930 年，穆斯林印度的政治领袖已经开始设想一个独立后分治的次大陆，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将位于其西北部。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反抗重新开始，国际经济状况的恶化带来了进一步的刺激。这时，农村的大众在民族主义呼吁下已经对现代化有了更为充分的准备；部分得益于统治者建立的交通设施和成功的教育，甘地成为第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印度追随者的政治家。同样，尽管遭受了挫折，伦敦仍然吸取了自 1917 年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的教训。1935 年，一个《印度政府法案》出台，为日后权力和任免权的真正转移做了准备。事实上，它使得几乎只有国防和外交事务处在总督的完全掌控之

539 下,为一个完全的地方代议政府,以及向一个可靠的代议制国民大会(这时开始了对它的建设)的权力移交做了准备。1939 年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最后一个进程,但是英国这时已经有效地为印度的国家政治建立了框架。

事后看来,到那时为止,印度独立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这已经很清晰了,虽然在当时总督未经形式上对印度意见的征询就宣布参战引起了许多印度人的愤怒。在地方政府的代议制度和印度行政参事会的平稳印度化实际运行了将近 20 年之后,英国政府认识到,离开了本地精英的赞同和帮助,次大陆是无法控制的。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经历开始为其将来的自治做准备。战争期间,统治者仍然能维持其支配权,但是充满了困难和窘迫。印度已经被英国统治所革命化;和其他地区一样,帝国也埋下了将会颠覆自身的种子。

形成中的亚洲

在各个帝国的领地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更大范围的亚洲革命正在进行中,在文化的相互作用、经济力量和现代化希望的驱动下,它在许多国家都引起了反对欧洲的行动,尤其是在日本。在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东西方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个国家遥遥领先,虽然这并不明显。日本的推动力对欧洲在亚洲优势地位的日益破坏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俄战争表明,亚洲历史的节奏再次日益被一些事件所标记,这些事件对欧洲历史的意义并未很快显现出来。因而,要理解它们就必然要打破欧洲年表的框架。例如,1911 年,德里庄严的仪式给帝国的控制带去了前所未有的正式通告,而这一年中国的革命产生了一个比杜尔巴意义更加重大的历史烙印。1911 年终结了中华帝国的辛亥革命给 19 世纪里黯然失色的文明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将比法国或俄国革命引发更多根本性的变化;它结束了 2 000 多年来信奉儒教的政府维持中国统一、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然而,对在中国有着领地或利益的欧洲大国来说,如此重大的变革并没有立刻显示出其重要性。革命者间的分裂很快加剧了国家的混乱。接下来对“军阀”

(这是一种自身拥有可支配武器和士兵的军人)来说,是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

在国外,日本是中国长期衰弱的主要受益者。日本的盟友不会反对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夺取德国在中国的港口;它们即使想这么做也无能为力。它们需要日本的船只和制造品,并且经常希望日本能够派出一支军队到欧洲来帮助它们。这从未发生。相反,日本巧妙地处理这一关系(这引起了别国对日本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的恐慌),并且继续在中国进行掠夺。1915 年初,日本给中国政府列出了 21 条要求,归结起来就是日本计划成为中国的保护国;大多数要求都被接受了。接下来在 1916 年,来自日本的压力极力劝阻英国承认一个想要称帝的中国军阀;第二年,另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并将其扩展到内蒙古。很明显,日本已经成为像曾经的欧洲异族那样的掠夺者。1917 年 8 月,中国政府对德宣战,部分原因是希望赢得列强的善意来支持其在和会上独立的声音。

540

事实上,《凡尔赛和约》让中国和日本同样深深地失望。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大国(1918 年它拥有世界上第三强大的海军),日本获得了坚实的利益。它保留了此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这是 1917 年英国和法国许诺给它的),并且被授权管理德国原先的许多太平洋岛屿,以及拥有在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永久坐席。但是,当其支持种族平等的声明未被写入《国联盟约》时,在日本人眼中,上述获利都被抵消了。中国更感到愤愤不平,它仅获得了德国和奥地利在中国治外法权的结束,以及允许义和团运动赔款延期的让步。这两个国家一起拒绝签署这个条约。

后果之一是"五四运动",评论家们赋予这一剧变如同 1911 年革命一样重大的意义。北京的一场反对和约的学生示威游行逐渐升级,开始演变成一场骚动,接着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运动,蔓延开来吸纳学生以外的人,并且引起了罢工和抵制日货。这是亚洲对欧洲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回绝最确凿的证据。

无论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带来了怎样的实际利益,它从未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吸引力,现在,知识分子被另外一种同样是西方的、却是敌

对的思想所吸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国人对和约的幻想破灭时,苏联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受到了欢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正式放弃其曾受沙皇所喜爱的所有的治外利益和管辖权。在民族主义者眼中,他们已经清白了。更何况,俄国的革命(一场在庞大的农民社会中的革命)能够给中国以启示。随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贯穿欧亚关系的奇特坎坷的新转折。这时,在欧洲背景中产生和成形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在扮演着最令人不安和充满活力的、破坏世界各地欧洲力量的角色。

541 同时,日本的推动力继续发挥其作用。1914 年之前,廉价的日本进口商品就已经使得欧洲制造商十分忧虑。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机遇:当他们的探险先驱们发现国内的市场无法满足其战争需求时,曾经面临西方强大竞争的市场(尤其是在亚洲)开始向日本开放。盟军政府向日本的工厂订购军需品和补给用品;世界性的船只短缺给日本新的造船厂带来它们需要的工作。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战争期间增长了 40%。虽然在 1920 年被打断,但此后 10 年内,扩张重新开始,1929 年,日本的一个工业基地(虽然它雇佣了不到其人口的五分之一)在 20 年间将其钢产量几乎翻了十番,纺织品产量是之前的三倍,煤炭的产出是之前的两倍。这仍然能够被视为其整个“西方化”总体进程的一部分。1925 年,日本引入了全民选举;尽管有许多欧洲的迹象,这与自由主义或调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看起来像是 19 世纪开始的平稳体制进程的继续。

到 1931 年,亚洲已经能够感觉到世界性衰落的影响。那一年,日本有一半的工厂停产;欧洲殖民市场的瓦解及其在关税壁垒下残余的根基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日本制造品的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日本国民的地位恶化。严重的政治后果不久就将显现,虽然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显现的要比在极端民族主义中的少。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市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任何可能的威胁都会引起日本的警觉和愤怒。此时的情况似乎可充分解释日本对大陆的进一步侵略这一反应。欧洲的殖民

体系已经很明显处于防御状态——如果不是撤退状态的话。荷兰面对着 20 世纪 20 年代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叛乱,法国则在 1930 年面临越南叛乱;在这两个地方,一个新奇的灾难是:社会主义为民族主义叛乱所提供的援助。在中国,英国仅仅想要一个与民族主义政府之间安定的和解(它在 1922 年同意交回一个占领的港口),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不失脸面。

1922 年,中国的领土完整作为复杂的《华盛顿条约》[①]的一部分而得到保证,这些协约由美国、中国、日本和其他六个欧洲[②]国家共同签署。关于限制海军力量(装备的花费使得政府非常局促)的决定使得日本相对较强,但是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同样保证其他各自的既得利益。这给了英日同盟(美国长久以来寻求它的终结)一个得体的葬礼。同时,外国人继续管理着中国政府所依赖的海关和税收,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外国代表和商人会直接与军阀打交道。

542

到 1927 年,中国表面上的统一在国民党(由孙中山建立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最终完成。一次成功的抵制英货运动使得英国政府(它被苏维埃对国民党日益增加的影响的迹象所警醒)放弃了它的一些特许权;美国已经宣布放弃义和团运动赔款中它的份额。事实上,到 20 世纪 20 年代,唯一为指导中国国家发展作出重大努力的欧洲大国是苏联。不止出于一个原因,其利益是可预见的。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宣称的革命,还因为它是一个独特而强大的亚洲帝国。苏维埃政策必定尤为关注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22 年,日本的军队才从西伯利亚撤离。苏联和中国共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苏联的统治者也不会忘记,俄罗斯帝国曾经拥有着比他们还多的中国领土。而且,虽然远东没有大国比它拥有的领土利益更大,它仍然没有被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

---

① 即《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22 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签署,因而又称《华盛顿海军条约》或《华盛顿条约》。——译者注

② 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葡萄牙。

莫斯科与国民党寻求合作,以共同保卫苏维埃在蒙古的利益,加强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国民党也同样抵制英国,这一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核心支持者的力量在莫斯科被大大夸大。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苏维埃的路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优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得不期待这一转变。虽然给中国共产党派送了专家和资金,1929 年斯大林并没有保护它不受国民党的放逐和对其城市干部的残酷镇压。接着,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苏维埃也取消了对它的指导和资助。离开了苏联政策,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得更好。

国民党的胜利使掠夺成性的日本进一步在中国寻求利益。日本尤为关注满洲[①],自 1905 年起它在这个地方就一直是成功的;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支撑了它在大战期间的地位,面对日本驻军,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其他应对,只能默许这一情况。然而,虽然在世界眼中日本政府是满洲的主管机构,但它并未实际控制这一地区。1931 年,日本军事指挥官在奉天策动了一场事变,作为完全接管这个省份的借口,东京的保守分子们无法制止他们。紧接着是一个新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出现,以及中国(和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及其在国联无果的抗议。中国组织了一次抵制日货运动,而日本军队则在上海登陆,这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欧洲经济力量的所在地和欧洲管辖的"特区"。接着,1933 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一个强加的和约使得他们占据了中国大片领土。

543 中国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使这一侵略并非来自欧洲。虽然国民党政府已经削减了"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也稍微表现得更加随和(它们开始将国民党视做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盟友),当 1937 年日本发动新一轮的全面攻击时,中国几乎立刻就处于防御状态。"中国事变"[②]——就像日本一直称呼它的那样——将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

① 满洲,作为地名,旧指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废弃不用。——译者注

② 指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译者注

并被视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然而,西方大国感到无法调停,尽管苏联为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些飞机,国际联盟在形式上对日本进行了谴责。即使是美国和欧洲侨民的抗议也被漠视。日本让世界清楚地知道,如果它在亚洲的新秩序不能进行下去,它就准备封锁中国的外国租界。英国和法国反应之微弱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地方的麻烦已经多到让它们无法找回帝国过去的自信。美国在其炮舰被日本轰炸机击沉后的无动于衷反映了一个长久以来的事实——美国也许会谈论亚洲大陆,但绝不会为它而战。或许这是明智的。

到 1941 年,中国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近一半土地都被占领,并几乎被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到那时为止的长期斗争来看,日本似乎将会是胜利者。它的国家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它羞辱中国的外国居民,并在 1940 年强迫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该公路是已迁往重庆的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补给线),还强迫法国允许日本向印度支那进军。由于日本军队的声望及其在政府中的力量依旧强大(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就是如此),进一步冒险的诱惑似乎无法抵挡。同样,日本将对中国的侵略粉饰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即日本首先致力于粉碎西方在亚洲影响。如同其 1905 年击败俄国开启了一个欧亚心理关系的新纪元一样,日本在 1938 至 1941 年所展示的独立和强大同样显示出它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亚洲强国。

中东[1]的欧洲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土地上开启了一个动荡

---

[1] "中东"这一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初,笔者不知其确切年份。"近东"和"远东"这些概念被运用得更早——前者指之前在奥斯曼帝国掌控下的从埃及到黑海海峡的土地,后者包括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当"中东"一词开始被使用,它在逻辑上指组成了从西方到达印度的通道的国家和地区——波斯和阿富汗,也可勉强算上中国的西藏。但是,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的殖民部的"中东"专家为被委任处理原为"近东"的事务,因此,"中东"涵盖了土耳其、之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用这一名称用来特指这些地区的情况开始变得普遍,因此该名称流传开来。似乎没有必要将更东的地区族群包含进来,除了在波斯湾的情况中(或"海湾地区"、"海湾国家")。

544 的时期。英国的盟友侯赛因在1918年被推举为“阿拉伯民族的国王”，但是这一头衔并没有如此大的意义。在国联的帮助下，英国和法国有能力控制阿拉伯国家的新形势，这是阿拉伯统治者甚至阿拉伯民族（抛开它们制造的麻烦不说）都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个长期以来塑造欧洲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历史的地区，这是帝国权力的最后阶段。考虑到这一点，由此带来的外交问题相比之前的要稍稍简单。过去沙皇在君士坦丁堡继承奥斯曼帝国的野心已经无需再考虑，这种情况在其政权被令人不安的国际共产主义替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两个大国——法国和英国——在中东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它们并不信任彼此，但还是能够大致同意由国联授权的判决所建立的势力范围。它将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托管给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给法国。

从一开始，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就多少有点专横，也许是因为叙利亚的国会要求独立或至少被英国或美国而不是法国托管，法国不得不用武力确立自己的地位。法国驱逐了一个由叙利亚人选出的国王，之后它面临着一场全面的暴动。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依然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统治，但是到那时为止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向民族主义者让步。当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发动叛乱以反对阿拉伯国家的黯淡前景时，这一地区的复杂性显露出来。对想要尽快结束对伊拉克的托管的英国来说，它被阿拉伯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所羁绊。英国对伊拉克在1932年独立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加入国联感到欣慰，通过保持其在当地的一支陆军和空军力量，英国的战略利益得以保护。早先在1928年，英国已经承认外约旦的独立，同样有一些军事和财政权力保留在英国人手中。巴勒斯坦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1921年，针对犹太移民和抢占阿拉伯土地的阿拉伯人反犹暴动爆发，这个不幸的国家从此再无和平。处在紧要关头的不只是宗教和民族感情。对大多数人来说，犹太移民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其巨大的影响力改变了经济关系并向传统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英国托管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它不限制犹

太移民，那么阿拉伯人就会强烈抗议，如果它限制，那么强烈抗议的就是犹太人。此时的阿拉伯政府也必须被纳入考虑范围，它们占领了对英国的安全性有着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这个问题被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激化：1933 年在德国上台的政府不久就开始迫害犹太人，并没收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获得的合法社会收益。

545

到 1937 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激战。不久，一支英国军队试图平息一场阿拉伯暴动。在历史上，阿拉伯地区最高政权的衰落之后往往紧跟着一段时间的混乱。这次似乎稍稍不同的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帝国领导权的建立(就像早期混乱的状态最后演变成的)。英国仅仅想要一个有着严格限制的帝国地位；在短暂地陶醉于胜利果实之后，它仅仅想要保证其在该地区的基本利益，保护苏伊士运河到印度的航线，以及从伊朗和伊拉克获得源源不断的石油。到 1934 年，从伊拉克北部穿过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到达海法(Haifa)的巨型油气管线建成。这赋予这些地区以新的重要性，虽然在那时，欧洲对石油的消耗量还不是太大，对它只是一般的依赖，新的巨大储油地也尚未被发现。

维持在埃及的兵力给英国带来了日益增多的麻烦。战争强化了埃及的民族情感。占领军几乎不受欢迎；当战争导致物价上涨时，外国人受到指责。埃及的民族主义领袖在 1919 年试图将这一情况提交到巴黎和会，但是被阻止了；紧接着是一场反英起义。虽然它很快被英国镇压下去，但是，英国的摄政在 1922 年结束了，它希望能赶在埃及民族感情起作用之前。然而，新的宪制埃及的选民大多数是民主主义者，任何埃及政府都不可能向英国妥协(虽然英国政府觉得，出于保卫英国利益的目的，这些妥协是可以接受的)。其结果就是长期的制度危机以及断断续续的混乱，直到 1936 年，英国最终满足于在运河地区保持独立驻军以及亚历山大的为期八年的海军基地。同时，治外法权也宣告结束，不过混合了欧洲法官和埃及法官的法庭仍然被保留下来。

英帝国的内缩反映了它已经意识到其力量和资源都已捉襟见肘。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英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关注于欧洲和远东。这

些变化简直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因此，其有助于后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兰地区的发展。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整个时段，俄国向阿拉伯国家播放的无线电支持了第一批阿拉伯共产主义者[①]。尽管共产主义引起了种种忧虑，但并没有迹象显示它能够替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后者仍是最强的革命影响力，到1938年为止它开始关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样，阿拉伯对法国在叙利亚的暴行的愤怒开始显现，如同埃及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的强烈抗议一样。一些人认为，潜藏在泛阿拉伯情感中的力量最终将结束哈希姆王国的割据。

546

伊斯兰社会的欧洲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联盟协议是奥斯曼本土战后历史的出发点。英国、法国、希腊和意大利都对将来的战利品划分表示同意；大战带来了一个精简，就是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要求被消除了。面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入侵，苏丹签订了屈辱的和约，宣布放弃其非土耳其领土。通过塞夫勒条约，希腊获得很多特权，亚美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土耳其的剩余土地被划分为英、法、意的势力范围。黑海海峡被置于国际管辖之下。为了彻底贯彻这点，欧洲重建了其财政控制。这是最公然的帝国主义，它使得所有谴责它的土耳其爱国政治家的地位大大加强。

很快就对和约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修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前青年土耳其党成员、一个出色的士兵。他打败了法国和希腊的军队，并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摧毁了亚美尼亚。未得到前盟国支持的英国决定协商解决，因而，1923年在洛桑签订了第二个对土耳其的条约。民族主义对巴黎决议的胜利是和约中唯一一个在两个平等地位的国家间签订的，而战胜国不是强加于战败国的和约，它也是唯一有俄国参与的条约。它至少比其他任何

① 虽然这是从意大利到阿拉伯的播音，它是使得英国政府允许英国广播公司首次使用外语(阿拉伯语)的定期广播。

条约要好。这个条约取消了投降协定和财政控制。土耳其放弃了它对阿拉伯土地和爱琴诸岛、塞浦路斯、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岛的要求。黑海海峡地区的武装解除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大规模人口移动随之而来，这些民族间的相互仇恨因为新的怨念而重新被激发。所以，经历了六个世纪之后，安纳托利亚之外的奥斯曼帝国(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Thrace]的一小部分)消失了。一个新的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开始在小亚细亚作为民族国家而存在，苏丹的地位被废除。第二年废除了哈里发在土耳其的地位。这是奥斯曼历史的终点；也是土耳其的新纪元。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五六百年来第一次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

旧的奥斯曼帝国拥有的边界有助于区分不同的文明。好几代欧洲人都深受影响。现在，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土耳其自身应当被看做是欧洲的一部分吗？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伊斯兰世界从欧洲引入的。凯末尔(他愿意这么称呼自己，其意思是“完美”)是一个欧洲特色现代化的热情拥护者。土耳其的法律被世俗化(模仿拿破仑法典)，穆斯林立法被废弃不用，1928年对宪法的修改去除了“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陈述。一夫多妻制被禁止。1935年，周末法定休息日被改为星期天(之前是星期五，伊斯兰教的圣日)，一个新的词语出现在语言中：周末(vikend)，指从周六下午一点至周日午夜的时段。学校不再进行宗教教育。禁止戴土耳其毡帽——虽然其源自欧洲，但是人们认为它太穆斯林化了。凯末尔意识到了他所希望达到的现代化的本质，以及这些对他有重要意义的象征。它们显现了欧洲社会对传统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替代。字母表被拉丁化，并自此以后成为初等教育的必修课程。国家的历史被写入教科书中；它说亚当是土耳其人。它与过往的决裂比欧洲更为激烈，其中包括给予妇女新地位，到1934年，土耳其妇女拥有选举权并被鼓励进入专业领域工作[1]。一直到凯末尔1938年去世，他似乎认定其改革进程不应被中止。结果是，在当时，这

547

---

① 法国妇女直到1945年才获得选举权，瑞士则要到1971年。

个新建立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已经处于世界最强的国家之列。

1914 年之前,波斯既不在欧洲也不在奥斯曼的统治之下。1907 年英俄在波斯划分了势力范围之后,它们仍然继续干涉波斯事务,但是,俄国的力量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消失了,而英国力量则继续操控直到战争结束。像埃及一样,英国不允许波斯代表团向巴黎和会陈述其情况,这激化了波斯的反英怒火。从英国的力量方面考虑,武力保持其在波斯的统治不成问题,而且,在一个混乱的时期,在俄国撤走其军队之后,英国为寻找抗拒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而努力。一个波斯官员,礼萨汗(Reze Khan),在 1921 年发动政变,接着利用英国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迫使它签订条约,拿回了俄国在波斯的所有权利和财产,并使俄国军队的撤退得到保证。接着,礼萨汗继续挫败英国支持下的分裂分子。1925 年,他被国民大会授予独裁权力,并在几个月之后被冠以“波斯王中的波斯王”的称号。他的统治一直到 1941 年才结束(重返的俄国和英国联合推翻了他的王位),多少类似于一个伊朗的凯末尔。迄今为止,世俗目标并不如土耳其那样紧迫,但是 1928 年废除了投降协定,这是很重要的标志性的一步。1933 年,他赢得了第一个重要的胜利,以一种新的艺术,即石油外交,废除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所持有的特权。英国政府将这一问题呈交到国联,却导致了对波斯的其他更为有利的退让:这是礼萨·汗的最大的胜利,也是其国家崭新的独立地位的最有力的证明。波斯湾的新时代开启了,尽管英国仍在那里占统治地位。

548

经济灾难:世界经济大萧条

在许多方式上,欧洲的世界地位是经历 1919 年之后经济力量的剧烈打击而形成的。战后最初几年(战胜国和战败国都觉得很难掌控它)俄国之外的欧洲就开始日渐恢复繁荣。1925 至 1929 年是经济上的美好年代。1925 年,欧洲的粮食和原材料产量第一次超过了 1913 年的水平,制造业的复苏也指日可待。这鼓励了政治乐观主义。货币制度自这 10 年前半段可怕的通货膨胀(例如,奥地利的货币贬值 1.4 万倍,

而德国的贬值10亿倍)而产生,并一度更加持稳;许多金本位的欧洲国家恢复了硬币支付,表明了一些人仍然认为1914年之前的日子能够重现。在世界贸易复苏和美国(它现在是资本输出国)巨大投资的帮助下,欧洲贸易在1929年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一水平一直到1954年才再次达到。然而,经济崩溃紧随其后。经济的复苏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一旦突然面对危机,这个新的繁荣景象就瞬间崩溃了。爆发的灾难不仅是欧洲而且是世界范围的,它是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世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个体事件。虽然它在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在欧洲农村的贫民区悲惨,但是,它摧毁了能够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础,并为进一步的革命开启了大门。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急剧变化。1914年之前,它主要出口农业产品,并主要进口资本,是一个债务国。战争之后,它日益增强的工业生产力已不仅仅能满足国内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美国产出了世界上将近40%的煤炭,其制造业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它成为一个债权国,国内富裕的人和机构都在寻求向国外借贷的机会。因此,美国的国内繁荣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保证了人们对美国资本出口和欧洲重整的信心。

这一长期繁荣在1928年已经出现了结束的迹象,而商业圈也开始波动。从美国借出短期资金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美国从欧洲撤回贷款。不久,一些欧洲的借贷者陷入困境。同时,人们开始认识到一次剧烈的衰落可能即将到来,美国的国内需求也在持续萎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引发了1929年10月股票市场尤为突然的惊人崩盘。美国商业信心的结束意味着美国海外投资的终结。经过1930年一个较短时间的回升,它彻底崩溃了,世界繁荣的飞轮停止了运转。一场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开始了。 549

这一灾难在不断加速和蔓延。债务国试图整理它们的账户,缩减了进口。这降低了世界价格。但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由于其收入降低而无力购买制成品。同时,核心的问题是,美国和欧洲都陷入了财政危机;这些国家努力(但是失败了)保持其货币价值与黄金的比率(一种

国家认同的交易方式,即“金本位”),宣布采取通货紧缩政策来保持账面的平衡。这进一步缩减了其国内需求。到 1933 年,法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的货币“脱离”了黄金,这就是说,它们再也无法平等地与黄金兑换了。这种对自由经济古老崇拜的废除标志着即将到来的悲剧。部分现实是,失业扩展到无法想象的范围,在工业世界可能已经达到了 3 000万人,当然大部分是在欧洲。1932 年(最糟的一年),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指标刚刚超过 1929 年的二分之一。

经济衰退的后果随着一个不可抗拒的惊人逻辑汹涌而来。在欧洲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时候,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社会收益已经基本没有了。所有国家都无法解决失业问题。这一情况似乎在美国和德国最为严重,但是以一种恶性的、有时却是半隐蔽的形式,在世界的乡村和出产初级产品的农场存在着,并带来了更为糟糕的社会影响。但是,其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实际的生理后果(数百万人患病以及营养不良),都更为不幸。整个社会士气下滑,失业和闲散使得劳动力感染了他们不被需要、不被尊重、被遗弃的感觉。国家收入和制成品的价格下跌,但是原材料和食物的价格下跌得更为迅速。每一个地方,比较贫困的国家和成熟经济中比较贫困的部门不成比例地忍受着煎熬。可能它们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它们可供下跌的空间更少一些;一个东欧人或阿根廷农民可能不一定会比他以往更困难。而一个德国的职员或工人必定会更加贫困,而他也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国家通过关税壁垒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孤立起来,这使得情况更加恶化。一些国家通过政府对经济生活越来越强的控制来尽力达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在这一点上,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要好,一些国家做得非常不好。对于那些渴望并期待或者主张瓦解民主和自由文明的人来说,这场灾难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此时,贪婪者开始期待对这些日渐衰落并似乎正在沉没的新的宪政国家的颠覆。金本位体制的结束和对“不干涉经济”信条的抛弃,标志着世界秩序在其经济维度上的衰落,其显著性如同社会动荡与新的民族主义愤恨的尖声大叫标志着其政治维度上的衰落一样。令人恐惧的是,自由文明明显失去了控制

550

事态的能力。这进一步证明了其价值观的偶然性和相对性的本质；此时，这些价值观得以维持的政治经济霸权正在世界范围内衰落。

一些欧洲人很难明白这些，他们继续梦想着时代的复兴，梦想着他们的文明到时将享有的无可置疑的霸权。但这并未发生。虽然世界经济的复苏最终将会到来，但是它只能通过另一场大战才能实现，这是一个悖论，也再次表明了欧洲时代的最终结束。与第一次大战不同，这次大战通过其可怕的本质和影响表明了（或者似乎表明了），关于人性、其理性的自控能力及其发展潜能的自由设想，都随着在大萧条中消失的对物质文明的乐观主义一起被抛弃了。

551

第二十六章　欧洲幻觉的最后年代

新政治

如今可以轻易发现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及其约束力对塑造1919至1939年的欧洲历史的作用，但是，奇怪的是，当时的人似乎没有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个时期的许多政治家仍只将在欧洲及其大使馆发生的事情看做是重要的。只有当具体问题产生的时候——如苏维埃外交政策的主动权、国内对经济保护的需求或是需要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公然的话）承认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他们才会暂时给予变化的外部世界更多关注。当然，他们所要面对的最紧要和急迫的问题仍然集中在欧洲。但是即使在那里，许多政治家仍然很难认识到，1914年之前的世界已经消失，而且无法复原了，但是另外一些现实将会重现，如德国和俄国有一天必定会享有其人口、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所赋予它们的力量和地位。

然而，起重大作用的不只是大国间的关系。还有其他重要且变化着的政治现实。其中一个似乎是不可抵挡的公众对政治的参与。这不仅限于选区的扩大和普选制的发展，虽然它们的确很重要（英国最终在1928年实现了成年公民的普选权——只有贵族、疯子、罪犯被排除在

外)。除了选举,大众的活动也能够以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现存的政党不得不适应这种潮流。同时要适应的还有通过义务教育获得的公民读写能力、大众传媒在政治领域的部署、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无线电广播的引入以及越来越廉价和普及的收音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30 年代,最后一项使权力牢牢掌握在控制了收音机使用权的人的手上,就像(尤其是)德国和苏联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另一个在大战期间更快地运用于政治目的的大众媒体是电影,开始是无声的,接着出现了有声电影。当然,大众通信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意义远超过了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当 1937 年电报的发明者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逝世的时候,英国广播站宣布这则消息后,以停止播音两分钟的方式向他致以独特的敬意。

552

另一个新的政治现象是有着异常规模和表象的共产主义。它在不同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和平之后旋即而来的经济萧条中,许多曾在 1914 年之前就在活跃于现存的政党和工会中的社会主义者,被鼓励要加强其工作力度。这引起了并不新鲜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虽然共产主义左翼内部很快分裂,对许多政治家来说,他们一开始似乎没有对整个政治背景提出变革性要求,而是仅仅加强了其现有的斗争。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明确要求领导国际革命之前,左翼的大多数人就被想当然地归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许多国家里都引起了普遍的反马克思主义运动。

挑战宪法政治的自由主义设想的运动中,最重要且最早的一次出现在意大利。大战严重束缚了这个新的宪政国家。在 1914 年的强国中,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为贫困,却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更为沉重的战争重担,且往往以失败告终,并几乎都是在意大利的领土上。随着战争的进行,不平等的遭遇加深了社会分化。比和平来得更早的是通货膨胀。财产占有者(农业或工业的)和那些由于劳动力短缺而能够要求提高工资的人,比那些职业阶层和以投资或定期债券为生的人要更有能力抵制通货膨胀。然而,他们基本上是完成于 1870 年的国家统一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支撑着保守的天主教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宪

制的和自由主义的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意大利的参战视做将意大利统一为一个国家的“复兴运动”的延伸,以及一场从拥有意大利血缘或语族的人所居住的土地上最终清除奥地利影响的十字军东征。这些思想是混乱且不科学的,但却强劲有力。

然而,和约带来了失望和幻灭;这些民族主义梦想无法实现了。而且,随着战后紧接而来的经济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力量更加强大,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府在俄国的建立,这种情况更加令人担忧。许多意大利人感到失望和害怕,并且厌倦了社会主义者的反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讲演,他们对自由的议会体制丧失了信心,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方法以摆脱失意。他们同情国外强硬的民族主义(例如,对占领亚得里亚海的阜姆港[Fiume]的冒险者的同情,巴黎和会未能将该地给予意大利)和国内暴力的反马克思主义运动;后者在天主教国家尤能引起共鸣。反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领导阶层不只来自传统的保守教会,也来自一个新的运动:法西斯主义。这一名字从意大利语的“一束”(fascio,不是一束别的东西,而是一束古罗马扈从所携带的大棒)而来。19 世纪 90 年代,它被西西里革命者用来指“一帮”或“一组”。不久,在世界大战初期被力劝政府参战的意大利人运用。之后,这一名字被融入了许多其他因素,仅与其他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①]的国家的激进运动有着松散的联系。首例是在意大利,1919 年,一个新闻记者、退役军人和前社会主义者(在战争前持有极端观点)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加入了一个由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组成的组织,组成了第一个“战斗法西斯”,也可以被简单地译为“斗争的区域联盟”。它通过任何方式追求权力,包括暴力(共产党的“赤卫军”已经在街道上演了暴力行为)。年轻的法西斯恶棍的组织反复攻击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联盟,并开始反对选举权利。这个运动逐渐发

553

---

① 这一词被运用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失去了许多实用性。关于它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意思,H. W. 福勒作了一个有用的总结:“合作的观念、放肆的行为、革命性的活动、对和平主义的厌恶、对中立立场的嘲笑,来自社会主义的反应,对共产主义的痛恨以及对个人和独裁的信仰。”见福利尼奥和福勒:《石油工程师手册》,第 19 册,伦敦,1925 年,第 32 页。

展起来。

意大利宪制的政治家既无法控制法西斯主义，又无法通过合作来驯服它；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也不愿意这么做，他们将其视做对抗社会主义报纸和独断的工会的重要助手。不久，“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开始被这样称呼）在一些地方享有来自地方政府的政府性的或准政府性的资助和来自警方的保护。强盗行为被半制度化，棍棒和蓖麻油（法西斯主义者用以对付其受害者）成为街头政治的常见内容。1921 年，一个国家法西斯政党成立，将现有的地方法西斯组织统一起来。到 1922 年，法西斯主义者不仅获得了重要的选举胜利，在一些地区还几乎使得政府无法有序运转。其他政治家不能（或者表示自己不愿）面对法西斯的挑战，国王请求墨索里尼组成政府。他领导下的一个联合体宣布就职，暴力行动结束了。这一时期在之后的法西斯神话中以“向罗马进军”而著名，但是，这并不是宪制意大利的完全终结。墨索里尼只能逐渐地将其地位过渡到独裁。1926 年，开始通过指令任命官员；选举制度被中止。这几乎没有遭到反对。

毫无疑问，墨索里尼渴望进行革命性变革，他的许多追随者的抱负则更加清晰和激进，但是实践证明，他的“改革”大多数是表面文章；墨索里尼对建立一个他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社会表现出喜怒无常的焦躁，但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念上都难得地达到了一致。的确，一旦掌权，它将会越来越反映出已建立的意大利的分量。最重大的国内成就（这是与自由主义式的过去的真正决裂）是与教皇的外交协定，即 1929 年的拉特兰协定。教会在意大利人生活中的权力（在今天依旧保留着）有了实质的让步，作为报答，教皇最终正式承认意大利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协定是意大利国内最为保守的势力的胜利。“我们将上帝交还给意大利，将意大利交还给上帝。”教皇如是说。重要性仅次于此的、但同样非革命性的是，对自由企业法西斯式的苛求和对个人利益应从属于国家的法西斯式鼓吹的后果。归结到实践中就是剥夺工会保护其成员利益的权力。对雇主的自由几乎没有限制。至于其他，法西斯的经济计划是徒劳无功的。只有农业产量显著增加，而

554

鼓励移民和意大利对非洲殖民的努力则全部失败。

新独裁主义

相似的分歧在其他被称做是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是显著的，一方面表现在形式和抱负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取得的成就上。虽然这的确反映了一些新的和后自由主义的东西——除了对大众政治的表达以及对青年、活力和革命的重视，它们绝大多数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运动在实践中几乎总是与保守利益相妥协。这使得精确论述“法西斯主义”这一现象变得十分困难。许多国家匆匆建立了集权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但是，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这些思想唯一的可能来源。例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基于传统和保守势力的政权；除了新的技术，它们与大众政治这一新的现象几乎没有关联。在这些国家，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往往对其向保守主义的让步而感到不满；他们希望改变现有的秩序。最后，只有在德国，一场或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最终控制了历史保守主义。由于这些原因，法西斯主义这一标签既澄清了一些东西，又让人感到迷惑。

也许最好仅仅区分开 1918 年之后 20 年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一些理论家和行动派的出现，他们操着一种新的激进的政治论调，运用关于力量、唯心主义、自由意志和牺牲的言辞，对其反对派施以暴力，并且希望在新的标准上重建社会和政权，该标准既不考虑既定的利益，也不会向唯物主义让步。他们强调其现代性和思想通常根植于 1914 年之前就可以细察到的先锋的观念。虽然这一现象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其势力只在两个主要国家获得了成功，即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两个国家里，经济的衰退、愤怒的民族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有助于他们取得成功（在德国直到 1933 年这一成功才到来）。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那么可以说是法西斯主义。

555

在其他国家，通常是欧洲比较贫穷的国家，其政权更应该被称为独裁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为贫穷所困扰的为数众多的农业人口、巨大的社会差异、不发达的境况以及麻烦重重的变换的边界继承，所有这

些都激化了他们的政治,并导致了需要找出一些人来接受谴责。有时,外族的少数民族的存在开始威胁这些新国家,其自由主义制度仅仅是植于表面的,而其传统保守势力和宗教势力依然很强大。在这其中的许多国家,短期的宪政制度迟早要让位于强力的个人和军人的统治;于1929年撤销了宪制政府的南斯拉夫国王的这句话可能被许多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的国家所运用:"机器不再运转了。"[①]这在1939年之前普遍发生于新巴尔干国家、波兰和其他二元王朝的继承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例外,这是中欧或巴尔干地区唯一有效的民主政治。这些国家倒退回这种政体的希望说明了其对1918年政治成熟的希望破灭和对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新威胁的恐惧,尤其在俄国边境上最为激烈。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感到相似的压力(虽然没那么激烈),那里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影响更加强大,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比法西斯主义更具重要性。最终,无论是转向传统势力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是对一个潜在事实的反应,这一事实在每个地方都存在,且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即:1914年之前的世界自由主义设想的魅力正在日益减弱。同样,像其他政治潮流一样,无论它们在哪里欣欣向荣,这两者都吸引了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的支持。

德意志问题的再度出现

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德国地位的问题被掩盖了一段时间,但它必定会成为战争期间欧洲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的主题,同样也是最重要的难题。德国是战败国,经历了政治改革并丧失了许多领土。但是,它没有被毁灭。德国终有一天会再次运用其地理、人口和工业力量所赋予它的地位,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以一种方式或另外一种,一个统一的和经济得以重建的德国必定将会在中欧占支配地位,从而夺去法国的光彩。人们争论的核心是这一切的发生是否会伴随着战

① 他对一个法国报纸的通讯记者如是说,并在1929年1月15日的《晨报》中被刊登。摘自A.波隆斯基:《小独裁者》(伦敦:1975),第99页。

争。只有一些人突发奇想认为或许可以通过分裂早在1871年即统一的德国来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法国简单地考虑了军事制裁(虽然英国在莱茵地区驻军直到1929年,法国直到1930年)。大多数外交家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起点应当是努力使和约中的条款兑现。其不适当性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

556

不久,德国就开始寻求修订《凡尔赛和约》。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要求会被听取,并满怀希望地开始着手处理这些要求。赔款的实际负担在逐渐削减。1925年末的《洛迦诺公约》被视做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通过它们,德国勉强同意凡尔赛和约中在西方的领土要求,而法国在英国和意大利对其边境的保证下感到安心。这留下了东方的修订问题,很明显,英国在这里不愿意承担责任。在这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隐约可见:有着特殊历史和文化经历的像德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如何与其邻国平衡地和平相处?一种方案被采纳,即:德国于次年加入了国联。

许多人希望,德国一再坚持己见的这一潜在危险,已经通过建立一个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得到转移,它的制度将会重新以温和而仁慈的方式教化德国社会,并且再一次使德国文化中许多广受赞誉的特质发展起来。的确,魏玛共和国(新德国以其选民大会召开的地方而命名)的体制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但是很多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当经济萧条打碎了德意志共和国赖以栖息的舆论的狭窄基础,并引爆了其所掩盖的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力量之后,"魏玛共和国解决了德国的问题"被证明是一个幻象。

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对德国的遏制再次成为国际问题,但是,由于许多原因,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毫无希望起到遏制作用的十年。其中之一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在东欧和东南欧相对弱小的农业经济,而这正是法国寻求反对德国复兴的盟友的地方。这些盟国在当时非常衰弱,且苦于国内争端。另外,还有一些原因造成了双重的困难,即将俄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再次被视做是无可争议的(如果是不可思议的话)强国——包含在遏制德国的范围之内。其意识

形态上的差别足以造成与英法合作的隔阂，但其战略地位也是一个原因。如果不越过一个或几个东欧国家，俄国的势力无法达到中欧，而这些国家短暂的历史一直萦绕着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恐惧：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不说别的，它们毕竟建立在俄国之前的领土之上。

557

美国将不会给予帮助，的确，很难看出普通的美国选民应该这样做的理由。自威尔逊开始，美国政策的总体趋势回到专注于自身的孤立中。美国人毫不困惑地将麻烦归咎于欧洲人自身——自战争年代开始的盟国间的债务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因为它被认为与国际财政问题相关联（虽然并不完全像大多数美国人想象的那样，但它的确如此），他们不信任进一步的联盟。更何况，大萧条带给他们足够多的国内问题去处理。即使到 1939 年，于 1933 年出台的罗斯福“新政”仍未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对于外交政策来说，虽然罗斯福比他的同胞更深刻地认识到坚持美国对欧洲问题孤立的危险性，但他只能缓慢地表露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经由民主选举上台的国家领导人。

如果苏联和美国靠不住的话，一旦需要，将只有西欧的强国来继续抵抗德国。英国和法国作为欧洲警察被寄予厚望。它们有着鲜明的记忆，即使有俄国帮助，遏制德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自 1918 年开始，这两者之间就有诸多争执。它们在军事上衰弱了。法国意识到，一旦德国重整军备，自己将在人力资源上占劣势，于是它投资了一项加强防御工事的战略防御工程，这似乎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时有效地剥夺了法国主动进攻的能力。皇家海军也不再没有敌手，并且，像 1914 年一样，将其资源集中在欧洲水域上已经不再安全了。英国政府长期寻求减少军备支出，世界范围内的承诺日益加重了英国的负担，在大萧条时期更加如此；人们害怕重整军备的花销将会大伤元气并引起通货膨胀。同样，许多英国选民认为德国的委屈是合理的。他们打算以德国民族主义和自决的名义作出让步，甚至交回德国的殖民地。同时，英国和法国都被意大利所困扰，它们高估了后者的力量。意大利不过是欧洲团体中的丑角。希望它能够有助于反对德国的梦想在 1938 年破灭了。

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墨索里尼迟来的参与争夺非洲的尝试。1935

年,意大利军队占领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明显违反国际联盟盟约的行为,而这两国都是国联的成员。法国和英国处境尴尬。作为大国、地中海国家和非洲殖民国家,它们不得不在国联反对意大利。但是,反对仅仅是微弱且不认真的,因为它们指望一旦需要斗争意大利就能与其一同反对德国,它们不想疏远它。结果是所有可能中最坏的一个。国际联盟没能阻止侵略,意大利也被疏远了。埃塞俄比亚丧失了独立地位(尽管如此,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短期的)。之后看来,这被认为是犯了致命错误的时刻之一。但是,回顾过去,不能说这些事情所造成的形势从那个阶段开始就无法掌控和逆转。当然,一个更为激进和残忍的机会主义政权在德国的出现是一个主要的转折点。但是,大萧条在这之前发生,并使得这成为可能。经济衰落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它使得20 世纪 30 年代对时事的意识形态解读显得更为可信,从而进一步使人们更加愤恨。同样,决定历史走向的岔道依旧难以确定。

558

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

外交政策会被意识形态所影响,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它根本上来自国际共产主义及其潜在促进力量的出现。但是经济下滑所加强的阶级冲突导致了阐释国际关系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甚至左派和右派,或民主主义与独裁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入侵了埃塞俄比亚的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并讨论反共产主义的活动之后,上述对立更加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不仅是令人误解的,且是具有破坏性的、涣散人心的。它掩盖了德意志问题的中心实质,并且因此使得它更难处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内部情况使得状况更加糟糕。那里的国内局势随着这十年的开始而危险起来。工业化强加给人民严重的约束和更大的牺牲。它由于独裁政权残酷统治的加强而暴露出来——以沉重的代价(对数百万苏维埃居民来说)。它不仅表现为以集体化名义与农民的战争,还表现在 1934 年对政权本身的干部们进行的恐怖行动。接下来的五年内,数百万人被处死、囚禁和驱逐,经常被强迫劳动。世界

惊奇地看着成批的被告俯伏在苏维埃法庭前面做着奇怪的供认。军队里十分之九的将领消失了，据估计这些人的数量占官员总数的一半。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精英替代了旧的；到 1939 年，有一半参加了 1934 年党代会的代表被拘捕。外人很难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一些人同样想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盟友，这对于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更为重要。

通过苏维埃的宣传，这也更加直接地影响了国际形势，这种宣传似乎反映了斯大林受围心态所引起的深思熟虑；他远没有放松下来，其以“我们-他们”模式（这一模式诞生于马克思主义信条和 1918 至 1922 年的干涉）来思考世界的习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受到了鼓舞。随着这一观念被固定下来，在外部，共产国际对国际阶级斗争信条的讲道也纳入正轨。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每个地方对保守派的恐惧都加深了。那些对与俄国的合作持怀疑态度的人只能指责这些统治者的话语。很容易将任何对左翼甚至是温和的进步力量的让步看做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随着对右派态度的更加坚定，共产主义者为其“阶级冲突和革命不可避免”的论点找到了新的证据。

559

然而，在战争期间，欧洲并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危险在战后突然爆发并随即迅速平息。工党政府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部分时间内和平而平淡地统治着英国，接着下一个 10 年是保守党联盟的统治，他们赢得的选票占压倒性优势，在对改革论者传统的忠诚和通过谨慎理财（这标志着英国开始成为后人所称的“福利国家”）来缓和零碎的社会及行政改革方面，他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走得更远；它们经常吹捧自己对政治民主、社会服务和平均主义的合并，并将其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比。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而活跃的共产党的国家，共产党甚至在大萧条之后也没有赢得大多数的选票，社会改革开始于这个 10 年的后半部分。左翼革命战斗性的传统依旧存在，其言辞引起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警觉，但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裂缝即使在“人民阵线”内部也依然存在。1933 年之前，德国的共产党能够赢得比社会民主党更多的选票，但是从未能

取代其在控制工人运动上的地位。在工业化不太发达的国家,共产主义的革命性影响也相对要小。在西班牙,它不得不在左派中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抗衡;当然,西班牙的保守人士对它非常恐惧,并且可能同样会不知不觉陷入社会改革和国家分裂的趋势(这是他们在1931 年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统治下所感觉到的和惧怕的)。然而最后,西班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纷争有助于保守党摧毁他们中的许多人所痛恨的共和政体。

希特勒的改革

这些年里,成功的改革(或者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伪改革)并不是左翼的,虽然它们经常获得大众的支持。它们以其他方式来发掘意识形态的魅力。在德国,一个新的统治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 1933 年上台。他惊人的成功使人们很难否认其政治天才,尽管其追逐的目标同样使人难以相信他是完全正常的。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他只是一个失望的煽动者,在一次试图推翻一个选举政府(巴伐利亚政府)的行动中失败,在有催眠效果的演讲中和一部长篇的、不成形的半自传书(几乎没有人去读)中倾吐其痴迷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到了1933 年,他领导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已经足够强大,使得共和国总统合法地将其任命为总理(即首相)。这是这个世纪政治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它开启了通向德国革命化以及随后转向侵略的道路,这直到另一次德意志战争对德国自身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毁灭才得以终结。希特勒有着复杂的要求,但其宣传口号是简单的。他鼓吹道,德国的困扰有着确定的来源。《凡尔赛和约》是其中一个。国际资本主义是另外一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及他们所谓的反对国家的活动也是。他同样说道,纠正德国的政治错误必须与德国社会和文化的革新相结合,而这应当通过净化德意志民族的血统来进行,即去除其中的非雅利安人成分。

560

一开始,这些内容并没有给希特勒开辟多少道路,但是,1930 年,他的追随者在德国议会赢得了 107 个席位——超过了共产党的 77 个。

纳粹党是经济衰落的受益者,而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纳粹党能够获得这一政治收益是有原因的。共产党花费了与对付其他反对者一样多的精力来对付社会党,这是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左翼一个致命的不利因素,但这对纳粹是有帮助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经济下滑的刺激下,民主共和政体下的反犹主义情绪增长。像民族主义一样,反犹主义的呼吁打断了对德国困境的阶级解释,不像同样简单地应用了阶级战争范畴——在(希望)吸引其他人的同时,它实质上引起了一些有势力的组织的敌对——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在国内明显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吸引了更多的支持,也重获了许多人的支持,有在其巷斗的"突击队员"中看到了反共产主义保障的人,有寻求重整军备和修订《凡尔赛和约》的民族主义者,还有认为希特勒无异于其他党的领袖并可能为其所用的保守派政治家。策略是复杂的,但是到 1932 年的大选,纳粹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虽然并没有赢得大多数的选票。1933 年 1 月希特勒出任总理之后,进行了进一步的选举。政府对无线电的垄断和毫不犹豫的恐吓始终没能保证纳粹成为议会的多数派,但是,之后来自一些右翼议会成员的支持给他们提供了投票以授予政府特殊权限的机会。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通过紧急法令来统治国家。魏玛政府和议会主权原则就这样结束了。以合法取得的权力为武装,纳粹开始了一系列摧毁民主制度的改革。

像斯大林俄国一样,纳粹政权对其敌人采取残忍的恐怖措施。不久就开始了尤其是反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欧洲在惊愕中发现它正在见证中世纪欧洲或沙皇俄国的大屠杀在最先进的社会之一的复兴。虽然,对于稳固的政权来说,更重要的是对暴力、告密者和秘密警察的恐惧。与爱国主义热情一起,失业的结束和有效的正面宣传使纳粹有着令人吃惊的顺应力。到 1939 年,除了罗马天主教会,德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在纳粹的控制和胁迫之下。保守党也失败了。他们不久就发现纳粹对传统权威的独立性似乎是过分干涉了,甚至在重建德国军队方面也是如此。 562

561

通往 1939 年大战之路

1932 年	12 月 11 日	英、俄、德、意四国政府联合发表声明绝不使用武力解决其分歧。
1933 年	1 月 30 日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2 月	裁军会议建议德国的军备重整应最终建立在与别国平等的基础上,但这不为德国所接受。
	5 月 28 日	纳粹在但泽(Danzig 自由市)的选举中获胜,开始接管该市的行政事务。
	6—7 月	美国拒绝解决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建议,之后的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也失败了。
	10 月 14 日	德国退出裁军会议。
	10 月 23 日	德国退出国联。
1934 年	1 月 26 日	德波条约打破了法国在东欧的联盟网。
	7 月 25 日	奥地利总统陶尔斐斯(Dollfuss)在维也纳遭纳粹暴乱分子的暗杀。
	8 月 19 日	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统。
	9 月 18 日	苏联加入国联。
	12 月 19 日	日本废除海军协定,包括 1922 年的五国海军协定。
1935 年	1 月 13 日	萨尔公民投票赞成重新并入德国。
	3 月 16 日	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并恢复征兵制。
	5 月 2 日	法俄结盟,双方互相援助以抵抗无端侵略。
	6 月 18 日	英德海军协定。
	10 月 3 日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0 月 18 日	国联投票通过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
1936 年	3 月 7 日	德国废除《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莱茵河非军事区。
	5 月 9 日	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
	7 月 18 日	西属摩洛哥爆发军事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
	10 月 25 日	德意结盟,柏林-罗马"轴心"确立。
	11 月 25 日	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8 年	3 月 12 日—14 日	德国入侵并吞并奥地利。
	5—9 月	漫长且日益加深的捷克危机最终由 9 月 29 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解决,这标志着西方的"绥靖"政策达到顶点,该条约将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划分给波兰、匈牙利和德国,遗留下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并最终使法国的东欧联盟体系瓦解。
1939 年	3 月 10 日—16 日	德国吞并捷克剩余领土,鲁塞尼亚(Ruthenia)被匈牙利吞并。
	3 月 21 日	德国吞并梅梅尔(Memel)。
	3 月 31 日	英法担保波兰的独立和完整。
	4 月 7 日	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1939 年	4 月 13 日	英法对罗马尼亚和希腊提出保证。
	6—8 月	苏联、英国、法国进行磋商。
	8 月 23 日	苏德签订条约。
	8 月 24 日	英波签订互助条约。
	9 月 1 日	德国入侵波兰。
	9 月 3 日	英法对德宣战。

562

不仅是德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也在很长时间内都很难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政权本质上的迷惑性使得人们很难这么做。一些人仅仅将希特勒视做是像一个土耳其之父凯末尔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热心于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重建其国家，宣称其合法的要求，如果对传统价值观有些漠不关心的话。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改革者，他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道德沦丧、血统玷污和其他许多事情。甚至一些人将他视做抵挡左派的保卫者，这大大增加了左派将希特勒视为资本主义工具的可能性，这同样是似是而非的。对希特勒其人或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仍有争论，一个合理的接近真实的可能理解是，他将德国社会的怨恨和恼怒以其最消极和最具破坏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以一种畸形的程度来表现。由于经济灾难、政治抨击以及国际势力的有利形势，希特勒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以整个欧洲，包括自己的同胞为代价，释放了这些消极特质。这意味着战争。

563

通向战争之路

我们可以清晰地追溯 1939 年德国通向战争之路，虽然关于它的争论仍然很激烈。争论点在于，到底是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仍有机会避免战争，不管是否是这场到来的战争。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之前时刻谨防德国在中欧野心的墨索里尼成为希特勒的盟友。英法对其在埃塞俄比亚行动的反应已经疏远了他，1936 年在西班牙爆发的内战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进一步行动和获得更多的利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派了分遣队去支持佛朗哥（Franco）将军，他是反叛左翼共和国的将军领袖。与其他国际形势发展不同，西班牙还给了欧洲外交分歧以意识形态的色彩。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事实上，他小心翼翼地操纵着对他报以希望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现在被左翼打上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苏联政策开始与西方国家一同支持西班牙，它领导当地的共产主义者放弃攻击其他左翼党派，并支持组成了“人民战线”。西班牙开始以最单纯的形式显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扭曲，但是使人更容易想到，欧洲已经划分为两个阵营。

到这时,英法两国政府只是意识到了与新德国打交道的困难。1935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开始重整军备,这是《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法国和英国将会依旧弱小,除非它们自己也重整军备;法国拥有庞大的军队,但是并没有用它们来进攻的策略,虽然皇家海军依旧(只)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但是英国很难同时成功地保证其在远东、地中海和本土水域内的利益。当希特勒废除《洛迦诺公约》,德国军队重新进入莱茵河地区的“非军事区”(凡尔赛和约将德军从这里驱逐出去了)时,第一个后果显现了。没有人试图努力驱逐他们。西班牙内战使得英法的大众舆论陷入混乱之中,之后,希特勒在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很难为禁止德奥合并的凡尔赛条款辩护;对英法的选民来说,“联合”(它被这么称呼)能够被看做是合理而愤怒的民族主义,是德意志血统和语族寻求的和平而友好的联合。奥地利共和国依旧有着长期的内部困扰。同年秋,德国发起了新一轮侵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希特勒正在逐渐实现自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之后就日渐褪色的古老梦想——统一的包括了所有德意志血统国家的新德国。

564 尽管如此,回顾过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割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转折点。它是由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带来的,这一结果是英国外交政策试图满足希特勒的最后尝试。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仍然不确定为了抵制希特勒的要求而进行的英国的重整军备会达到什么效果,但是,他希望,将最后一大批在异族统治下的德意志人转移到他们的祖国的举动也许能使希特勒放弃进一步修订《凡尔赛和约》的意图——无论如何,这个条约已经多多少少被撕毁了。这可以在徒有其表的对民族自决的宣称中得到辩护;但是,其所涵盖的地区(由于其众多的德意志人口)是重要的,而他们的损失则会削弱捷克斯洛伐克日后自卫的前景。

张伯伦错了。希特勒继续开辟其另一个古老的梦想,对非日耳曼的斯拉夫国家的扩张。第一步是在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英国宣布去年秋天它所给的保证无效,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签署《慕尼黑协定》之后这个国名开始带上连字符号)已经从内部解散

了。几乎是立刻,最大的德意志城市梅梅尔(它在 1924 年被国联判定授予立陶宛)被纳粹占领。波兰感受到了威胁,开始动员准备保卫 1919 年所设定的边界。希特勒痛恨“波兰走廊”,它将东普鲁士从德国中隔开,并且包括了但泽(它在 1919 年被给予一个独立的国际化地位)这一古老的德意志城市。这时,虽然是犹豫不决地,英国政府决定改变行动方针,为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抵抗进攻提供了保证。英国同样与苏联进行了谨慎的谈判。

苏维埃的政策依旧很难解释。似乎斯大林对共和国的援助保持着仅仅吸引德国注意力的程度而使内战继续进行,但是随后又通过其他方式来争取在西线受到攻击(他经常对此感到恐惧)的缓冲时间。对他来说,德国很可能会被英法国内的某些人煽动而去进攻苏联,他们意图将其所面临的危险转嫁给工人政权。毫无疑问,他们很可能会这么做。但是无论如何,苏联与英法合作反对德国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它们愿意也不行,因为除了穿越波兰走廊,任何苏维埃军队都无法到达德国——而这是波兰人绝不允许的。相应地,对于苏联来说,只有再次瓜分波兰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行动在 1939 年夏天实施。在所有的宣传之后,苏联和德国分别将目标对准布尔什维克-斯拉夫的暴虐和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剥削,纳粹和共产党在 8 月协议共同瓜分波兰;集权国家在实施外交活动中享有巨大的灵活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希特勒在 1939 年 9 月 1 日袭击波兰。

第二次德意志战争

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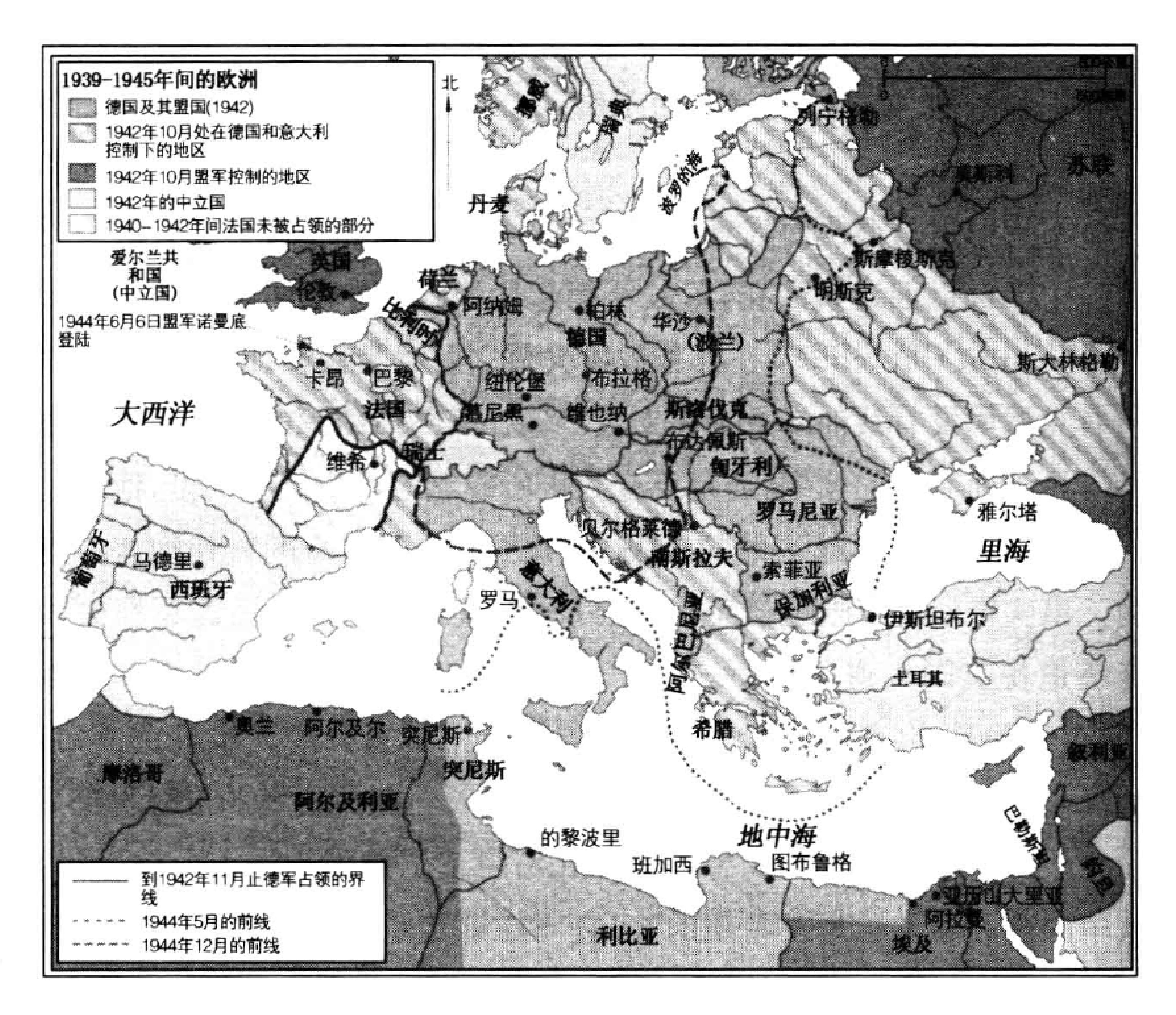
两天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兑现它们对波兰的承诺,不情愿地对德国宣战。很明显,它们不能拯救波兰,而这个心怀不满的国家再一次消失了,在一个月后被俄国和德国瓜分。但是,这些行动未遭干涉意味着各国对德国在欧洲优势地位的默许,因为其他国家都不认为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会有效。所以,欧洲仅有的两个宪政强国在缺乏 1914 年那样的群众热情的情况下,要艰难地独自剔除德国这个集权政体。英法两国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对这一角色没什么热情。他们的地位相较其 1914

年的前辈来说下降了很多,但是希特勒的一再侵略和屡次食言引起了愤怒,人们很难看出,到底什么样的和平能够被建立起来,而哪种和平能够使他们安心。与 1914 年的情况一样,这场战争最基本的原因是德国的侵略。但是,那时德国发动战争是因为它感觉受到了威胁,而这次,是英法要对德国扩张所表现出的危险作出反应。这一次,受到威胁的是它们。希特勒期待的仅仅是一场战役,但是他实际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争——像之前许多次战争一样。但是,它将像 1914 年的情况一样,更是一场世界大战。

出乎很多观察家意料,也让一些人如释重负的是,战争的头六个月在短暂的波兰战役结束后几乎恢复了平静。它表明了机械化部队和空军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着更加重大的作用。但是,索姆河和凡尔登的屠杀令英国和法国记忆犹新,所以它们只打算进行经济制裁;坐在西线它们自认为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背后,希望封锁会有效。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并不想去打扰它们,因为他渴望和解。当英国寻求在斯堪的纳维亚海域加强封锁的时候,为获取从挪威运往丹麦的矿石,德国发动了成功的攻势,僵局被打破。始于 1940 年 4 月 9 日的攻势开启了一个惊人的阶段,即德国在陆地上长期保持胜利但是在海洋上损失惨重。仅仅一个月之后,德国首先入侵低地国家,然后入侵法国。穿越阿登高地的一次强有力的武装侵袭打开了分割盟国军队和占领巴黎的道路。6 月 22 日,当时由法国元帅贝当(Pétain,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领导的法国政府签订了一项休战协定。月底,从比利牛斯山到北角的欧洲海岸都落入德国手中。意大利在法国投降前十天加入了德国一方。英国占领或毁坏了他们认为可能落入德国手中的法国战船之后,法国政府(在德国占领了半个法国以后迁到了小城维希)与英国断交。随着贝当就职为政府首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结束。由于在陆地上没有盟友,英国面临着迄今为止甚至比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更为糟糕的战略局面。

566

它并非完全独自战斗。所有的自治领都站在它这一方加入了战争,它也庇护了为数众多的从充满灾难的大陆来的流亡政府,其中的一



些指挥着自己的军队;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在随后的几年中继续英勇斗争。最重要的流亡小队是法国,虽然眼下他们只是法国内部的一个小集团,并不是其法定政府。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年轻的将军,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他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离开法国,并在离开的日子里被判决死刑。他被英国人公认为"自由法国"的领袖。他将自己视做是第三共和国的合法继承者,以及法国利益和荣誉的监护者。不久他就开始崭露头角(虽然并不总是明智的),最终他成为自克里孟梭以来法国最伟大的官员。

非洲是欧洲之外第一个被卷入战争的大陆。意大利的入侵证实了这一点,其结果是,它的非洲领地和地中海航线都成为了作战地区。再加上法兰西帝国部分地区命运的不确定性,戴高乐本希望在这些地区能够找到同情者来加入他一同战斗,但他没有在那里成功地取得主动权。紧随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之后的是一个战略上的转变。大西洋和斯

567

堪的纳维亚港口的价值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日后所称的“大西洋战役”将会更加激烈，德国必将通过潜水艇、地表和空中的打击以切断英国海上力量的联系。

不列颠群岛很快面临直接攻击。危机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来支撑这个国家以面对挑战；有着长久而起伏的政治生涯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挪威战役失败之后成为首相，因为众议院的所有党派里没有其他人去指挥支援。他在其随后组织的联合政府里显示了显著而有力的领导，这是至今为止所缺乏的。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四次无线电演说唤起了他的人民，唤醒了他们已遗忘的曾经拥有的能力。事实很快就清晰地显示出来，只有饥馑或直接袭击后的军事失败能够迫使英国人退出战争。8 至 9 月在南英格兰的一场大规模空战中，英国的科技(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就建立了一系列的无线电定位站)和皇家空军的胜利使得它更为确定。英国人一度体验到了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之后的自豪和安慰。这一胜利阻止了德国的海上入侵(虽然战争的胜利通常也是没希望的)。它同样证实了英国不会仅仅被空中轰炸所击败。不列颠群岛前途渺茫，但是这场胜利改变了战争的方向。它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众多的影响(其中包括英国拒绝言和)使得德国将注意力转向别处。1940 年 10 月，德国开始计划入侵苏联。

这年冬天，苏联获得了更多的领土，很明显是指望其来保证一个可以抵御德国未来攻击的缓冲地带。一场对芬兰的战争使它赢得了一些这样的土地。波罗的海的共和国，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已经被苏联军队所占领，在 1940 年被正式合并。1918 年罗马尼亚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取得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现在与北方的布科维纳(Bukovina)一起又被重新占领了。借此，斯大林时期的领土超越了旧时沙皇的边界。在这个时候，希特勒选择对它发动进攻，部分是因为担心俄国日后的进一步扩张。德国力求将苏维埃势力排除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峡之外。对苏联的迅速打击不仅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还将向英国表明进一步发动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里同样有一个深刻且必要的个人因素在起作用。希特勒总是由衷而狂热地憎恨布尔什维主义，

并认为斯拉夫人这一种族较低劣的民族应当在东方向德意志人提供生存空间和原材料。许多德国人积极响应这一歪曲的说法，即条顿人将西方文明强加在东方的斯拉夫人身上的长期斗争。这比以往任何改革神话都更能为其变本加厉的暴行进行辩护。

568

短暂的春季战役为这两个巨头国家间的冲突拉开了序幕。德国入侵了南斯拉夫和希腊（自 1940 年 10 月起意大利军队就不幸地与希腊交战）。在欧洲大陆上，兵力不足的英国军队再次被驱赶，去往他们曾经被派到的地方帮助新的盟友。克里特在一次壮观的德军空袭中被占领。现在，"巴巴罗萨"行动已经时机成熟——这一行动以中世纪的德国十字军皇帝的名字命名，作为对苏联发动强烈猛攻的代号。这一攻击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发动。在德国前期的巨大胜利中，大量俄国士兵被俘虏，俄军撤退了数百英里。德军的先头部队几乎差一点就要攻入莫斯科。然而，这"一点儿"却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扫除的，到圣诞节时苏维埃的第一次胜利反攻，宣告了德国实际上已经被苏军压制了。德国丧失了主动权。毕竟，大错已经铸成。如果英国和俄国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同盟关系，那么，即使没有由于列强的新式武器而造成的剧烈的战争技术的改造，它们通过海路获得的美国支持同样也必将增加他们的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必然能够击溃德国，只是说它们有可能会与之进行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们通常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巴巴罗萨行动发动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对于其开始的日期有几种流行的说法，其中有 1937 年（在中国）和 1936 年（在西班牙）。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系列战争的集合，其中的一些战争甚至在 1939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聚集在一起的是西欧对德国的战争和东方的纳粹-苏联（或条顿-斯拉夫）战争。1941 年，这些战争与当时其他地区的战争纠缠在一起。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自 1940 年就认为，为了美国的利益，应当在美国公众舆论和中立法则（有时这两个都被他越过了）的允许下

最大力度地支持英国。到 1941 年夏天,考虑到美国所有的意图和目的,希特勒发现美国是自己隐蔽的敌人。关键性的一步是这一年 3 月美国《租借法案》的颁布,美国将为盟军提供不必支付现款的物资和服务(这一政策会在适当的时候扩展到适用于苏联)。不久,美国政府扩展了海军巡逻队,增强了其对从东方进入大西洋的航运的保障。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第一次会晤签署了一项关于共同原则的声明——《大西洋宪章》,在这项声明中,一个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与一个事实上和平的国家谈论了一个“在最终摧毁了纳粹暴行之后”的战后世界的需要。这样的语言已经远非孤立主义。这有助于解释希特勒第二个重大而愚蠢的决定,他于 1941 年 12 月 11 日对美国宣战,在这之前四天,日本已经袭击了英国、荷兰和美国的领地。希特勒之前就答应过日本他会参战。战争因此成为全球性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被丢弃。英国和美国对日宣战使得这两场独立的战争更加激烈,只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的流亡政府同时加入了这两场战争;希特勒的决定忽视了美国可能置身于欧洲之外而只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结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个体事件,因为他已经确保了欧洲强国势力的衰落。欧洲大陆的未来不久之后将不仅由其自身的努力决定,也由在其两翼的大国,美国和苏联决定。

569

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的结盟实际上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本来的主要斗争对象就是美国。通过占领欧洲在远东的领地而迅速获利的期望,尤其是对原材料和石油的期望,对日本发动攻击的时机和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与美国作战是重要的决定,虽然其早期的胜利是惊人地迅速而广泛的,但是,这是一场失败的赌博。一旦最初的胜利结束,日本就会面临一场长期的战争,而它在这样的战争中必然会失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像珍珠港事件一样使美国人团结起来。孤立主义在 12 月 8 日以后已经几乎被抛之脑后;比起威尔逊,罗斯福得到了整个国家的支持。希特勒的决定使其对欧洲历史,还有亚洲的历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在真正意义上,这场战争比 1914 至 1918 年的战争更加算是

世界战争。到珍珠港事件为止,德军在巴尔干的战斗使得欧洲只剩下五个中立国家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土耳其(仅有少数欧洲领土)、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瑞士。在利比亚和埃及之间进进退退的北非战争到这时已经扩展到叙利亚和伊拉克,那里由德国空军支持建立的民族主义政府已被英国军队驱除了。伊朗在 1941 年被英国和俄国占领。在非洲,埃塞俄比亚胜利解放,而意大利的殖民帝国被摧毁。其他的欧洲帝国被日本一手摧毁,1942 年早期,它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其兵力穿过缅甸直到印度的边境,并很快从新几内亚轰炸澳大利亚。同时,海战仍在继续。德国的潜水艇、空军和地面打击遍布大西洋、北冰洋、地中海和印度洋。不久,只有一小部分国家能够置身于这场浩大的战争之外。

它要求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进一步的社会和经济动员。美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它巨大的生产力使得"联合国"(United Nations,从 1942 年开始的对共同抵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盟的称呼)的物质优势是无庸置疑的。尽管如此,1942 年上半年的前路依旧十分艰辛。四场重大而艰难的战役是这场大战的转折点。6 月,在主要是由空军作战的战役中,袭击中途岛的日本舰队被击沉。日本的损失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再也无法重新获得战略主动权,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长期反攻开始了。接着,在 11 月初,英国在埃及的军队决定性地打败了德国和意大利,并开始向西挺进,加入到在法属北非作战的英美联军中去,以将敌人彻底打败,并在 1943 年 5 月将其驱逐出整个北非。六个月之前的 1942 年底,苏维埃军队在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围歼了希特勒鲁莽暴露的一支德国军队。1943 年 2 月,在最让德军泄气的失败战役中,其余部全部投降,这仅仅是苏联冬天最辉煌的三个月的其中一部分,它标志着战争在东线的转折。

570

盟军的另一个胜利是为了保持与英国的海上交通而进行的大西洋战役。战役在 1942 年早期达到高峰。3 月,将近损失了 85 万吨的航运,而只有 6 艘德军的 U 型潜水艇被击沉;六个月之后,数据变成了 56 万吨和 11 艘 U 型潜水艇。趋势在逆转,虽然接下来的斗争依然很艰

苦。年底的数据是将近800万吨航运的损失和87艘U型潜水艇的沉没。1943年,相应的数据为325万吨和237艘。这对于联合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战役,因为这决定了它们利用美国物资以及再次进入西欧的能力。这最应当归功于英国几乎从1941年开始就保持的、在通信情报方面的优势。

罗斯福同意首先击败德国,但是,最后对法国的光复直到1944年才成功,这一拖延惹怒了斯大林。当它终于到来的时候,6月法国北部的光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远征。那时,墨索里尼已经被意大利人推翻,意大利已被从南部攻入;现在,德国独自面对欧洲陆地上的三线斗争。诺曼底登陆后不久,俄军进入波兰。虽然比它的盟友前进得快,俄国也直到1945年4月才到达柏林。到那时为止,盟军在西方已经冲出意大利进入中欧,并从低地国家进入德国北部。几乎是偶然的,德国城市遭受了猛烈的空袭,损失惨重,虽然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这可能都不是什么决定性的战略影响。然而,当4月30日,这场战争的引发者在柏林的废墟中自杀时,它有助于证实,大部分历史性的欧洲无论在字面意思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已经成为废墟。5月8日,从希特勒那里继承的有名无实的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远东的战争要更持久一些,但是当美国向日本的两座城市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从而造成了至那时为止尚不知晓的毁灭性的影响时,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在两次爆炸之间,俄国对日本宣战。9月2日,日本签署了投降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71

胜利的意义

在1945年所发生的一切其重要程度很难衡量。很明显,只有一个立刻了然的完全的好结果:纳粹政权的倾覆。随着盟军在欧洲的推进,一个空前的和到那时为止无法想象的恐怖与酷刑体系的罪恶被揭露出来。苦工和政治犯的集中营,以及被揭露的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仅仅是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的一部分。丘吉尔所说的话突然变成了赤裸裸的真相,他曾对他的同胞说过:“如果我们失败,那么整个

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我们所知道和所关心的国家，都将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而科技的滥用将使这一切更加凶险和漫长。”这一威胁的现实将很快在一些地方显现出来，如贝尔森（Belsen）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但是在此之前的六年里，盖世太保的酷刑室里生存着数以千计的苦工和受害者。暴行蹂躏了整个欧洲，区分这一暴行及其最后被揭露的程度，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随着更多证据的出现，世界的想象力再次被更恐怖的事情所打击：试图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尝试。这就是德国人所追求的“最终解决”，它在 1942 年 1 月柏林郊区的一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接下来的三年里，这一尝试在实践中已经足以改变欧洲的人口地图。占整个欧洲犹太人数量约十分之一的 325 万波兰犹太人在 1939 年几乎被全部消灭。荷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希腊以及奥地利的犹太人也与其数量成比例地遭受了不幸；但是，德国及其盟国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几乎无一幸免。总之，完整的数据可能无法统计，但东欧和东南欧大约有 600 万至 700 万犹太人死亡，不管是死于死亡集中营中的毒气室还是焚尸炉，被枪杀或是当场处决，或者死于过度工作、疾病或饥饿。随着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作为全世界犹太人中心的人口基础被粉碎，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这一章走向结尾。

此前从未有过仅仅由遗传基因的推测而彻底毁灭如此庞大的欧洲族群的尝试。如此大规模、系统性和官方的谋杀也从未发生过；成熟的官僚国家的全部资源都被利用起来，即使其任务完全是荒唐的（而这或许浪费了原本可以更好地用来维持战争的资源）。不应忽视——这也许是整个糟糕的事件下唯一的少许安慰——即使是纳粹政体也无法公开承认其灭绝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得以栖息的备受吹捧的种族纯洁性的废话和伪“科学”。毫无疑问，古代神话中的犹太阴谋和集体犯罪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借口——反犹主义自身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大屠杀（犹太人在战后这样称呼它）是一件令人惊骇的现代事实，它集合了来自上世纪前后成熟的欧洲文明的各种态度、理念和可能性。这同样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新奇事，即给予不成熟的和患有精神病的男女以

572

充分发挥的余地,在大多数社会他们本应被竭力约束和控制;许多纳粹统治阶层自身就性情乖戾、有时心理失常、轻信和无知(虽然其他人都是高智商),而在他们之下的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国家罪犯和虐待狂,授以他们编制和制服,通过一个疯狂但却有条理的社会工程来对受害者发泄他们的恨意和毁坏力量。比起许多事实上知道或是能够猜到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的沉默,大屠杀的这一特征更为可怕。

除了犹太人,还有许多人死于灭绝集中营和劳动改造营。然而,大屠杀是一个独特的暴行。它导致了人们对文明的正确性和欧洲历史意义的质疑,动摇了人们关于人性及其理性的自我引导能力、仁慈和进步潜力的信仰。在许多方面,善于思考的德国人几十年来都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之一,而它也的确曾是如此。它呈现了许多欧洲遗产中最好的东西。德国深受集体精神错乱之害,它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这一文明本身的根基已经损坏。希特勒不是新的成吉思汗,陶醉于毁坏他所不理解的东西,而是一个以错乱的逻辑行事的人,并要求其他人共享这一逻辑。纳粹的罪行不仅表现为对征服的原始陶醉状态,也表现为一种荒唐的方式,除了其追求的令人震惊的结果(在这方面,亚洲的战争有着重大的不同。其令人恐惧但却毫无系统的残忍暴行是有限的,大多数只对欧洲国家中的英国和荷兰造成了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一度取代了西方帝国主义,有时以粗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其臣民并非总是对这一变化感到惋惜)。

回顾过去总是让人很痛苦,但这也是个意料之中的事实,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政府是为了与纳粹邪恶进行斗争而参战的,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场战争的道德尺度的感知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日渐被激发出来。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即使在纳粹的全部罪恶被揭露出来之前。甚至当英国作为欧洲唯一能自立的国家而为其生存斗争的时候,一个民主的社会已经试图在战争中寻求超越生存的积极结果。对社会和经济的重建以及一个民主强国间合作的新世界的希望写入了《大西洋宪章》,而新的国际组织已经在1945年产生了。这些实体在其重要性上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历史。它们在盟国得到了友善的支持,这

573

是一种以明确的正义的原因所建立起的友谊,对利益和急于重新出现的社会理念的区分也十分模糊,这是不幸的。随着和平的到来,许多战时的花言巧语最终自食其果;硝烟散去后人们渐渐醒悟。尽管如此,1939 至 1945 年在欧洲的战争最后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斗争,也许是史无前例的。总有那么一天,也许会听到由盟军的胜利所带来的许多令人遗憾的影响;永远不能忘记它粉碎了对曾经兴起的自由文明最恶劣的挑战,即使在某种方式上,这个挑战是这一文明的畸形创造物。

1945 年的欧洲

这场战争在欧洲最明显和直接的遗产是其造成的完全且空前的毁灭。这在德国被毁坏的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的大规模空中轰炸(这场战争的主要发明)比西班牙内战中的西班牙城市所遭受的轰炸更加残忍,代价更为惨重。但是,不只是所有的城市被夷为平地。经济生活和交通运输也完全瘫痪,尤其是在中欧和东欧。1945 年末,数以百万的难民仍在这里流浪,试图返回故土。由于食物供给的缺乏,饥馑和瘟疫的危险也很大。1918 年的巨大问题在欧洲重演,甚至以更具威胁的方式出现。这一次,它们面临的是由于战败和被占领而士气低落的国家;只有中立国和英国逃脱了这些灾祸。私人手中有大量的军队,而一些国家惧怕革命。这与战争的政治影响有着明显的联系。在 1914 年成为现实、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苟延残喘的虚幻的权力结构自 1941 年起即已注定要失败。两个次要的强国在政治上控制了欧洲,并在军事上起核心作用。

在 1945 年 2 月盟军领袖在雅尔塔的会议召开之后,这一情况就很明显了。这次协议为将要持续数十年的欧洲和平建设提供了基础的规划。其根源上将欧洲重新划分为东西两部分。新的分歧将被堆砌在原有的矛盾之上,一条亚德里亚海-波罗的海的边境再次成为现实。这一年末,除希腊外整个东欧国家的政府都由共产党参政或掌权。苏联军队证明自己找到了一个远比革命要好得多的手段来扩展国际共产主义

的力量。战前的巴尔干共和国尚未挣脱早在1939年就环绕着它们的苏维埃怀抱,此时苏联的边界已经包含了战前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574

1939—1945年欧洲战争

1939年	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
	9月17日	苏联入侵波兰。
	9月27日	波兰放弃抵抗。
	11月30日	苏联进攻芬兰。
1940年	3月12日	苏芬两国签署和约。
	4月	英法在挪威海域布设水雷以阻止德国舰队。
	4月9日	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
	5月10日	德国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5月14日	荷兰军队投降。
	5月26日	比利时军队投降。
	5月2日—6月4日	大量英国军队和14万名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
	6月3日—6月7日	盟军军队从挪威撤退。
	6月10日	意大利对英法宣战。
	6月22日	法德签订停战协定(6月24日,法意签订停战协定)。
	7月9日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临时政府迁往维希。
	8月8日—10月10日	不列颠战役。
	10月8日	德军进入罗马尼亚。
	10月28日	意大利从阿尔巴尼亚进攻希腊。
	11月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加入德意日三国协定。
1941年	3月	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
	4月6日	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4月17日	南斯拉夫军队投降。
	4月23日	希腊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英军从希腊撤退。
	5月20日	德空降部队开始进攻克里特岛。
	6月22日	德国入侵苏联,10月底,德军已经占领奥德萨、哈尔科夫,进入克里米亚,逼近莫斯科郊外。
1942年	7月2日	德军夏季攻势开始——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并进逼高加索。
	10月25日	阿拉曼战役开始。
	11月8日	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驱使德军占领维希临时政府并击沉法国在土伦的舰船。
	11月19日	德国的胜利达到巅峰,苏军转入反攻。
1943年	1月	苏军围攻列宁格勒。
	2月2日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3月	德军春季攻势开始。
	7月	苏联展开夏季攻势。

575

（续 表）

	7月10日	盟军登陆西西里岛。
	9月3日	盟军进攻意大利，与意大利新政府签署停战协定。
	11月6日	苏军解放基辅。
	12月31日	苏军解放日托米尔。
1944年	2月	苏军进入前爱沙尼亚。
	3月	苏联夺回克里米亚。
	6月4日	英美联军进入罗马。
	6月6日	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始进攻北欧 。
	8月	苏军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和东普鲁士。
	8月15日	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
	8月24日	罗马尼亚政府投降。
	9月2日	布鲁塞尔解放。
	9月12日	美军进入德国在欧本附近的领土。
	9月25日	苏联向保加利亚宣战，三天后保加利亚投降。
	10月20日	苏军进入贝尔格莱德。
	12月16—25日	德军在法国的反攻失败。
1945年	1—4月	德意志战役。
	1月17日	苏军占领华沙。
	2月7日	雅尔塔会议。
	2月13日	苏联最终解放布达佩斯。
	2月20日	苏军逼近柏林。
	3月7日	盟军越过莱茵河。
	4月20日	苏军进入柏林。
	4月25日	苏美军队在易北河会师。
	4月28日	意大利的德军投降。
	5月1日	公布希特勒的死讯。
	5月7日	德国投降。
	5月8日	欧洲胜利日——欧洲战争的结束。
	6月5日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自1937年12月31日起的领土。

德国主导的欧洲历史阶段已经告一段落。一旦欧洲权力中心形成，它实际上就已不再存在了。希特勒的"杰作"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以及对奥地利的分区占领所粉碎。即使是俾斯麦时期稍小的德国（除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地区又重新被法国占有），现在也被划分为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并且由于失去东方的领土而使其面积大为减少。西欧大陆另一个主要的政治单位在被占领和打败之后进行了重建，但是依旧很虚弱（虽然法国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一支

576

庞大的军队在作战);意大利在墨索里尼被推翻后转变了立场,它和法国一样拥有日益强壮和壮大的共产党,不应忘记,这些共产党仍坚定地致力于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佛朗哥的西班牙仍在苟延残喘,实际上其内战中由于战时封锁而造成的经济不幸仍在继续,同时被世界舆论所孤立。只有英国在世界眼中保持了由于其在1940年和1941年的不屈服而带来的道德上加强的高度。在一段时期内,它在形式上仍然与苏联和美国平等,法国和中国也是这样。然而,真正情况并非如此。英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凭借仅次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高强度动员其资源和社会力量,它才得以幸存。但是,其战略绝境只有靠德军攻击苏联才得以打破,也只能靠《租借法案》才得以在战争的激流中生存下来。同样,这样的援助是昂贵的;美国坚持在费用付清之前,要求英国低价出售其海外资产以负担其费用。英国货币区域被打乱,美国资产如今在很大范围内流入英国的自治领。在依赖"母国"帮助其防守的范围内,这些国家从战时的力量和(相反的)弱点两方面吸取了教训。1945年开始,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获得完全的或是形式上的独立。对殖民帝国来说,它不仅被战争消耗了精力,当事实证明它无法保卫其大多数臣民的时候,它也失去了更多的精神权威。

已经能够感觉到的,发生在最强大的古老帝国主义列强身上的巨大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1944年英国开始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它所加入的远征军是由美国人指挥的。虽然几个月之内英国在欧洲的军力仍然赶上了美国,但是,战争结束时还是被美国所超越。同样,在远东,(虽然英国重新征服了缅甸,摧毁了那里最大的一支日本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它能被任何一个盟军部队所消灭)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迫使日本投降。尽管丘吉尔做了所有的努力,战争结束时,罗斯福依然绕过了他直接与斯大林进行谈判,尤其是计划要瓦解英帝国。尽管在1940年凭借其胜利精神独自支撑着,并因此得到了精神威望,但英国仍然无法逃脱战争对欧洲带来的巨大影响。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英国(除了德国)的情况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第六卷

冷战中及冷战后的欧洲

577

历史加速是一个隐喻。要测量其中的含义是很困难的;尽管许多统计指数被用来测量变化的尺度,但是这种变化最重要的部分也许恰恰是主观的,无法用数字或计量手段来表述。人们心中越来越迷失方向,突然找不到熟悉的精神路标与心理支持,他们吃惊地感到这只蠕虫已不再像以往那样缓缓蠕动了。从这层意义来说,对 1945 年以来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并无夸大之词。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父辈还生活在像新石器时代一样遥远的社会中,他们的孩子却伴随着对他们而言不可思议的计算机长大。他们出生后,第一架比空气重的载人飞机刚刚诞生,其后就目睹了人类在月球上行走。几年之内,大量的新国家接二连三地涌现,与此同时,旧帝国迅速衰败。

的确,欧洲最后一个跨国帝国在 1989 至 1991 年间迅速垮台,随之消失的还有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以及许多非欧洲人)生活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冷战。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要比其他东西更能对写作一本条理清晰的战后欧洲史构成挑战,因为冷战是一场全球斗争,决定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命运,但又总是超越欧洲范围。因此,在本书最后一章中会比前面各章更多地描述欧洲以外的情况。冷战结束后这项工作也不会变得容易。本书尽力构建一个实体,以接近近年来所称呼的"欧洲",但是无论如何定义,这块大陆的历史在 1945 年之后都无法简单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分开。

第二十七章 战后的欧洲

579

欧洲的萎缩

1945年,博学深思的欧洲人也许会钦佩法国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一个多世纪前对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的预见。他认为,这两者分别被标明出来,"将影响半个地球的命运"①。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命运最终看起来似乎掌握在两个不同体制的超级大国手中,一个以曾经的俄罗斯帝国为基础,一个以美国为主导。几十年来,欧洲的命运不可阻挡地受到了莫斯科或是华盛顿决策的影响。希特勒在1941年作出的与苏联和美国开战的决定,被证明是多年来一个欧洲人所作出的将会改变整个大陆历史的最后决定。不管俄罗斯和美国在历史上如何受到欧洲的影响,或是在它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欧洲模式(至少两者都是正式建立在从欧洲源起的意识形态之上),它们所关心的也各不相同并且是全球性的。单就地理位置就说明了这一点。接下来几年里,他们对待欧洲的态度只有放在全球

① 引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最早的法文版分为两部分,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本文所引用的内容出自第一部分的最后一页,亦可参见菲利普·布莱德利(Philips Bradley)版、里夫斯(Reeves)的英文译本(New York,1948,I,p.434)。

背景下才能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那些从旧的殖民和经济联结中崛起的新国家与世界历史无法分割之外,1945 年以后的欧洲史也无法从世界历史分离出来的又一原因。

外交上的微妙、民族心理与实际政策,曾一度必然会限制公众对这一至少自 1905 年以来就在进行的世界权力关系完成转型的意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确保对国际事务进行理性安排以及(正像国际联盟打算要做的那样)维护世界和平所筹建的国际新排序就反映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同盟国创造出一个新组织:联合国(简称为 UNO 或 UN)。经过详细磋商,这一组织于 1945 年在旧金山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成立,美军和苏军恰巧在同一天于易北河相遇。新宪章和旧的国际联盟宪章之间一个明显而又振奋人心的区别在于:苏联和美国从一开始就都是联合国成员国。在其他 49 个原始成员国(现在有 180 余个)中,大多数是欧洲以外的国家。曾经支撑欧洲旧的优势地位的国际等级,可以在这一新组织结构的其他方面得到确认。联合国大会包括所有成员国代表,所有成员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但安理会只有 11 个成员国,其中从成员国中轮流选出六个,一次任期一个月,另五个是常任理事国。

580

五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中,苏联和美国各占一个席位,另有两个席位被欧洲国家占据。其中一个是英国,未被削弱和入侵的唯一的前欧洲强国;另一个是法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坚持下获得)。第五个成员是中国。每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一种必要的让步,如果想要美国和苏联(更不要提其他三个国家)接受联合国组织的话。会议还决定,联合国大会位于纽约,并且从 1952 年开始,它就永久性确定了——这是世界权力关系转变的又一标志,尽管第一次普通会议(1946 年 1 月)是在伦敦举行。那次会议上,在对战争结束之后数月苏联仍有驻军在伊朗阿塞拜疆地区以及英国仍有驻军在希腊进行了激烈辩论之后,苏联代表第一次行使了否决权。

新权力平衡

对于英、法甚至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五重奏中的存在,很

难进行逻辑上的辩护，虽然从历史上很容易理解。就相对实力而言，1945年实际上只剩下两大强国，早在它们被称为“超级大国”之前这就已经成为非正式认可的事实。由于各种法律、外交上的拟构，英国实力被严重夸大了。法国还未从生不如死的被占领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国内又存在分裂，强大又纪律严明的法国共产党很可能利用这一分裂。在其他欧洲战前“强国”中，意大利国内旧的争吵还未平息，战争最后两年中又酝酿出新的争吵。德国已化为一片废墟，处于入侵军队的铁蹄之下，没人知道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

除了前中立国瑞典和瑞士，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尽管战时保持中立，但是由于内战而使经济复苏困难)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些国家还相当严重。1945年，只有英国、瑞典和瑞士的农业生产超过1939年。欧洲各地的煤产量(尤其是德国)都远低于1934至1938年的平均水平。欧洲比起其他各洲经历了更大的物质和经济损失，战争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从未被精确地计算过。除了苏联的伤亡之外，1 400万欧洲人死亡，而苏联则可能有超过2 000万人死亡，其中大约有1 300万人是士兵或囚犯。在受创最严重的国家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也生活在废墟中。许多地区的工厂、通讯陷入瘫痪，当然尤其是德国。除了美国提供的美元资助，没有什么能用来支付欧洲所需的进口和各种开销，货币流通已经瘫痪。盟军占领军发现香烟、猪肉和牛肉罐头要比钞票更好用。文明社会退化了，不仅是由于纳粹战争的恐怖，还由于侵略把撒谎、诈骗、欺瞒、偷盗变成了美德，这些不仅是生存之必需，而且被所谓的“抵抗”行为合法化。这一现象本身又孕育出新的仇恨，当一些国家刚被前进的盟军解放，行刑队就随后着手工作。宿怨刚被抹平，新仇又起(据说，在法国死于“净化”解放中的人比死于1793年大恐怖时期的人还多，但是这比起在南斯拉夫的复仇又相形见绌，各团体间因战时反抗德国或与之合作的不同决定而造成的宿怨此时随着新一轮大屠杀而进一步加深)。

比1918年更严重的是，欧洲的经济生活瓦解了，这也许比物质损失更为影响深远。欧洲经济的龙头曾经是工业化的德国。但即使通讯

和恢复设备的生产力还在，盟军也会首先致力于阻止德国的工业生产。他们的首要目的是阻止德国恢复其经济实力，而不是鼓励其发展。此外，德国被一分为二。从一开始，苏联人就夺取固定设备作为“赔偿”来修复他们受损的土地（考虑到德国人在对苏联战争和占领中所做的，这也许可以理解，他们在撤退过程中摧毁了 3.9 万英里铁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权力平衡显得分外清晰。1945 年的欧洲，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比其他可能的对手都更享有巨大的军事优势，更不要说在欧洲以外了。所有其他胜利的国家至多存活了下来或是有所复兴，而美国和苏联是唯一真正的胜利者。不为人知的只是，红军的实力在多大程度上或许掩盖了其背后的缺陷。

582

战后的苏联

在其盟友不可或缺的帮助下——但首先是在其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之下，到 1945 年，苏联获得了比沙皇帝国时代更强大的地位。在欧洲，苏军统治着广阔的西部缓冲地带，多数是从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获得的主权领土。其他国家很快被组成一套卫星体系，许多国家有苏军驻守。德国东部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也是潜在的主要工业区——如果它能够再次起飞的话。再往西，越过缓冲地带，就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是唯一没有在苏联占领军帮助下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1945 年，这两个国家看起来都是莫斯科坚定的盟友。

西方政府在与他们的盟友和军事领袖协商后制定的政策助长了苏联的战略成功。特别是西方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拒绝在苏军到达之前进入布拉格和柏林。结果使得在欧洲的东部和中部，苏联陆军力量在战略上具有绝对优势，也更具威胁，因为在 1914 年对俄国势力构成威胁的障碍（旧的哈布斯堡帝国和统一的德国）已经不复存在。1945 年，精疲力竭的大不列颠和正在恢复中的法国无法抵御红军，唯一一支可与之相抗衡的军事力量——美军，很快就要回家了。

在土耳其和希腊边境也有苏军驻守。英国政治家还记得 19 世纪

俄国人直接进入地中海的噩梦。在希腊，一场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进行，这使得情况看起来更糟。同时，在欧洲以外，苏联军队占领了伊朗北部，在远东占领了中国新疆大部和旅顺港海军基地，以及蒙古、朝鲜。还从日本手中夺下库页岛(Sakhalin)南部和千岛群岛(Kuriles)。像沙皇俄国时期一样，其他所得都是采取老办法，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由中国付出代价。另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已经可以看到新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因此，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许正在形成。

另一方面，当战争接近尾声，苏联的真正实力还很难估量。很明显，苏联人民经受了巨大的苦难，或许比德国人更甚。除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之外，约四分之一的总资本设备被摧毁。1945 年，斯大林也许对自己的优势并不比劣势了解得更多。尽管他的政府管理方法以及胜利的声誉使他不必复员给他在欧洲战场带来权威的庞大陆军，但是苏联既没有原子弹，也没有重要的战略轰炸机。斯大林发展核武器(十个原子反应堆迅速建立起来)的决定对苏联经济产生了沉重的压力，因为此时正迫切需要普遍的经济重建。战争刚结束的岁月证明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业化竞赛一样严峻。然而 1949 年 9 月，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年 3 月，苏联官方宣布拥有了核武器。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时代不复存在。

583

美国与战后欧洲

1945 年，美国的世界霸权不是像苏联那样体现在更多的领土占领上。战争结束时，美国在欧洲腹地也有驻军，但是美国选民却想尽快把他们带回家。环绕欧亚大陆大部分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基地却是另一回事。俄国也许比以往更成为一个陆上霸主，但太平洋却已成为美国的内湖。总之，广岛和长崎已经显示了原子弹的威力，这是只有美国才拥有的新武器。

美利坚帝国的根基还是在于其经济实力。除了红军以外，美国压倒性的工业实力是盟军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物质因素。美国不仅装备了自己庞大的军队，也装备了盟国的大部分军队。此外，和盟国相

比,取胜并未使其付出太大代价。美国的伤亡人数不算少,但是比起盟国来要少得多;英国的伤亡人数比美国大得多,苏联的数字则更加庞大。美国本土只受到零星敌人的骚扰,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其固定资产完好无损,其资源比以前更多。实际上,战时美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上升。最后,美国是个巨大的债权国,资金投向海外,当时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其商业和政治对手们正在复苏的困境中挣扎。它们的经济资源流向了美国。结果是一场世界范围的间接的美国力量的复兴,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初见端倪。

在欧洲,这在战争的后几个月已经出现了问题。实际上,美元是国际不可或缺的流动资源。通过《租借法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成立于1943年)的救济以及美国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在海外的直接开支,1945年欧洲危险地依赖于不稳定的资源来资助自身进口。实际上,美国已成为欧洲的银行家,上千万的欧洲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一些统治者却觉得不安。

584

冷战起源

一面是列宁和他的同事,另一面是伍德罗·威尔逊及其继承者,如果双方的主张都被重视的话,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就在所难免。在这层意义上,冷战也许可以追溯到1917年。意识形态对于苏联一方尤其重要,因为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如果苏联的统治精英和他们被灌输的主题不总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为抱有深刻的偏见,他们对待战时盟友的态度当然就会有很大不同。同样,一些美国人也从未停止对苏联的怀疑,总是把它看做一种革命威胁,早期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宣称的,而美国左翼却坚决否认这种威胁。但是那些始终不信任苏联和害怕共产主义的人相对来说是少数。他们在战争期间对于美国政策的制定没有产生主要影响。当战争结束,两个胜利的盟友中疑心更大、更谨慎的是苏联。

在战争结束之前,东西方未来政治分歧开始在欧洲显现时,最为关

注的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确，苏联在波兰的行为并不是美国所预想的让东欧人自主选择他们的统治者，但是，随着战事推进，美国政府和那些投票支持苏联的人都没有停止和苏联就这些事情达成合理协议的希望。总体来说，罗斯福对于两个强国继续相处抱有信心；他认为，鉴于他们在阻止德国复兴，以及支持战争在前欧洲帝国所引发的反殖民主义（他不把苏联看做一个帝国）的共同立场，他们应该能够达成协议。他和他的同胞都不太清楚俄国政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历史观，强烈反对大英帝国。当战争结束，许多美国人对英国人在已获得解放的希腊反对旨在推翻当地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游击队运动的行为感到极度不信任（有趣的是，斯大林显示出愿意让英国继续下去；他很轻松地同意丘吉尔的观点，为回报苏联在罗马尼亚留一手，英国也应该在希腊留一手）。尽管有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和他们在加勒比的记录，1945 年美国人仍然不喜欢谈论明确的利益范围，而苏联已经准备好将之作为谈判的基础。

当罗斯福总统在 1945 年 4 月胜利前夕逝世，美国的政策与思想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奇怪的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胜利之后并不愿意在欧洲使用它的威力；有趣的是，它更关心的是确保中国的重要城市免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而不是在红军到达前占领欧洲的首都。美军最关心的是尽快复员回国。甚至在日本投降之前，杜鲁门总统就已切断了对于赢得战争非常重要的对盟国的借贷，苏联也在其中。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它削弱了其他老朋友，而也许很快就需要它们的帮助。由于经济负担沉重，它们无法找到一个新的安全体系来替代美国。至于终极武器原子弹，很明显它威力无穷但只能在最后一刻使用，并且，无论如何，制造出这样的武器也要花费很长时间。唯一可用的两颗已经于 1945 年 8 月投给了日本。

585

美国的态度与政策随着它赢得时间和经验（主要在德国）发生了转变。苏军一丝不苟地执行他们的协议，建立占领区，承认英美（后来还有法国）在苏军所控制的柏林的驻军，和他们一起进行治理。种种迹象

表明,斯大林希望德国应该最终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这也是他、丘吉尔和杜鲁门在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所设想的。这会对苏联在鲁尔地区的未来有所帮助,这是一个潜在的赔偿宝库。同时,一个统一、被占领的德国也是一个被削弱的德国,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被划给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划给波兰(约 700 万德国人被从这些新土地上和从其他国家驱逐到更西部安置),并且,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归还给了法国。

苏联要确保防止德国复兴的努力实际上导致东部愈来愈从另三个占领区脱离出来,其与占领协议还是相容的。这种分歧开始时也许只是希望为将来一个统一的德国提供坚实可靠的(共产主义)基础,结果却是导致了 45 年来用分隔来解决德国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经济考虑也同样是分裂的。很快,西部地区出于经济原因相互联合起来。同时苏占区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断引起猜疑。在东德采取的措施似乎反映了在其他地区所见过的场景。1945 年,只有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起共产党多数派支持的政府;在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分享联合政府,但它们看上去越来越与苏联共舞。一个共产主义阵营似乎在 1946 年已初步形成。不管确切目的如何,很明显,除非处于一个能被掌控的政府之下,斯大林忌惮德国以任何形式重新统一。来自西方的攻击萦绕在俄国的历史记忆中,条顿骑士团、17 世纪的瑞典人、1919 年的“干涉”等。如果不被盟军统治,或最好是被苏联统治,统一的德国总会是个威胁。不管莫斯科政权的意识形态性质如何,这可能一直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如果统一的德国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话,那就带来更大的威胁。

586

还有其他方面使前盟国对苏联的政策产生忧虑。苏联表明不愿从伊朗撤出驻军,而当它的确撤军之后,却在阿塞拜疆留下一个共产主义卫星共和国(后被在 1947 年从美国接受军事援助的伊朗消灭)。在安理会,苏联的否决权一次又一次频繁使用让前盟国十分受挫,西欧共产主义明显受到苏联操纵。而且,斯大林的盘算仍然令人疑虑;也许他在等待、期望或甚至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场新的经济崩溃。

当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以“铁幕”谈起欧洲从的里雅斯特(Trieste)到奥德河的日益分裂，许多人谴责他，因为他绝不是代表英国人而言，远不如说是代表美国人所说的。苏联仍然在它的盟友中间享有很好的声誉。然而，在英国，尽管赢得了1945年大选的许多工党支持者都希望“左翼能够与左翼展开对话”，但是新工党政府中的部长们迅速变得犹疑起来。1946年，英美政策开始趋同，美国官员再三思考苏联的政策趋势，几乎巧合的是，美国在希腊的干预至少在那里实现了自由选举，而在波兰这根本就没有发生。此外，英国至此已经宣布他们将撤离印度，这与美国官方的意见一致。最终，杜鲁门总统没有形成需要摆脱的偏向苏联的固定见解。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决定欧洲几十年命运的一系列关键决定在华盛顿作出了，有时这被认为是莫斯科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由1947年2月英国政府在一次交流中默认英国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而引发的。由于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英国的经济急需对国内进行更多投资。非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第一阶段的代价非常昂贵。这不是英国部队在海外支出费用很高的唯一原因，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①]。还有与福利国家扩大有关的新的国内开销。1945年的一大笔美国贷款到1947年已经用完了。此前，面包配给制也在英国推行(战时觉得没有必要)。到1947年，英国想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只有从希腊撤军，并撤回对希腊所有的援助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的安全岌岌可危。杜鲁门总统立刻决定由美国来填补这一空白。美国给予希腊和土耳其财政援助，以帮助他们抵抗苏联的压力。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杜鲁门总统特意强调这其中的暗示意义；而不仅仅是促使这两个国家接受援助。“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他说(并继而承认希腊不是完美的)，“但是，如果它的缺点总是可见的，

587

---

① 1947年的海外军事支出约为2.09亿英镑，而1934年到1938年，英国政府每年海外预算，包括行政、外交和军事费用都是600万英镑。A. S.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1951* (London, 1984), p. 41.

并可以在民主过程中被指明或改正,那它就具有民主的美德"[①]。其意识形态的挑战意味非常明显。尽管只有土耳其和希腊要接受援助,但是他让美国来领导世界的"自由人民",用美国援助来抵抗"来自武装少数派或外部压力的征服企图"。

尽管主要是出于经济和财政援助手段,这一要"遏制"俄国力量的明显决定,可被看做是自路易斯安那购买案(Louisiana Purchase)以来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这是对1945年美国好像热切期望要与欧洲分离的明显回归的一种公然反驳,也宣布了与美国历史上传统外交政策的巨大决裂。最终,这将导致对美国实力有效性的不现实的评估,或如评论家所说的,这导致了新的美国殖民主义,因为政策延伸到了欧洲以外,但在当时这并未看出来。这是由苏联的行为和在过去18个月内对斯大林政策的恐惧以及英国的衰落引起的;美国政客和官员所做的决定还没有几个会对欧洲历史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马歇尔计划

几个月后,"杜鲁门主义"由另一项更深思熟虑的措施所实现,这一政策得到紧急政治事态的支持:美国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促进其经济的共同复苏。这就是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计划"。它根植于欧洲的重建。在许多美国官员看来,美国的利益现在变成确保欧洲的民主、友好政权的延续。虽然他们可能夸大了法国和意大利所面临的政治危险,但这是一种新观念。为此采取的措施是慢慢缓解欧洲的债务问题,确保欧洲经济复苏,这就找到了一个遏制苏联的非军事且不激进的方法。

588

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是第一个理解其中含义的欧洲政治家。他和法国人一道,敦促西欧国家接受援助。援助

① 总统的承诺在3月12日公布(英国则在3月31日关闭了他们在希腊的机构)。全文参见:*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 Truman, Jan. 1 to Dec. 31, 1947* (Washington, 1965), pp. 176–180.

是针对整个欧洲的。但是苏联既不愿意参加,也不允许它的卫星国接受;这一计划遭到莫斯科强烈的谴责。很快(尽管带有明显的遗憾)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也拒绝接受这一援助;作为东欧唯一一个还没有完全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并不被看做苏联卫星国的国家,很明显它必须站在苏联一边。苏联不妥协的另一个标志是战前旧的机构"共产国际"(Comintern)于 1947 年 9 月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的名义复现。它立刻开始了对"以建立美国帝国主义世界霸权为目的的毫不掩饰的掠夺和扩张进程"的谴责。最终,西欧国家建立起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来适应马歇尔计划,苏联则在欧洲的另一半建立起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来回应,这不过是苏联控制东部计划经济的一个掩饰而已。

实际上冷战(正像它后来所称的那样)已经开始了。战后欧洲史的第一阶段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下一个阶段将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这期间,跨越地球的两大集团的成员国,一个被美国领导,一个被苏联引导,挣扎着渡过一系列危机以获取自身安全,它们采取了各种手段,但在主要竞争者间并未发生战争。

就冷战产生的所有简单粗暴的语言来说,此后所发生的与 16、17 世纪欧洲宗教斗争的纠结颇为类似,意识形态促使暴力、激情滋生,甚至偶尔还有信念,但永远不可能容纳当时所有错综复杂的思想与逆流。毕竟,冷战不能包括民族利益。尽管特定的争吵可能会湮灭,灾难可能会避免,但很快种种迹象表明,修辞和神话会继续,在它们早就不再反映现实之后使得问题更复杂、更痛苦(这当然也让人想起过去欧洲的宗教斗争)。在后来成为西方集团的一些国家中,冷战看上去就像内战或临战(near-war)状态,产生了类似自由、社会正义、个人主义这样有关价值观的道德辩论。一些辩论在较边缘的剧院进行宣传或颠覆活动,一些则通过由两大竞争者赞助与支持的游击战争来实现。冷战也是一场经济斗争,贿赂卫星国、前殖民地政客或中立国。在此过程中大量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与教条主义的刻板相混合。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冷战是一场祸患,使得世界大部分地区难以幸免,30 多年来成为罪恶、腐

589

败和苦难的源泉。但同时,它也为西欧提供了保护,使之日后成就一片崭新的未来。

帝国的清算

最早打断冷战的复杂因素之一,对欧洲产生的直接影响要远远小于其他洲的一些国家。那便是出现了一些感到自己既不属于这一方又不属于另一方的国家。其中许多是在1945年期间由于非殖民化形成的新国家,非殖民化过程尽管不会在超级大国间引起核冲突,但是会像冷战一样在国际关系间引起巨大变化。联合国大会将被证明是个重要的反殖民主义平台,而不是宣传冷战的平台(尽管其常常被混淆)。1945年,有六个欧洲国家仍然存在帝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尽管其战后继续坚定、强硬地继续它们的统治,但是在未来的25年中,它们都不得不接受殖民地的清算。

虽然在程度、环境、时机上各不相同,但当战争夷平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扑克城堡时,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大体上取得了最终胜利。1942年,新加坡的6万英国、印度和自治领部队投降标志着欧洲在亚洲的帝国注定要失败;没有什么努力能够挽回比"约克城"号更惨烈得多的灾难。其反响是如此巨大,甚至影响到那些殖民力量还未被日本取代的地区(例如印度次大陆)。这不仅颜面尽失,每个在远东的欧洲国家都丧失了信心和声誉。这与日本人有时会粗暴对待他们的新目标并没有什么关系。到1945年,已经出现了要发生变化的明显迹象,前亚洲帝国几乎都将在几年内荡然无存。

在印度,甚至在1939年以前就已很明显,殖民统治的结束只是个时间和形式的问题。支持印度独立的英国人希望使它与英联邦相联系,这是自1926年的帝国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时起对英帝国的称谓,其产生了第一个"自治领地位"(Dominion Status)的官方定义,即独立于英国,效忠英王,完全控制内外事务。自治领地位为印度设立了一个可以预想的目标,尽管英国政府直到1940年才承认接受这一目标。到1941年日本参战时,印度的独立浪潮更加风起云涌。不同的印

度利益集团看到不同的机会。日本的进攻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国大党民族主义者战后自治,以及拥有退出英联邦的权利。但这已经太迟了;印度要求立即独立,独立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离开印度"。国大党领袖被逮捕,英国统治继续。平息 1942 年的叛乱比起一个世纪前的兵变(Mutiny)要快得多,但如果英国想要和平撤离,期限将至。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秘密商谈印度独立的必要性(包括亚洲其他地区,以及对法属印度支那托管的必要性)。就像 1917 年所做的那样,美国参战对欧洲来说暗示着革命性的变化。

590

工党一直把印度(和缅甸)的独立看做它的一项计划。1946 年 3 月 14 日,英国政府同意了。约一年后(恰在向杜鲁门总统宣布它从希腊撤军的计划之前),它向印度领导人保证,宣布它将不迟于 1948 年 6 月移交权力。这对解决酿成很多流血事件的纠缠不清的部族敌对十分必要。印度次大陆的分治随之而来。它曾拥有过的唯一统一政府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结束,从中诞生了两个新的英联邦自治领,巴基斯坦和印度。前者是穆斯林国家,在印度北部的两边各有两块领土,后者官方上讲是世俗的,但其领导人和治国理念绝大部分是印度教的。当几十万难民力图穿越新边境,寻求躲避部族暴力的庇护时,大屠杀随之而来。

在亚洲,绝对的领土统治并不那么利害攸关。尽管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范围在 1948 年就明确划定(可能柏林是例外)并实际上维持了 40 年不变,但由于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远东大国关系的解决却犹犹豫豫很多年。100 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奋斗,不仅仅是为了驱逐领土上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它能够在日本的威胁下幸存下来,并完成漫长的革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1941 年是关键的一年。中日在世界冲突中的相遇拖垮了日本的行动自由,并使中国获得强大的盟友以及新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和英、法及美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的残留部分最终被废除。这比同盟国所能给予的任何军事援助更重要;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忙于把自己从 1942 年初的灾难中解脱出来而无法对中国提供更多的帮助。相反,倒是一支中国军队被派出帮

助英国保护滇缅公路,抵御日军。尽管有美国空军的支持,但西部仍处于封锁中,长久以来,中国只能尽最大可能靠空军或滇缅公路与盟友保持联系。然而,在解除掉对西部的严密封锁后,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开始了。这一变化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典礼达到顶峰。

591

像印度和中国一样,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荷兰和法国殖民地,有时变化发生的速度要比英属殖民地更快。1939 年以前,荷兰在印尼的授权代表机构并未预见到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一些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与 1942 年占领岛屿的日本人合作。当日本投降时,他们处于夺取权力的有利地位,宣称在荷兰人返回之前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尼共和国。战斗和谈判进行了大约两年。最终达成协议,成立一个荷兰国王统治下的印尼共和国,但并没有生效。战斗再起之后,最初一次战役中荷兰人以前殖民地"警方行动"的方式徒劳地奋力前行,结果却遭到共产主义的全面攻击和联合国反殖民主义的谴责。印度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认为一个独立的印尼最终会出现,最好是对其进行安抚)都将这一事件提交到安理会。最终,荷兰让步了。随着印度尼西亚合众国的建立,拥有 350 年历史的阿姆斯特丹东印度公司于 1949 年寿终正寝。印尼与荷兰的模糊的联盟关系保持了下来,但于 5 年后结束。

法国一度似乎要比荷兰做得好些。印度支那战争与马来西亚或印尼有所不同,尽管日本自 1941 年以来就在那里实行全面的军事控制,但是直到 1945 年初法国的最高权威才正式遇到挑战。日本人将安南(Annam)、交趾支那(Cochin-China)和东京(Tongking)[①]合并,成立安南皇帝统治下的新越南。日本一投降,当地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rth)]领袖胡志明便跻身河内的政府大楼之中,宣布成立越南共和国。那些支持他的革命运动迅速传播。很明显法国人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不容易。一支大型远征军被派往印度支那。法国同意承

① 越南北部一地区旧称。——译者注

认越南为法国联邦内的一个自治国；关于给交趾支那独立地位的问题，所有磋商努力都失败了。同时，法国士兵受到狙击，他们的护航队遭到伏击。1946 年末，在河内发生攻击外国居民事件，造成多人死亡。法国军队围困河内，战争打响，共产主义者要实现民族主义目标，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法国则设法维持一个衰落了的越南，并将其与其他印度支那国家一起留在法国联邦之内。到 1949 年，法国转而同意把交趾支那包括在越南内，承认柬埔寨和老挝为"托管邦"(associate states)。但新的外来者现在越来越感兴趣。胡志明政府得到苏联和中国的认可，安南皇帝(法国所扶植)则得到英国和美国的认可。

592

因此，亚洲的非殖民化很快冲破了罗斯福所预见的简单过程。同时，缅甸和锡兰于 1947 年独立。第二年，共产党支持的游击战在马来半岛打响。尽管它会遭遇失败，也无法阻止迈向 1957 年独立的坚定进程，但它是困扰美国与欧洲关系的早期后殖民冲突之一。与共产主义世界不断增长的敌对，超越了简单的反殖民主义。

战后中东

中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稳定还不难实现，因为这一地区各种激进事件都时不时发生。1939 年，法国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托管，而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托管，同时在与当地统治者谈判之后，英国还在其他阿拉伯地区不同程度地发挥影响或行使权力。英国最重要的利益是在伊拉克和埃及。在伊拉克，英国保留了一支小型武装，主要是空军。在埃及则有大量驻军保卫苏伊士运河。1940 年意大利参战后，运河地区成为英国战略最关键的(有时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部分之一。埃及西部边境突然成为前线(埃及和英国共同管理的苏丹在 1940—1941 年间曾在短期内成为前线)。埃及几乎直到战争结束一直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它是英国的基地。战争也需要来自海湾的石油供应保障，尤其是伊拉克。因此，当伊拉克在 1941 年的一次民族主义政变中威胁要转向亲近德国时，英国进行了干预。同年，英国和自由法国(Free French)的军队适时地进驻叙利亚使叙利亚免于落入德国之手，这促成了一个

新国家的诞生。很快,黎巴嫩宣布独立。法国在战争结束时想要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轰炸了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但未获成功,1946 年他们的驻军撤离。在更西边的战线上法国也遇到了困难,在阿尔及利亚,1945 年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者当时只要求从法国联邦中独立。1947 年法国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在英国影响大的地区,反英情绪成为当地政客用来实现团结的利器。战后的岁月里,埃及和伊拉克都遍布对英国入侵的敌视。1946 年,英国宣布准备从埃及撤军,但是签署新条约的谈判严重破裂,埃及把此事诉诸联合国(并未成功)。到这时,大国在中东的势力已经被新兴力量所改变。

593

以色列和冷战

巴勒斯坦问题以及阿拉伯地区后殖民命运的不确定性可以在犹太人决定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的决定中体现出来:必要时,使用武力。其催化剂是欧洲的纳粹革命。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发布时,在巴勒斯坦居住着 60 万阿拉伯人和 8 万犹太人。这一数字使得一些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庞大,更具有威胁。在两次大战期间,从巴勒斯坦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实际上超过了外来移民的数量,在尊重"现存的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正像《贝尔福宣言》所说的)的前提下为犹太人构建一个"民族之家"的诺言好像还有通过调和得以解决的余地,但是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因为随着纳粹发起对犹太人的迫害,来巴勒斯坦寻求庇护的犹太人开始增长。

一些极端主义者总是把英国而不是希特勒当做主要敌人。当灭绝政策在战争期间开始实施时,英国试图禁止外来移民的做法使得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对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说无法接受。政策的另一面——分治,也遭到阿拉伯人的拒绝。战争一结束,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World Zionist Congress)就要求 100 万犹太人应被允许立刻进入巴勒斯坦,这使得问题更加戏剧化。英国的政策不断被斥责为仅仅是出于帝国主义的考量而不愿意放弃领土。其他新因素也开始出

现。英国仁慈地看着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外约旦(Transjordan)于1945年成立阿拉伯联盟。英国政策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假象,即认为泛阿拉伯主义可以说服中东稳定下来,阿拉伯国家之间政策的协调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开端。实际上,阿拉伯联盟很快投入到巴勒斯坦问题上,而把其他问题排除在外。

其他新因素还包括冷战。在战后初期,斯大林好像还抱着陈旧的共产主义观念,把英国看做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要帝国主义支柱。尽管在1919至1939年间苏联政府对中东地区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对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的攻击还是随之而来。战后,苏联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并且,苏联开始公开地支持中东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不需特别的政治眼光就可以看出,这是传统俄国利益在破碎的奥斯曼帝国遗产上的延续。然而此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却是反英的,或说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在1946年中期国会选举中,犹太人的选票非常重要;一种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对于一个民主党总统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从1945年起,英国人在巴勒斯坦面临来自犹太和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双重威胁。他们想要从这个乱摊子中解脱出来,离开圣地。当英国政府设法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结束托管时,不满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英国警察尽量维持现状。他们寻求美国的帮助,但是没有用处,杜鲁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最终,英国把这一难题带到联合国,联合国建议分治。这对阿拉伯人仍然是行不通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英国决定立即撤军。1948年5月14日,在英军撤离之时,以色列国宣布独立。在独立16分钟以后就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很快也得到了苏联认可。然而在之后25年中,美苏之间再也没有什么一致的看法了。

594

以色列立刻遭到了攻击。埃及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这部分按联合国决议判给了犹太人。约旦和伊拉克军队支持留在判决给他们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但是大卫王战胜了哥利亚,随后开始休战。1949年,以色列政府迁往耶路撒冷,尽管半个城

市还被约旦人占领着,这是耶路撒冷自罗马帝国时代以后首次再度成为犹太人的首都,且这一举动也无视了联合国想要把圣城国际化的想法。在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支持以及美国的私人金钱支持下,犹太人凭借自己的能量和创造力成功地建立了一个 25 年前没有任何基础的新国家。

事实证明代价非常沉重。阿拉伯国家感受到的失望和羞辱使他们不断对这个新国家进行敌视,同时也为将来的大国干预提供了机会。对他们而言,以色列越来越像欧洲或西方在伊斯兰中东世界的又一个植入品(第一个是十字军骑士所建的)。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牺牲品,现在却被阿拉伯人看做迫害者和剥削者。就犹太人来说,犹太领导人谈论的是新一轮大屠杀的危险。就这样,这一地区旧的争吵被进一步恶化。其幕后的背景是绵延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权力的消解,是后继帝国主义的相互竞争,是两个新世界大国的崛起使中东进退维谷,是 19 世纪欧洲民族主义与古老宗教的互动,是工业国对石油不断增长的依赖所产生的初步效应。20 世纪政治中很少有像以色列建国这样能够如此深深地(且如此不幸地)铭刻于历史的时刻。这的确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刻。欧洲犹太人中的大多数结束了大屠杀的命运,未来四分之一世纪中的移民迁出将证实这一点。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全世界的犹太人现在将转向以色列来寻找,带着因为一个建国梦想而产生种种问题的复杂心理。

欧洲分裂:第一场危机

在欧洲,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冷战主要通过欧洲事实上的分裂表达出来。这遮蔽了 30 多年来所有其他历史的发展,刺激了一些,而又掩盖了另一些。1947 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政府中都不再有非共产主义者。次年 2 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结果也是如此。在这种分化之后,冷战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在柏林打响。

595

英国人和美国人出于经济目的把他们的占领区合并,这促使苏联从盟军对德国中央委员会(Allied Central Commission for Germany)

中退出。1948年6月,在未经苏联同意的情况下,所有三个西方占领国在他们占领区内引入了一场货币改革,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开启了西德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且比其他早期措施更明确地把德国一分为二。按照马歇尔计划,(由于苏联的决定)只对西部占领区进行援助,这意味着东德的复苏将不与西德结合在一起。一个强大的西德将靠自己崛起,西方列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设想的是一个依靠自己政府而强大的国家。他们将着手让德国工业恢复元气无疑具有经济意义,但这也意味着东部德国将从此决然地被置于铁幕的另一边。

货币改革也把柏林一分为二,并因此阻碍了共产主义者在城中发起一场广泛的暴动的机会。苏联的反应是立即切断了德国西部与在苏占区中孤立的柏林之间的通信联系。不管最初的动机如何,争执不断升级。一些西部官员已经考虑到,把东柏林从三个西部占领区分隔开来的企图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封锁”(blockade)一词早已被应用,苏联的行为现在被按这层意思来解释。西方盟友接触位于柏林的本国军队的权利没有被苏联占领军触动或质疑,但是他们干扰了西柏林其他工业的交通。为供养西柏林,英国和美国组织了物资空运。苏联的目的是向西柏林人表明,如果俄国人不愿意,西方列强就不能待在那里。因此他们想除掉在苏联控制的柏林选举非共产主义者进入市政当局这一障碍。因此,一种角力很快展开。尽管维持西柏林生存所需的食物、燃料和医药的运输成本巨大,西方列强仍宣称他们已准备好将之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其中的含义就是只有武力能使他们停下来。自从战争结束后,美国首次将战略轰炸机移往英国基地。

西柏林人最终没有被吓倒,因为盟军的供应被证明是十分充足的,除非被武力打断。一年之后,封锁被打败。这一成就代价高昂,且技术卓越。柏林的飞机场大多数时候必须每天起降1 000多班次(仅煤的日均运输量就达5 000吨)。然而,封锁的真正意义却更深。封锁的失败表明在某一时刻,美国准备不惜与苏联决战以保护1948年确立的战后格局。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结果。　596



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域组成了前联邦德国，而苏联控制区域形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柏林仍处于四方力量的共同控制之下。

他们充分利用这次失败，在东西柏林的交流上引入新的障碍（在东西柏林之间行动原本是畅通无阻的），拒绝选举出的柏林市长上任。苏联的主要目的并未改变，即不能再有一个统一、经济强大的德国独立于苏联控制之外并占领德国领土。这一目的现在通过其他手段而不是胜利者之间的协议来实现。但是现在西方盟国却能够开始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加速德国的经济发展，而不必等到德国的政治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再实行。这对于整个西欧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597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开端

1945 年后塑造欧洲历史的内外大事是在观念之中展开的，观念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影响，不仅是恐惧，还有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感受和思想，它的命运以及改变它的可能性，甚至还有理想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刺激了许多政治家；不容置疑的是，除了逃离一种比它已经经历过的更野蛮的命运外，欧洲在任何方面都受益。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且是欧洲弱点的一个基本来源，如同 1914 年一样，民族主义在 1939 年显示了它的威力。一些人觉得欧洲历史从长远来看就是为了克服大陆的不统一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其他原因（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 1939 年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有助于促进所谓的“欧洲统一运动”（European Movement）。但是 1945 年及随后几年的特殊环境至关重要，这些环境鼓励欧洲人寻找新方法来组织欧洲，并满怀激情地将之付诸行动，且为此提供了机遇。

各国政府不同程度地对这种潮流和当时的环境作出反应。一般来说，排除环境和实用因素，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它们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常常从两个方向中选择一种。一是始终如一的英国政府的观点（常常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爱尔兰的支持），它强调政府间出于明确、具体的目的进行合作。与此相反，一些大陆性的欧洲政府往往更愿意倾听更长远、跨国界的一体化计划，也许可以拥有联邦制结构和欧洲议会。甚至在 1948 年这就已导致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一年英国坚决反对所谓的“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1949 年正式成

立),一点也不让步,甚至连法国和意大利提出新机构的名称应被称为“欧盟”也不能接受。

598 同时,当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布鲁塞尔条约》(*Brussels Treaty*)之后,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第二年开始了一项具体的区域防御协定。但这个协定实际上在 1949 年 4 月(封锁被正式解除几周前)被一个新的国际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所超越。北约是把欧洲各成员联系起来的第一个冷战协议。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中孤立传统的进一步突破。当任何一个成员受到威胁时,这个纠缠不清的联盟会进行共同防御。在西欧国家中,只有瑞典、瑞士和西班牙没有加入这个组织。

同年 5 月 23 日,一个新德国从西方三个占领区中崛起,成立了联邦共和国。9 月,第一任政府成立,一位重要的天主教政治家(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成为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10 月,在东部地区,一个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苏军手中接管行政事务,对此予以回击。在统一社会党名义下,共产主义者控制了它的政府。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出现了两个德国。冷战将沿着这条线将它们分开。一个危险、不确定的阶段已经结束。它将证明这主要是以东德为代价的,现在则紧紧地与苏联政策和利益联系在一起。

第二十八章　欧洲与全球冷战

599

新东亚

1949 年开始时表明,历史不知会发生什么,不仅是在欧洲,也是在两极世界里,欧洲几乎无法摆脱这一变化的结果。尽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放弃印度和其他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以及法国与荷兰殖民地的致命削弱在重要性上同一个新兴的、共产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相比相形见绌。从冷战的视角看,这为共产主义阵营增加了世界上最多的处于一个政府领导下的人口。

一年以后,两个世界的可能性看起来更合理。朝鲜是日军战败后按占领区域划分的又一个国家。联合国曾力图把被美军和苏军划定的两半重新统一起来,但是经过许多努力之后,仍无法达成覆盖全国的选举协议。因此在 1948 年,它承认在美国保护下由南部选举的政府为整个半岛的合法政府。这个政府宣布拥有(但无法行使)整个半岛的主权。与此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北部成立。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越界韩国迅速向南推进。两天后,安理会投票抵制对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起的侵略,杜鲁门总统派美国军队以本国的名义帮助韩国。当时苏联抵制安理会会议,因其代表不能行使否决权,最终联合国能够在行使国际纪律制裁方面获得了唯一一次重

大胜利。

大多数在韩国的联合国部队是美国人，但其他国家包括欧洲也派出了军队援助。英国派出了英联邦军队的一部分，包括空军和海军。盟军是成功的。几个月后，它就穿越了三八线进入朝鲜领土，此后，当战争靠近中国东北边境时，中国军队开始干预了。联合国军队被击退，一场更大战争的危险，也许涉及美国会使用核武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协调意见(主要来自英国)之后，美国谨慎地决定不在亚洲挑起重大战争。1953 年 7 月签署了停战协议，为把停战变成最后的和平，谈判开始；并且至今仍在继续。

600

1953 年，法国放弃了柬埔寨和老挝。1954 年，法国在一个叫奠边府(Dien Bien Phu)的军事基地作战失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既涉及法国的声誉，又决定法国选民作战的意愿。此后，在红河三角洲维持法国的优势就不再可能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会议同意对越南实行分治，一方是南越政府，一方是渐已控制北部的共产党政府，未来的选举也许能使国家重新统一。但选举并未发生。相反，始于 1941 年的反抗西方的亚洲战争很快就在印度支那开始了自 1945 年来最激烈的阶段。西方竞争者不再是以前的殖民国家，而是美国人；法国人回家了，英国人在其他地方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另一方面是印度支那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者和中苏两国支持的改革者。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和认为其应当支持当地非共产党政府的信念促使它像支持韩国一样支持南越。不幸的是，无论是在老挝还是在南越，或最终在柬埔寨，都未出现在其被统治者眼中无可置疑的合法政权。印度支那的历史越来越被强行纳入冷战模式，人民的国内利益在未来的几年中不断丧失。

欧洲人在关闭他们在亚洲的殖民生意。有时候，他们的行动没有自己希望的那样迅速。尤其是英国人，他们因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延迟了几次。英国部队不得不最迟于 1964 年再次在东南亚采取行动，因为新印尼的铁腕人物苏加诺(Sukarno)斥责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这一联邦是在殖民帝国的废墟之上于 1957 年崛起的(1962 年扩大)。对许多亚洲人来说，欧洲统治的结束现在看

来并不像曾经想象的那样是转折点,并且也没有冷战对抗那么大的影响。帝国主义退出后的现实状况开始显现。欧洲人影响了几百万亚洲人的命运,支配他们的生活达几个世纪,与他们建立了新的特殊的国际关系,但是除了与之合作或帮助建立起来的统治精英阶层外,欧洲文明却很少触及亚洲人的心灵和思想。在亚洲有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加根深蒂固和强大的传统。 601

亚洲的非殖民化

印度次大陆	
1942 年	印度独立运动拒绝英国提出的战后自治建议。
1946 年	3 月 14 日,英国提出印度完全独立。
1947 年	2 月 20 日,英国确定撤军最后期限;6 月,印度和穆斯林领导人同意分治;8 月 15 日,印度和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
1948 年	锡兰(斯里兰卡)成为自治领。
1950 年	英联邦属下印度共和国成立。
1956 年	英联邦属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东南亚	
1945 年	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宣布独立,但是法国慢慢又获得对各国的控制权。
1948 年	缅甸成为独立共和国。
1949 年	越南在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被法国认可。
1954 年	法国认可南越、老挝、柬埔寨的完全独立;越南按内部协议一分为二。
1957 年	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n States)在英联邦内独立。
1959 年	新加坡实现自治。
印度尼西亚	
1945 年	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紧接着荷兰重新树立了权威。
1949 年	荷兰把主权移交给印尼。
1954 年	印尼解除与荷兰的所有联系。
东亚	
1943 年	英国和美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1945 年	朝鲜在苏联和美国占领区之间分裂。
1946 年	菲律宾共和国成立。
1948 年	大韩民国(南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部)成立。

亚洲文化从未像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一样被扫地出门(因为做不到)。就像亚洲以外的伊斯兰世界一样,不论是欧洲人的直接努力还是欧洲文化通过自以为的现代化的间接传播,都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即使是那些相信自己已经从过去彻底解放的人,那些最“欧化”的人,其 602

思想和行为的最深层也通常从未被触动。

中东与北非

以色列的出现使中东政治发生了革命。1948 年以后对石油的需求以及冷战的影响增加了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以色列比起英国对阿拉伯问题要敏感得多(尽管在苏伊士运河仍有英国驻军,在其他“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也有英国军队)。它甚至一度使泛阿拉伯主义看起来似乎有理。阿拉伯土地被不公地掠夺(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承诺给阿拉伯统治者),巴勒斯坦难民遭受苦难,列强和联合国代行其责,阿拉伯人苦苦思索着这些问题。他们的统治者可以就这些不满达成协议,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然而,在 1948 至 1949 年战败以后,阿拉伯国家一度不再愿意公开委派自己的军队。

划定以色列与约旦、叙利亚和埃及实际边界的一系列停战协议的签署一直持续到 1967 年。20 世纪 50 年代初不断有摩擦发生,以色列不断遭到从埃及和叙利亚难民营雇佣的一群群年轻游击战士的袭击。但是外来移民、辛勤的劳动和美国的资金坚定地支持着这个新国家。当以色列的人均收入同人口更稠密的阿拉伯国家相比差距拉大时,阿拉伯人更受刺激。对这些国家的外国援助还从没产生过像这样巨大的变化。由于人口快速增长,最发达的埃及面临尤为严重的问题。不同阿拉伯国家间以及各国内部贫富阶层间的对比加深。大多数石油生产国被少数富有、通常传统又保守、偶尔具有民族主义情结又西方化的精英所统治,他们通常对贫困的农民和住在人口稠密地区贫民窟中的人不感兴趣。民族主义者和泛阿拉伯主义者在中东推动共同反对以色列、反对英国和反对西方等方面遇到了困难。

一场埃及革命以后似乎带来了更有希望的前景,这场革命把一个年轻的战士迦玛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带到了前台,纳赛尔一度看起来既有可能把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又有可能为社会变革开辟一条道路。1954 年,他成为推翻埃及君主制的军政府的领袖。在面临强烈的敌对情绪时,英国政府总是试图与阿

拉伯统治者合作;其从印度撤军后认为中东并非那么要紧。1951 年,英国的盟友约旦国王遇刺,为了生存,他的继任者不得不宣布拒绝与英国旧有的联系。再往西,战争一结束就被迫承认摩洛哥和突尼斯完全独立的法国面临更多的问题。1954 年,一场阿尔及利亚国家叛乱开始;没有哪个法国政府能够轻易放弃 100 多万拥有欧洲血统的定居者。另外石油刚刚在撒哈拉沙漠被发现。

603

在这种背景下,纳赛尔社会改革的逻辑和民族主义吸引了埃及以外的阿拉伯人。他的反以色列情绪没有被怀疑,为他赢得荣耀的是,他很快与英国达成了退出苏伊士基地的协议。美国人也不断感受到苏联对中东的威胁,也一度赞赏地把他看做一个无可挑剔的反殖民主义者以及潜在的代理人,但是很快纳赛尔便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1950 年,英、法、美一致同意通过向中东的老客户限量出售武器来稳定这一地区,这样做的条件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保持平衡。当纳赛尔以棉花为抵押成功地进行了一宗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交易,且埃及给予共产主义中国以外交认可之后,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为表示不满,英美撤销了对其一个很受欢迎的国内发展项目——在尼罗河上修建大坝——的资助。作为回应,纳赛尔扣押了拥有并运营苏伊士运河的私有公司的财产,声称它的收益应该用来资助大坝工程,这触动了英帝国主义的敏感神经。至少这一次,只是被帝国撤离驯服一半的本能看起来好像是与反共产主义和与更传统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是一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已开始怀疑纳赛尔是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英国首相也沉浸在错误的类比中:他把纳赛尔看做是一个新的希特勒,在他成功发动侵略之前要阻止他。至于法国人,他们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暴动而抱不平。两个国家都正式抗议苏伊士运河被没收,因此与以色列串通,开始策划推翻纳赛尔。1956 年 10 月,以色列突然入侵埃及,声称要摧毁侵扰他们边界的游击队基地。英法政府立即宣布通过运河的行动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它们号召停火;当纳赛尔拒绝时,它们先是对埃及发起空中袭击[在盖伊 · 福克斯日(Guy Fawkes' Day)],然后是海上袭击。它们否认与以色列串通,但是这种否

认是可笑的。这是个谎言,更糟的是,是个难以置信的谎言。很快,美国人被彻底震惊;他们害怕苏联会从这场帝国主义的冒险中受益。财政压力迫使英国接受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英法干预以耻辱结束。

苏伊士事件看起来是(也的确是)一场西方的灾难,但它的主要影响却是直接的、道德上的和心理上的。英国人的损失最大,这使他们的良好愿望付诸东流,尤其是在联邦内部,同时也使中东对他们撤军的诚意失去信心。它也加深了阿拉伯对以色列的仇恨;对以色列与西方难分难解关系的猜疑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苏联的迎合。纳赛尔的声誉更是节节上升。也有人认为苏伊士事件在最关键的时刻使西方失去了东欧(当西方列强相互争吵的时候,苏联军队镇压了一场匈牙利反抗其苏维埃卫星国政府的革命)。然而,中东事务的基本内容并未因危机而发生重大变化。苏伊士事件并未改变冷战或是中东的平衡,英法再也不会冒险来吃这么大的苦头。他们遗憾地而不是满怀气愤地看着那些友好政府后来的垮台,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英军曾被召唤到约旦来支持其统治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是与支持纳赛尔的军队作战。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发展来自阿尔及利亚,它与苏伊士事件并无多大关系。

604

在这十年里,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风起云涌。内战使革命更错综复杂,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既包括当地的马格里布人(Maghreb,马格里布人内部四分五裂),也包括欧洲后裔(分裂不是很严重)。定居者毫不妥协,再加上许多士兵感到自己是被要求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痛苦不堪,这几乎导致一场法军政变。不过,1958 年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宪法下已经成为总统的戴高乐将军和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签署了秘密协定,1962 年 7 月,全民公投之后,法国正式认可阿尔及利亚独立。1951 年,利比亚从联合国托管走向独立。至此,除了西班牙飞地以外,欧洲霸权在整个北非海岸已被消除。

实际上,欧洲利益被改变了。在中东,他们不再受旧的固有观念所支配。苏联继续以冷战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地区。当以色列对于抵抗英国不再有用时,苏联放弃了早期对以色列的支持,随后采取坚定的支持阿拉伯路线,竭尽全力地煽动阿拉伯对残存的英帝国主义的不满,同时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通过在边境骚扰苏联犹太人来稍微地为自己挣得阿拉伯的赞同。然而此时改变中东问题的主要因素是石油。50 年代有两大重要发展。一个是比以往更大储量的石油矿藏的发现,尤其是在波斯湾南部海岸,位于仍深受英国影响的小小的酋长国内以及沙特阿拉伯境内。第二大变化是工业国能源消耗的剧增。石油增产的主要受益者是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科威特以及略微落后一点的主要生产国伊朗和伊拉克。那些依靠中东石油的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很快还有日本,将不得不在他们的外交中重视阿拉伯人的观点。 605

不断增长的石油收入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其在石油生产国导致了多方面的社会变化,一些变化是有意的,更多变化则是无意的。这对它们绝不仅仅意味着好处。中东和海湾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随着人口增长一些地区不断贫困化,保守派统治者不断提高国内治安体系,富人接触西方奢侈品,一些地区累积了大量移民劳动力,等等,这些都是众多最终导致不稳定或至少破坏社会、文化凝聚力的问题中的一部分。的确,自 1919 年后,中东的主要国家结构是坚实的,能够承受野心勃勃的革命——泛阿拉伯主义的巩固和统一的初始计划或多或少是完整的。它们因以色列的创立和生存而紧张,但最终坚持了下来。然而,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却充满暴力与暗杀。石油革命所做的就是把阿拉伯大众卷入政治,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威胁性的背景因素,也是在现代从未发生过的。在冷战背景以及维持现存政权的外部利益之下,这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出现。但是当它确实出现,它就会成为整个“西方”国家首要关注的问题,而不只是欧洲。

欧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在使地图绚烂多彩方面,19 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要比在其他地方做得更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取消了德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取消了意大利殖民地,但这并未影响欧洲在撒哈拉以南的普遍霸权。1945 年,唯一独立的国家是利比里亚和南非联盟(南非联盟是英联邦的一部分)。其他地区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英国、法国、比利时或葡萄

牙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在西非海岸拥有一块小岛)。这一地区的非殖民化过程是迅速的,但却充满巨大的困难,并且将会比亚洲产生更模棱两可的后果。但整个过程也是令人惊讶地不流血的:只有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过程导致许多人丧命(但是在后殖民时代,当非洲人开始非洲化进程时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葡萄牙是在国内革命后才放弃其殖民地的,但是非洲其他地区的殖民主义却是相当和平地被取代。可能的话,法国和英国政府急于卖弄似地通过仁慈地对待其以往的臣民来保持一定的影响;以定居者而不是帝国统治者的形象出现作为避免撤出的常用途径。

帝国的结束比大多数人预料的要快得多。1945 年时还没有像在印度那样有任何可靠的预计,但是到 1961 年(南非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共和国,脱离英联邦),24 个新非洲国家已经形成。十年后,葡萄牙是唯一一个仍然坚持拒绝放弃非洲殖民地的前殖民国家,但是到 1975 年底也撤走了。领导了海外欧洲领地冒险的伊比利亚人几乎是最后一个放弃这块土地的。

606

帝国主义撤军之后,紧随其后的是割据成小国。非洲缺乏像亚洲那样伟大的本土文明的统一影响来摆脱殖民分裂。西方化的非洲精英所感兴趣的民族主义观念确认了非洲大陆缺乏一种内在的文化统一(穆斯林国家塞内加尔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著名例证,其总统用法语创作诗歌,并且是个歌德研究专家),并经常忽略殖民主义所包含或操纵的重要现实。结果是,黑非洲现在的形式主要归结于 19 世纪欧洲人的决定(正像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框架来自这一世纪他们的继承者一样)。新非洲国家主要靠前殖民地的界限来界定;其常常包括各种语言、血统和习俗的人们,对他们来说,殖民管理提供的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

尽管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新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却非常不稳定。这在形式上的帝国消失之后仍然常常鼓励了欧洲经济影响的持续。帝国主义的遗产又一次变得重要,既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与亚洲相比,非洲的殖民政权留下了薄弱的文化和经济基础设施。

识字率很低,受过训练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专家也很少。他们不均匀地分布在各国之间。非洲重要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矿藏)需要他们开发,进行资金运作和营销,这些都只能在不远的将来依靠来自外部世界的帮助(非洲白人被许多黑人政治家看做“外来者”)。此外,由于欧洲的需求和利益,一些非洲经济体直到最近才经历了分裂和转移。

前英属殖民地加纳于 1957 年第一个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崛起。在接下来的 27 年中,非洲发生了 12 场战争,13 位国家领导人被暗杀。发生了两次尤为激烈的冲突。在以前的比利时属刚果,富含矿藏的加丹加(Katanga)地区试图独立,导致了内战,苏联和美国的影响迅速卷入。比利时士兵返回此地,联合国努力维持和平。然后,在 60 年代末,迄今最为稳定和最有前途的新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爆发残酷的内战,又一次把非洲以外的人们卷入血腥战争中(一个原因是尼日利亚加入了石油生产国队伍)。然而,除了一两个例外,无论其他非洲以外的利益在它们中间发挥怎样的作用,非洲国家大部分在冷战政治中未被外来者明显地操纵。形式上马克思主义政权仅在最传统的国家之一的埃塞俄比亚和前葡萄牙殖民地出现。前法国和英国殖民地,有时享受或是承受前殖民主人的某种赞助,很少受到超级大国对峙的影响。但是欧洲人并非没有加入非洲政治的黑名单中。新成立政权糟透了的政绩有时需要替罪羊,非洲大陆有两个主要欧洲定居者国家,一些人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潜在的对象。

607

南非联盟起了重要作用。到 1945 年,它被讲南非荷兰语(Afrikaans)的布尔人所控制。布尔人对英国人的积怨可以追溯到大迁徙时期,又被布尔战争中的战败所加强,因而激发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积极解除与英联邦的联系。开普敦和纳塔尔省盎格鲁-撒克逊裔选民的集中使之变得容易;布尔人在德兰士瓦(Transvaal)和主要的工业区和农村腹地扎根。的确,南非于 1939 年参战并站在英国一方,且派出重要力量参加战斗,但是甚至那时,不妥协的“南非白人”(Afrikaners,正像他们不断称呼自己的那样)却在支持一场与纳粹合作的运动。1948 年,它的领导人在一次大选中击败南非资深政治家扬·史末资(Jan

Smuts)后成为总理。当南非白人在联盟中取得稳定独占的权力,并在工业金融区增强自己的经济地位时,那么向非洲黑人强加政策,使他们改变深深的偏见很快就是难以置信的了。最终的结果是建立一套种族分离体系:种族隔离(*Apartheid*)。种族隔离系统地体现出把黑人降到布尔意识形态中的劣等地位之中,并得以加强。其目的是保证白人的主导地位,在工业主义和市场经济中打破了按照旧的部落划分而不断增长的黑人人口的规则和分布。

种族隔离吸引了非洲其他地区的白人(甚至不是在可谅解的基础上,而是在原始迷信或所谓南非白人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唯一一个黑人和白人人口比例与南非相近且财富分配同样不平等的国家是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使英国政府尴尬的是,它于1965年从英联邦中退出了。它担心白人分离主义者的目的是将其转向一个越来越像南非那样的社会。当时的英国政府在犹疑间错失了机会。尽管英国要求以禁运的形式进行"制裁",禁止其与前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但黑人非洲国家没有能够立刻对罗得西亚采取措施,联合国也没有什么办法。许多黑人非洲国家对此置之不理,英国工党政府对主要石油公司采取措施来确保他们的产品抵达叛乱分子手中也装作不知情。这一羞辱的事件使得英国的声望在非洲人眼中大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为什么英国不能像1776年那样公然镇压一场殖民地的叛乱。而许多英国人认为正是那一先例使得一个遥远的、军事上已衰弱的帝国去进行干涉的前景看起来令人沮丧。这是英国实力下降的又一个标志。

608

欧洲复兴

对前殖民国家来说,欧洲帝国的覆灭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最为重要,但是比预料的看起来影响要少。也许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学上的——大量前原住民、定居者或土著居民从前殖民地返回(或第一次到达)母国,还有心理上的——熟悉的假设慢慢褪去,旧的纽带不断萎缩。通常,这两种变化的影响都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同时,欧洲东西部

从战后贫困中的复兴也在进行，随之它的各个分支也进一步被塑造。与海外领土关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多大影响，与之现存的经济纽带证明是持久的(正像1783年所系上的那条纽带，有历史头脑的人会记得)。

然而，1945年以后欧洲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虽然有临时性的挫折(尤其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人类的财富在20世纪几乎持续增长，且增长的幅度很大。1945年以后，总的经济增长从未终止。此外，尽管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多受到巨大差异、分歧和挫折的影响，但是这种增长在全世界却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如果按照人均(通常是按总值)来计算，发达国家无疑在其中做得最好。当然，长久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是在欧洲大陆。这种不断增长的富裕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国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和平。1945年以后的十年间虽然有各种小规模的或是初期的冲突——人们每天在这些类似战争的冲突中被杀戮，大国通常让其替罪羊为自己作战——也有长期的国际冲突以及武器上的高额支出，可是这些事实并未对此产生影响。最重要的，在欧洲没有发生像1914至1918年和1939至1945年那样的人力或物质资本的摧毁。几乎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从1918年以后的先例(实际上是1815年以后的事例)来看，一次大的战争之后伴随和平而来的经济复兴在1945年以后并未很快衰退。

一部分原因来自政治方面。即使在马歇尔计划之前，政治已使欧洲重建所需的美元援助成为可能。冷战的影响并未消失。国际对立将维持欧洲的经济活动，且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兴。援助的金额是巨大的。在1948年和1949年，一直以不低于美国GDP总额的3%来援助欧洲。马歇尔计划超越了原计划的1951年，在此期间，共有不少于170亿美元给予了受助者，此外，欧洲还吸纳了世界银行30亿美元的贷款。这种输入促进了有益的技术进步和主要资金投资，使欧洲真正富裕起来。这些还促成1949年欧洲货币的一系列贬值，使得欧洲在约20年的时间内极大地增强了竞争力。 609

欧洲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工业生产中心的复兴预示了美国能量的存

在;它的前提是在欧洲以外。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欧洲国家自己的努力,到 1953 年西欧已得到了坚实的重建和恢复,正是从那时起,开启了所谓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并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西欧 12 国(包括芬兰)的数据表明,1950 至 1972 年的 GDP 实际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4.6%,人口增长率为 0.7%(1913 至 1950 年的数字分别为 1.4%和 0.5%)。[①] 但是仍旧很难确定这一增加的具体原因以及各个国家间的差距。经济学家仍旧在就为什么发生这些而争论不休。

东欧也经历了经济增长,但是幅度并不大。原因也很复杂,无疑其必须回溯到 1945 年前。一些东欧国家的相对落后在战争期间就很明显(尤其是农业)。自从“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商业关系就因政治原因而不断受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大萧条且寻求救护(或自助),苏联也遭遇其他灾难(一些灾难是自己制造的),1931 年以后世界贸易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克服困难的机会也消失了。此后是战争期间的破坏。战后,分配稀缺资源的两种方式不断分裂着世界,所有早期世界市场的格局被打破,欧洲尤为严重。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决定要素是市场,尽管这个市场概念与旧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所说的市场截然不同,并且在很多方面并不完美,要通过国际机构和协议进行大量干预;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集团中(以及一些其他国家中),政治权威是决定性的经济因素。虽然贸易是在市场和指令系统(或准指令系统)间进行,但是受到严格限制。

610

随着时间流逝,两种体制间的接触不断增加,但是并没有使它们走得更近。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选择的和政治上竞争的模式,其竞争被冷战的政治斗争所点燃,实际上帮助了传播敌对的状况。这种形势并非静止不变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并未完全主导一个体制,另一个体制也不像十年前那样完全被苏联控制。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

---

① 这些数据摘自以下这篇知识性技术文章(尽管作者自称其为有选择的和非技术性的)中的一张图表: N. F. R. Crofts, “The Golden Age of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Europe, 1950 - 1973”,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VIII(1995), pp. 429 - 447.

的持续经济增长中，两者都有所增长(尽管程度大不一样)，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两者开始分道扬镳。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样，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也扩展到欧洲以外(蒙古、古巴和越南都最终加入)，尽管试图鼓励国家经济专业化，但是在促进成员国贸易上却没有什么效果。鉴于东西间的分裂，试图为欧洲确立一种总体的经济地位，并把这种地位与世界其他地区相联系是不现实的，也是虚伪的。然而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世界人口中较富裕的一部分。

而西欧人经历了史无前例、较长时间的繁荣昌盛。多数人居住在工业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生活水平很高，并且整体看来，今天也是一样，尽管有其他国家加入(且仍在加入)。像 1939 年一样，70 年代时世界三大工业人口密集地带仍然是美国、欧洲和俄国，日本也逐渐跻身其中。

现代工业经济并不像 19 世纪时的经济一样，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开始变得明显。老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长久以来一直是经济发展支柱，其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了。长久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1900 年的三大主要钢铁制造国，8 年后仍处于世界生产者的前五名，但是分别位列第三和第五；这就是美国和德国(以西德代替德国位置)。英国(1900 年位列第三)在同一张世界列表中位列第十，西班牙、罗马尼亚和巴西紧随其后。1982 年，波兰的钢产量超过了美国 1900 年的产量。另外，新工业出现，且不仅仅是在过去的技术和结构上的推进。很多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来自甚至在 1945 年尚不存在的行业，如电子工业、塑料等。煤炭，在 19 世纪取代水力和木材成为工业能源的主要来源，但是在 1939 年以前，水电、石油和天然气也都成为了重要的能源来源；最近，核裂变产生的能量也成为来源之一。连续性在结果中要比在过程中更容易辨认。像 19 世纪一样，工业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范围更广。生产商品所需的廉价能源和材料抵消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交通改善进一步降低了成本。结果是为欧洲消费者使用和娱乐所需的商品生产大幅度增长。

611

这些变化与其他变化一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趋势的表征。它们也反映了政治领域已经很明显的重要主题。精确的时机很难确立,但是大体看来,新兴的富裕先是从美国开始,然后是欧洲,然后再传递到其他洲。其重要性在物质商品的不断流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迅速显现出来,但是这些事实本身也暗示和促进了其他变化,这在世界发达社会中是共有的。一定水平的物质生活带来了态度和观念的变化——这部分是欧洲作为全球文化影响的最后的迟来的胜利,是四个世纪前开始的欧洲国家、欧洲宗教和欧洲文化输出的结果。这种变化超出品位和时尚的肤浅(不管怎样,品位和时尚常常反映了欧洲所受到的美国影响)。例如,对于欧洲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而言,实际上所有这些必须面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年轻一代态度和行为上的显著变化。专为年轻人进行了很多的配置:有针对性的推销、娱乐和新闻业等商业认可。一种国际青年文化首次亮相。在一些地方这一度产生了某种骚动。尽管这很吸引人,但大部分是泡沫,是伟大变化中最不深刻的表现。年轻人中一种品位、价值观和设想的新的国际化要重要得多。这是建立在它能接触到的新的繁荣和财富的基础上的(由于具有民主思想的选民不断准备投票支持社会福利,在一些国家失业且能生存比以前要容易得多)。财富带来休闲和运动的特权,也带来更廉价、更丰富的物质商品。但是年轻人的好动也反映了新的交流方式的变革。到 60 年代,"大众"交流已不再仅仅限于在教育和塑造 20 世纪早期欧洲城镇居民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报纸,大众教育的普及使许多人不再是文盲。变化始于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无线电广播,尽管它还没有预示后来所发生的,随着更强大的电视媒体的出现,谷登堡的世界被抛在了脑后。

政治重组

在柏林之后,美国和苏联的政治敌对继续顽抗下去。1953 年斯大林去世(比朝鲜战争的结束稍早一些),很明显这很重要,但是也很难说。几小时内他最亲密的同事被吓坏了,以为他不会真的死了,所以并未立刻采取行动。在适当的时候,看上去领导人的离去如果不是给苏

612

联政治带来了目的上的改变,也是带来了方法上的改变。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 年接任杜鲁门)及其顾问立即对苏联的意图表示怀疑;他们继续把欧洲看做冷战的中心和苏联直接威胁最可能的目标。斯大林的继任者表明他们拥有改良的武器——氢弹(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是在 1952 年),也就是说,具有更强大和不加选择的破坏性。这是斯大林从坟墓中送给对手的最后的礼物,保证他所赋予苏联的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这是他最大的成就,比列宁还要伟大。斯大林继承了他的前任的行动逻辑,赋予这个国家工业、军事力量来应对它所面临的来自国外的最大威胁。战后,苏联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永远无法证明的是,是否只有他那些可怕的方法才能做到这些。自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就注定成为一个伟大的欧亚强国。许多其他现代化制度倾向于认为苏联模式具有吸引力,因为它看上去成功了,却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苏联人民得到的回报是从灾难中活了下来;实际上,1945 年后,消费在苏联被抑制;此外,还有使苏联人民驯服的宣传,要说稍有不同的是,在卫国战争期间放松一段时间后,警察制度的粗暴似乎得到了加强。

苏联政策的一个后果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来越分裂。1954 年 3 月,莫斯科连续两天宣布东部共和国拥有完全主权,西德总统则签署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他的国家重整军备。1955 年,西德加入北约,这次苏联的回击是建立华沙条约组织,一个由它的卫星国组成的联盟。柏林的未来仍不确定,但是很明显,除非通过协议,不然北约各国将通过战争来抵制柏林地位的改变。在东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意与旧敌达成协议:奥德河-奈塞河(Oder-Neiss)一线成为与波兰的分界线。希特勒要实现 19 世纪民族主义者的伟大德国的梦想以俾斯麦式德国的覆灭而结束,历史上的普鲁士现在被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所统治,而新兴的西德在结构上是联邦制,在情绪上是非军事主义的,天主教政治家和俾斯麦可能认为的“国家的敌人”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争夺着权力。在德国自由党的帮助下,基督教民主联盟统治着联邦共和国,直到 1969 年一直把社会民主党人排除在政权以外。在这种框架之下,没有和平协定,限制曾两次通过战争破坏欧洲的德国实力

613

这一问题延续了35年[1]。欧洲有基督教民主党，德国也有，通过遍布欧洲的温和基督教右翼，它稍稍占有优势，这使人想起1914年前德国社会主义领先于国际左翼。

1955年，当占领军从奥地利撤军，奥地利重新获得独立，中欧最后一个领土边境问题通过协议得以解决。同时，意大利-南斯拉夫边境的长久争端得到解决，最后一支美英部队从的里雅斯特撤离。欧洲的两翼安定下来了。这无疑有助于维持没有加入冷战结盟的几个国家的地位。1948年，苏联顾问被从南斯拉夫召回，南斯拉夫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被开除出去。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宣布无效。这开启了长达五年的对铁托主义(Titoism)的刻薄攻击。但是铁托坚持了下来。南斯拉夫与华沙条约国相毗邻，但并不与苏联接壤。阿尔巴尼亚长久以来强烈忠诚于莫斯科的领导，且是华约的创始成员国，却于1961年脱离苏联控制，但继续对南斯拉夫抱有传统的敌对态度。

西欧的新结构

1945年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被独裁者统治着，在战争期间这些国家都曾保持中立，尽管根据环境变化有某些细微差别或妥协。两国常被称为“法西斯主义”，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葡萄牙要比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更容易在国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一项1946年的决议阻止西班牙进入联合国组织，直到1950年这一协议才废除)，但是在50年代，很明显两国在欧洲大分裂中都站在西方一边。这种大分裂在更连贯地组织西欧方面要比各国宪法和意识形态倾向还要重要。对欧洲统一的渴望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重新被赋予活力。1939至1945年欧洲的争吵所导致的恐怖强有力地刺激了新思想。然后，苏联的威胁感和经济重建与复兴的需求

---

①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1947年2月，战胜国已经与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芬兰签订了和平条约。

不断增长。当政治家们努力克服单个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实力下降以及失去殖民力量的勇气时,他们感到一种他们所相信的"欧洲人"共有文明价值的复兴。加上其他因素,这些不同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 40 年代末,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学说起源的地区建立大规模组织的要求在西欧出现了正在松弛的早期迹象,尽管这一迹象还很微弱。

614

狂热者喜欢追溯到加洛林王朝时代来追溯欧洲意识,但是就政治进程而言,1945 年远不足以追溯统一的故事。当战争的结果(后来是苏联政策)结束了德国问题,分治作为制度化的持久解决办法而出现时,法国的恐惧受到安抚但并未完全消除。的确,在德国这一地区的西方另一场大内战的可能性还很遥远。苏联政策成为欧洲国家更紧密合作的新理由;如果美国人回家,让西欧处于分裂状态,那么 40 年代末在东欧发生的一切就被视为一种警告。因此,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只是通向新欧洲之路的前几步而已。马歇尔计划开始以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于 1948 年成立,但是第二年,建立北约的条约签署后一个月,第一个代表十个不同欧洲国家的政治机构——欧洲理事会也成立了。要求统一的经济力量比政治力量发展得更快。关税同盟已经于 1948 年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之间(比荷卢经济联盟)以及法国和意大利(Francital)之间创立。但是,迈向欧洲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早期步骤却来自一个关于具体工业的建议。

1951 年,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为国际组织和欧洲主要工业资源的管理以及煤炭、钢铁生产提出的建议取得了成果。然后,法国、意大利和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最重要的是西德,签署了一项协议,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以达到用经济合理化手段为未来的法德冲突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政治目的。在西欧,煤炭和钢铁资源由跨国权威来管理。这有可能通过去除关税和技术障碍来改善市场以达成一体化,并(希望)促进在煤炭和钢铁供应产生波动和不协调时进行更好的管理。但是欧洲煤钢共同体也为更广阔的政治视野开辟了道路。重要的是,它带来了解决 1918 年后很快发生的控制萨尔河

问题的方案。法国计划委员会领导人让·莫内(Jean Monnet)把欧洲煤钢共同体看做第一个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跨国组织。

欧洲煤钢共同体最重要最直接的外交后果是把西德正式纳入新的615 国际结构中。它提供了一种抑制措施,但同时也复兴了一个国家——西德,越来越明确的是,在苏联陆上力量的威胁下,在西欧需要增强西德的力量。使一些人(尤其是法国人)惊诧的是,在朝鲜事件的影响下,美国官方迅速出现了德国必须被重新武装起来的观点。

主要由于经济复苏,在法国和意大利大量共产党选民代表的政治软弱也有助于为跨国主义者的想法铺平道路。在这两个国家中,共产党人早在1947年就已经不再参与政府管理,到1950年,他们的民主也许会变得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危险已经消失。在那里和西欧比利牛斯山以东的其他地方,反共观念倾向于与那些罗马天主教政治家或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力量相联合,他们很明显地知道他们在东欧同僚们的命运。一般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一个温和的右翼西欧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追求的是经济复苏、提供福利以及在西欧在实际事务中的一体化这些共同目标。在欧洲政治中,基督教民主主义迄今在各国以不同形式利用一种被忽略的潮流,天主教的社会思想第一次是在利奥十三世的教皇通谕中进行了权威的陈述。它产生的经济、社会制度与为了弱者的利益对经济实行干预的关系相一致,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效益。

1952至1954年间,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取代《布鲁塞尔条约》,以此确立西德军事地位的努力一直在进行。法国的疑虑使这些努力受挫。但是1955年,联邦德国被允许加入北约,关于欧洲防务组织的争论消失了[西德已加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该组织此前在1954年改称西欧联盟(WEU)]。和以前一样,要取得更大统一的主要动力依然是经济的。1957年采取了关键步骤: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更重要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或"共同市场")形成,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签署了《罗马条约》。它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关税联盟,关税联盟在以后的十年中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罗马条约》所做的不止这些。它通过一个委员会体系来负责一套官僚制度，监督条约并促成进一步的一体化，以部长会议作为制定决策的权威，还有国际法院以及具有建议权（不是立法权）的欧洲议会。这里有重构查理曼遗产的说法；也的确能够看出地理上的某种一致。两年半以后，《罗马条约》促使没有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或宽松或更为限制地建立自己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到1986年，欧共体的原始六国已经变成十二个（此时它已经变成欧洲共同体，意味深长的是，"经济"一词被去掉了），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除了四个成员国以外都加入了欧共体。五年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剩下的成员则与欧共体合并。 616

西欧复杂、缓慢但是朝着更大统一不断加速的进程显示了那些作出这些安排的人们的信心，在他们看来，武装冲突再也不能代替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谈判。根植于民族国家体制的西欧列强之间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可悲的是，尽管意识到这一事实，但考虑到制度原因，英国的统治者在一开始并没有抓住机会加入其中。他们更有想象力的继任者在最终加入欧共体之前，曾两次被拒之门外。同时，共同农业政策（CAP）稳稳地维护着共同体利益，无论出于何种意图，这一政策对于德国和法国选民中占重要组成部分的农场主和农民来说，乃至对于后来那些想要加入欧共体的较贫困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

从一开始，经济事务就在欧洲一体化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对经济事务及其技术需求的关注，催生了从1948年的比荷卢经济联盟和Francital开始的一些机构，尽管有一些消失了，也有一些（及一些功能性的非经济组织）留了下来。这一结果有些令人困惑并且注定会造成新的紧张，同时也给欧洲精英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真正的跨国经验。对于欧洲自我意识的聚焦第一次成为了现实，甚至在50年代的公务员、工业家以及商人中就开始见到了这一点。其出现自然也在一些地区引起了非常大的敌意和民族主义情绪。

随着制度的演化，许多组织都在功能和成员上有所重叠，其使"西"欧究竟应该是什么或实际上是什么的理念进一步复杂化。比如，1948

年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1961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之前依次吸纳了联邦德国、西班牙和芬兰,美国与加拿大也是这一组织的成员。欧洲理事会由1949年的10个成员国到1990年增长到了23个。虽然,任何关于西欧应当如何组织起来(因此,也包括如何界定)的理念经常为美国关于冷战现实的理念所压倒。尤其是其从未单独界定欧洲共同体或其后继者——这使得许多热心人士感到失望。

617

东欧的纷乱

东欧的状况也没有处于规则之外,冷战宣传的简单常常掩盖了许多复杂的现实状况。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里,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剧变已然发生,其他的变化看起来亦将随之出现。最重要的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出现。1956年,他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并迅速为人们所知。它因为谴责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并宣布"和平共存"(coexistence)应当是现在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而引起了轰动。该年早些时候已经宣布计划削减苏联的军备;这使人产生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但是1956年的气氛却是雾气重重。苏伊士危机便是重新紧张的根源之一,造成了苏联对英国和法国的威胁;赫鲁晓夫没有公开宣布对埃及的支持,但其并非打算将与阿拉伯国家的良好关系置于危险境地。美国对此不满。另一个对国际气候造成重大损害的事件就是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1948年以来,也就是斯大林与铁托争执开始的那一年,苏联对其卫星国任何的背离和不满有着近乎病态的敏感。铁托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在遭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大量诽谤中依然存在的现实,使得苏联对其同盟内部的震动更为警觉。1953年东柏林的反苏起义被苏联军队镇压;超过300名民主德国公民被杀害(在其后的35年内,西德以暴动的那天——6月17日作为国庆日,称为国家统一日)。三年后,1956年的夏天,波兰再次发生暴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了。

同年10月,苏伊士远征队正在筹备之中时,布达佩斯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运动。这时,苏联军队从首都撤出,新的匈牙利政府掌权并

承诺自由选举、结束一党独裁。然而,可能是相当不明智的,其很快就走得更远了。新政府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宣布中立并要求联合国干预匈牙利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军队重新返回(同其他华沙条约盟友一起),匈牙利革命被彻底镇压了。联合国大会进行了两次谴责,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这一事件大大硬化了冷战双方的心理态度。西欧再次想到了苏联力量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苏联领导层也比以前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东欧人民那种信以为真的友好实际上是多么容易消散;当美国谈到要"解放"他们时,苏联很容易紧张起来。

618

1960—1962 年危机

嗅到了重整军备的西德的危险,苏联领导层对加强卫星国民主德国的控制更为急切。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这个国家正在经受一场长期且日益恶化的经济困难,西柏林作为一个独立和资本主义的城市却位于东德的领土上,这是一个弱点。人民很容易穿越城市内部的东西边界。穿过这道边界,就能见证城市西部的繁荣与自由,这吸引了许多东德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他们能在那里轻松地找到工作——到联邦德国那边去。1958 年,苏联谴责了柏林在过去十年中的制度安排;宣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会将他们的占领区域交还给民主德国。其后两年的长期外交手腕和日益增长的紧张随之而来。其后在 1961 年 8 月,东德人迅速建立了一座墙,并以地雷、铁丝网和武装守卫加以保卫巩固,从而在物理上将柏林的苏占区同西方占领区分隔开来。

随着危机的气氛在柏林上空加剧,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逃往西部,1959 年有 14 万人跨越边界,1960 年则有 20 万人。1961 年上半年超过 10 万人逃离到西部。从短期来看,柏林墙的修建阻碍了人们的逃亡并加强了紧张气氛,但是最终可能也削弱了其目的,虽然其有效地终结了非法移民。这堵墙一直在其后的 28 年里存在着,超过 150 名东德人在试图穿越时被枪杀,许多人也因为想要穿越柏林墙而受伤或遭逮捕。这是两个世界之间差别的显著象征,也成为送给西方冷战宣传的礼物。对任何要求改变柏林合法状态的想法,赫鲁晓夫都默默地放

弃了。很明显,美国更倾向考虑战争而非允许这样做。

尽管如此,这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开端,苏联的政策好像是在试探美国解决问题的决心。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危机,虽然这一次是聚焦在加勒比海而不是欧洲。大战之后,欧洲在中南美洲的利益都相对较少。战前英国对拉丁美洲的大量投资多数都停滞了。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想要挑战门罗主义以照看他们在西半球的领土财产(英国、法国、荷兰和丹麦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有残存的殖民地)。美国在这个半球的政治优势愈加明显,尤其是随着1945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加强。这就使一切显得更为荒谬,能在美洲地区同美国进行角力的欧洲国家只有苏联,而其却从未在这一地区拥有过领土或进行过投资。古巴危机是纯粹冷战的产物。

619 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在古巴的影响就是强大且明显的(那里有美国的海军基地)。这一点从50年代美国收回对当地独裁者的支持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仁慈地看着它的政权被一个年轻而爱国的游击队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推翻了。他在1959年成为总理。起初,他被许多美国人当做一个浪漫偶像来崇拜(在美国激进分子当中蓄须变得十分流行)。但是两国的官方关系却因卡斯特罗开始干涉美国的商业利益以及抨击过去政权所支持的美国化因素而迅速恶化。反美主义最终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主题;古巴人通过革命后的联合来与之相应。美国此时开始反对卡斯特罗。很快,美国停止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行政部门确信卡斯特罗日益明显地依赖知名共产主义者意味着这座岛屿将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因此,冷战推进到了西半球。

当赫鲁晓夫公开警告美国如果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所可能面临的报复(苏联的导弹力量)危险时,对于形势的改善并没有帮助(他同时宣布门罗主义已经寿终正寝;美国国务院迅速向世界确认门罗主义的终结被严重地夸大了)。与此同时,美国决定通过对古巴流亡者提供财政和武装支持,促使其直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这一政策被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总统所继承。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他既不够谨慎也不够充分就草率地实行了。结果便是"猪湾行动"(Bay of Pigs)的惨败。这对于

持不同政见的古巴远征队来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对一个受到民众支持的政府的进攻在全世界各地遭到了反对，甚至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对此颇有非议。卡斯特罗现在诚挚地寻求苏联的支援。1961 年底，他宣布自己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联政府一定相信自己现在面临着绝佳的黄金机会。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们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机作出决定，要在古巴安置能够袭击到美国任何一个目标的导弹(这样一下子便成为其潜在目标的美国基地或城市翻了一番)。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哈瓦那还是莫斯科首先提出的，但后者的可能性最大。其结果是造成了冷战中最为严重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转折点。

1962 年 10 月，美国的航空拍摄侦察确认古巴正在为苏联运来的武器兴建导弹站。肯尼迪总统一直等到一切证据确凿无疑，才宣布美国海军将禁止任何船只向古巴运送更多的导弹，并且要求已经运到这座岛上的导弹必须被撤走。一艘前往古巴的黎巴嫩船只被截获并遭到了搜查。苏联船只受到密切地关注并被拍照。美国的核打击力量也为同苏联之间的战争做好了准备。几天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进行了私人通信，后者同意导弹应当被撤出。

620

欧洲曾短暂地看上去有成为战场的可能——或者被化成灰烬，但是这一次并不与其人民直接相关。美国的盟友在古巴问题上并没有像在维持德国现状问题上那样紧张；它们数年前就已经处于苏联导弹的射程之内了。苏联的欧洲盟友可能更有意识形态上的兴趣。因为古巴政权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也未必会感受到广泛的联系。欧洲国家真正担心的是要确保其所在阵营的超级霸权不要发动一场核战争。最后，在一场真正的对抗处于一触即发之际，看起来是苏联被迫让步了。其导弹从古巴撤出了。肯尼迪总统避免了可能刺激苏联的行动或言语，通过对其需求要素的限制为苏联的外交留下了一条回旋的道路(并且还谨慎地同意了作为对等条件，即在几个月后撤出美国在土耳其安置的导弹)。

以后见之明来看，现在很容易相信作为冷战地域扩张终极代价的

核战争是难以面对和无法接受的。如果这样的话,古巴就是真正的转折点。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尽管苏联吹嘘与美国竞争,美国在武力上的优势仍然同以前一样巨大。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冲突体现在洲际弹道导弹(ICBMs)上;到 1962 年底,美国在这种武器方面对苏联有着超过六比一的优势。这一选择使得导弹优先于黄油,随着苏联着手尽量缩小这种差距,这些最终都要苏联人民来承受。与此同时,古巴对抗可能也有助于英国(当时是唯一一个拥有自制核武器的欧洲国家)、美国和苏联达成禁止在太空、大气层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决议。裁军在其后几年里仍旧没有什么进展,但这却是在核武器方面磋商妥协的第一个积极成果。

苏联的变化

1964 年,赫鲁晓夫在执掌党政大权六年后被迫下台。他那些曾受到其冒犯或恐吓的同僚们在军队的默许下发动了政变。然而他并未被处死。这表明在苏联政治中许多东西都改变了。赫鲁晓夫的历史贡献看起来应该是对这个体系内部的动摇。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演不能不被提及(其副本最终自由地广泛传播),其至少开启了“非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即使还有一些局限性。他同时也应为农业政策上的重大失败负责,但还应包括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古巴的冒险行为,这是导致他下台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支配地位与一种文化上的松弛相符合;一些人称之为“解冻”(thaw)。艺术家和作家们有了最低限度的较大自由,并且这个政权短暂地对世界如何看待其对待犹太人的做法给予了多一点儿的关注。但是这些都是个人性的和零散的;自由化依赖的是赫鲁晓夫听谁的话。很明显,在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在赫鲁晓夫掌权时期,党再次成为了俄国生活中更为独立的一个部门,而不再是一个人的造物或工具。虽然苏联政府根本上的集权本质看似并未改变——但是人们对此开始怀有期待。

621

即使如此,人们开始觉得美国和苏联越发变得相像,这将使苏联的政策更不具有威胁性。这种“趋同”(convergence)的幻想对一个无可

置疑的事实产生了扭曲的重视：苏联是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并且比1945年富裕得多。因此，60年代，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看似有效的道路。苏联经济的低效率和不均衡经常被忽视。50年代虽然按其说法苏联工业增长比美国快，但是其压倒性的仍是重工业。苏联的私人消费者仍旧贫穷，如果没有高昂的补贴制度将会更加明显。俄国曾经哺育中欧城市并为沙俄时代工业化提供支持的农业一直处于衰退；矛盾的是，苏联经常不得不购买美国粮食。1961年苏联共产党官方宣布，到70年代苏联将在工业产出上超过美国，但是这一计划并未真正实现（这与肯尼迪总统同年宣布的在十年内实现登月计划不同）。然而，苏联与许多欠发达国家相比无疑是十分富裕的，其无数公民回想起1945年贫困潦倒的生活时还是会对1960年所能得到的好处心存感激。

这样的对比很容易成为从定量到定性的判断，但是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60年代苏联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即使苏联公民能在1956年起领取退休金（比英国滞后大约半个世纪），还必须建立医疗保障体系，而这比西方落后得更多。苏联的实际工资到1952年才达到1928年的水平。这一"趋同"理论常常过于乐观了。即使如此，苏联有自己的科学和工业基础，直到1970年，其最好的部门在规模和质量上能够与美国相抗衡。其中最明显的以及苏联公民爱国自豪的重要来源就是对太空空间的探索。到1970年，已经有许多轨道碎片，再也难以重获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惊人影响。虽然美国的成功也紧随其后，苏联在空间探索的成就仍旧是第一流的。在太空探索中有许多东西滋养了爱国想象，并使人们在忍耐苏联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匮乏更增添了耐心。许多苏联公民认为他们的空间技术证明了革命的合法化；历史上发展缓慢的俄国，经由共产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能够做另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任何事情，并且很多事情只有其他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甚至还有一两件事是其他国家一时半会儿都做不到的。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将会全面地现代化。

要说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满的国家，领导人也越发自信且降低

622

了对外部世界的怀疑,也更少扰乱国际舞台,看起来还不是那么明显。苏联对中国复兴的反应不那么令人鼓舞;20 世纪 60 年代的争吵甚至谈到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到 1970 年,苏联社会也在其他方面显现出紧张的迹象。各种不满和批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自由的重新限制上,越来越多的表达能够被听到和看到。不断增加的反社会行为展现为暴力活动、贪污腐败和酗酒。但是这种缺点在其他大国经历重大变化时也会或多或少出现。与此同时,苏联仍旧是一个警察国家,那里对自由和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实践中都有行政命令和政治监狱在背后支撑。苏联与美国(或任何西方国家)之间真正的区别都是以这样的标准,或者也通过前者在干扰外国广播的巨大投资上显现出来。

并发症

然而,冷战出现了可怕的简化(尤其明显的是仅介于北约和华约之间),1960 年之前就已开始对这种资格有了要求。在亚洲,一个重大事件——共产主义中国的出现——可能含有不同于冷战之意义,这一状况已迅速显现。1950 年几乎必然的中苏同盟以及数年的马克思主义修辞的采用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是这场争斗中明确的参与者。但很快有迹象表明这种理解可能过于简单化了,最终中国以其自身力量重新出现并未强化冷战体系的两元论,即使最初并非没有意义,也是仅仅在一个相当局限的范围内。

1955 年,29 个非洲和亚洲国家代表聚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宣布他们的国家在冷战中奉行“不结盟”政策。其中一个代表团就来自中国;其余大多数都是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南斯拉夫也很快加入了它们。这些国家多数是贫穷困苦的,对美国比对苏联怀有更多疑虑,也更被中国所吸引。这些与会者被称为“第三世界”,这个词汇显然是一位法国记者想起 1789 年的法定受压迫的“第三等级”所杜撰的,这一等级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其暗示这些国家都是不为大国所重视的,并被排除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特权之外。虽然这听起来貌似有理有据,但是“第三世界”的表达实际上却掩盖了这些国家间的分歧,并且第

623

三世界政治凝聚力并不持久，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之后，万隆会议迫使超级霸权认识到弱者也可以通过联合起来获得力量。基于这种观念，它们寻求一种联合。

到1960年，已经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将会出现分离，双方都在寻求对欠发达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影响。最初这只是出现在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上进行隐晦的隔空交战；其后便演化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这带来了悖论；60年代，巴基斯坦与中国走得更近(尽管巴基斯坦与美国签有条约)，而苏联与印度关系更密切。国际事务中出现了新的流动性。1963年早些时候，世界被中国人对苏联领导层严厉的谴责所震惊。

在欧洲，阿尔巴尼亚这个欧洲最小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对苏联发起了激烈批判，并赞赏中国，双方的争吵(以及铁托的幸存)表明就是欧洲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尽相同，这将成为莫斯科不得不忍受的现实；阿尔巴尼亚与其他华约国家没有共同边界，因此也就不必在意红军。更为显著的是罗马尼亚，在中国的支持下成功地对经济互助委员会关于其经济发展的指示提出了反对，宣布一个国家有权利发展自己的利益。它甚至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模糊的中立立场——虽然仍在华约内部——说来也奇怪，这个国家却是处在东欧最为厉行独裁的政权之下。但是罗马尼亚与北约国家没有陆地边界(阿尔巴尼亚则与希腊有陆地边界)，而与苏联有着800公里边界；罗马尼亚的不驯服虽非必然却可能被容忍，因为对其可以较为容易地采取限制措施。

对任何削弱旧式共产主义统一团结的干涉很快就在1968年成为了现实。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开始对其国内结构实行自由化，并且同西德发展贸易关系，一系列尝试也紧随其后。最终，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8月遭受了华约武装力量的入侵，为避免成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翻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未抵抗。如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所说的“人性的社会主义”的短暂尝试消失了。

在铁幕的西边，苏联到那时已经放弃了对当地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希望，并不得不面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革命力量在西方的没落。 624

60年代,共产党赢得的选票明显下降了,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意大利的共产党甚至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sm),要求将各国的共产党从莫斯科的纪律中解脱出来。

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

一些人认为,主要的西方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反映出一种类似的政治演进趋势,并向社会提供相似的条件——这在英国被称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以及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其首先意味着提高就业率)。两个古老的国家有些不同。英国是其中之一。20世纪60年代,英国完成了成功的、事实上未发生流血冲突的和几乎全部的非殖民化。遗憾的是,英国仍然存有(并且受到议员们鼓励的)幻觉。其经济表现长期不如其他欧洲国家。这种幻觉也笼罩在其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上,最重大的失败就是仍旧被隔离在海峡对岸的一体化进程之外——尤其是当196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整合成为“欧洲共同体”时。这一整合具有政治的维度,而不仅仅是经济和精神上的维度,从这一角度来说,其发展已经有所减缓。这很大程度上应归于一个共性上的例外,即在戴高乐将军统治下的法国。

他在1958年第四共和国处于与阿尔及利亚的内战时重返政坛。他上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同这些激进者协商,并进行了重要的宪法改革。他第二次为法国所作的贡献同其在战争生涯中所作的同样伟大,在1961年彻底清偿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承诺。军队回家了,有些人感到不满(出现了反对戴高乐的阴谋与企图)。这一行动使他和他的国家能够扮演更为活跃的国际角色,即使有时是负面的。

将军对欧洲联合道路应该实行的观点是明确的。排除了那些设想建立一个基于欧洲议会(他曾说过,“欧洲议会已经被抛弃在沙滩上奄奄一息”)的主权欧洲的梦想,他希望建立一种基于独立国家间的协约而限制在政治行动方面的整合。他将欧洲经济共同体首先视为一种保护法国利益的途径,并准备筹建一个新的组织以实现他的意图。此外,他实际上两次拒绝了英国加入这一组织的申请。战争期间的经历使戴

高乐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极不信任,而且这也并非是毫无缘由的,英国政治家们仍然更渴望同美国结成大西洋联盟,而不是与欧洲大陆结盟。1964 年,戴高乐因为与共产主义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触怒了美国。他坚持法国应继续开展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从而减少对美国保护的依赖。最后,因为北约里面的许多问题,他最终带领法国退出了北约。

这种在欧洲占主导的被称为戴高乐主义的理念在 1966 年的“卢森堡妥协”(Luxembourg Compromise)中达到顶峰,其使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国家有否决权成为了惯例。这实际上削弱了次年所实现正式整合的程度。两年后,戴高乐因在法国进一步进行宪法修订的全民公决中失利而辞职,导致西欧不稳定和混乱的重大政治力量消失了。那些后来几十年里领导法国的人,也尽力使自己听起来像他,有时也感觉和他很像(尤其是在英国对欧洲态度的怀疑上;六个世纪的国家意识不会轻易蒸发),并且毫不妥协,虽然法国的政策仍旧在向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市场的演进、从国内的抵制中解脱出来,还是朝向牺牲国家独立性以凝聚形成一个政治上联合的欧洲之间徘徊。对许多法国人而言,欧洲的建构仍旧是为牵制德国所应付的必需代价的最后一招。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这一代价也日益提高了。

德国:东方政策

与此同时,德国的政策也在经历着微妙的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未敢梦想的目标已经成为了可能。旧式的标志已经消失,尤其是 1959 年 11 月在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的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作为他们所设想的经济中一个适当的(他们使用“重要的”一词)特点;这是对放弃政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默认。十年之后,在一位新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领导下,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成了联合政府;自 1930 年以来,德国第一次出现了一位社会主义者总理(也是从 1925 年以来出现了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总统)。

勃兰特在声明中将其政府规划提交给国会,并特别提到了民主德

国，尽管指出对其进行国际承认是不可能的，却称其是“一个德国民族之下的两个德国国家”(two German states within one German nation)之一。这一深有含义的表述引起了各方兴趣。很明显(其他事实很快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德国总理意欲缓和西德对其邻国的态度，并使之成为早先未能达成的非正式承认的方式。他并没有放弃重新统一的目标，寻求保障两个德国不会更加分裂，并恢复了能实质上帮助改变民主德国的真正联系。这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推进了在冷战中寻求缓和措施的国际趋势。然而，这也使一些人感到恐慌，他们担心联邦德国会与东部政权以及苏联发展一种独立的关系。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影响是，其倡导者在将来不得不考虑接受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以及德国在东部的特殊角色。其新政府也必然对任何朝着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的推进缺乏热情，如果这种整合仅仅局限于西欧，而非其先辈所设想的包括整个欧洲的话。

626

第二十九章　欧洲战后秩序的结束

627

对稳定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出现了许多困难的征兆。苏联不得不面对马克思主义自己所宣称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意识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相对于苏联给其公民带来的麻烦已经不算困扰的现实，其他令人烦恼的事情是：在民众中出现了明显的反政府的异议，它规模很小，是一个个人问题而不是重大的组织问题，但是暗示着不断增长要获得更大精神自由的需求，一个不太清晰但很真实的认为更多的物质获益会即将来临的想法不断高涨。然而苏联继续把巨大的资金投入在武器军备上，似乎技术上的领先意味着他们在未来会处于继续上升的状态。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变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尽管越来越可能引起争议，但是它不得不变化。

两极之间新适应的最大压力来自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从古巴危机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人发挥其创造迷人口号的天赋，把这种情况简单总结为MAD，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的武器军备能力能造成确保互相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效果，或者更确切地说，两个潜在的敌手互相有足够的打击力量能确保即使突然核攻击导致军械库的重要武器被毁掉，剩下的武器仍会有足够能力

给对手一个可怕的回击,使对手的城市变成荒无人烟的地方,军队力量也至少足以控制受威胁的生存者。

这个奇异的可能性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保守力量。即使(把事情做得有些过头的)疯狂的人偶尔会掌握权柄,但根据约翰逊博士的观察,那萦绕在脑中的将会被绞死的认知像适用于在这种规模上受威胁的集体一样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犯下大错可能导致灭绝的认知是谨慎行事的巨大促进因素。这给予了美国和苏联开始显现的新程度上的合作很好的解释,尽管这两国还存着一些具体的争吵。

628 尽管如此,这两极不可避免地对那时很流行的"缓和"(*détente*)一词的含义有不同观点,许多使缓和成为现实的努力就像当时被设计的那样诞生了。这是苏联长期以来的一个目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过,其目的就是举行一次欧洲会议并对因 1945 年确立的国际制裁而变成现实的欧洲边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就是对德国边界问题达成一个和平解决。70 年代开始的和平谈判是建立在进一步限制军备和达成一项综合的欧洲安全协定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并最终在 1974 年于赫尔辛基(Helsinki)举办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上取得了成果。美国和加拿大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其成果包含在下一年签订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Final Act")之中,并且非常重要。作为对默认欧洲战后边界(尤其是两德之间的边界)的回报,苏联谈判者最终在 1975 年赫尔辛基会议上同意增加东西欧之间的经济交流,承认民族自决原则,签订保证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协定。最后,当然不能强制执行。然而,在近十年里,当越发难以避免来自和关于西方的资讯和消息与东欧和苏联民众接触时(这要归因于不断进步的电视广播和对无线电干扰的实质性取缔),赫尔辛基会议给持不同政见者相当多的鼓励。这一协议鼓励被视为侵权行为的斗争宣传,默默地撤销了对迄今被视为对共产主义国家内政干涉的限制。慢慢地,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开始更加自由地出现了一种广泛的、挑战长期以来所持有的设想的大众批评。

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可能还不清楚这只是苏联在赫尔辛基会议上

签订协议后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当事情变得清晰后，他们就不喜欢这样了。然而苏联领导人所期望的已经有了安全保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达成一个和平条约，这个和平条约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确立了军事胜利所带来的边界问题的胜利。这是一个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可以理直气壮地说，1975 年后的苏联在外交上空前绝后地强大，而且，与在全球舞台上跟美国竞争那些时期所处的外交环境相比也更有利了。但是平衡也有不好的一面。当苏联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看做是边界争端问题的确定和对东欧不干涉的因素时，西欧和美国则强调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标志性和实践性价值观(将有一系列后续会议)作为要求人权合法权益的证据来源，以及欧洲是超越分裂的团结的欧洲的暗示。意味深长的是，他们谈到了赫尔辛基“步骤”(process)。

尽管对美国选民来说，在中间不景气的十年似乎很难寻求直接获利时，冷战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很难使人们感兴趣。在这十年的前半段，民族心理上的灾难萦绕着美国：长期卷入的越南战争失败并带来重大伤亡、颜面扫地后的责任清算以及亚洲盟国的牺牲。感情和心灵的创伤随着 1974 年尼克松总统政府下台的骚乱而延长了，尼克松的外交成就因其在国内政策上的非法和草率行为所引起的骚乱而被人们抛之脑后。然后，在这十年的后半段时间里，美国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挫折，这就是革命推翻了它的同盟——即伊朗国王被他的敌对政权所取代。这件事迄今也被视为现代化、工业扩张和伊斯兰国家石油财富增长会导致不可预期和不稳定事件最清晰有力的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很快就谴责苏联和美国一样霸权，伊朗这么说是很公平的；在冷战中，两极被伊斯兰国家生动地描述成了两个“大撒旦”(Great Satans)。当 1979 年苏联的军队进入阿富汗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以镇压穆斯林起义者，且将其势力延伸到亚洲时，美国不得不眼睁睁地站在一边。这一结果并非苏联领导人最终所期望的，但是这却与后来美国无法靠武力或外交来解救被伊朗扣押的本国外交人员人质时，美国所显示出的权力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629

考虑到这个背景,美国1980年的总统选举,因为可理解的不易明言的国内原因,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选民国家意识的虚弱以及对苏联的恐惧之间的争斗;缓和的希望很快破灭。随着里根总统准备就任,保守的苏联领导人再次显示出了对美国政策趋势的怀疑。最后,里根政府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展示外交事务上显著的实用主义,并将给里根的追随者们带来信心和士气的恢复。

石油危机和西欧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欧洲和美国受到一个重大打击,而且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工业国都受到了打击。这件事起源于1973年10月犹太人神圣的赎罪日(Yom Kippur)这天,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进行了又一次攻击。以色列第一次面对军事失败的前景,其对手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并拥有苏联武装的军队。即使只是在据说苏联已经将核武器运抵埃及,以及美国全球军队进入警戒状态之后,以色列仍旧再次取得了胜利。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东仍然保留着引发远远超过这一危机的令人惊恐的潜在可能性,这可能阻滞了通往赫尔辛基之路。而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对欧洲、日本和美国所作出的石油供应限制的宣言所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

新"石油外交"的影响是直接的:石油价格暴涨。这突然使被大部分欧洲人忽视的20年变化引起的历史影响变得清晰起来。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英国凭借在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非常规影响力享受到了稳定、廉价的石油供给,直到1963年阿拉伯社会复兴党(Ba'ath)在这些地方取得政权时才停止。20世纪70年代,这种保障在压力下被打破,主要是以色列问题。一夜之间,在60年代虽然有人愤愤不平但还是能够忍耐的经济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对石油进口依赖很深的美国,其收支平衡开始出现重大动荡。美国,一个巨大的石油消费国被剧烈撼动了。有一个说法认为:这是像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一样的新的世界大萧条。始自战后恢复期的经济增长黄金期似乎已经结束。

630

就长期和事后看来，这个有益的冲击带来的许多泡沫掩盖了具有世界重要性的数十年的趋势，即欧洲自 1958 年以来在财富方面和世界贸易份额方面的持续领先。尽管在那段时期，石油危机猛烈地冲击了大部分欧洲国家。随着美元浮动增大，汇率问题驱使法国和德国通过 1979 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EMS）来寻求从 1948 年以来一直隐忍的、直到现在也起作用的美元专制中解脱出来。由来已久的争吵和口角（特别是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的争吵）提醒欧洲国家限制目前取得的任何对两极现象有所超越的行为。伴随着对日本控制的远东经济圈的成功所带来的不安，这种困难局面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使得欧洲国家对其他重大发展有所分神。到 80 年代中期，美国三分之二的外国投资来自欧洲（这时，美国已经恢复了它在 1914 年前的投资最大接受方的地位）。

对其他国家都希望联合的认识日益加深，这促使人们开始了新的努力，使更大程度上的共同体未来的观念具体化。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发现更加团结、合作的习惯和增长的财富是先决条件，欧洲政治独立所带来的可能结果并不是先决条件。一些人认为，除非欧洲也能成为权力的一极，否则独立将是无价值的。这样想的那些人可以从进一步的发展和一体化中得到安慰，尽管这使其他人感到忧虑。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第一次直接选举在 1979 年举行。希腊在 1981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 1986 年都很快加入到了这个共同体中。接下来的一年，《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的第一步就是允许对一些问题进行多数投票决定（取代了要求一致意见）。1987 年，欧洲共同货币和金融体系建立（尽管英国没有接受），并且在 1992 年确定将成立一个真正的单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各国进出口货物、人力资源、资本和服务都能够自由流通。成员国甚至在原则上赞同欧洲政治统一，尽管英国和法国有明显的担忧。随着重大影响的出现，这很难立刻让人在心理上感到赞同和舒适，但这是某种发展毋庸置疑的标志。

631

英国

在戴高乐下台五年后，1973 年英国也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

是一个国家不确定性时期的高潮，尽管不是结束，独立于欧洲的英国努力表现得好像现在的世界依然像1939年的世界那样。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各届英国政府的努力工作没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没能增加社会服务和提高就业水平。第二点在根本上还要依靠第一点，当困难出现时，总是要牺牲其他两个。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其轻信的选民不得不被安抚。在国际贸易中，英国传统经济部门的弱点也是一大阻碍。还有些在于英国陈旧的主要工业、缺乏投资以及对其民众很深的保守态度。尽管英国变得越来越富（在1970年实际上没有一个英国体力劳动者拥有一年四周的带薪假期，十年以后，在经济灾难的十年以后，三分之一的英国体力劳动者拥有了这项权利），英国在财富和创造财富的效率上却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英国人在信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接受了变化：他们成功迅速地实行了人道的非殖民化，没有暴力和国内的分裂。人们仍不清楚他们是否能用其他方式摆脱过去，并保证其至少作为第二流的发达国家达到中等富裕水平。

在北爱尔兰，作为英国的一部分，新教和天主教的不良分子似乎一样想致力于摧毁他们的家园而非与其敌人合作。在20世纪70、8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阿尔斯特（Ulster）造成成千上万的英国公民——士兵、警察和平民的死亡，不管是爱尔兰的、苏格兰的还是英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唯一令人欣慰的事情是，这没有打乱英国政党像过去那样实行对爱尔兰的政策。选民仍然一直都有物质上的焦虑。在7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0到80年代年通货膨胀率都超过13%），以及石油危机的打击，通货膨胀伴随着激烈的劳资关系。有人猜测国家是否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矿业的大罢工推翻了政府，领导人和意见传达者似乎总是被社会分裂这个主题所困扰着。甚至英国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问题也经常因为阶级利益被提出，在1975年6月这个问题就曾经提交到一个由公民投票决定的根本性革命计划中。当结果明显有利于继续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许多政治家都感到惊讶。也许这是这十年的第一个标志，或者说总体上的国家观点并非由那些自以为是发言人的人所代表。这也可

能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不可避免地从孤立主义中溢出的封锁选择的再现。

不景气的时期（就经济而言）仍在继续；通货膨胀（1975 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飙升到 26.9%）被工党政府认为是最主要的威胁。英国劳工联合会的工资要求所带来的预期通胀还未显现，人们开始明白消费必将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给人一线希望的是：几年前，在北欧沿岸的海底发现了大量的油田，其中有些是在靠近英国的海底发现的。1976 年，英国成为石油输出国。这并未立即给英国很多的帮助；同一年，英国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当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英国主要政党（保守党）的第一位女领导人，也是欧洲第一位女首相——在 1979 年上台执政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没什么可损失的；她的政敌已经信誉扫地。所以，很多人早就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为英国政策的决定因素了。

632

共产主义的欧洲

无论赫尔辛基会议意味着什么，在 1980 年，东欧似乎依然像以前一样被套牢在苏联的安全体系之内，是各个单一民族的内部生活。由于《华沙条约》这个保护壳，人们仍然没有看到 30 年来慢慢出现的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如果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它的余波所带来的巨大无意识变化的话，变化不止这些）。

乍看起来，长期特定发展模式的经验所取得的成果是高度的结构一致性。在每一个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里，党是至高无上的；野心家围绕着党构建他们的生活，就像几个世纪以前身边聚集着皇室成员和赞助人的那些人。每一个（就像苏联自身）都有一个不可言说、不可衡量、不能悲叹的过去，过去太沉重，如果说有过轻松的气氛，那它也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政治讨论的气氛。关于东欧的经济，对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投资使早期经济增长势头非常迅猛（其中一些方面的增长明显超过其他领域），并出现了苏联主导下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因计划经济而僵化。日益明显的是，这些协定由于严

格的交换控制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需求;在西欧人眼里很平常的商品,在东欧人眼里仍然是奢侈品,更别提他们能从国际经济特殊化中获利了。在乡村,私人所有制到20世纪50年代时就已经被削弱了,通常被混合所有制和国有农场所代替,尽管在这幅广阔统一的图画内不同的模式随后又出现了。例如在波兰,农民到1960年就已经回到了小农场;最终尽管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约五分之四的波兰农地还是回到了私人所有制上。其产量依然很低;在大部分东欧国家,农业的产出仅仅是西欧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到80年代,东欧所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处于经济危机状态,如果可能的话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个例外。即使在那里,1988年的人均GDP也只有9 300美元,而这时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均GDP已经是1.95万美元了。

633

现在人们熟知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赫鲁晓夫的继承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华沙发表一段讲话之后就有了这个名词)认为,东方联盟国家内部的发展——就像那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需要苏联的直接干涉以保护苏联及其盟友的利益,以及抵制任何企图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倒退回资本主义的尝试。然而勃列日涅夫一直对寻求国际关系的缓和很感兴趣。因此,勃列日涅夫主义通过使共产主义欧洲脱离欧洲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个方法,来承认国际稳定局势下存在着危险的可能,同时勃列日涅夫主义也是通过划清界限来达到限制目的的一次尝试。自那以后,西方国家内部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大,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记忆中似乎没有颠覆之忧,这些变化并未使东西方关系紧张。到1980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革命性的变化之后,没有一个专制国家存在于的里雅斯特-什切青(Trieste-Stettin)线以西的地区,民主在各地取得了胜利。30年来,反对政治决策者的工人阶级的起义仅在东德、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过——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引人注意的是,当巴黎在1968年陷入骚乱,学生暴乱摧毁了戴高乐政府的威望时,巴黎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骚动)。

1970年以后,甚至可以说是赫尔辛基会议之后,随着西欧意识在

东方联盟中的加强，见证了东西欧之间明显对比的反对团体出现了。渐渐地，一些政府官员或者经济专家，甚至一些党员也开始表露出对于具体、集中计划的效果的怀疑，并有越来越多的关于利用市场机制好处的讨论。然而，保持东方稳定的关键仍然是苏联军队。如果勃列日涅夫主义一直坚持继续给那些苏联卫星国提供最大的支持，那么没有理由相信任何华沙条约国会发生根本改变。尽管有时倡议的计划多，但华丽的结果和事情少，从长远来看，政府的行动更重要。庆祝苏联建国50周年时，勃列日涅夫宣称：在1972年，过去在我们身边围绕的国家的问题已经完全、彻底、永远地解决了。在相同的十年里，一个有趣的转折点已经过去，这只被少数洞察力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以俄语为母语的人第一次在苏联变成了少数派。

缓和与苏联

最后，莫斯科一方的新态度是允许在卫星国有剥削因素存在，因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更加灵活了。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18年后于1982年11月去世。他的直接接班人也很快去世了（这个人是苏联安全部门克格勃的领导人）。之后是一位七旬老者接替上一位领导人任职（这个人去世更快），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这位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作为总书记上台执政，结束了这种领导人快速更替的局面。他当时只有54岁。实际上，他政治生涯的所有时期都处在后斯大林时代。他对其国家、对世界的影响迄今历史也很难作出评价，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他初始的个人动机和促使他接任上台的联合力量仍然是未解之谜。可以推测，克格勃可能不反对他的升任，他的第一次行动和演讲都是很受欢迎的。尽管在任期开始不久，他就已经给英国首相留下了可以进行交易的印象。

634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确表达了他新的政治姿态。“共产主义”一词在他的演讲中很少被提及，社会主义得到了重新解释，去掉了平均主义（尽管他时常告诉他的同事，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实际上他从未退党）。为了以一个更好的术语来形容，他的目的被人们认为是自由化

(liberalization)——这是以不太恰当的西方词语来表示他经常用到的两个俄语单词：*glasnost*（这个俄语单词就是公开化的意思）和*perestroika*（这个俄语单词就是改革的意思）。这一新进程的意义十分深远，在这十年剩余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都在应对这一新进程。很快，他就不得不承认没有基本的现代化，苏联的经济就无法永远保持先前的军事力量（军备占用了苏联四分之一的预算），无法保证他对同盟及其他附属国的责任实现，也无法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和保证科技的自主创新。这一点意味深远，虽然他无法立刻抓住全部。

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政策实施有心理贡献的事件在1986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可怕的事故。这一故障导致大量废料进入大气，造成了巨大的放射性污染，甚至有可能出现更大的核爆炸灾难。虽然毁坏性很大，但相对较少的技术人员、士兵和消防员的英勇努力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但其破坏还是使全欧洲震撼，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震撼了全世界。威尔士羊羔草料、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的饮用奶以及瑞典人呼吸的空气都被污染了。这个事实使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至少在一些问题上，欧洲范围内是要相互依存的。一夜之间，整个欧洲大陆上环境保护者的政治运动获益了。对于苏联自身而言，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启示，在一个核工业老化的国家有发生灾难的可能，一旦现代化的意义变得清晰，国家就会需要巨大的投资。受到这一事故长期影响的苏联公民受害者人数仍是可怕的未知数。

635 在外交事务上，苏联领导人的新进程很快在与美国总统的会议中变得明朗。重新恢复了裁军问题的讨论。1987年，长期谈判终于达成结果，成果集中在一个关于中程核导弹的协定中。这是一个转折点。尽管由于新权力焦点的出现带来了许多震动和侵蚀，核平衡仍然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使两极能第一次停止争斗。它们毕竟能够不采取全面战争的方式来成功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和世界危机。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寻求获得核武器，它们至少已经认识到核战争一旦真的发生确实会使人类灭绝。1991年，美国和苏联同意着重削减现存武器库存时，形

势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戏剧性进展。

处于新的国际氛围中，两极在其他方面也达成了协议，当苏联领导决定在 1989 年退出阿富汗时，双方的协定就更容易达成了。苏联军队多年来一直困在阿富汗，导致了经济和人员上的巨大损失；和美国 20 年前在越南的经历相似，都受到了打击并遭到失败。这是一个尤其令人头疼的因素，苏联在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引起的愤怒不能被大部分生活在苏联的穆斯林所忽视。许多美国人对苏联作为“邪恶帝国”(里根曾经提出的名词)的恐惧也逐渐蒸发。随着苏联显示出日益分裂和困难的迹象，美国人的乐观和信心开始增长，同时美国政府出台了新的在太空部署的防御措施以消除美国民众的担忧。尽管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个项目不切实际，苏联政府也不得不冒着危险与其进行竞争。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氛围中，人们没理由期望在十年里西欧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一个欧洲国家为保卫殖民地财产的最后一战当然并不能对其进行允诺。1982 年，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被阿根廷军队短暂占领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主导了重新收回的行动。她本能地为保卫国际法原则和领土主权而斗争，并为岛上人们的权利而斗争，鉴于他们应该受到管理，并习惯了英国的普遍方式，其成果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军事战绩，还是一次重要的心理和外交的胜利。在不确定的开始之后(考虑到美国对拉美地区传统的敏感性，这并不令人惊奇)，美国开始提供重要的实际和暗中的帮助。智利与其难以驾驭的邻国关系一点也不好，因而它不反对英国在南美大陆上的隐秘行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欧盟国家支持在联合国中孤立阿根廷，并通过决议谴责了阿根廷的行为。很明显，英国从一开始便取得了法国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总是这么容易得到)，它知道在国际法面前这是对既定权力的一大威胁。

636

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名誉随着国内士气、民心的增长而跃起，在国外也是如此，其地位迅速攀升，在这十年中剩余的时光里，这件事使

她在其他国家领导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美国总统),这使英国能勉强凭自己的能力保住自己的地位。她在某些方面和戴高乐将军十分相像,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种影响总是对国家有利的。撒切尔夫人的个人信念、成见、偏见和戴高乐将军一样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欧洲人意味着必须对整个欧洲投入感情上和实际上的责任义务,并且使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变模糊的话,她和戴高乐都不能算是欧洲人。

撒切尔夫人政策的国内影响仍不能恰当地评价,尽管这使她成为了 20 世纪英国首相中任期最长的一位。很清楚的是,在她任期结束前,她已经改变了英国政策的关系,可能也改变了文化和社会争论的关系,消解了长期关于国家目标的正统和含蓄的一致性。这伴随着她坚决的激进主义唤起了人们的激情和不同寻常的愤恨。然而,她没能完成最珍贵的两个目标:公共支出的减少和政府对国内生活干预的减少。她执政十年后,中央政府在社会许多领域扮演了更大而非更小的角色。自 1979 年以来,卫生和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实质上增长三分之一,然而这并未满足大大增加的需求。到 1990 年,她许多政治上的伙伴认为,尽管她已经领导保守党取得了连续三次的选举胜利(这在英国政治上是独一无二的成就),她将在下一次竞选中落选。面对忠诚度和支持率的下降,她辞职了。其继任者梅杰(Major)不太为人所知,他在政治生涯前期没有多少曝光率。尽管如此,似乎英国的政策现在可能在共同体和共同体事务上的接触会更少阻碍(在风格上将会更安静一些)。正如结果所显现的,事情证明是另外一副模样。

波兰革命

到 1980 年,西欧没有一个国家是专制体制了。民主取得了完胜。现在该轮到东欧了。第一个苏联态度软化和国际关系缓和成果的清晰标志呈现在波兰。波兰早在 80 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独立性,尽管这个进程由于各种阻碍被打断了。通过跟随着神父而非统治者,波兰人在很大程度上(在他们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保留着他们集体的完整性。必须要说的是,波兰教会的影响并非总是那么仁慈。1946

637

年，波兰大主教就谴责犹太人因为这年波兰人杀害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而作出的反击。[①] 然而，教会作为国家的化身长久把持着大部分波兰人的感情和思想，并经常为其说话以达到更好的效果——1978年一位波兰裔教皇登基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具信服力。在70年代，教会支持工人反对经济政策，并谴责对工人的虐待。这种情况再加上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和物价飞涨构成了1980年一系列罢工的背景，其顶点是在格但斯克(Gdansk)造船厂发生的一次通过电视转播的抗争，在这次抗争中出现了一个名为“团结”(Solidarity)的新自发组织的工会联合会。这次罢工在经济目标外，又增加了政治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争取工会的自由和独立。团结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是一位著名的数次遭到监禁的电力工会的领导者，名叫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他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和波兰领导阶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造船厂的大门装饰着一幅教皇的画像，罢工者举行了露天弥撒。

全世界很快就为看到一个动荡的波兰政府而感到惊讶，波兰政府被范围日益扩大的罢工所困扰，因而作出了让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团结工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会。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天主教主日弥撒的常规广播也得到了承认。但是混乱并未终止。随着冬天的到来，危机的氛围越来越重。威胁来自波兰的邻居有可能进行干涉的消息。据说苏联有40个师已经在民主德国和苏联边境准备就绪。但是并没有出现警报；苏联军队没有移动，也没有收到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去这样做，其继任者在接下来的动荡年代里也没有这样做，尽管可能有时候看似要入侵。这是莫斯科方面思想变化的第一个迹象，也是东欧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的必要前提。

1981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但是瓦文萨尽力避免挑衅行为。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的苏联指挥官曾五次到访华沙。最后一次访问时，团结工会的激进分子摆脱了瓦文萨的控制，呼吁如果

---

① 参见：B. Wasserstein, *Vanishing Diaspora, The Jews i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1996).

政府采用紧急权力就要举行大罢工。12 月 13 日，宣布戒严，随之而来的是暴力镇压(反对者有数千人牺牲)。但是波兰的军事行动可能也有利于使俄国的入侵变得不必要。团结工会转到地下活动，开始了七年抗争，在这期间，军事政府既不能阻止经济进一步倒退，也不能争取"真正的"波兰支持的这一形势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于这种体制，社会已经脱离了共产主义。一场精神道德上的革命正在发生。正如一位西方观察者所说，波兰人开始表现出"他们好像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有秘密组织和出版物、罢工和示威游行，以及教会对现存政体的持续谴责，一时产生了一种内战的气氛。

638

尽管数月之后，政府谨慎地废除了正式的戒严令，但其仍然继续实行各种各样公开的和秘密的镇压。同时，经济进一步下滑，西方国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而仅仅是抱有一丝同情，在 1985 年后，莫斯科方面的变化开始产生效果。这些在 1989 年达到了高峰，这是自 1945 年来波兰最重要的一年。由于波兰的示范作用，这一年同时也是许多其他国家最重要的一年。随着政治体制的开放，其他政党和组织，包括团结工会，能够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作为真正政治多元化的第一步措施，7 月举行了大选，其中许多席位是可以自由竞争的。团结工会大获全胜。不久，新议会公开抨击 1939 年 8 月的苏德协议，谴责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并对 1981 年以来的政治犯进行调查。

1989 年 8 月，团结工会在华沙宣布支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戈尔巴乔夫告诉共产主义保守派这是合理的；因为一些苏联的军队已经从波兰撤离，使得这个裁定更加有分量。9 月，由团结工会控制的、自 1945 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员总理领导的联合政府成为了波兰政府。这是自 1948 年以来，东欧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西方很快许诺对其进行经济援助。到 1989 年的圣诞节，波兰人民共和国已经从历史上消失，历史上的波兰共和国因其英勇而再次诞生。

传播和效仿

波兰引领东欧走向自由。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很快被其他共产主义

国家觉察到了,这些国家的领导更加警惕。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两个新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欧洲范围内缓慢但却一直持续增长的东西方贸易(包括苏联与西方的贸易)。另一个因素是关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讯息在这些地区流通的增长,最重要的是通过电视这一媒介传播,而这对民主德国影响最大。随着技术的发展,赫尔辛基会议的效应加强了。更多的活动自由,更多的接触外国书籍和报刊的机会不知不觉地使其他国家比波兰加快了批评的进程。尽管有一些继续控制信息的荒唐举措(像罗马尼亚仍要求打字机要到国家当局注册),在这十年的后半段,几乎所有共产主义同盟国里的大众意识都发生了改变。同时,波兰的经历越来越让政府机构意识到,一个日益分裂和瘫痪的苏联不会(可能是不能)进行干涉,来维护其在其他华沙条约国的共产党官僚机构的傀儡。这是日益明显的事件,尽管直到戈尔巴乔夫自己含蓄地接受了这个变化后,这个事件的最终效果才被人感觉到。 639

即使在公开的政治变化前,匈牙利也已经和波兰一样迅速地走向了经济自由化。在1989年8月,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就可以作为旅游者自由进入匈牙利,尽管人们知道他们是要去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使以及到大使馆寻求庇护。到9月份,匈牙利边境完全开放了。捷克斯洛伐克紧随其后,涓涓溪流汇成了洪水。在三天内,1.2万名东德人穿过边境进入西德。苏联当局评价这种现象"非同寻常"。实际上,这是民主德国终结的开端。在精心策划、大肆吹嘘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胜利"40年的庆祝会前夕,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让德国社会主义者吃惊的是他看起来是在督促东德人抓住机会),防暴警察在东柏林大街上与反政府游行者大打出手。政府和社会统一党抛弃了它们的领导者,但这还不够。从11月开始,反对政体日益明显腐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许多城市上演。11月9日,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柏林墙被自发地推倒了。东德的政治局妥协了,接下来柏林墙剩下的部分也被拆除。几天内,900多万东德人去往西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其他地方,联邦共和国政府给每个到访者分发了100马克

作为“欢迎费”，东德到访者因此大受鼓舞。

1989 年，这种变化达到顶峰并席卷东欧，人们突然明白以前的政府在其臣民眼中已丧失了合法性，他们或者起来对抗政府或者背过身去任由政府瓦解。在体制方面他们要求到处都要有自由的政治选举，反对党派可以自由竞选。随着新宪法的起草，波兰实行了部分自由的选举(一些席位仍然为先前政体的支持者保留)；1990 年，莱赫·瓦文萨当选为总统。此前几个月，匈牙利选举了一个议会，这个议会产生了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苏联士兵也开始从这个国家撤退。1990 年 6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选举中诞生了一个自由政府，政府很快决定苏联军队必须在 1991 年 5 月前撤离。在这些选举中，先前的共产主义政治家没有一个得到超过 16%的选票。这些事情在保加利亚没有全部发生：640 在那里，变身为改革家的共产党人赢得了竞选并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在 1989 年 12 月的一场起义中，罗马尼亚经历了暴力剧变(以杀害其前任领导者收场)，其预示了前方道路的不确定性并明显成为了进一步冲突所引起的内部分裂的预兆。到 1990 年 6 月，一个被认为仍受前共产党员极大影响的政府攻击了一些以前的支持者，亦即现在的批评者，并在矿工组成的义务民团帮助下镇压了学生运动，许多人因此丧命，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

新德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另一个前共产党统治国家，在那里发生的转折有些不同，且远非那么暴力。不论在那发生什么都注定是一个特殊事件，因为自由化会涉及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这是自 1945 年来苏联外交政策产生的结果，退一万步说，这也显然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但是，不论以何种形式，德国的统一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在 1989 年底，确保统一过程在控制之中成为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最为关切的事情，科尔的选举前景可能主要受益于成功地实现再次统一；国际反应尚难预料，尤其是先前四个主要占领国。

然而,东方政策自从 1969 年来在东西方都取得了巨大效果。当 1990 年 3 月民主德国举行一次普选时,48%的选票和大部分席位都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另一半德国,即联邦共和国的执政党所控制的联盟获得。科尔完成了自勃兰特将民主德国纳入社会民主党规划一部分以来的大转身。在民主德国选举前,他就已经提出了推进两个国家合并的计划。考虑到大众对统一的广泛支持态度,统一在原则上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程序和时间表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并使非德国人安心,特别是苏联人。1990 年 5 月,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说:"我们不想任何人因为德国的统一而感到他们自己是个失败者。"

1948 年的货币改革开启了此后 42 年间德国双重分裂发展的过程;1990 年,随着两个德国货币、经济和社会的恰当联合,开启了重新统一的进程并因此开始了对战后既定秩序的撤除。10 月 3 日,两德在一个新宪法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先前民主德国的领土成为了联邦德国的行政区域。12 月选举了第一届联邦议会并确认了基督教民主派的支配地位。赫尔穆特·科尔成为德国重新统一后的首任总理。

变化是极其巨大的。美国和西欧国家最后很容易就改变了观点,没有公开表达政府对一个统一德国重生的关注。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莫斯科方面已经有所察觉,却没有正式表达任何严重警告。苏联没有反对德国重新统一,这必须归功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共产主义统治柏林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对之进行了访问。很难否认,拥有 7 100 万人口并且作为位于苏联西部的欧洲最大经济体的新德国将会再一次像过去的德国那样扮演强国的角色。赫尔辛基会议经历了它的第一次重要修整。

641

苏联政权此时经历了自 1918 年来从未有过的低潮;随着苏联(某种程度上像法国)最后成为和平解决进程的失败者,在苏联军队胜利地站在荒废的柏林大街上 45 年后,那些胜利、欢愉的时光被人们遗忘了。给戈尔巴乔夫的补偿是德国许诺在经济上帮助苏联进行现代化的一个条约。也可以说,使那些记得 1941 至 1945 年事情的人们安心,新的德

国已经不是旧德国的复活，而是一个被割让了一部分旧东德土地的国家（实际上，它已经正式宣布放弃那些土地），也不再是以前那个由俾斯麦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统治的普鲁士了。更令人宽心的是（对解除西欧疑虑很重要），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联邦制宪政国家，可以确保经济的成功奠基在将近 40 年的民主政治经验上，并嵌在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框架当中。它至少暂时打消了各方面的疑虑，甚至是有着长久记忆的西欧人。

苏联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在东欧革命的早期开始掌权。五年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接任也导致苏联体制改革的创新，首先是权力开始从共产党手中夺走，其次是新兴的反对力量抓住了机会，最重要的是，联盟的各共和国开始或多或少要求自治了。不久以后，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他可能正在瓦解自己的权威。自相矛盾和令人担忧的是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无论这一转变是快是慢，都可能给许多、也可能是大部分苏联人民带来比预期困难还要严重的问题。到 1989 年，苏联经济很显然失去了控制而骤然下降。像苏联以往的历史那样，现代化由中央发动并通过专制结构传播到外围。首先是因为当权人物和计划经济行政人员的抵制，其次是因为在这十年的最后时期，中央可以实行的力量显而易见地快速瓦解。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苏联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改革保存下来的希望。

642

到 1990 年，更多关于苏联及其人民状况的信息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易接触到。不仅有许多大众感受的明显标志，而且通过民意调查，苏联出现了第一份公众意见的调查。从一些大体有效的评判可以看到：党和当权人物信誉丧失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情况在 1990 年还并未像其他一些华约国家那么糟糕（更令人吃惊的是，长期毕恭毕敬的东正教会似乎比马克思列宁主义旧体制的机构拥有更多的权威）。但很明显的是，各地经济的失败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政策的自由化上。1989 年，苏联人和外国观察者都在谈论内战的可能。

这种威胁不会只因为看起来的经济上的失败而发生。过去紧张政策的解冻也显示了被经济崩溃和机遇所鼓舞的民族主义者和区域感情的力量。做了70年苏维埃公民之后,苏联呈现出一个像以往一样独特的民族联合。其15个共和国中的一些国家(尤其是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很快表现出许多不满。阿塞拜疆和苏维埃亚美尼亚引发了问题,这个问题由于笼罩着整个联盟对伊斯兰骚乱的恐惧而变得复杂。让事情更糟的是,一些人认为会有军事政变的危险。就像对美国士兵从越南撤离不满的人一样,那些对苏联在阿富汗失败感到不满的人将指挥官说成是潜在的波拿巴主义分子——而这个虚构的危险早已被广泛传播。

土崩瓦解的迹象日益增多,尽管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保住了职位并且实际上其名义上的权力正式得到提升(但这也增加了承担失败的主要责任的不利因素)。1990年3月,巨变发生了。立陶宛议会宣称1939年的兼并无效并重申国家的独立,尽管这经过了复杂的谈判以避免激起苏联军队对重新崛起的共和国的武力镇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宣布独立,尽管形式上稍微有所不同。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并未寻求否决脱离这个事实,但是作为回报,他赢得了一个协议,规定波罗的海的共和国应保证继续向苏联提供某些实质上的服务。然而这后来证明是其末路的开端。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不断迅速博弈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先与其中一方结盟,为了平衡势力,后来他又与另一方结盟。这导致1990年底时,当年夏天达成的妥协看起来既过时又无法实行。新年初期,在维尔纽斯(Vilnius)和里加(Riga)默许的士兵与克格勃的镇压行动并未能力挽狂澜。九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议会在那时已经或宣布其拥有主权,或声称其从联盟政府中脱离,获得实质上的独立。其中一些将地方语言改为官方语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开始着手使其自身经济与联盟经济相分离。乌克兰共和国准备建立自己的军队。3月份,大选使戈尔巴乔夫再次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并寻求达成一个能保持这个国家一些中央角色的新联盟条约。世界迷茫地注视着。

643

东欧解体

1990年底,曾经看起来铁板一块的东欧集团的现状已经无法进行概括评价或作简短描述。随着前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申请加入欧盟,或者准备这样做(保加利亚),一些观察者猜测将会出现比任何时期都更具潜力的更广泛程度上的欧洲统一。那些注意到新的或者说重新出现的往昔国家和种族分裂会使新东欧出现灾难(首先灾难出现在罗马尼亚)的人们作出了更谨慎的评判。尤为重要的是,在整个东欧地区都积聚着经济失败的暴风雨并且很可能由此引发骚乱。可能已经到来的解体,是在复杂程度、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当中发生的,这些国家和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遗产对其反应也各不相同。当事实在1991年变得清晰时,以前作出的预测显然是不明智的。

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令人震惊和重大剧变的高峰,就此而言,对整个世界历史亦复如是。前方道路如何,没人说得准——除了那将会是一段危险、困难并且对许多前苏联人民而言痛苦的时期。在其他国家,政治家们对于这一转折性事件表现得十分谨慎。前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苏联以前的朋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保持沉默。

第三十章　新秩序正在形成?

644

南斯拉夫解体

除了人们所关注的之外,在世纪的开端和终结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在 2000 年或 2001 年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特别的事情(就像是其他历史中那样)成为既存事实的结果,有些是自然产物,而有些由于人为的决定,有些则出于这些偶然的巧合所共同形成的环境。只有心理学才能给那些世纪重大事件予以特别的解释,并且,随着 1990 年的开始,亦即随着 20 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开始,先前几年中的愉悦情绪也在衰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 1988 年就已经开始显现的经济衰退,尽管与此同时一些人忽视了东欧正在发生的令人振奋的事件。无论如何,欧洲实际的通货紧缩与愉悦都随着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解体出现。

这个国家的历史常常被大量倚重。其最大的国家庆典就是纪念早在 1389 年的一次战役的失败,在那次战役中,奥斯曼人在科索沃打败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王国。然而,直到 1950 年,还有许多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妇女蒙着面纱,而土耳其早在 30 年前就由凯末尔(Kemal)将这一习俗废除了。这个国家在 1918 年出现,称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其

在1929年建立王室独裁之后更名为南斯拉夫,并力图清除旧式的划分),其实质上是古老历史上“大塞尔维亚”(Greater Serbia)梦想的体现。1903年夺回了塞尔维亚的这个王朝继续占据了新王国的王位。1934年,第二任国王亚历山大被一个马其顿人暗杀,此人受到了由匈牙利和意大利政府支持的克罗地亚人的帮助。这一事件明显地显示了国家事务的局外人对其持续的利益兴趣以及国内划分的怨恨,其后的一次类似事件被认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

南斯拉夫内部的分裂是1919年和平制造者未解决的典型失败案例(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曾想要解决这个深深扎根于过去的问题。1931年的人口普查将人们分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德意志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瓦拉几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其他斯拉夫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意大利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范畴,其把黑山人、波斯尼亚人、穆斯林、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以及作为其名称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归并在一起。但是罗马天主教占多数的克罗地亚人以拉丁字母书写,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则用西里尔文字。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南斯拉夫人的信徒中约占五分之四,但也必须忍受占绝对少数的穆斯林(1931年占11%),后者多数是波斯尼亚人①。最终,这个王国呈现出了财富和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马其顿是欧洲发展较为缓慢落后的区域之一,其在中世纪时几乎逐渐消失了;斯洛文尼亚只是许多对照物中的一个,其已经实质上实现了城市化并且具有大规模的工业。南斯拉夫主要的农业经济受到了迅速增长的人口的巨大压力:土地压力造成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广泛增长,他们的穷困状况因3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变得越发窘迫。

王国内的政治问题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对抗。到1939年,贝尔格莱德的政府令克罗地亚人憎恨,他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接近于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同时也出现了克罗地亚人的法

645

① 参见:A. Polonsky, *The Little Dictatorships* (London, 1975),见第162页的表格。

西斯运动——乌斯塔莎(*Ustasa*);在1941年德国入侵和占领之后,克罗地亚人、主要塞尔维亚共产党员——由克罗地亚人约瑟夫·布罗兹(Josef Broz)或称铁托(Tito)所领导——以及王室分子之间发生了三边内战,其间流传了许多关于这一运动的糟糕消息。这一运动以1945年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民族问题遂受到了铁托强有力的遏制。

45年后(铁托去世十年后),老问题又突然鲜活地重现了。这很快引起了局外人的兴趣。1990年,南斯拉夫面临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联邦政府试图着手处理日益出现的政治碎片化的局势。随着南斯拉夫各民族想方设法地去填补共产党倒台后出现的真空,各种代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利益的政党也组建了起来。到这一年底,所有各共和国政权除马其顿外都依赖于新当选的多数党。更为糟糕的是,少数民族问题又在各共和国国内出现:比如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宣布在克罗地亚应享有自治的权利。在马其顿靠近科索沃的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那里五分之四的居民是阿尔巴尼亚人);那里宣布独立是对塞尔维亚具有象征意义的蔑视——也引起了希腊和保加利亚政府的高度关注,其前任从巴尔干战争开始就野心勃勃地对马其顿领土存有觊觎之心。很快,随着贝尔格莱德联邦政府权力的式微,新共和国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塞尔维亚重申了对科索沃的统治,但是在1991年3月,零星的战斗开始出现在北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村庄之间。很快两个共和国的官方武装力量加入进来,并导致了双方的公开冲突。战争最激烈的地区不在塞尔维亚,而在其他共和国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 646

通过外界干涉达成最终和解的先例从未看起来前景广阔——部分是由于欧共体内各个国家持不同看法——并且其前景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后警告这一地区冲突有可能上升到国际层面而更加黯淡。1991年6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独立,年底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也步其后尘宣布独立。那时出现了穆斯林与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人之间的战斗,很多人担心这将成为更为广泛的种族冲突的伏笔。几乎与此同时,波

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宣布他们的对手是"土耳其人"而火上浇油。塞尔维亚东正教神职人员乐于在伊斯兰教再次向欧洲进军这一背景下制造冲突。就在圣诞节之前，令许多欧共体成员感到窘迫的是，德国率先给予了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官方认可(这也给其盟友带来压力，使其效仿了这种做法；欧共体也在1992年早些时候承认了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一直反对联盟共和国的分裂，其继续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有利于保证塞尔维亚的优势支配地位。现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只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广义上讲，前南斯拉夫军队一直是塞尔维亚人占多数的，这便在一开始就给了塞尔维亚人军事上的优势。塞尔维亚与俄罗斯不同，当其原先的联盟成员国想要从它的霸权下分裂的时候，塞尔维亚选择了战争。但是保存原先的联盟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可达成的目标，也不再是一场追求战利品的简单战役。塞尔维亚首先就企图占据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希望以此获得一个其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亚得里亚海港口。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终结

对前南斯拉夫干涉的外交政策被证明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后一次干涉，并很快因为更为惊人的事件而失色。1991年8月19日，保守派(他们的职务都由戈尔巴乔夫任命)通过一场政变取得了权力，但是最终失败了。三天后，戈尔巴乔夫重新掌握了总统权力。然而无论如何，他的位置改变了；持续不断地寻求妥协的策略破坏了其政治稳定性。他未能带来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在民族事务上也出现了差错。他被过去束缚得太重，并且对党和联盟的坚持也太长了：苏维埃政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突然倾倒了。

到8月底，已经可以看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现了滑向内战或解体的迹象；已经有九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政变的环境给了鲍里斯·叶利钦极好的机会(他大胆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是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经过民主选举而上台的领袖。军队是对其在莫斯科的支持者唯一可能的威胁，但是当他对政变作出反应，将所有在俄

647

罗斯领土上的苏维埃机构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并未受到军队的反对。他以苏维埃舞台上的铁腕人物形象出现,没有他的参与什么也无法实现,而(对一些人而言)他代表着一种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可能,这将会威胁到其他共和国。然而令国外观察家不解的是,对那些对政变企图持支持或默认态度的人的清除被发展为苏维埃官僚体系的坚决大换血。克格勃的角色被重新定义,联盟和共和国之间的控制权也重新划分。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苏维埃议会在 8 月 29 日宣布停止苏联共产党活动后,苏联共产党解体了。几乎是兵不血刃,至少在起初时是如此,这使得整个世界都震惊了,这个从 1917 年布尔什维克政变中成长起来的庞大组织走向了终点。随着 1991 年接近年底,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项在不久的将来取消限制物价的决策,不仅会产生从苏维埃体系最早期迄今未有过的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甚至还会造成数百万俄罗斯人的饥荒。那时候,新独立的格鲁吉亚已经出现了战乱,发生在第一次自由选举的民选总统支持者与不满的反对者之间。

这一产生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流血经验中的超级大国,在将近 70 年中并几乎直到其终结,都作为全世界革命的希望以及巨大的军事力量发动机,曾赢得过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战争,看来已无能为力地在一系列加盟共和国随之而来的独立中瓦解。除了在策略上的重要性之外,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也卷入了中央权力的争夺中,在其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处理方式上就能反映出这一点。但是,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是欧洲最后一个跨国帝国的垂死挣扎。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明斯克会晤,宣布终止苏联的存在,并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12 月 21 日,11 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代表在阿拉木图会晤,再次确认了这一点。他们达成协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正式终止。几乎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圣诞节宣布辞职,他是第一个如此以自由意志行事的苏维埃领导人。

648

戈尔巴乔夫做了很多事,并制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有些是与他的意图相反的,但是他活到了他能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他想要将那

些无法合在一起的东西联合起来”,俄罗斯总理如是说[1]。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为令人震惊和重要剧变之一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整个世界历史来说也是如此。前方有什么,没有人能够确定——对许多前苏联公民而言,那是一段危险、困难而又悲惨的历史。其他国家的政治家都对这一转折性事件表达着谨慎的看法,前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其中就包括苏维埃的核军火库将会发生什么。至于苏联的前盟友,其中一些对 8 月的失败政变表示认可或欣赏(比如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多少有点回到冷战阵营的前景必然会激起对国际区域如此彻底改变后的新的策略可能性的梦想。

欧洲的整合

1990 年新年伊始,法国总统发表讲话,提到“一个”包含所有欧洲国家的欧洲,除了苏联以外——即使只是暂时的。这使许多法国国民和外国人感到惊诧。随着各种事件迅速显现,这也可能只是一种渴望(或者是试探舆论风向?),但其表明了欧洲离着莫内(Monnet)[2]有多远。其后的几年里显示出了对于未来整合的慷慨解释意味着怎样的困难:欧洲的乐观主义开始出现了衰退。这证明将 1992 年作为 1985 年时设定的建立单一市场的象征性日期是很难达到的。

困难的来源之一就是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很快就想加入这一共同体;对其予以准入必然会给现有成员国造成外交上和经济上的问题。东德事实上在 1990 年就因两德重新统一而进入了共同体,但是其他想要进入的新成员需要等待西欧各国确定其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然而令人不悦的是,这一问题并不是那么轻易能够解决的。

649

政治家们于 1991 年聚集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达成了关于筹备一个真正的单一欧洲市场的协议,并制订了不晚于 1999 年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时间表。其给予欧盟内所有成员国国民以

① 1992 年 1 月 6 日《新闻周刊》引用了鲍里斯·叶利钦的这句话,第 11 页。

② 法国曾呼吁的在欧洲建立的统一市场上所使用的共同的虚拟货币。——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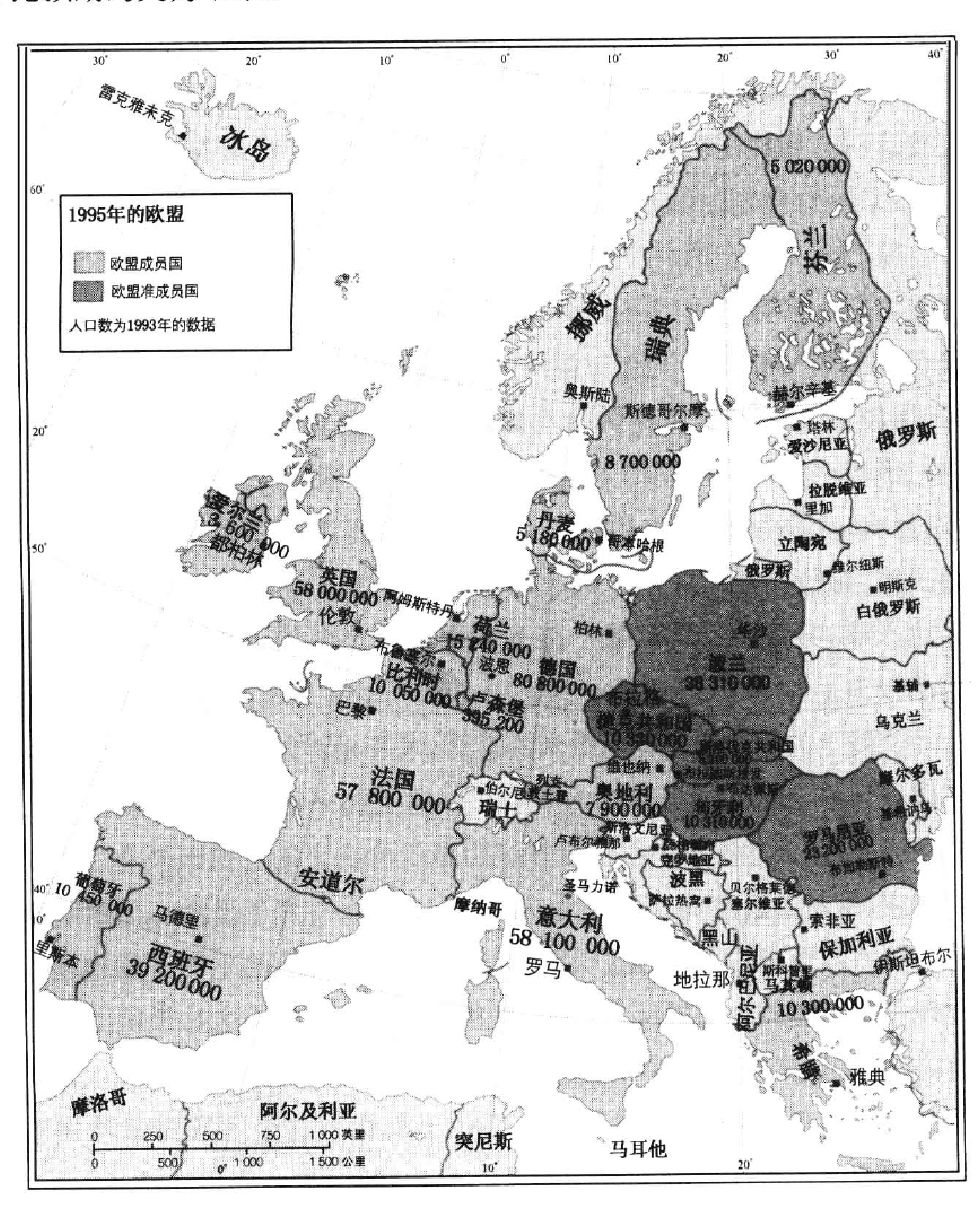
欧盟公民身份，并(这一条款英国有豁免权)要求所有成员国实行工作实践和一些福利制度的普遍标准。最后，协议在“辅助”(subsidiarity)原则上达成了共识，这个词语植根于天主教社会训导，其目的在于限制欧盟委员会或布鲁塞尔对各国国内行政事务的干涉——这是一种消除疑虑的努力。尽管如此，丹麦人在公民投票中拒绝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一个在法国进行的类似民意测试表明只有小部分人对之感兴趣，英国政府(尽管为保障通过进行了仔细的磋商和特别保护措施)则在试图使这一方案在国会通过时面临困境，因为在执政党中有一些“叛乱分子”投票反对他们的领袖。

欧洲未来整合的一个障碍在于，仅就真正关于未来的辩论而言，主要是西欧大多数选民的不理解；对他们而言，能够确切感受到的，更多是传统的划分和国家民族利益——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也是如此。此外，国家利益倾向于使其对抗看似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理事会的干涉这一焦点上。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时任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先生频繁作出了许多欠周详的和无关紧要的理事会决策，这些决策需要通过国家政府进行实施。这个法国人有极高的表达天赋，其关于欧洲的雄心使人们更进一步聚焦于布鲁塞尔更为有效的权力上。

实践上的困难也阻碍着欧洲的道路，尤其是对德国影响深远。在科尔总理领导下的德国是欧盟的发动机。这主要来源于他在重新统一上的巨大胜利，但这次统一很快就被证明是代价巨大的。德国被卷入了贸易赤字，这对于西德而言是极为罕见的，并由此引发了恐慌。随着财政代价将持续数年的可能日益明显，对于重新统一在政治上的不满也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时间推移，通货膨胀的危险越发增长，这对于德国人而言是一个古老的噩梦，这一沉重的负担由德国的纳税人所背负，不仅由于那些从前东德来到西德的人们，还由于大量从这个国家对政治避难采取的自由态度中获益的外国移民。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在增长。

经济衰退对每个欧共体成员都投下了阴影。它提醒了民众彼此之间经济力量的差距和差异；保护特别利益(或者被视为如此)的政策因 650

此也被更为强力地推行。每一个国家的财政、预算和兑换问题都在 90 年代削弱着其政府的力量(其中一些的产生被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威胁到其保持就业率和普遍被称为“福利”的高水平支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殊的欧洲协议和资源分配——比如对渔业的规范——的形成就比预期的更为艰难。



651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European Union,这个共同体的新名字在 1993 年 11 月 1 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开始使用)内部即使已

经达成的事务仍旧处在失去的危险中也就并不使人惊讶了。这里有着太多对前途的疑虑、误解、含糊甚至直接的争吵。经济环境使其更加难以经营。比如,一个由法国和德国在 1987 年设立的共同货币体系在 1989 年被并入了货币联盟计划。这一安排与德洛尔先生密切相关,其通过设立欧洲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对成员国自身的货币管理造成了极大的限制。其造成的货币重估和货币贬值更无法迎合国内的需求,尤其是德国国内的中央银行大幅度提高了利率。1992 年,英国和意大利也被排除出外汇兑换体系,爱尔兰则于次年加入,国际货币运动将德法关系置于巨大张力之下,并迫使整个体系作出了重大修正。这尤其给已宣告的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和统一的欧洲货币的目标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到 1996 年,为达成这些目标的时间表也受到了威胁,有些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一些国家的疲软状况表明其经济情况实际上难以达到制订的标准。

在每个国家中都有众多可被政治家们轻易利用的逆流。这些甚至可以在两个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欧洲整合的国家中看到,亦即法国和德国。法国的基本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虽然其卷入得更深了;对法国而言,驱动欧洲的根源在于对一个复生的德国的恐惧。法国政治家力求减轻这种危险,亦即通过将德国牢牢拴在共同市场、其后是共同体上。随着时间推移,德国经济变得日益强大,法国政府被迫接受对其独立行动更大的侵犯,并承认德国在勾画欧洲未来问题上享有优先权。戴高乐关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欧洲的理念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更为联邦化的观点。为了将之做到最好,一些法国人认为一个联合的欧洲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其是自觉地建立,以加强法国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砝码——比如,通过任命委员会。如果必然要出现一个欧洲的超级国家,法国至少可以尝试占据主导地位。

德国在未来整合上的利益不得不从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方面来考量。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词语再度被提及:中欧(*Mitteleuropa*)。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德国人出版了一部论证要提升德国和(在德国领导下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内聚

652 力的图书[1]，作为图书的标题，这一词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不是对应“欧洲中部”的恰切翻译，也没有充分表达出“德国及其邻居们”的意味。无论如何，其表达了德国的特殊角色与来源于这一特殊角色的特殊关系。

随着共产主义欧洲的终结，德国政府通过采取欧共体向东扩展的措施以寻求与前共产主义邻居友好相处。德国商人和投资者在那些国家建立德国的经济利益也许能加速这一进程，而这种渴望（德国因此而承认了刚刚独立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却远非能让其他欧盟国家安心（除此之外，还唤起了对过去历史上条顿人与斯拉夫人、东正教与天主教对抗的文化恐惧和记忆——尤其是在塞尔维亚）。

自从《罗马条约》签订以来，到 90 年代中期，西欧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欧盟之外还有一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但却被大大削弱了[2]。其他正在接近或敲击共同体大门的国家数量，也至少反映出非成员国从成员国数目上看到的物质资源。此时出现了一些文化上的趋同（尤其是在流行文化层面）甚至消费上的标准化，这可能更主要由于国际交流和国际市场的进展而非政策作用。在社会结构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差异。德国和法国农民数量的减少反映出缓慢但具有共性的向更为理性的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虽然这样的变化代价高昂[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常常触怒非农业选民]。欧洲也感到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束手无策，事实上它是通过 1995 年底美国的干涉才得以解决的，北约力量成为了和平保卫者这点恐怕是其创建者始料未及的。因此，当时欧洲整合的未来仍是前途未卜。

在实现了单一欧洲市场之后（虽然有一些实际上的资格限制），欧盟宣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统一的货币和货币联盟，据说这特别为科尔总理所重视。这也是法国政府相信应当去做的，虽然之前有些勉强。

---

① 瑙曼（F. Nauman）的《中欧》（*Mitteleuropa*）出版于 1915 年。

② 丹麦、英国、葡萄牙和瑞士在 1995 年退出了。1994 年以来，剩下的成员国在统一的欧洲经济区内与欧盟国家形成了联合。奥地利、芬兰、瑞典在 1995 年 1 月 1 日加入了欧盟。

然而,在1996年春都灵的跨政府部长会议上,一个可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时间表看起来越发不确定。

653

在一些主导人士的展望中,怀疑在增长。在一些国家中可以看到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对于欧洲政策制定观念的强烈的感性承诺(一种对防卫和安全措施的需要,尤其是受到了南斯拉夫后继的共和国中危机的刺激)。一些小国家被减少或者可能去除国家否决权的理念所吸引。一些热心家甚至看到在更远的未来,一个政治上联合的欧洲是不可避免的道路终点,这一条路已经通过联盟的国家联合开始了。所有这些理念看起来都会在符合传统的政治思考中实现(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某种欧洲主权国家的出现),而许多人则对这些事情感到恐惧。政治家们苦思冥想的是,当一个选择不得不作出的时候,选民们在想什么;对他们而言,这一选择的结果是清晰可见的。

另一个与货币联盟几乎同样紧迫的问题是联盟的扩大问题。毫无疑问,货币联盟有些失败,扩大化并未出现,欧盟可能倒退回一个由德国主导的简单的关税同盟(像一些倾向历史类比者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关税同盟多数时期就由普鲁士所主导)。除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之外,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性。但要考虑到一旦超越它就要面临着扩大的关键问题:谁应该被允许——或鼓励——加入欧盟?在那些想要加入欧盟的国家中,土耳其坚持的时间最长。除了毫不妥协的希腊反对者的阻挠外,土耳其也被合理地质疑是否算是欧洲国家——但同样可以合理地指出其制度方面(比如代议制度和世俗国家)的现代化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欧洲性"(Europeanness)的考验。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瑞典和芬兰已经加入了欧盟(挪威在全民公决中否定了这一理念);奥地利也加入了欧盟;它们从未在欧洲性上受到质疑,并且也有发达的经济和自由政治的传统。更大的困难主要出现在中欧和东欧,可能最为明显的就在曾经是南斯拉夫的区域内。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新联合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令人沮丧,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加入欧盟将会减少这两个国家再度发生危险的可能,尤其是

基于它们在1990年之后的经济进步。其他东部国家作为潜在的候选人看起来吸引力就小得多了,无论是从政治文化或经济准备层面上的考量都是如此。除此之外,它们可能会在欧盟和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带来问题,由于曾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它们对西部邻居的政治阵营较为敏感。最后,未来劳工自由流动的时机也不合适:潜在的来自俄罗斯和其他东部国家的巨大劳工潮涌向西方的劳动力市场的图景令人战栗。

654

在这十年的中间时期,很难去正视回答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此时主要的大陆国家仍处于经济不景气当中(英国在欧洲货币基金会的成员资格难以为继,可能成为唯一一个脱离该组织的欧洲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都面临着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其他国家也面临着预算混乱。一种选择保守政府的趋向便是对这一形势的可见反应。这些事实必然会对货币联盟和欧盟扩大化等问题的处理上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几乎就是在那一时期所清晰表明的。

然而,这些事实也很容易使人们忘记《罗马条约》以来这些年所达成的全部成果。到1990年,我们通常称为“西欧”的地区是三大新世界经济体之一。其占据了70%的世界贸易总额(多数在其成员国内部)和世界上40%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自身的GDP比美国还要大(并且是日本的两倍)。其在发达世界工业区域通过投资流动实现的整合是1914年以前未曾见到的。美国三分之二的外国投资掌控在欧洲人手中。这样的事实因其担忧自身的未来而常常受到忽视。

西方对伊斯兰的恐惧

1972年,一群来自中东的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挟持并谋杀了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这是20年里对欧洲最轰动的一次恐怖袭击(因为电视机的普及)。欧洲人发动的恐怖袭击也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出现(比如1980年在博洛尼亚火车站那场明显由意大利右翼政治组织所发动的血腥炸弹屠杀)。但是那些阿拉伯人或伊斯兰组织所制造的恐怖袭击通过欧洲(就这点而言还有北美)的想象和媒体产生了一种

不断增长的迷狂。在80年代,这种关注通过伊朗革命的言论,通过阿拉伯组织吉哈德(圣战)的讲话,通过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戏剧性事件——比如1981年对埃及总统的暗杀,他曾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这是另一次电视展演——通过利比亚穆斯林独裁者的奇怪声明和行为,以及通过穆斯林国家中的政治变化等都得到了加强。

伊朗革命不仅提升了国际世界对阿拉伯-以色列长期冲突的关注热度,并使已存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与一种更模糊但更大的对抗性纠缠在一起。其有时被视为——或者宣称——存在于作为整体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90年代早期,这就引发了关于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的对话,其太过明显的夸张以至于难以信以为真,但是其重要性的有趣征兆却附属于一种文化的对比,以及有时会出现的文化冲突。

新伊朗一系列强硬的反西方(有时是反基督教)领导人,及其为国家反西化所采取的新的纪律和强制推行的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和习俗都令人印象深刻。阿富汗圣战者(*mujaheddin*)反抗苏联军队的成功战斗,以及阿富汗在其伊朗邻居的影响下建立的伊斯兰激进政权也同样引人注目。尽管曾受共产主义统治,但阿富汗从未经历过明显的现代化(伊朗的情况也是如此),并且其宗教领袖因对抗当下的状况以及对伊斯兰教传统复兴的强调等行为也获得了大量的民众支持。这在其他地方也引起了共鸣(还有来自美国对圣战者的占主导的、自相矛盾的秘密支持)。80年代,在多个国家中"伊斯兰"政党所获得的选举胜利导致更为"伊斯兰化"的政权上台,尤其是在苏丹。1990年,阿尔及利亚选举中一个伊斯兰政党赢得了多数选票,这引起了欧洲的迅速反应,法国感到自己不得不支持阿尔及利亚军事政权镇压伊斯兰运动。阿拉伯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某种程度上承受着伊斯兰化激进势力的压力。每一个地方都能找到对反抗政府的资助,尤其当这个政府支持特权阶层的少数人,有时是因为其公开地西方化或者向以色列显示出日益宽容的立场。

在欧洲和美国,如此广泛的混乱现象很容易使人产生误判;它们看起来是想形成一个更为团结的模式,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们看似是

一个统一的反西方运动——至少是渴望统一团结的阵营。伊斯兰言论常常印证了这一点。虽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充满了各种限制条件和复杂性,并且作为一个解释性术语具有明显的界限。但其并非在所有伊斯兰教国家中同等重要。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人口中穆斯林占多数,但是从未出现过像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那样激进的状况。此外,近来在穆斯林国家之外出现的反映穆斯林不安的政治行动(包括恐怖主义),是一个比人们有时认识到的更为有限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引发了伊斯兰社会内部新的分裂和争执,并使一些老问题重新浮上了表面。

656 大多数阿拉伯地区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其既体现了一种精神领导(哈里发),也一度给从马格里布到苏丹、也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广袤区域建立了一种框架和秩序措施。先前奥斯曼的土地曾是早期伊斯兰民族的家园,其后逐渐向西扩展,有时还受到欧洲和北美传教士团和近东地区教育的影响。他们早在奥斯曼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但是直到 1918 年才开始在埃及(他们早在 19 世纪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就进行了尝试)以外的地方进行严肃的西方化实验,在战时和 1945 年后的中东,西方的理念和制度——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都在数个阿拉伯国家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然而其却明显地未能提供进步,也未能实现许多阿拉伯人从屈辱中解放的梦想。西方的万灵丹并不能产生道德和政治独立、文化的自我尊重、自由的制度,或者这一地区人民期冀的能惠及黎民的物质财富。民族政权在一些国家出现,但是繁荣和欧化社会只在黎巴嫩昙花一现,这里曾是阿拉伯世界和先进的西方观念最古老的接触点。然而,这些政权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被人们的粗心、肆无忌惮、愤怒和失望所摧毁了。

在那时,形势因为以色列的建立而迅速恶化了。另一个刺激则是中东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其在 1914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为该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新收入,但并未使大多数阿拉伯人受益。西方化失败在其潜在的结构方面,而非在破坏性或腐蚀性影响上,这一点在非阿拉

伯国家且经济发达的伊朗有极好的体现。在这里(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一样)伊斯兰保守的神职人员也加入了反抗不满的洪流(一些人反对伊朗国王是因为他不够自由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其过于自由化),并利用革命掌握权力。他们不仅发掘出了对其统治者的罪行和错误的不满,而且还有数十年来由于现代化进程在其国家之外普遍遭受的挫折,这一进程削弱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使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感到愤怒,这些都为其寻求阿亚图拉(Ayatollahs)的领导和鼓舞提供了理由。在伊朗推翻美国盟友的成功以及实际上达到的减少西方文化影响的成果,对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所感受到的无能为力的耻辱而言是一种缓解。

无论如何,这一充满希望的时代背景,并没有开启一个使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人民感到历史的潮流已经趋向他们一边的十年。首先,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这证明伊斯兰激进派立场所具有的根本性缺陷即其反现代主义。伊斯兰保守派经常希望获益于一种可选择、可控制的现代化。他们能将自己的文化目标(以及对西方世界文化目标的摒弃)与经济、技术、科学的现代化结合起来吗?看来这不太可能。第二个缺陷也迅速明朗起来。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世界的分化引发了1945年以来最血腥的战争之一,即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且因为宗教上的分歧而被加重,这些分歧甚至可以追溯到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建立时期。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并导致了近百万人死亡。很明显,无论其各自对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态度如何,伊斯兰世界自身也存在着这样尖锐的划分。最后,令所有中东穆斯林感到失望的是,在解决他们所认为的以色列问题(从最极端角度来看,其希望彻底摧毁这个国家,或者从最中庸的角度来看,要求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要求)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657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场没那么血腥的战争更明显地揭示出伊斯兰世界合作(更不用说团结)道路上隐匿的障碍,并使得欧洲的军队再次回到了中东地区,虽然其只是一个配角。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伊拉克曾经受到了美国的援助(考虑到这些事情发生在1979至1980年,这并不令人吃惊)。1990年,伊拉克军队入侵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更

小但是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的科威特。出乎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意料之外的是,其以反以色列为掩饰的企图失败了。只有巴勒斯坦人和约旦国王(十分尴尬地)站在他一边。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埃及都站在另一边,并加入了美国领导下的反伊拉克联盟。一场在联合国协调组织的外交战役产生了一系列谴责侯赛因行动的决议,并授权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英国和法国先遣队加入了在沙特阿拉伯集结的在美国指挥下的多国部队(德国政府因宪法原因不能派兵,这在欧洲引起了不满)。苏联并未介入或阻碍正在采取的行动。伊拉克的火箭弹攻击瞄准了以色列的城市,但是这并未获得军事或外交上的优势:以色列并不想卷入这场战争,因为这会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面临严峻的问题。最后,在 1991 年 1 月,联军开动了。一个月内,伊拉克投降并从科威特撤军。可以说,以色列是这次伊斯兰内部分裂的最大受益者。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感觉也很好。因为所有伊斯兰世界内部持续的不满和愤恨都将比以前更加无法用于有效的行动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能够被更实际地予以评估。

一种新的发展(与伊斯兰民族相关联)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引起了一些欧洲国家对大量少数民族移民越发增加的关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因为地理上的接近和先前的殖民地纽带关系(尤其是法国)吸引了大量来自马格里布的移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吸引了许多土耳其人。英国也有大量的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国人群体。欧洲似乎给那些人口迅速增长而只能给年轻人提供很少就业岗位的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随着经济形势走低,那些想得到工作的欧洲人对移民产生了不满,他们不了解这些新邻居的习俗和习惯,并看到了许多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各个国家之间的环境不尽相同,不仅是穆斯林移民面临着诸多问题,近似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们也尽其所能利用这种形势。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支持的严酷的军事政权受到“伊斯兰”反对者的挑战时,法国政府便采取警察行动来应对阿尔及利亚移民。虽然到 90 年代中期,在全球背景下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658

并未显示出比先前对欧洲入侵的反应更为有效地捍卫伊斯兰利益的迹象,但很明显,伊斯兰因素使欧洲政府面临的许多问题进一步恶化和复杂化了。

新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

俄罗斯是独联体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国家。叶利钦在 1990 年 7 月退出了苏联共产党,从而很快赢得了比戈尔巴乔夫更为坚实的合法性。他曾四次投身民主进程,并在四次选举中均获得胜利。当其 1991 年作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时,他赢得了 57%的选票。1992 年 1 月,他启动了一项激进的经济改革,某种程度上是效仿先前波兰所做的,导致了经济的全盘自由化并免去了所有的琐碎控制。那时,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但这一果断的措施至少延缓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如此,伴随日益升高的失业率,1990 年以来国民收入和实际工资的迅速下降,1991 年来工业产出的下降(下降了一半),政府机关中出现的大量腐化现象,以及广泛的犯罪活动,叶利钦还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对与独联体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感到为难,在 21 个非俄罗斯共和国里,居住着2 700万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境内有2 500万非俄罗斯人)。

独联体建立之后,1992 年在俄罗斯境内的 20 个自治共和国中的 18 个签署了一项协议而形成了一个联邦国家。次年,一部新的宪法因其可疑的状况,只在全民公决中以微弱多数通过,大约只有刚刚超过一半的选民参与了投票,从而完成了后苏维埃时代俄罗斯的正式架构。共产党在最初被停止活动之后,最终被总统令所解散。这,如同摧毁以叛乱反抗新宪法确立的对手(其对所谓的莫斯科"白宫",俄罗斯联邦议会所在地发动了一次攻击),被一些人视为一种过度的总统高压手段的征兆。叶利钦的个人风格是不会作出太多的让步,也从来不会和风细雨,但是他对于反对派的缺乏耐心助长了对其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攻击。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尽管其在处理与独联体其他成员的关系上比较成功(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有危险),他没有多少正面的和物

659

质的成就提供给俄罗斯人民。他无法实现在大街上渴望工作和低物价的男男女女们所期待的经济复苏。因此,他不仅日益受到聚集于工业和官僚体系的被称为政治利益“帮派”的潜在影响的反对,也受到了前共产党员、法西斯主义者和代表大众呼吁的民族主义者,还有那些失望的前改革家们(经常是在叶利钦解雇了他们之后)的公开反对。然而,叶利钦仍旧享有微妙的道德优势和来自西欧的外交支持,尤其是德国总理的支持,其敦促其他西欧领导人优先考虑在俄罗斯恢复稳定,并且避免因试图吸引前共产主义国家加入北约而分心,这一进程必然会引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警醒。

1995 年底的选举,在多数人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并抵制叶利钦的局势下产生了杜马(Duma)。其中最大的议员团体是共产主义者,第二大则是极端民族主义者。这对于通往 1996 年 6 月第二次总统选举的道路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开头,然而,在第二轮选举中叶利钦再次获胜了。但是投票模式表明许多俄罗斯人明显渴望在美好的旧苏联时代时所享有的稳定的就业、廉价的食物和国际的尊重。俄罗斯大众对于在 1990 年曾出现的、向西方传统和理念开放的思想看起来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热忱或哪怕是勉强的意愿。在海外很少听到人们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胜利的议论。看起来,俄罗斯认识到应一如既往地同其他欧洲国家区别开来,一如既往地维护自身的文明区域,正像一如既往地葆有其特色一样。不幸的是,看起来他们还抱有沙文主义的渴望,以再次扮演一个自认为应担当的国际角色,这常常被视为一种与西方相对抗的力量。

660

欧洲的混乱

民族和少数民族问题在独联体之外也十分突出,虽然其中最古老的一个看似几乎消失了,这是由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所解决的。东欧犹太人的命运曾为大屠杀所决断;这里再也不会成为世界犹太人的中心了。以色列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新的聚集地。1945 年后,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被吸引到那里,并且东欧的共产党非常渴望利用传统的大众反犹太主义(尤其是苏联)通过骚扰和小规模迫害促进移民。在一些国家

中,其结果是使曾作为该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犹太人口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彻底消失了。波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 年在波兰有 20 万犹太人幸存,他们很快又成为屠杀和折磨(有时是谋杀)的牺牲品,到 1990 年其人数下降到仅为 6 000 人。然而,仍旧有接近 100 万犹太人留在独联体共和国中,主要是在俄罗斯(并且,讽刺的是,法国的犹太人口有了实质性的增长;来自伊斯兰北非的移民使其人数达到了约 50 万)。

在其他地方,民族主义的反抗也如火如荼。爱尔兰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有些迹象表明其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已经过去了。一份英国与爱尔兰的协议在 1985 年承认了爱尔兰共和国具有参与讨论阿尔斯特地区未来的权利并且为此设立了新的机构。更为有希望的是,九年后开始了一段新时期,有关利益各方为了爱尔兰宪政未来的和平商讨而实现了停火,并且受到了双方恐怖组织的遵行。然而,在不到 18 个月后,因为民族主义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IRA)于 1996 年 2 月 1 日在伦敦制造的一场爆炸案,这一充满希望的时期悲剧性地结束了。这场爆炸对和平进程所造成的道德、心理和政治损害至今仍可见到。

在其他许多地区,民族或团体之间古老的冲突也并未消失。1990 年,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失败时,便出现了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Transylvania)的匈牙利人之间的冲突。三年后,这里要求在罗马尼亚国家内部实现自治。但是持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破坏性最悲剧性的证明发生在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境内。这就是为人们所知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这是在一个特定地区通过谋杀、驱逐、恐吓、强奸、纵火和饿死等方式对一个当地人群进行彻底清除的委婉说法。这就是 1992 年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对该地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所采取的行动。在其后的四年里,波斯尼亚的存在处于危险之中。

661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为了对抗南斯拉夫(事实上是塞尔维亚)军队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在波斯尼亚的斗争注定更为困难。这

里至少有三大有影响力的民族——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而这些群体的分布——主要居住在隔离的村庄或城镇的隔离街区内(其中就有首都萨拉热窝)——比在其他共和国的情况更复杂。1992年3月波斯尼亚的全民公投受到了塞尔维亚人的抵制，但是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都投票支持，决定了波斯尼亚的独立。其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就拿起了武器为占有萨拉热窝和其他他们宣称应归属塞尔维亚的土地而战。他们受到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支持(正式来说，两者仍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对外贸易的制裁，这是该组织在数年悲惨事件中作出的最后的有效行动。

欧盟因为德国此前对克罗地亚的承认感到的尴尬也因此稍微得以缓解。直到1994年北约(在联合国的授权下)才准备采取行动进行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攻击(空中打击)，这些塞尔维亚人一直忽视或者阻挠达成一个解决方案。美国政策缓慢地具体化，但最终却是决定性的。其使得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政府遗弃了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并使北约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行动。克罗地亚也重新开始了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冲突，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对穆斯林感到友善而是因为克罗地亚人在塞尔维亚人宣称占有的区域内陷入困境。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最终接受了停火协议，1995年11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总统在美国举行了和平磋商。

在这四年当中，大约有20万人丧生。对这些并不富裕的国家而言，破坏是相当巨大的。资助北约先遣队(约有6万人)去监督必要的撤退和边界划定比设计一个重建计划要容易得多，更不要说将战犯绳之以法了。和约的实质是波斯尼亚应由两个实体组成，一个是穆斯林-克罗地亚人联邦，另一个是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政府已能确保其所想要的北部领土的安全；塞尔维亚再次未能取得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并被迫放弃在其他地区获得领土的希望，但却因撤销制裁而感到一丝满足，毕竟这一制裁措施对其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损害。穆斯林的波斯

尼亚幸存了下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遵守了分治的规定，但在精神上却拒绝这一解决方案。他们没有理由希望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老问题能够就此平息。

663

后记：面向21世纪

尽管最近存在相反的说法，但历史并没有走到终点。历史并不像任何人所想象的那样存在着终点。从另一方面讲，某种事物的历史，例如国家的、教会的、宗教的、文化的、法律制度的、工业的，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物的历史，会有终点。在写作和研究各个实体时，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用时间顺序解释他们的课题。无论解释是什么，他们最终在最接近自己所争论或叙述的地方得到了结论，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主题。据此，随便举一个例子：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被认为结束于1806年（尽管从历史学家对于帝国的研究和论述中来看，它的历史并不是这样）。

可能欧洲历史如今从这样的特殊角度看来已经到了一个终点。当然，这里没有一个如同1806年那样清晰的时间分界线。在考虑各种可能性时，我们需要清楚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将欧洲作为一个（在大多数时间内）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区域的地理范围来对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进行考察。尽管如此，显然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历史不得不被纳入到欧洲历史叙述中，以使对欧洲历史的认识变得清晰。事实的确如此，即使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例如非洲或亚洲——也通过来自欧洲的人和事对其发生的作用这一观察途径（而非与之相反）而显得更加清晰。尽管如此，影响却

是相互的。举个例子，欧洲历史长期以来深受从美洲流入的马铃薯和白银的影响，而这就意味着，那些为欧洲历史发展提供可能性的非欧洲历史是与欧洲相关联的。

如今，实际上，这只鞋子毫无疑问地被穿在了另一只脚上。在这个世纪中，那些欧洲以外的地区常常决定着欧洲的事物。随着世纪末的来临，这个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今，在北京作出的决议决定了清理欧洲帝国在亚洲残余势力最后阶段的推进方式；来自东京和首尔的决议决定着威尔士的就业前景。就政治层面而言，这个进程始于1945年，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明确地产生作用。在此背景之下，欧洲历史还能被继续写成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一个完全由自身内部演化而不是起源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叙述吗？至少谨慎地来说，那是做不到的。 664

尽管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一再反思我们可能试图将欧洲历史表达为一个独立的和明确的研究对象是明智的。界定其自身是不受外界影响的还是易受外界影响的标准应当是观察其对于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传统文明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应。显然，西方在近几个世纪里显示出了一些显著的力量——普世观念：这是西方留在世界上的印记。命名以及为该名称下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权力的标志和形式；我们的世界中大部分广泛被认同的名称来自欧洲。即便是恒星和行星的名称也来源于欧洲流传的神话，而我们的地球表面将这个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概念来源于被欧洲人所极大地拓展的古希腊观念。美洲以意大利航海家来命名。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之所以被称为澳大拉西亚，是因为其面对着被欧洲人称为南极的地方。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区被称为中东与远东，因为这个安排与欧洲人首先到达的地区有关；而且在全世界范围里，这样的名字还有纽约、新拉雷多、新法兰西、新西兰。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命名，欧洲人清晰地重组了世界，无论是对于他们自身还是非欧洲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版图是欧洲人在仅仅一个世纪内发现并完成的。它确定了全世界居民如何认识他们自身的途径，因为欧洲人像命名地名那样来对不同的人种命名。正如他们创造了地理上的非洲这一

概念,他们同样也创造了"非洲人"的范畴。从古老的、模糊的"摩尔人"的概念——起初包括了所有深色皮肤的非基督教徒,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概念被扩展到印度——发展出了一个"非洲人"的支系范畴(后来又出现了其他进一步细分和更加精确的支系范畴)。随着时间的演进,这使非洲大陆的居民将自身视为共享一种他们实际上从没有拥有过的共同身份成为了可能,并且为其他词汇的发明开辟了途径,例如泛非主义或非洲性格(*négritude*)这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则更容易在合适的时间里被从欧洲人那里借用——例如有关种族、民族时。这些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虽然它们实际上走了捷径,有时否认了其他的真实的原始身份的存在。

欧洲为全世界提供了第一种世界性语言。汉语相比其他语言可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是这并没有使其成为世界性语言。它从没有像西班牙语在我们今天称之为"拉丁美洲"(来源于 19 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一个灵感)的地区,英语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以及英语、法语对在许多非洲地区那样广泛地应用于中国之外的区域。通过语言(如同地理上的表述一样)来确定想象和感知的标准,确定重点,在某些方面相比其他方面更早地取得突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的竞技体育、艺术、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上。

665

历史依旧可以持续发展。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迹象,显然也反映了一个文明有独特意义的最具体的影响,这些在过去 300 年中都是改造世界的主要力量的主要来源。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过由单纯的政治或军事实力所产生的影响。它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能被自觉接受的思想和原则。实际上,衡量欧洲影响的一个困难是文化演变的过程常常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下。更进一步讲,有时甚至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抵制欧洲所造成的后果。最后,欧洲文化当然不是唯一的"高级"文化。其只不过是与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人类文明的塑造(在各个层面以不同程度展开)相关,这一过程的影响是完全彻底的、从上到下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贯穿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的。

历史学家(特别是在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们)常常被认为给予了欧

洲过多的关注。“多”指的是他们所论述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性”的特征)这类的概念,这些概念比单单关注一些固定的题目范围要更加宽广,目标要更加分散。通常而言,相比这种歪曲背后的原因,对于欧洲中心性的批评似乎不太关心欧洲和欧洲的主题被给予了不适当的关注。这往往意味着不仅是高估了欧洲历史的相对重要性,还包括欧洲人行为的内在价值也都被高估了。研究欧洲历史而不是其他的,例如非洲或中国的历史,被认为反映了一个假设,即欧洲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更值得钦佩,更值得赞赏,所以“更好”。

我们最好应当承认,面对这样的批评,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著作给出了一些貌似合理的以及似是而非的解释。许多欧洲人的确俯身去研究过其他文明。受到莱布尼茨与伏尔泰所推崇(尽管对其并不了解多少)的中华文明后来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轻视——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巨大的、稳定的、缺少活力的沉闷的文明”[①]。当然,这两个判断都是肤浅的。许多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在近几个世纪里,欧洲人通常还是认为非洲人是野蛮人,尽管非洲人能够像为自己的部落在非洲大陆上寻找合适的生态环境那样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很容易想到。

我们还应当回顾,在欧洲大扩张中(因为这是欧洲历史中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人都认为自己在一定意义上要比被自己所征服的地区“先进”得多,无论其本身的行为有多糟。即使当作为寻求世间平等众生灵魂救赎的基督徒,欧洲人也自认为拥有真理,而其所面对的是无知、没有道德和野蛮的民族。这种想法是基督教文献世俗化的表现,其不断满足着欧洲人的虚荣心,不断维持着宗教的发展和世俗传教士的热情,一直持续到这个世纪。但是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如果说有教养的欧洲人习惯性认为只有欧洲传统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么同样有许多欧洲人从事于其他文化艺术的研究与收藏。并没有人强迫他们来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是基于热情在从事这些工作。

666

① Cardinal Newman i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ed. I. Ker (Oxford, 1976), p. 213.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英国人而非印度人率先推动了印度本土出版物的出现，另一个英国人发起了印度的考古学研究，最终实现了政府对印度古迹的有序保护，而这些事情是之前任何征服者都未曾想到的。更进一步（更尖锐地）讲，显而易见，欧洲人曾遭遇的一些社会习俗，与作为征服者的欧洲人一样时常是残忍的、卑鄙的和野蛮的；我们很难（除非为了一些谨慎的或实际的理由，但即使是这样也很难）为溺杀女婴和焚妇殉夫这样的行为来提供论据。由于欧洲中心论的消极方面的过度影响可能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而这肯定也会导致对历史史实的歪曲。

如果要讲一个关于世界历史而并不只是世界上某些部分的历史的故事，事实上还得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理解最近几个世纪之事。欧洲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起源。而在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并不是因为其与欧洲扩张的联系，而是因为其自身的闪光点。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的历史可能像欧洲历史一样为我们带来心灵的愉悦，陶冶我们的情操，指导我们的判断并开阔我们的思路。历史总是这样，每一部历史都有自己值得研究的原因。欧洲历史也是这样，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欧洲历史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亚洲、非洲或美洲的历史。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使用“欧洲”一词，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更难说清楚。由欧洲大陆产生的各种影响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欧洲人的著作以及那些与欧洲人相遇的人们的所见所感（无论友善的还是暴力的）来进行传播。通常欧洲人的共同点是不难看出来的。是通过语言还是态度来表达自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要理解欧洲人，那些欧洲人共有的语言和态度应当被作为历史性的问题来理解，这显然十分重要。但是这些语言和态度对于理解一个持久的、稳固的、被我们称之为“欧洲”的文明并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在数量上，现在可能有比从前更多的欧洲人对于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体制抱有强烈的信心，他们之中许多人对于推动统一怀有极大的个人兴趣或者说是热情，甚至有人（少数人）对之抱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信念。

但是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这种想法花了很长时间，而且让所有欧洲人都具有相似的意识还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并不奇怪。经过了数个世纪，欧洲人在其所拥有的不同的经历(或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将欧洲的行为和习惯塑造成了不同的形式。

历史能够增进我们的理解，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欧洲的定义和自我认同的现成例子。历史也不会为我们提供将拥有共同、持久的历史传统的成员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定义为欧洲的证据。这就说明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对于欧洲的忠诚必然意味着一些与过去所能认识到的东西完全不同的情况。太多的人曾试图在过去的身份上加入关于传统的自我认同的观念，或者至少是这种观念的雏形。实际上并没有不变的持久的欧洲传统，即使从欧洲流传来的许多思想和观念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在我看来，“欧洲”一词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意义变化，因欧洲人面临的不同需求和挑战而产生差异。欧洲产生的某些思想、制度已经断断续续地通过各种手段相互交融，变得精炼，并且更有效地起作用，还传播到了整个世界。这些思想和制度多种多样。在一定的时间内为了一定的目的，人们常常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使其发挥功效。

如果一定要为欧洲确定一个形象，在我看来，它应当被视为一个历史的熔炉。在欧洲(其范围甚至很难被界定)，某些时期内发生的某些事件以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在事件发生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这些影响现在被视为全球性的影响，这些发生在欧洲的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而由这些影响产生的后果最后又被作用回欧洲本身。通过这个影响的网络——或者我们更加形象地称之为传播系统(transmission system)——这些事件的影响覆盖了整个世界，而这个网络本身就是欧洲对于世界影响的产物之一：它使历史的发展形成了规律。反过来讲，这个网络丰富、批判和修改了被传播的内容：于是，欧洲的成为了西方的。现在新的文化创作，新的确定性已经开始明显地作用于地理上的欧洲。试图去判断欧洲遗产的性质实际上并没有意义；欧洲的任务已经完成。

或许有人会对这个结论感到不快，有人会感到失望，有人甚至会感

到可悲。然而,如果我们不再将未来的欧洲看做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角色,这便是一个成功的结果。欧洲历史不会由于曾经像产生过人权论一样产生过大屠杀而不值得被研究。这一切仅仅是一个主要的文明化过程和一个历史进程的结束,辉煌的时代已成过往。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去对那些已经远去的旧帝国统治的传播系统(再次使用这个比喻)、自信的传教努力、经济的剥削和技术的传播等感到惋惜(或进行庆祝)的借口,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几乎不起作用了。成功已很难被复制,所有剩下的工作就是去把握最后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由欧洲起源的那些价值观和思想固定下来,使之能在其他文化中稳定下来,即使这些文化看起来对于外来文化有排斥性。当然,由此产生的现实中的和物质上的对抗的升级必然会随之而来。五个世纪前许多文化与欧洲之间那种原封不动的、纯粹的文化边界将不复存在。(至少在这个星球上)不会再出现新的文化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也不会出现新的欧洲时代了。

668

但是,历史学家不应该做预言。那些明显的轮廓实际上是模糊的。我们并不能总是准确地描绘出这些轮廓,因为这些边界仍在不断地改变。这些改变之中的边界可能变得非常奇怪。而这也在未来的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回头看去,也并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曾经在欧洲紧密团结的基督教会,现在变成了天主教与新教。基督教内部长期的、富有成果的自我批判甚至是自我怀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完全世俗化的行为。尽管偶然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和 16 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迥然不同了。今天的传教士们传教所怀有的目的和信念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一个半世纪前的先辈们。很显然,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军火商还会显示出像文艺复兴时期希望禁止向非洲人出售武器的罗马教皇,或者小心翼翼地将印度军队中的大炮置于英国兵团控制之下的英国统治者那样的谨慎态度。所有这一切,还有其他更多方面,汇总起来可以说明,文化的迁徙已经改变了那些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形成的关于全球欧化的认识,因此,任何认为“欧洲”的对外文化性影响就像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一

样，无论接受者愿意与否都不可避免(但基本上都是被动的)的观点是荒谬的；这些自来水管现在通过别的方式来起作用，欧洲人有时不得不让自己来洗洗淋浴。

我们很容易认为，欧洲内部机构的形式变化将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无论这些想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欧盟可能需要时间来处理实际问题，调整利益分配，通过安排谈判消弭矛盾，调和积极与消极方面使之可以被接受以及尽可能地实现国家间的公平、平等，从而增强欧洲内部的凝聚力，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会比我们所期待的慢得多。同时还可能存在一些文化上的问题：例如对于大量的非欧洲移民而言，他们接受最多的东西仅仅是肤浅的欧洲式生活方式。像这样的挑战将会引起政府决策层更加尖锐的争论和立法。这样也许能阐明对于外侨待遇的共识(尽管这种共识令人怀疑，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共识)程度。不管是否能真的达成这种共识，但至少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无论如何，欧盟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合逻辑的事物，许多人依旧认为欧盟并不是欧洲的完美形态。东西欧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争论，而这种差异已经突显了多次。东欧与西欧两个文化区的长期存在并不是冷战的产物，也不是 1939 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产物，更不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历史条件下加入了新的限制性条件，特别是在市民文化、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和卫生的现实等方面。关于欧洲何时终结的辩论将一直持续下去。起源于犹太教经典的基督教世界发展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天主教欧洲与东正教欧洲。政教合一成为俄国难以磨灭的政治传统(而最近的历史表明仍存在这样的希望)，而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给其在巴尔干半岛国家中的政府带来了恶名。虽然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信仰天主教，但俄罗斯却不是：它没有罗马教皇，没有关于叙任权的斗争，没有中世纪的领主豁免权和公民自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参与地理大发现，没有来自本土的启蒙运动，也没有法国大革命。它直到 20 世纪才

669

完成了工业化，令人惊奇的是，是在来自西欧的思想框架内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俄国长期以来也是欧洲文明的传递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主要的传递对象是亚洲，但是，1918 年以后，俄国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是欧洲思想的加工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其吊诡地成为欧洲霸权的颠覆者。

这些信条在世界众多地区的吸引力进一步证明——当然这也是这些地区所需要的——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期待这个世界被改造成欧洲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的形象。没有迹象表明那些将抵制这个结果的人，能永远抵抗文明缓慢的侵蚀，那些文明的危险礼物对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对那些权势人物来说则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如此，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将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化的对立将会带有政治与经济对立的色彩。这些诞生于欧洲传统之下的事物，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里被他们文化上的对手谴责为魔鬼撒旦的信徒、邪恶原则的体现和政治经济上的侵略者和剥削者。然而这些拟人的手法只是一种比喻。我们（包括历史学家们）都使用这些说法，却常常并没有真正认识它们。比喻是最有帮助的工具，但是它的诱惑力使其具有更大的危险。我们很容易将某些现实甚至是人物归于我们所选择讨论或解释的单位中；也很容易不自觉地跌入理想化的状态，认为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所发生的事情是被新观念所启发的，或者认为我们视之为袭卷整个社会的一波疾病的传播或通货膨胀，是真正意义上或实际意义上的，而不是基于观察者对成千上万独立事件的分类，而这些独立事件可能被划分在其他的背景中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叙述。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用过一个说法，看起来对于思考欧洲十分有帮助。他谈道，欧洲的一部分——意大利——是“一种历史实体的代表，其中各种事件具有相似的影响和效果，并且这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限制的”。这个说法认识到一个框架长期以来对于欧洲历史的限制，这个框架尽管是一件紧身的夹克，但首先，它是一个只放映固定历史剧目的剧场。毕竟，欧洲这个名字第一次被给予一个地方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虽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确切地知道欧

670

洲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是否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但这一名词通常已经能在最小的地理范围上为人们所认同。在其范围内，甚至在狭义上，特定的事件建立起了特定类型的制度，各民族开始有意识地要拥有自己的历史意识，一些危机被克服，其他的则产生了灾难，而这些危机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人共有的经历或所经受的同一观念的影响程度能够（并且必须）被探讨；欧洲人所共同经历的东西，在同一时间并没有为亚洲人和非洲人所共同经历，这些东西十分重要，应该被作为历史所书写；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共同的经历，并且有时他们这个群体共同经历的事情，并不会与其他人分享。

任何时期内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认知都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如果有这么一个典型的人的话，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注定要与今天欧洲人所持有的观点大相径庭。在不同时期内，欧洲人一直在担忧"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希特勒对此极为重视，并且看起来是郑重其事的）。然而，关于美国化的警钟很难扮演19世纪在全球分享的"西方"文化那样的角色。数个世纪以来，对于伊斯兰教的恐惧成为欧洲人共有的观念，他们所想象的现代伊斯兰教中的某些元素现今仍困扰着他们。然而，从外部来看，伊斯兰教关于欧洲和欧洲人的描绘大多数都迷失在对"西方"的普遍反应中——认为其是一个唯物的、无神的、断裂的社会，正如那些满怀热情的穆斯林在前苏联和美国所见到的那样。视角发生变化，认知也随之变化，"欧洲"这个概念始终在不断完善和改进之中。如果我们觉得困扰，即便是像本书一样对历史作一粗略的探讨，可能对于着手解决问题也是有所助益的。

索　引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B

C

D

G

K

M

O

P

Q

R

T

V

W

X

Y

Z